

五十年無祭而祭

章詒和

沈志華

章立凡

徐慶全

謝 泳

章詒和
編著

Thinker Publishing

五十年無祭而祭

章詒和 編著

Thinker
Publishing

五十年無祭而祭

章詒和 / 編著

ISBN 978-988-994554-1

I. 五... II. 章... III. 中國當代史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開本/228 × 152mm

200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7

© Published by Thinker Publishing (HK) Limited 2007

Flat B, 23/F Broad Ville, 4 Broadwood Road, Hong Kong

發行代理/田園書屋 電話/2394 8863

定價/港幣\$100 / 新台幣\$400

五十年無祭而祭

目 錄

章詒和		
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		1
沈志華		
從波匈事件到反右派運動		15
——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鬥爭的思想歷程		
一、中共中央對波匈事件的反思		18
二、毛澤東設想和推動的黨內整風運動		50
三、黨內整風是如何轉向反右派運動的		79
章立凡		
“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		125
引 言：中國知識分子的結社傳統與近代政黨的會黨特徵		125
一、前世：知識分子黨派與農民會黨的結盟		127
二、無間道：在“陽謀”中陷落		150
三、今生：尷尬的花瓶		190
結 語		203
徐慶全		
“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		205
——1957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紀實		
一、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205
二、關於黨組擴大會議召開的背景		219
三、黨組擴大會議休會後的部署		233

四、復會後的黨組擴大會議	239
五、劉白羽的發言	249
六、陳企霞“轉向”	266
七、對馮雪峰의 批判	276
八、對李又然、蕭三、羅烽、白朗夫婦、艾青的批判	293
九、丁玲、馮雪峰檢討	301
十、對丁玲、陳企霞的組織處理	306
十一、“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313
十二、毛澤東發動“再批判”	322
結 語	324

謝 泳

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	325
一、反右運動史料範圍概述	325
二、反右運動始末及相關史料	326
三、“右派言論集”的史料價值	333
四、反右運動的影像史料	343
五、近二十年完成的右派回憶錄	345
六、長篇小說中的右派史料	349
七、方志中的右派史料	351
九、簡短結語	355

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

編者序

章詒和

我們為什麼要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紀念反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基本上認同學者徐賁先生的說法。他說：“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以牙還牙，而是為了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對歷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¹而我之所以說“基本認同”，就是另有個別部分，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記住過去“不是要算賬還債”。

據說徐先生已定居美國，他的觀點或許適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適合於我們這塊土地。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從鎮反到六四，運動無數，死亡無數，殃及無數。可是，運動的發動者，製造者，領導者，執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話沒有，一句道歉的話沒有，一點悔罪的意思也沒有，而是發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遺忘和實施強迫遺忘。要知道，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運動，都屬於群體性傷害。傷害最深的是社會底層，普通公民，無辜百姓。這是最嚴重的社會傷害與民族傷害。因此，我們有權要求算賬，欠債者必須還債，況且很多是血債、命債。在中國，“算賬還債”是“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對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難者傾訴痛苦的權利，其實也就給了執政者一個悔罪的機會。只要他們請求寬恕，中國的老百姓立馬就寬恕。不信，請當下中共十七大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們試試。

1 徐賁：《人什麼理由來記憶》《南方周末》2007.3.22.

那麼，欠債幾多？最完整的“賬本”，就是各種檔案、絕密文件、秘密會議記錄、秘密調查報告、秘密計劃、秘密決定、秘密決策等等。這些要緊之物，官方是不會解密的，不會公開的，更不會退還給你。有例為證：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級法院索要作為“現行反革命”罪證的十六本日記、札記和手稿。人家熱情接待，細心查找，讓你等個夠，等到最後給你一句懷着歉意、帶着溫柔的答覆：“對不起，我們找不到。”請注意：人家是說“我們找不到”，可沒說“東西沒有了”，更不說“東西找到了，就是不給你”。狡猾得這樣出色，無賴得如此完美，想發個脾氣都叫你發不出來，不愧執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氣倒在床。“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我的日記是從1958年開始寫的，那上面有父親的交往行踪，父親的談話牢騷，父親的詩作，一家人的生活記錄以及我的勞改日記。在當局封鎖真相、把持壟斷一切憑證、材料、檔案、文件的情況下，我們只有自己動手找“賬本”了。一個重要的賬本，就是記憶。由於我們這個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於許多個人保存的資料被銷毀，由於許多親歷者已經消失，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便十分寶貴了。

倖存者倖存下來幹什麼？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樂業，恐怕就應當是存留記憶和守護記憶。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記憶是一種測試，測試一個個體，一個民族的倫理責任和普世價值取向。俄國的普列漢諾夫，臨終前曾自語：俄國無產者，你們還記得我嗎？蘇聯元帥朱可夫死後，一位詩人曾這樣寫道：“他（指朱可夫）為自己的士兵哭泣過嗎？臨終之時，他想起了士兵嗎？”這兩個細節都令人喟嘆，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訴我們：回憶是飽含複雜情感感受的“向後看”。這個“向後看”內涵豐富，它蘊涵着對人對事的聯繫、關切，感受、體驗。所以，記憶不只是記住從前的人與事，它們還留住了聯繫、關切、感受、感情、體驗。故爾，記憶在本質意義上代表並記錄着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環境，人與時代，人與自身最持久、最細緻、也最深刻的聯繫。

自從《往事並不如烟》(牛津大學出版社版《最後的貴族》)出版，很多人給我來信或打來電話，說：“我也想寫，但因不是名人，寫了也沒人看。”我聽了，一再解釋，且焦急萬分。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底層搭築而成。普通百姓的記憶當是社會最真實、人類最重要的記憶。個人的記憶，表面看來微不足道。但所有親身經歷者的記憶，聚合起來才能成為共同記憶。中國大陸的每一個政治運動傷及百姓都以數十萬計，乃至數百萬、上千萬。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性回顧，都屬於共同記憶。由於執政者長期查禁和親歷者大部死去，原本的“共同記憶”就成了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報》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堅強的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語。我剛看到它，心潮洶湧，立即給成都朋友發送郵件。說：“我一整天都在激動！這個民族沒有死滅，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地表達我的欽佩和敬意。”很快，興奮成了傷感。原來它的順利出台，是因為報社從業人員根本不知“六四”為何物，不知“六四死難者”為何人。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來，距離天安門廣場那個血色夜晚，還不足二十年，而我們的年輕人已茫然不知了。這是愚昧瘠貧土壤培育出來的碩大無比的時代苦果，讓今天的每一個人來咀嚼吞咽它。

殘酷吧？現實從來就殘酷。國內不少“八九”精英，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們心結。到了那個日子、那個鐘點，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開着私家車圍着天安門廣場轉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會、賺錢，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漸成儀式。這樣做，也好。儀式起碼可以承載哀思，並提醒人們“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該幹嘛幹嘛了。這樣做，對不對？當然也對，再是英雄豪傑，不也得過日子嗎？但我心裏總覺得彆扭。事情是需要比較的。一比較，質的差異，深淺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

我非常尊敬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女士。

多少年了，她堅持不懈地調查文革的死難者，調查他們的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家庭、死因。與宏大的文革敘事相比，她做的事簡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萬別小看這些“碎片”和“粉末”，它們是珍貴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帶血。它們還是強力粘合劑。由於有了它們，“文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才有難以撼動的基本數據和無法塗改的基本輪廓。有了數據、有了輪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國，做了我們本當做的。我們當中有誰在調查“六四”的死傷者？須知，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難忘那個不斷揮臂擋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麼，是從哪裏來。可為什麼那些政治人物都沒死，那些社會精英都沒死，那些學生領袖也一個沒死？死的都是無名之輩、可憐的孩子。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後就再沒有爬起來的孩子們，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十八年了，為什麼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俗話說：雁過留聲，人死留名呀。

我尊敬的另一個人，是個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個深秋的黃昏，他給我打來電話，說：自己是個小小行政幹部，也是個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見一面。

我說：“天色已晚。明天找個茶社或飯館，我們邊吃邊喝邊聊吧。”

“不。”他說：“我要說的事，是不能邊吃邊喝邊說的。”

口氣不容商量，我答應了。心想：什麼話，有這樣重要？

第二天傍晚，他來了。儘管初次見面，可濃重的鄉音，把我倆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在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之後，就進入正題。

他說：“章老師，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寫我的往事。”

“好呀！”

他說：“你寫的都是上層，我要寫底層。”

“那你能簡單說說嗎？”

“簡單說，就是你寫貴族，我寫饑餓。”說着，從黑色公文包

裏抽出一卷圖紙，說：“我要寫的都在這裏。”

圖紙平鋪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們像是農家村落平面圖，毛筆手工繪製。除了豬圈，雞舍外，其餘均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個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寫着三個人的姓名，有的是兩個，有的是一個。

他抬眼望着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像是農家院落的平面圖。”

“章老師說對了。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個幾十口的大家庭。”他逐一指給我看，講給我聽：哪間屋住的是父母，哪間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間是伯父孀娘，哪兒是兄嫂子侄們的房子。繼而，他抽出第二張圖，第二張圖是1959年的家，第三張是1960年。每張圖的格局都一樣，可房屋裏標注的姓名，越來越少。

翻到最後一張——圖上，一個小屋裏，只有一個人的姓名，其他房間都是空白。

我說：“只剩一個人了嗎？”

他抬眼望着我說：“只剩一個人了。”

“剩下的這個人，還活着嗎？”

“還活着。”

“他在哪兒？你認識他嗎？”

“他在這兒，就是我。”

愕然，啞然。悲而喜，喜而悲！過了好一陣，我問：“原來的人去哪兒了？”

“都餓死了。章老師，整整一個村子都是黃塵滾滾，不見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淚水沿着面頰滾落。

他告訴我：成了孤兒，自己就立誓——長大後一定要寫家史，寫饑餓史。後來，村幹部可憐他，負擔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學。孩子聰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機關幹部，還入了黨。但他一刻不曾忘記當年的誓言。

他對我說：“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圖上那間小屋說：“我要回到這裏，開始寫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寫完了，就寫鄰居的；把我們村寫完了，就寫鄰村的。一個村、一個村地寫下去。”五十年來，多少鮮花是盛開在劇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現在，他要摘掉艷麗的鮮花，恢復原貌，原色，原本。

“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樹。”安徽老鄉走了，消失在京城美麗的暮色之中，我卻久久不能平靜。我知道，他的記憶儘管是極其珍貴的直接見證物，但終因個人記憶的分散性，大概無須多久，或遺失，或流散，或被消滅。因此，我們必須把個人記憶納入一個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裏，個人記憶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公共空間裏，個人記憶才有可能轉化為共同記憶，“粉末”與“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個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和我們的後代子孫，也才有可能通過這個公共空間承擔記憶，也承接記憶。二戰大屠殺的猶太倖存者的見證，已經為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個人和民族提供了“災難見證”與“災難見證保存”的典範性先例。一切災難都是人性災難。所以，這些“災難見證”，無一不是對一個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質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倫理教育。它相比於我們這裏搞的各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對現實的見證，同時也是對未來的見證。它不是叫孩子們去“愛國”——愛某個政黨，而是使孩子們變得更好，了解自身，長得有個人樣兒，也活得了個人樣兒。

再把話題扯回反右。究竟毛澤東的反右運動針對誰？是什麼性質？這話還用問？當然是針對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大陸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但是，當我閱讀了西方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猶太問題研究資料以後，才明白自己的認識何其淺薄。漢娜·阿倫特是一個德國猶太女人，一個美國學者。她專門從事猶太問題和極權主義的批判性寫作與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誕辰

(1906—1975)，大陸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時代的人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等，讀她的書，內心非常震撼。

漢娜·阿倫特的與眾不同，要以一樁官司來說明。1960年，以色列情報部門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國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這個人是貨真價實的劊子手。正是由他負責，將三百萬猶太人送進了死亡集中營。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開始受審。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當然擁有審判權，而以何種罪行控告他，卻成為問題的關鍵。提出這個問題，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叫荒唐。負有三百萬命債的人，還缺少罪名嗎？自當“從嚴、從速、從重”處理，宣佈死刑，立即執行。

漢娜·阿倫特的與眾不同處正在這裏。她認為審判阿道夫·艾希曼面臨的是“由國家機器所組織的行政謀殺”，而西方社會在二戰後紐倫堡審判中首次把“行政謀殺”確認為是“具有現代特徵的新型罪行”。這種罪行的性質是對人類犯罪，納粹極權是人類之敵，她不同意將這一場人類的浩劫，僅僅放在猶太人受難史中去認識。大屠殺是非常殘酷的，從成因到過程也都異常複雜。其間有納粹的命令，也有猶太人的順從，甚至是合作。因為在納粹暴力下，猶太人為了個人的生存、利益，就盡量去妥協，對他人冷漠，對世事麻痺。結果呢，每個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氣兒的日子，到了後來連逃避恐怖的一點可能性也沒有了。數百萬人排着長隊被納粹送進集中營，送進毒氣室，送進焚屍爐。

1961年，漢娜·阿倫特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赴以色列參加報道審判。她想，這個劊子手能不是一頭野獸嗎？當阿道夫·艾希曼被帶進法庭，她手中的筆滑落到地板上，緊張又意外。這個人不單不像野獸，倒像一隻“被關押的綿羊”，說話措辭文雅，理智平靜，回答問題一絲不苟。阿道夫·艾希曼還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當眾絞死，自己對此感到滿意。現場審判的情景，使漢娜·阿倫特

認識到：有名的大戰犯原來是個級別不高的公務員嚴格遵守紀律，認真執行命令，絕對服從了帝國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兇殘和受虐者的順從，在漢娜·阿倫特那裏，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義，它們一起指向了極權！所以，她要求審判阿道夫·艾希曼時，必須以全人類的名義，應該盡可能多地公佈真相！不是公佈一部分，遮掩另一部分，被遮掩的部分往往是“陰暗”篇章和“灰色地帶”，布滿傷痕，也充滿教訓。但要想避免類似的災難再度發生，就必須這樣做，絕不能把災難的罪責全部放在具體行為者的身上。否則，就是一種“集體自我欺騙”和“集體失憶”。它的危害不在於給歷史留下空白，而在於危害全人類的未來。

反右不也是這樣嗎？1957年夏季，對章伯鈞、羅隆基從政治批判到組織處理，其間的每根鏈條、每一環節，皆由民盟中央領導人及其成員操作。當然，運動是毛澤東發起的，運動的步驟、方針、策略是由鄧小平領導和中共中央統戰部一手籌劃制定的。但具體落實到每一場批判會的佈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寫以及每一個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確定與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幹的²，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學者。沒有他們的熱烈擁護，積極配合，主動出擊，民主黨派的反右運動能那麼酣暢淋漓、滿盆滿鉢嗎？在這本書裏，徐慶全先生《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國大陸文壇反右的情況，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膽俱寒——上邊為了搞丁玲，決定從陳企霞下手；為讓陳企霞低頭，決定先從他的女友柳溪下手；為了叫柳溪開口，決定找到於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一番功夫，幾番撥弄，目的達到了，也準備停當。當柳溪站到了批判大會的講台前，一向嘴硬的陳企霞驚懼不已，精神幾乎崩潰，“像木頭似的杵在那裏”³。批判會前，中共文藝總管周揚還特地接見了柳女士、這個紀曉嵐六代孫，並指示：“柳溪是起

2 詳見拙作《雲山幾盤，江流幾灣，極目天涯空腸斷——章伯鈞在1957》一文，見《順長江，水流殘月》，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3 徐慶全：《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同見本書。

義，不要劃為右派，也不要開除黨籍。”⁴ 會後，陳企霞不得不低頭認罪，並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交代揭發問題。妻子趕緊向上匯報，周揚得知情況後，連夜接見陳企霞。親切握手，說：“黨是要你的。”⁵ 沒幾天，當丁玲看到陳企霞站到批判大會的講台前，這個堅強高傲的女作家，同樣驚懼不已，精神失去支撐。她“無以作答，欲哭無淚，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⁶ 一切都是由周揚親自指揮的，但又是在整個文壇積極響應下進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揚早就說了：“利害之心勝過是非之心”⁷，為了身家性命，對朋友，對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純的愛情也都不得不拋撇於身後了。結果，周揚並未兌現“黨是要你的”的承諾，他們被一網打盡。“在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持。”⁸ “順從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⁹

所有的順從，都可用人的趨利避害之本能來解釋。實際上，這是國家在極權主義道路上，人類於絕境中摧毀人性、侵犯人性、殘害人性的表現。所以，漢娜·阿倫特在她撰寫的《極權主義之源》一書的序言裏，這樣寫道：“它（指極權統治）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裏實行，它都在摧毀人的本質。”這位傑出的政治哲學家一再強調：由於人殘忍地對待他人，才使一部國家機器、一個政黨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層層官員、級級組織），得以大規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惡吞沒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沒者所表現出來的惡，漢娜·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則更具普遍性，更可怕。舉個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風鳴放高潮。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貼出一張題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的大字報，公開為胡風招魂（劉以為胡風死了）。很快運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漢娜·阿倫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結語·後記）》，《“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版。

9 同上。

動從鳴放轉入反右，北大同學對劉奇弟的圍攻，從一開始就異常猛烈，強迫低頭彎腰，直呼其為‘反革命分子’。劉奇弟不服氣，即招來更嚴厲的懲罰。只要他開始講話，便有同學上去搨他的嘴巴。這個痛心的例子，足以說明順從者的作用了——說明“在極權制度下，不必是惡魔，任何一個平常的人都可以成為劊子手……任何人都可能無端地成為暴力殘害的對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為兇殘狠毒的打手。誰在極權制度中‘盡忠職守’，誰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對錯，不再能察覺自己行為的邪惡”¹⁰。這是漢娜·阿倫特極其精闢的論述！

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喪失人性，每次運動都是這樣，豈止一個反右。後果是整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道德淪喪；後果是從圍觀活剝狗皮到山西黑窩奴工現象層出不窮，驚心動魄，且延續下去。面對某種強大的存在力量，個人情感與需求無論多麼重要，多麼真實，似乎都無須獲得尊重。於是，連人的生命也都變得像草一般，輕飄飄。難怪任何一次災難發生，傳媒都不怎麼報道死難者的情況，五星紅旗也從不為哀悼死難者下降半寸。還記得嗎？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瑪依發生了那場震驚中外的大火，325條生命瞬間喪身火海。其中，288位是成績優異且多才多藝的孩子。就在那令所有的人悲痛不已的日子裏，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仍然高高飄揚。我和同事們氣憤得真想搭個梯子，把它扯下三尺。真的，快別給咱的孩子上什麼充斥着意識形態內容的政治課了，也快別在中央電視台給咱老百姓灌大碗“心靈鷄湯”了。要緊的是恢復人性，恢復人的常態！現在，哪一級政府、哪位官員誰能明確告訴我們：在專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當來於何處？家庭？學校？還是政黨？他們恐怕無法回答這個嚴峻又急迫的問題。良知的獲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識的，即“捫心自問”。遇事“捫心自問”，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儘管今天的神州大地處處高喊“以人為本”的口號，但當下的各級政府和官員缺的就是人性。

10 徐賁：《卡茲納與艾希曼：往事與爭議》《南方周末》2006.11.16.

更糟糕的是，我們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導致各種聞所未聞、屢禁不止的醜態，醜行，醜聞。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讓官員有高學歷或上黨校所能解決問題的。父親很早就告訴我：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黨衛軍裏就有許多博士，而反動的排猶運動也非希特勒一人所為，它還是遍及歐洲的普遍情緒與思潮。

面對共同記憶，面對過去創傷性記憶是需要全民族來共同承擔的。反右運動的歷史不是五十五萬右派和他們的親屬子女的私產和包袱，也不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私產和包袱。我們既要從政治體制上追究歷史的罪責，同時還要從人性的深層拷問民族、群體及個人的責任。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把反右運動研究定為1957年學，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¹¹ 因為五七歷史，就是“人禍史”。反右運動從政黨性質、意義上消滅了民主黨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滅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當人，也不把別人當人。漸滅人性，摧毀人倫，將每個人潛藏很深的動物性、獸性都開掘出來，泛濫於社會。五七歷史，是“背叛史”。中共公開背叛盟友，公開背叛聯合政府的誓言，公開背叛憲法和國民。當然，中共也是徹底背叛了當初的自己。就像當年聶紺弩滿懷悲憤對準備入黨的戴浩所言：“這個黨你想進去，我正想出來呢！當年，我要是知道共產黨是今天這個樣子，我決不會參加的，它簡直比國民黨還糟糕。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其實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產黨自己。因為所有的錯事、壞事、骯髒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義和‘正確’的姿態做出來的，可憐中國的小老百姓！”¹² 五七歷史，還是“獨裁史”。毛澤東通過反右，兩手掀翻聯合政府，一腳踢開國家憲法，在一個被稱之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度裏，全面復辟封建專制。從最初標榜的人民民主專政，退到無產階級專政，再退到“一個人說了算”的個人獨裁統治，只經過了七年。咋才用七

11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12 拙作《最後的貴族·斯人寂寞》，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毛澤東靠的就是一系列運動。因為“能够使大眾政治化的，不是政黨而是運動”。¹³ 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獨裁竟然像一份珍貴遺產，被以後幾代中共領導人和決策層保留繼承下來。毫不過份地說，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所有的黑暗都與“這份珍貴遺產”相關、相連、相通。為什麼許多事情要最高領導人批示才管用？難道龐大的行政機構和上千萬的公務員全是窩囊廢？不，原因就是我們的政權性質——還是“一個人說了算”。

我讀到過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運動的發動者、領導者大罵一通，再以最正義的理由把它“鏟除”。1949年以後，共產黨就是以這種方式對待地主、富農、舊軍政人員、工商業者、教授學者、知識分子的。我們不能如法炮製。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須的清算與必要的懲處，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結束“以暴易暴”的歷史傳統和政治循環。所以，我要說：紀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義是為了五十年後，百年後。

我們紀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賠是應該的，討個說法也是應該的。為什麼不賠？而且應該從中共的黨產裏拿出錢來賠償！道歉更是起碼的事了。賠償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產黨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裏曾有講述——1958年，父親（章伯鈞）劃為右派，戴上帽子。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三個被撤職的內閣部長（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氣氛凝重，談話簡短。

接見臨近收尾，父親問：這個運動劃了多少右派？

周恩來答：大概有二十二、三萬吧。

父親後半輩子都在念叨這個數字，像背十字架一樣背着它，走進墳墓。父親哪裏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數字是五十五萬，受難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紀又有了更新的數字是一百萬以上。每個劃為右派的人，他們的姓名，他們的命運，

13 川崎修著，斯日譯：《阿倫特公共性的復議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結局呢？還有整個政治事件的前因，後果，性質……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嚴密封鎖，因死守“反右擴大化”的結論，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們不能像對待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那樣，自己說被殺者三十萬，那麼請出示三十萬人的名冊，我們卻拿不出來了。連“南京大屠殺”的紀實影片，也是外國人拍攝的。一位姓陳的先生看影片，在網上寫道：有錢的沒錢的，有車的沒車的，工作了結的沒了結的，都該掏錢買票去電影院，領回屬於自己的那份耻辱——這是多麼痛苦的呼籲啊！所以，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對反右運動，共產黨必須交代清楚。我們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過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國人對二十世紀血淚歷史的梳理、反思、歸納、研究、總結，才剛剛開始。

重要的是——開始了！我們決不後退，誰也無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接到中學（北京師大女附中）同學曉琳打來的電話，我頗感意外。多少年了，我們彼此相知，卻無聯繫。她知道我一個人度日，我知道她與生母相依。

曉琳說：“我花了一百多塊買了你的書（指《最後的貴族》）。”

“你買的書，居然這樣貴？”

答：“等我知道它的時候，已經被禁了。我是在黑市買的。”

“曉琳，謝謝你的閱讀。”

她說：“我看了，心裏非常難過，非常痛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我的父輩對不起你的父輩，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民主黨派。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對不起所有知識分子，更對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連幾個“對不起”，從沒聽見過的“對不起”，像層層細浪拍打、濕潤着一顆衰老乾枯的心，我嗚嗚地哭了。曉琳也啞聲而泣。

後來，我們各持話筒，默無一語，只有哭泣，哭泣。

她是誰？她是林彪的大女兒，親骨肉。

“嘆烏衣一旦非王謝，怕青山兩岸分吳越。”我需要記憶，她需要記憶，我們帶着各自的感受與體驗一同記憶。

2007年6—7月於北京守愚齋

從波匈事件到反右派運動

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鬥爭的思想歷程

沈志華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作為執政黨，中共不斷發動群眾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其中最令世人矚目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於政治的原因，國人(包括學術界)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比較充分，研究也相對深入，但是對於反右派運動的思考和研究卻始終沒有展開。到今天，那場與文革相比同樣是震動社會、摧殘人心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整整半個世紀了，人們需要、也希望了解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是怎樣發生的。

其實，從毛澤東的思想歷程來看，反右與文革是一脈相承的——反右就是文革的預演，文革就是反右的繼續。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那時發動一場波及全國的反右派運動？筆者的研究表明，實際上，在1956年和1957年，毛澤東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過程。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執政黨認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下一步的中心任務就是搞經濟建設，盡快實現工業化。為此，就需要調動全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積極因素。恰值此時，蘇共召開的二十大提出了一套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方針，進一步刺激了中共的思考。於是，毛澤東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十大關係”，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主張，而這些方針和主張在中共八大被確定下來，構成了八大路線的主要內容。中國似乎要走上一條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

社會主義道路了。

然而，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都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危害以及東歐各國民眾的反抗情緒，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了一片混亂和恐慌。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可能喪失。這種危險的主要根源不是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而在於人民大眾對執政黨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一旦這種情緒蔓延和膨脹起來，勢必為國際階級敵人所利用，進而推翻共產黨的統治。於是，毛澤東認為，主要問題出在共產黨內，並提出今後的中心任務就是調整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此則需要採用民主的方式開展整風運動，以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

毛澤東沒有想到，他的主張遭到了黨內多數幹部的反感和抵制，而他倡導的雙百方針和大鳴大放的做法則受到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歡迎和擁戴，再加上在毛看來，經過幾年的改造運動，知識分子已經歸順了黨的領導，於是，毛澤東決定邀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實行開門整風。然而，民主黨派座談會召開不久，毛澤東就敏感地認為，這些鳴放的言論有兩個危險傾向：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此後，在中共中央“引蛇出洞”策略的引導下，鳴放言論越來越激烈，特別是由此引發的學生運動同農民退社、工人罷工攪在一起，使毛澤東感到“中國有出現匈牙利事件的危險”。中共高層一致決定，必須重新開展一次群眾性階級鬥爭，堅決打擊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於是，黨內整風便迅速轉為全社會的反右運動。

概括起來，波匈事件—黨內整風—反右運動，這個三步曲大體上構成了那場政治運動如何緣起的歷史過程，反映了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綫、重提階級鬥爭的思想歷程。

本文的研究是以充分的史料為依據的。筆者首先研究了大量文獻史料，特別是有選擇地查閱了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陝

西省、雲南省五個檔案館有關整風反右的檔案材料。¹ 同時，還利用了許多有代表性的當事人回憶錄。作為當時的新聞報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都很重要，但在筆者看來，在報刊類中，最值得注意的應屬新華社發行的《內部參考》。至少在反右運動進入高潮之前，這個刊物的報道還是尊重事實、實話實說的。² 要梳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當然需研究他在此期發表的講話、報告、指示、文章，但這類材料很多，且虛實兼備，更因對象不同而各有側重，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因此，在考察和理解毛的公開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時，筆者重點利用了兩個史料。一個是毛澤東秘書林克的日記手稿，那裏記載了不少毛澤東私下談話的內容。³ 一個是毛澤東修改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經過和具體內容。⁴ 這是觀察毛澤東此時思想變化的兩個極其重要史料：一則，就真實性而言，毛對他身邊人員透露的心聲大概比他的公開講話更可靠；二則，毛本人把《正處》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修改時反反復復，字斟句酌，不厭其煩，而這個過程恰恰與整風向反右轉變的過程同步。所以，毛澤東對局勢估計、對問題認識的變化，應該比較真實地反映在這些史料中。

在仔細梳理和認真研究上述史料的基礎上，筆者試圖客觀地重現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中國政治局勢變化的複雜過程，向人們提供一幅反右運動緣起的真實畫面。

- 1 在各省市檔案館中，除了中央決策的內部討論情況外，幾乎可以找到所有關於整風反右的材料。這裏不僅有中央下發的指示、指令、通知等文件，還有各地運動開展情況的總結報告和具體問題的請示報告，甚至有地方每天向中央匯報的詳細電話記錄。所以，只要甘於坐冷板凳，有關整風反右的史料並不難找到。
- 2 《內部參考》當時是供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的刊物，1949年創刊，1964年停刊。現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等機構和圖書館有收藏。
- 3 筆者在這裏要感謝林克家人提供的林克本人親筆所寫的1955-1964年的日記，其中記載的都是這些年間他陪伴毛澤東的情況。雖然內容簡單，但很有價值。
- 4 見施肇城：《〈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重要理論觀點的修改始末》(以下簡稱《修改始末》)，《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逢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誕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形成過程》(以下簡稱《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4、5、6期。

一、中共中央對波匈事件的反思

1956年11月，東歐的十月危機過去了，華沙和布達佩斯也逐漸平靜下來。⁵然而，波匈事件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影響卻遠未消失。1948年蘇南衝突爆發時，社會主義陣營曾出現過一次“地震”，其結果是東歐各國被迫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對於鐵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權力和威望發動一次政治圍殲戰，通過召開共產黨的國際組織會議解決問題。這一次情況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產黨情報局都已不復存在，莫斯科面對的也不是幾個共產黨領導人，而是成千上萬走上街頭的民眾。如果不肯讓步，那麼通過武力(布達佩斯)和武力威脅(華沙)應對危機，似乎就成為蘇聯唯一的選擇。中共領導人並非在原則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對哥穆爾卡的支持僅僅是因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會主義，而當毛澤東認定納吉已經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時，便堅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鎮壓的主張。然而，痛定思痛，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中共及其領導人不能不思考：導致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條件在中國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東歐危機會不會在中國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共作為執政黨該如何應對在中國已經出現的群眾鬧事現象？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問題出來後，中共的主要精力在於統一黨內的思想認識，並在此基礎上調整執政方針和路綫。通過召開八大，這些目的已經達到。現在突然又冒出一個波匈事件，而且其影響和震動遠遠大於前者。那麼，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經驗、教訓？⁶

5 筆者對波匈事件的最新研究見《1956年10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1956年的波蘭危機與中波關係——來自中國的檔案文獻和內部報道》，《俄羅斯研究》2006年第3期。

6 關於這個問題，凡是研究1956—1957年中國歷史的論著幾乎都會有所涉及，例如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但是專門的研究和論述却很少見。

1.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不同聲音

劉少奇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從莫斯科回國後，11月10日，中共召開了八屆二中全會。參加會議的共296人，分為九組。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了六天。⁷ 會議由劉少奇作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共講了六個問題：中蘇關於波匈事件協商處理的經過；發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的問題；朝鮮問題；越南問題；中共的方針。

劉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點是“廣大群眾的反蘇運動，是社會主義內部的問題”，接着提出這兩個事件性質不同：“波蘭事件非馬克思主義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領導權”。在詳細介紹了波匈事件的處理經過後，劉少奇對這次“共產主義內部最嚴重的事件”分析了其發生的遠因和近因。遠因之一，波蘭和匈牙利都是蘇聯解放的，在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沒有把工人和農民階級組織起來，也沒有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知識分子沒有思想改造；肅反中犯了錯誤，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卻沒肅清；工農缺乏階級覺悟；對待民族問題也同樣沒有階級觀點。遠因之二，重工業投資過多，不重視輕工業、農業，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有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遠因之三，搞教條主義，照搬蘇聯不靈，便失去信心；蘇聯干涉其內部事務，有大國沙文主義錯誤，損害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尊嚴。近因之一，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在黨員群眾中引起混亂；二十大後控制不住，煽起反蘇、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發生初期，蘇聯處置不當，特別是波蘭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進行煽動。談到中共的立場，劉少奇說：我們的方針，第一點是中蘇兩黨團結。第二點是做好我們的工作。第三點是給兄弟黨提意見要謹慎。⁸

7 八屆二中全會記錄：第一次會議，1956年11月10日。這次會議的報告和發言，除毛澤東1月15日講話經整理全文發表外，其餘都只節選了部分內容刊出，或完全沒有發表。本文所引相關文件，除注明者外，均為與會者個人記錄。

8 八屆二中全會記錄：第一次會議，1956年11月10日。這次會議的報告和發言，

關於如何以波匈事件為前車之鑒，以免重蹈覆轍，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少奇指出：鑒於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階層，特殊的“統治階層”。劉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裏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裏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關於防止新貴階層出現的措施，劉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須對權力有所限制，對人民實行民主：“什麼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麼事情不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只能對反革命階級、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對人民群眾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人民內部只能實行民主。當然，這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講的大民主、無領導的民主。”其次，“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份懸殊”。這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特權等。還談到了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劉少奇認為在這方面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他列舉了美國華盛頓、艾森豪威爾、馬歇爾的例子，又借用毛澤東的話說：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麼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最後，劉少奇講到了經濟發展方針的問題，強調說：“我們工業建設的速度要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什麼叫穩妥可靠呢？就是群眾不至於上街游行，不至於鬧事，還比較高興，能保持群眾的那種熱情和積極性。”他贊同陳雲的意見，也主張經濟建設速度寧可“慢一點”，“穩當一點”。⁹

劉少奇的傾向是明顯的，即在共產黨內部找原因，所談的預防

除毛澤東1月15日講話經整理全文發表外，其餘都只節選了部分內容刊出，或完全沒有發表。本文所引相關文件，除注明者外，均為與會者個人記錄。

9 《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上冊，第515-518頁。

措施，重點也是改進執政黨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報告把問題的落腳點鎖定在經濟方針，把波匈事件的教訓與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聯繫起來。

接着，周恩來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周先談了波匈事件的兩個教訓：第一點，在中國，對周圍兄弟國家也有個別大國主義的做法，對兄弟民族也還有大漢族主義傾向，也產生過領導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利益的事情。周恩來特別指出，中國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着”。第二點，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周特別強調後者，提出：“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但“如果不關心人民當前的利益，要求人民過份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

由此談到經濟建設速度問題。周恩來說，中共八大提出建設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時間是恰當的，現在看來，時間可能還要長一點。周恩來委婉地指出：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可以放慢一點，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他以鋼產量指標為例：原來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末達到年產3000萬噸，照現在的速度不可能實現，所以八大確定的指標是2000-2500萬噸。從減緩工業發展速度的設想出發，周恩來又提出，八大建議的經濟指標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都還“只是個建議”，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認為：“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

為了制定1957年的經濟計劃，周恩來認為應該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正確的評價。周提出了“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討論”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周重點講了錯誤：“第一次制定五年計劃，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當。1952年提出的五年計劃是粗綫條的，然後1953年、1954年、1955年不斷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計劃還要修改。計劃不那麼準確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缺乏經驗和知識，是在不斷地發現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前進的。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¹⁰周恩來還專門講了1956年的冒進問題。他說，從1955年年底反右傾保守開始，經濟領域就刮起冒進之風，1956年勢頭更猛。雖然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人一再剎車，效果卻不理想。周列舉了一系列數據，說明1956年的計劃“總的說是冒進了一些，就是數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關於1957年的計劃，周恩來宣佈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的方針：保證重點，適當退卻或適當收縮。周恩來特別提醒說：“總的方面是要收縮下來，不然站不穩，那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國務院提出了一個生產控制數字，適當收縮，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設投資，還要減少國防和行政支出，凍結編制、預算以及國防和地方的結餘，注意平衡物資，安排就業，再大力開展一次增產節約運動。¹¹

第三個報告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陳雲。11月11日晚上，陳雲在全會上作關於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全會專門提出糧食、豬肉、食油這樣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是因為當時這些基本生活品供應出現了緊張局面，並引起社會不安。首先是糧食緊張。陳雲報告說，明年糧食將有50億斤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

10 以上引言見《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9-238頁。

11 以上引言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周恩來報告，1956年11月10日。

不如現在收縮。”¹² 副食品裏豬肉供應緊張最為突出。陳雲提出，增加生豬生產的方針就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同時採取措施解決飼料問題和適當提高收購價格。陳雲還集中講了對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認為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刺激了農民的生產活動，活躍了城鄉的物資交流，推動了國營和合作社商業機構的改革。儘管開發市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解決的辦法不是收緊，而是在明確規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放開價格和管理。¹³

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的報告，分別從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各個方面觸及到現行體制和政策問題。這種觸及當然是很有限的，但執政以來中共領導人還沒有如此重視制度的改進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鑒和國內政治經濟的某些緊張現實，不能不使他們擔心在中國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會上，表示出這種憂慮的還不止是劉、周、陳。在分組討論中，各地方和部門負責人都反映了不少問題——住房短缺、電力不足、鋼材和生活日用品供應緊張等，還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現象——機關層次和人員應該減少，財務、警衛、用車、看病制度必須改革，幹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對這種局面感到擔心，朱德說，“現在看起來問題很大”，東歐國家的經驗值得重視，搞重工業要注意和輕工業的關係。董必武指出，冒進思想不解決，二五計劃還會發生問題。西北組在討論時反映，市場供需有矛盾，蘭州衣食供應都緊張，如此下去，難免發生波茲南事件。¹⁴

仔細閱讀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記錄可以發現，會上也有不同的聲音，這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插話、講話和總結報告中。

在劉少奇作局勢報告時，毛澤東的插話已經表露出某種不同看法。對於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質的分析，中共中央內部似乎並沒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如何處理中共面臨的問

12 八屆二中全會記錄：陳雲報告，1956年11月11日。

13 《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6頁。

14 八屆二中全會簡報和小組發言記錄，1956年11月。

題和矛盾時，便顯露出不同的傾向。比如，劉少奇談到越南對土改時殺人過多感到“憂慮”，毛澤東插話：“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革命嘛！”劉少奇談到積累要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經濟建設要穩當一點，右傾比“左”傾好一些。毛澤東插話：那要看什麼右。¹⁵

特別是當周恩來、陳雲的報告把汲取東歐國家的教訓主要歸結為實行穩妥的建設方針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時，毛澤東感到有必要站出來扭轉會議的大方向了。於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組長會議，並發表講話。與周恩來“大冒了一下”的估計不同，毛認為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農業、工業和輕工業生產都有所增長”。“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他事業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不正確”。此外，對會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毛講話的重心同劉、周、陳的報告也有不同。他說：“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出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至於1957年的經濟計劃，毛贊同在某些方面做適當壓縮，但是仍然重申：“雖然如此，我們的建設事業還是前進的”。最後，毛澤東提到階級矛盾問題和對民主的理解，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應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¹⁶這顯然是針對波蘭和匈牙利出現的社會動蕩而言的。

全會最後一天，11月15日，毛澤東作總結報告，更明確地表達了對中國應該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看法。¹⁷首先是關於經濟方

15 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

16 八屆二中全會記錄：毛澤東在小組長會上的講話，1956年11月。

17 以下毛澤東11月15日的總結講話，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3—329頁。

針，他對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最不滿意的地方就在這裏。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我們應當告訴幹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針對周恩來關於一五計劃“基本正確，成績很大，錯誤不少”的估計，毛說：“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麼大錯，有什麼根本性質的錯誤”，“至於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特別是對周恩來、劉少奇有關冒進的提法，毛告誡道：“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毛澤東因此建議，把國務院預算報告中“穩妥可靠”的講法改為“充分可靠”。

對糧食、豬肉供應這類民眾生活問題，毛澤東也感到問題很大，要求領導幹部好好把糧食問題研究一下。不過，與劉、周、陳主張盡量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態度不同，毛澤東再次強調：“群眾要求辦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解釋清楚，也是可以解釋清楚的。”還指責報紙一年來“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澤東又突然提到鎮壓反革命問題：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台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為了解放生產力，“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這種莫名其妙轉化話題的做法說明，即使談經濟建設，毛也要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問題。

針對東歐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已經丟掉，列寧這把“刀子”也丟掉相當多了。就在半個多月前毛澤東還支持波蘭人，現在則認為：哥穆爾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他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

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訓就是：“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毛澤東又用很大篇幅專門談“大民主”和“小民主”問題。波匈事件發生後，基層幹部和知識界人士議論紛紛，很多人認為，蘇聯、東歐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革命勝利後沒有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中國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來。11月初，毛澤東委托他的秘書兼英文翻譯林克到新華社，找國際部主任王飛、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談蘇共二十大以後的情況和問題，他們提出了議會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分權削權、選舉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問題。李慎之還具體提出，應制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在小學和中學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建立憲法法院等，他自以為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結果呢？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¹⁸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制度，無論“大民主”還是“小民主”，都不過是階級鬥爭和政治統治的一種手段，而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鬥蔣介石、鬥地主階級、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營工商業改造也是大民主。不過，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情況下，也可以“借用”這種講法，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澤東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

18 《林克日記》(手稿)，第15頁；李慎之：《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第47—50頁。

說贊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還要加上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游行。他告誡黨內：“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與劉少奇單純批評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澤東在這裏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反對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準備加以利用。不過，毛當時並沒有考慮採用這種方式解決執政黨的官僚化問題，而寧願採取整風這種“小民主”的方式。毛澤東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這裏所謂“武力”，就是指公開衝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後，毛澤東終於不得不用這種方式開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當時，毛澤東以為通過整風就可以克服官僚主義，解決執政黨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

八屆二中全會是波匈事件後中共高層第一次全面討論如何應對東歐風波在中國的反應。從以上的發言可以看出，對於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的分析，黨內沒有分歧，轉到中國問題後，不同的聲音便出來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認為主要是解決執政黨本身的問題，毛澤東則強調同時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必須防止執政黨發生異化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不過劉、周集中談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強調加緊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現在如何調整經濟建設方針的問題上。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反復提出應減緩發展速度，壓縮基建和積累指標，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現東歐式的社會動蕩。毛澤東對此則不以為然，儘管沒有針鋒相對地提出不同意見，但他的不滿情緒已經溢於言表。

2. 再次討論波匈事件和斯大林問題

波匈事件的餘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鐵托在普拉發表了一篇

演說，又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一陣風浪。與蘇共、中共的判斷不同，鐵托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匈牙利發生的危機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批評匈牙利領導人請外國軍隊來教訓自己的人民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認為蘇聯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雖然可能有必要，但卻是“錯誤的”。鐵托反駁了南斯拉夫應對匈牙利鬧事和事態擴大承擔責任的看法，認為這些觀點來自“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由此，鐵托提出了“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問題。在鐵托看來，儘管蘇共二十大譴責了斯大林，但其認識卻有相當的局限性，實質問題不在斯大林個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這裏不僅僅是一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根源就在這裏，這就是需要不斷地堅持地根除的東西，而這也是最難以做到的事。”¹⁹

普拉演說不僅批評了蘇聯處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觸及到社會主義的制度問題，因此立刻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強烈反響。作為蘇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發表評論文章，認為鐵托的演說同南共聯盟領導機關此前不久的相關說法“格格不入”，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演說“流露出一種干涉其他共產黨的事務的傾向”；把共產黨分成“斯大林主義者”和“非斯大林主義者”的黨，在客觀上“只會危害共產主義運動”。蘇共還特別批評了鐵托關於個人崇拜產生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觀點，並將這一觀點與西方“反動宣傳”相提並論。²⁰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波蘭、蒙古各國黨報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領導人也相繼發文章或做報告，譴責鐵托及南共聯盟。²¹

中共領導人同樣特別關注此事。從11月25日開始，毛澤東接連

19 見《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的評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第15-37頁。

20 原載1956年11月19日《真理報》，見《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的評論》，第39-40頁。

21 參見1956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

召集政治局常委會，並通知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着重議論鐵托的演說。會議認為，鐵托提出反斯大林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誣衊，是西方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惡毒做法。毛澤東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觀點；所謂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錯誤，所以，鐵托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毛提出，我們要徹底把他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現在看來斯大林主義還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為它基本上是對的，這把刀子不能丟掉。這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會議認為，如何對待斯大林和犯錯誤的同志，是一個分清敵我的根本問題。鐵托要把犯錯誤的人趕下台，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是完全錯誤的。²²

鐵托演說後，蘇聯和東歐各黨紛紛表態，進行指責。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場，11月29日毛澤東提出，中共也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對鐵托，對蘇聯，都要有批評，通過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第二天，毛澤東將會議上討論的意見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國際現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綫、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份強調專政，但蘇聯的專政基本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

22 關於195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一系列會議的情況，由於當時沒有正式的會議記錄，而列席會議的吳冷西做了詳細筆記，這成為有關會議情況的唯一史料。據說，《毛澤東傳》一書的有關敘述，主要也是源於吳的回憶錄。此處及以下關於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和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62-82頁。

民主。第四，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鐵托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斯大林和其他與他觀點不同的同志，是錯誤的；把這些同志稱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擊，是分裂共產主義隊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文章的設想和要點：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道路，然後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講清斯大林主義。應明確地講，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三、講清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後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要分清兩類事件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的反蘇反共風潮就是一種階級鬥爭，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採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批判斯大林時的一些論點和採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要明確提出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後也落腳到團結。關於文章題目，毛考慮也可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最後，毛澤東指定他的兩個秘書胡喬木和田家英以及吳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議分工之後，各寫一部分，最後由胡喬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見。經胡喬木等人修改後，政治局於19日和20日連續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該修改稿。會議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一、對匈牙利事件不宜寫得太細，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文稿關於群眾鬧事是可以避免的說法過於簡單化，因為“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質的，但群眾是無罪的。迴避蘇聯第一次出兵的問題，而明確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確的。二、蘇共二十大有積極意義，糾正斯大林錯誤是對的，但是赫

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結果造成右傾危險和修正主義思潮泛濫。毛澤東強調，文章的主要鋒芒應該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澤東反復強調：“當前世界上帝國主義力量與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敵對矛盾是基本矛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要從存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基本矛盾的大背景來考慮問題”。四、要肯定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的共同道路。

關於斯大林評價問題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集中點”。會議認為，在指出錯誤的同時，文章應該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斯大林雖然有肅反擴大化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但其中都有他正確的一面：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殺對了，只是擴大化而已；在對外關係方面斯大林還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兄弟黨，援助社會主義國家的。會議特別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萬能的，要靠人來運用”。毛澤東強調：“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對客觀的認識正確與否，在這裏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對立統一規律，認為矛盾轉化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分子，“是一種誹謗，顛倒了大是大非”。

這次會議“討論得非常詳細”。歸納起來，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在思想上明確了以下邏輯鏈條：蘇聯以往的錯誤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斯大林個人的認識問題；但是，又必須為斯大林辯護，因為保護斯大林就是保護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儘管有缺點；蘇共二十大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義和右傾思潮泛濫；所以，波匈事件的關鍵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搞好，鎮壓和肅反不徹底。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考慮敵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這個思路又修改了兩天，12月22日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討論後，認為可以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23和24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採取分段議論的方式，再次對文

章提出修改意見。主要有：修正主義思潮的要害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強調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繼續明確“以蘇聯為首”，反對國際共運中的“多中心論”；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必然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

毛澤東又講了兩點意見。一是從理論層面解釋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說明如果處理不好，非對抗性矛盾可能發展成為對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確指出要為斯大林及其社會主義成就辯護，並強調現在只有中國有資格出來辯護，因為中共在借鑒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經過反復考慮，毛澤東決定刪去文中有關“和平過渡”問題的一段文字。此時中共對於蘇共二十大的路線主要有兩點不同看法，即斯大林問題和“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大概是在這篇文章中集中解決前者，而避免引起蘇共的爭議。

從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文章最後定稿。毛決定，28日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發表時，題目定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再論》)。²³

中共最高層如此重視一篇文章，數度開會，反復討論，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外，在中共歷史上實屬罕見。原因在於，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局勢和社會主義理論問題思考的結晶。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中共必須應對蘇共二十大、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鐵托和陶里亞蒂等共產黨領導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輿論媒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從理論上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全面闡述。

與《一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相比，《再論》反映了波匈事件爆發後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思想變化的軌迹。蘇共二十大後不久，中共高層在議論中雖然也提到不能

23 關於文章起草和初稿討論的過程，《毛澤東傳》(第607-608頁)與吳冷西的回憶差距很大。由於看不到原始材料，無從對此作出是非判斷。所幸對於討論的內容，兩者的描述大體一致，因此不影響讀者對實質問題的理解。

“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條主義，強調如何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²⁴ 波匈事件及其引發的國際風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轉向，把批判的“主要鋒芒”對準修正主義，強調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當然，開創了中國革命道路並且正要繼續開創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毛澤東，並不是要改變自己另闢蹊徑的思路，因為很顯然，即便是強調“共同道路”，毛也沒有忘記反對教條主義。問題是，波匈事件的震動，鐵托“普拉演說”的發表，已經威脅到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國際共運的團結。更為重要的是，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道路本質上同蘇俄經驗、列寧主義乃至斯大林主義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否定了蘇俄的經驗，否定了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理論體系和社會制度。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同沿襲蘇聯經驗、移植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相比，否定蘇聯道路、拋棄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是更大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儘管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界定，但從中共高層的討論中可以確定，所謂修正主義即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此後，“修正主義”的概念在中國被官方沿用二十餘年，成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號。

《再論》發表後，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普遍反響，各國共產黨機關報刊先後轉載。反應最為強烈的是蘇聯。《再論》發表的第三天，蘇聯《真理報》就幾乎全文轉載。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宮除夕聯歡會上，赫魯曉夫特意走下主席台與中國大使劉曉擁抱、接吻和乾杯，稱讚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還請劉曉與蘇共中央主席團坐在一起。其他蘇聯領導人也紛紛表示讚許。²⁵ 蘇聯民眾對《再論》的反應更加熱烈。轉載《再論》當天的《真理

2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67頁。

25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7年1月5日，第117頁。

報》發行了約2000萬份，之後還印發了100萬冊單行本。文章剛一刊出，蘇聯國內就有許多讀者打電話、寫信給《真理報》編輯部，表示對文章“非常滿意”。有讀者說：“我參加共產黨三十年了，據我評判，這樣的闡明斯大林功過問題深刻地符合我們內心感覺，符合每人的心意，這是非常重要的。”還有讀者說：“我不能不對中國同志表示感激，他們這樣公正地評論我黨。”一些讀者認為《再論》“給目前國際形勢和蘇聯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走的歷史道路以深刻的馬列主義的分析，對所有國家的共產黨都有巨大的意義”。《真理報》總編輯薩丘科夫告訴中國記者，“許多宣傳員認為這篇文章是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問題的典範”。²⁶ 蘇聯大學生最感興趣的是關於斯大林和鐵托問題的分析，他們完全同意對斯大林問題的分析。有的說，《再論》說出了我們人民心裏的話。還有的說，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發生。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學生看出中共和蘇共在斯大林問題上有分歧，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結論。²⁷

從中國駐蘇記者的報道看，蘇聯各方高度評價《再論》，主要是因為它充分肯定了蘇聯的基本經驗和斯大林，在對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鐵托演說的問題上，保持了與蘇聯基本一致的立場，在一片反蘇的國際輿論中，這對蘇聯無疑是強有力的支持，正如蘇聯讀者所說“這對於打擊目前反蘇叫囂很有作用”，“是中蘇鞏固友誼的再一次宣言”。²⁸ 中共在歷史上受過斯大林的壓制和懷疑，也對蘇共的某些做法進行過抵制，而現在既堅持蘇聯道路和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立場，批判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主義”，又有分寸地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教條主義，給人的感覺是立場堅定、態度公允、目光遠大。《再論》的發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和威信。無怪乎有些蘇聯人在盛讚的同時，表

26 《內部參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頁。

27 《內部參考》1957年1月4日，第51-52頁。

28 《內部參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頁；1月4日，第51-52頁。

示出對自己領導人的不滿，說赫魯曉夫應該到中國去學習。甚至有人說，世界上出現了偉大的列寧繼承者毛澤東，蘇聯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轉到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拜了。²⁹

儘管中共領導人贏得了如此贊譽，但他們同波蘭、匈牙利執政者一樣，也需要應對國內的複雜局面和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

3. 中國社會的反應和“少數人鬧事”

波匈事件對中國社會的震動絲毫不亞於其他社會主義各國，除執政黨外，整個國家也在積極思考。就中國社會而言，對波匈事件作出強烈反響的主要是基層黨政幹部、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民主黨派和私營工商業者，不過，這些人只有言論而無行動。相反，一般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雖然對東歐事變沒有表現出濃厚興趣，甚至也不大了解，但是對切身利益的關注使得他們中許多人採取了與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類似的舉動——退社、罷工、罷課、請願和游行。這確實給執政的中共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基層幹部、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他們對波匈事件的反應最為敏感，產生了許多疑問。

人們對波蘭、匈牙利發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會主義國家竟然也會發生群眾暴動和示威游行，並且提出了許多疑問：匈牙利的暴動如果是反動的，為什麼有許多群眾參加？如果是合理的、正義的，為什麼政府又要鎮壓，蘇聯軍隊也出來了？開始報上說是暴亂，後來又說是革命，到底革命對象是誰？納吉說要保衛革命的果實，是指匈牙利建國以後的果實，還是指這次事件的革命果實？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去波蘭是否妥當？匈牙利請求蘇軍幫助平息叛亂是否合適？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們提出要求獨立、主權是什麼意思，難道蘇聯妨害了他們的主權和獨立？他們提出要求蘇軍退出波蘭、匈牙利，是否會使華沙

29 《內部參考》1957年1月4日，第52頁。

條約組織陷於癱瘓？如此等等。³⁰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時，人們對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釋。一種看法認為，匈牙利的黨已經被資產階級篡奪了，黨已經變質了，建立了十幾年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被顛覆了，這都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打擊得太厲害引起的後果。但更多的人認為事件源於蘇聯對外政策的錯誤，如果蘇聯早一些檢討和改正過去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的錯誤做法，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對於蘇軍在布達佩斯出兵鎮壓的行動，很多人認為有干涉內政之嫌，給帝國主義以藉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緒。清華大學有教授說，波匈事件是革命輸出造成的後果。上海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的問題爭論也很大，有人認為蘇聯出兵是“走錯了一着棋，很被動”，這樣做“不符合華沙條約規定，因為華沙條約是對付外來侵略，不是對付內亂的”，“蘇聯出兵是把小國當作自己的支部一樣”。³¹

無論把事件起因歸結為蘇共二十大還是蘇聯對外政策，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為什麼被視為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經深入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層面。上海一些職工、幹部、工商界人士就認為，波、匈共產黨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不關心群眾生活，結果“官逼民反”。還有人認為是黨內不團結，同中國的高饒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說：“天天誇社會主義，誇了半天鬧成這樣。”³²

最敏感的議論是，人們從一系列國際事件聯想到了中國。儘管不少人認為中國黨處理問題穩妥，對於斯大林問題比較慎重，馬列主義水平比較高，但還是有許多人看到了國內存在的同樣問題。如民主建國會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員胥以恒認為，波蘭、匈牙利事件

30 《內部參考》1956年11月5日，第127頁；11月2日，第61頁。

31 《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第3-9頁；11月5日，第127-128頁；11月6日，第167-168頁。

32 《內部參考》1956年11月6日，第167-168頁；11月5日，第129頁。

的發生，證明黨和政府工作上有缺點，這應該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³³ 與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學氣象系四年級學生胡伯威的批評則尖銳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報》，指責中國報紙對所發生的國際事件封鎖消息，他說：“報紙應該尊重自己的讀者，將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飾地反映出給讀者”。“一個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築在對事物的真實情況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實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國，“只有報紙來提供這種自由”。他嚴厲地指責《人民日報》關於波茲南暴動以及波匈事件的報道“粉飾現狀”，報喜不報憂，“令人作嘔”。信中表達了一個善於思考的中國大學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堅決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發揚，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忠實地遵從這些原則，才能把人民群眾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這才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好處，人民群眾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變得聰明，成熟，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熱愛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來防止和消滅種種可能發生的弊病，消滅騎在群眾頭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朽傾向。”³⁴ 胡伯威的來信已經超出當時執政黨意識形態所能容忍的程度，但還有更為極端的言論。比如，在北京鋼鐵學院的食堂等幾個地方，就出現了粉筆寫的標語：“反對目前社會制度”，“我們要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處於悲慘的情況中，青年們行動起來吧”，“支持匈波人民的鬥爭”。³⁵

事實上，知識界和工商界對中共現行政策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已經有所表露，東歐的動蕩不過更加強化和刺激了這種情緒。還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各部門收到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來信就大量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屬機關共收到來信5200件，普遍反映對知識分子政策不

33 《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第5頁。

34 《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0日，第295-298頁。

35 《內部參考》1956年11月5日，第129頁。

滿。³⁶ 工商界很多人則對中共給資本家代理人和小資本家定為資本家成份的政策有意見。無錫市資本家代理人普遍說，資本家已經固定五厘利息，企業基本上由國家管理，我們在國家領導下工作，靠勞動，拿工薪，再戴資產階級的帽子，實在冤枉，紛紛要求獻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資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錢，最少的僅一角七分，卻為此帶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聯副秘書長康永仁反映：“摘除這些人的資產階級帽子，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有好處的。”³⁷

如果說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還僅僅是對中共某些具體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見和建議，那麼在波匈事件前後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局面，則主要表現為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繼續發展，甚至日趨嚴重。

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報告：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社轉為高級社，並進入秋收和準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生社員鬧退社的嚴重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退社農民已達7萬餘戶，已經垮掉的社有102個，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萬餘戶。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與遼寧、安徽、浙江等8個省電話聯繫，秋收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中，退社戶一般佔社員總戶數的1%，多者達5%。正在要求退社的農戶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寧波專區，想退社的佔20%左右。另據新華社內部報道，江蘇、山東、貴州等省，退社的情況還要嚴重，有的地區比例高達10%，甚至很多黨員都“要求單幹”。遼寧、湖北都是農業豐收省份，也同樣發生了社員退社的現象。就連新疆、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都出現了大規模農民退社的情況。³⁸

36 雲南省檔案館，7-1-804，第1-4頁。

37 《內部參考》1956年9月24日，第621-622頁。

38 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22、643、649、655頁；《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9日，第1086-1087頁；10月24日，第1178-1179頁；10月30日，第1337-1338頁；11月6日，第178-179頁；11月21日，第499-502頁；12月29日，第671-672頁。

關於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退社的情況，據遼寧省手工業管理局9月29日統計，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員有524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獨立手工業者都參加了合作社，但高潮過後就出現了社員要求退社的跡象。這種情況在目前供不應求的縫紉、制鞋兩個行業中最嚴重。另據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的粗略統計，從2月以來，已經批准退社的小業主有535人。有一個五金聯社，退社的小業主涉及到50個基層單位，共計398人。³⁹

《內部參考》還報道了大量工人罷工請願的情況。如內蒙古森林工業管理局所屬的單位，從6月到9月已經發生了6起工人罷工請願的事件，參加者少則數十人，多則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發生了60多築路民工集體向市人民委員會請願的事情。波匈事件發生以後，情況更加嚴重。到12月上旬，上海輕紡工業已有53個合營工廠1834人因工資和福利問題先後發生罷工、怠工、請願和其他鬧事事件。其中罷工的有10個廠，116人；怠工的有3個廠，60人，請願的有2個廠，29人，在廠內鬧事，包圍公方代表，準備罷工、請願的有38個廠，1629人。⁴⁰

學生罷課、請願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機械工業部所屬兩個技術工人學校，400多學生開始罷課，要求轉學和分配工作。參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並集體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勞動局請願，還毆打干涉他們罷課的同學，隨意破壞公共財物，甚至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此外，還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級法院請願、控告。至10月底，學校已陷入嚴重混亂狀態。12月下旬，陝西省少數學校的學生發動了集體簽名，強硬要求用罷課或絕食等辦法對學校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示抗議。⁴¹

波匈事件後，中國社會的動亂局面確有擴大趨勢。1957年3月

39 《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6日，第1258頁；10月31日，第1547-1549頁。

40 《內部參考》1956年9月24日，第615-616頁；11月15日，第367-368頁；12月17日，第342-343頁。

41 《內部參考》1956年10月30日，第1328-1331頁；12月26日，第561-564頁。

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游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⁴² 儘管從目前看到的史料，還不能說中國發生的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國際風波的影響，但就各地鬧事的緣由而論，與波蘭和匈牙利出現的危機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點，即都反映了人民大眾對執政者的強烈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長期受到壓抑，一朝爆發，便成烈火之勢。

農民和手工業者退社，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管理上的問題比較嚴重，經濟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於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請願、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為工作條件、生活待遇問題沒有解決好，或者是出於對基層管理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滿和反抗。⁴³ 縱觀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瑣事”，就每個具體事件看，規模並不大，程度也不算嚴重，與波茲南和匈牙利發生的事件無法相比，所以當時被毛澤東稱為“少數人鬧事”。但是，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區和人群，卻有着大體相同的起因。綜合起來看，問題的存在是帶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國社會底層各種困惑、不滿、騷動，與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響交織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構成了一種雖不過份緊張，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確實有些擔憂了。

4. 中共採取的各種讓步和安撫措施

各地發生的“鬧事”和社會問題，中共在召開八大時已經有所察覺。這一點，在中共八大的各項報告以及大會發言中均可看到。⁴⁴ 對於前述一些地方黨委的報告，中共中央也及時作了批示和轉發。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新疆區黨委和福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54頁。

43 《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第1178-1179頁；10月26日，第1258頁；10月31日，第1547-1549頁。

44 詳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建省委的報告，要求各地參照這兩個報告，貫徹中央關於整頓幹部思想作風、克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的精神。⁴⁵ 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實際上也是要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

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又批轉了一些地方報告，並發出一些相關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要求各農業合作社在當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對包工包產不合理、勞動報酬定額不夠準確的問題加以清理，在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處罰的制度時，採取多獎少罰的原則；對入社生產資料作價不合理的問題，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員應該交納的股份基金計算清楚，欠交的應該盡力補交，多餘的應該分期償還；對農業社幹部的報酬，應該根據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合作社章程規定，對於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適當的調整。⁴⁶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河北省委、廣東省委的報告，在批示中告誡各地黨委，“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入社“本來是不策略的”，因此讓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對堅持退社的手工業者和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可以允許他們退出，不必勉強把他們留在社內。批示還注意到合作社內困難戶的問題，要求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可暫時給以土地報酬。⁴⁷ 時近年末，中共顯然希望通過調整年終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開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糧、請願風潮，緩和農村基層的矛盾。

在解決農村問題的同時，中共還着手解決城鎮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退社問題。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場放開後，個體手工業營業“突然興旺起來”，這對合作社社員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後，手工業社員收入減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評某些合作社組織，“沒有認真執行黨和政府關於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

45 參見《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第622、630頁。

46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413-421頁。

47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第640、648頁。

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積累，後工資福利，把積累額定得過高，致使社員收入下降；在生產上不顧客觀條件，把不該集中的也集中起來，甚至高度集中，社員的積極性不能發揮，業務不能開展，給群眾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業主的使用上，沒有量才錄用，或者給以適當安排；在技術手段上，追求機械化、工廠化，把公積金定得過高，處處向現代化工廠看齊。文章提出要對手工業合作社工作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在檢查中發現積累比例偏高的，要適當降低；不該集中而又已集中起來的，要迅速分開；對小業主和輔助勞動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調整；工資不合理的，應當適當調整；管理機構龐大的要精簡；對其他不合理的經營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業生產的特點加以改變”。⁴⁸

與退社現象相聯繫，1956年下半年，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一個新現象：一些原私營工商業戶開起了“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個體手工業生產也日趨活躍。9月份上海市手工業個體戶為1661戶，從業人員5000多人；10月份就發展到2885戶，從業人員8100多人。廣州市9月份一個月內，個體手工業從業人員增加1100多人。武漢市合作化後，個體手工業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將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島、鄭州、成都和廣西等省市，個體戶和從業人員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認為，這種情形的產生，是因為八大後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自由市場，直接刺激了個體手工業的發展，使原私營工商業“死灰復燃”。有些幹部擔心“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又要泛濫了”，這樣下去會妨礙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⁴⁹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看法和態度卻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澤東與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批評了中共內部“左”的空氣：“我們一些同志對資產階級只批評不鼓勵，不認識資產階級這幾年有很大的進步，對資產階級應該採取又批評又鼓勵的方針。”毛承認，公私關係上的問題是“我們的工作

48 195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

49 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

跟不上，不能怪下級，只能怪上面”，還說：“資產階級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個別的，整個階級不能說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現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營了，沒有對抗了，合營前已經沒有對抗。民建、工商聯、民主黨派同我們是合作的，看不到對抗。”說到“地下工廠”時，毛指出：目前中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但自由市場和地下工廠能夠發展起來，這說明“社會有需要”。應該“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澤東以制衣業為例，主張私營工廠與合作社競爭，並把這叫做“新經濟政策”。“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⁵⁰第二天，毛澤東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談話，肯定“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們感覺熟悉了，更加靠攏了”。還說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對與會者提出的許多問題，毛說對他幫助很大，而且承諾政府會和他們商量，協商一個辦法，凡是能夠解決的總要解決。⁵¹

12月17日，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也說：各地地下工廠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資本主義或小生產者，有什麼不好呢？這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29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二次會議上，副委員長黃炎培發言提出私人開廠的問題時，劉少奇又說：“有一些資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萬元、幾百萬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這麼多錢，如果他們要蓋工廠，是否可以准許他們蓋呢？可以的。”“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

50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7-170頁。

5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74-177頁。

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⁵² 劉少奇的話同毛澤東的談話如出一轍，甚至比毛更放開。一個細小卻涉及實質的差異是，毛認為自由市場的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劉則認為私人工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過在當時，這樣的差異還沒有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私人開廠的看法。《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公開表明對個體戶的態度。社論肯定手工業個體戶的發展“一方面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場的商品供應；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城市的就業人數”，“這是對國家有利無害的事情”。⁵³

三個月前，中共八大剛剛宣佈“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現在又說“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沒收”，這不能不說是政策性的重大調整。

緩解社會緊張，平息各地“鬧事”，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解決國民生活問題。1955年起，由於過份偏重國家基本建設，日用品生產受到擠壓，加上各地爭搶高速度，導致物價上漲，商品供應緊張。以大城市上海為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所帶來的生產建設高潮，特別是發展農業四十條綱要草案提出以後，全國農業的生產勁頭很大，紛紛購置各種生產資料和文教衛生用品，帶動整個工業生產的發展，對上海市場提出了大量需要，原來上海認為積壓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購一空，成為緊張商品。”當時國營商業部門曾想了不少辦法開闢貨源，滿足生產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費品供應也跟着緊張起來。8-9月間，全國範圍內在提高工資基礎上的工資改革陸續結束，增加工資後的社會購買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費品市場。再加上全行業公私合營後，資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這一時期發放，更增加了對消費品市場的衝擊。呢絨、絨綫、針織品、傢具等供不應求，部分高級消費品如自行車、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82、383頁。

53 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

無綫電、手錶、鑽戒等，也暢銷起來。工業消費品市場，十分活躍和緊張。副食品的供應也很緊張，特別是豬肉來源較緊，減少了供應量，居民發生排隊搶購的現象。⁵⁴ 面對壓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調整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在安排計劃時強調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來出訪而任代總理的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提出了“在照顧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條件下來搞建設”的觀點。他主張“保證必需的民生，有餘再搞建設”，還提出要找出一個“民生和建設正確關係的標準”。⁵⁵ 雖然很難說這是要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方針，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便作為權宜之計，國民生活也已經被國務院擺在了基礎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將更多的財力用於國民生活。八屆二中全會前，各地上報匯總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為243億元，全會決定調低到135億元。陳雲對這個指標仍有疑慮，於是在12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時提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削減。⁵⁶ 會後，國家經委經過仔細計算，果然認為基本建設投資還可以削減。12月27日、30日，陳雲兩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主張將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削減到114億元，還說“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陳雲意味深長地指出，這樣做“可以避免犯東歐國家的錯誤”。⁵⁷

為了解決企業職工提出的問題，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工人階級問題十人小組，由劉少奇主管。12月17日，劉少奇召集十人小組和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負責人開會，座談勞動調配、工業基礎、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等問題。劉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問題，如工廠用人可以考慮採取“勞動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業基地，要研究輕重工業的配合問題”；企業管理可以通過職工代表

54 《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9—430頁。

55 《陳雲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34-135頁。

5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065頁。

57 《陳雲文集》第三卷，第141、143頁。

大會和管理委員會，“它又是領導，又是監督，主要是監督，是權力和監督機關”，並且不無擔憂地指出，這些問題“不解決要出亂子”。劉少奇還告訴與會者，中央要“全面討論”工人問題，要求各種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能解決的應作出決定加以解決，不能解決的要交代。⁵⁸

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即在內部系統開始了一次檢查工作。從民主黨派、知識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僅對中共各級統戰部門有意見，而且對各單位內部許多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更多。於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進一步開展統一戰綫工作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重點轉移到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和部隊，主要檢查這些單位中的中共黨員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係。中共承認，統一戰綫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在黨派關係上，我們的許多同志不承認或者不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地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或者加以歧視和排斥；在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內部共產黨員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關係上，很多黨外人士有職無權，想積極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關係上，許多同志不尊重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權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單位“一邊檢查，一邊解決檢查中發現的問題”。⁵⁹

總的說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以後，對各地“鬧事”和社會實際問題，中共和政府的主旨顯然是調整原有政策，採取了某種“讓步”的姿態。不過，還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後的社會思想動態。對此，毛澤東看得比較嚴重。

58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1-382頁。

5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546頁。

5. 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宣佈，這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有三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思想動向問題。⁶⁰

毛澤東在1月18日的講話似乎非常嚴厲，他一開頭便指出：“現在，黨內的思想動向，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出現了很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問題首先出現在黨內，如爭名奪利、貪圖享受的思想在黨內有所發展，一些領導幹部對農業合作化優越性有懷疑態度，反映富裕中農思想的單幹風有所抬頭。接着，毛澤東分析了學校裏學生鬧事的背景，一是學生中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富裕中農家庭者佔80%，一是受國際事件影響，“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毛特別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隨後，毛澤東使用主要篇幅專門講國際風潮對黨內和國內的影響，從尖刻的言詞可以看出，對於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蘇共二十大“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子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接着，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中共的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

60 《毛澤東傳》，第615頁。以下引言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0-362頁。

裏鬧一下，那裏鬧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沒有什麼可怕”。他們無非是要推翻共產黨，結果就暴露出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對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所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最後提出：“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1月27日的講話，毛澤東重點談了“鬧事”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毛澤東用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分析，認為鬧事就是對立面的鬥爭：地主、資本家鬧事是因為他們心懷階級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議論紛紛是因為他們都講唯心論，大學生鬧事是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至於在工人和農民中間發生的少數人鬧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領導上存在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是“工作方法不對頭”；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壞分子的存在”。由於對立面的鬥爭是永遠存在的，“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對待“鬧事”的態度，毛澤東主張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準備和積極的態度，這是一種“領導藝術”。他以匈牙利為鑒說：“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便成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鬧得對的，就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鬧得不對的，就駁回去。既“不能步步後退，好惡原則，什麼要求都答應”，也“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不能學段祺瑞”。應該耐心地做大多數鬧事者的分化、引導和教育工作，而“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至於那些沒有行動，只有言論的人，毛澤東主張後發制人的策略：“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

“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够。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總之，毛澤東最後提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學問，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看，現在的階級鬥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

毛澤東的這番講話，已經蘊含了他後來發動反右派運動的思想基礎。不過，筆者並不認為此時毛澤東已經在設計“引蛇出洞”的“陽謀”。顯然，當時中共急需解決的問題不在這裏。從波匈事件後中共召開的幾次會議和應對國內局面採取的方針可以看出，作為執政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中共面對着三個問題，即中共各級領導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這是引起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普通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由於中共政策方針的偏差可能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勢。不過，工農大眾不會反對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會隨着執政黨自身的作風改變和政策調整而得到解決；黨內外知識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業者)的“奇談怪論”，這些言論本質上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但由於建國以來階級鬥爭搞得比較徹底，所以他們的力量和影響都有限，不會鬧出大亂子。因此，要避免中國社會出現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危機，首先要解決的是前兩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執政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問題——第一個問題解決了，第二個問題便會

迎刃而解。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思考，毛澤東提出了他的著名學說——“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以此作為開展黨內整風的指導思想。

二、毛澤東設想和推動的黨內整風運動

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整風和反右實際上是一回事”，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反右，而且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⁶¹ 很多人接受了這種看法，但筆者的研究結果顯示，毛澤東確實設想並發動過一次整風運動。就打擊的對象和運動的方式而言，整風和反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而且，整風本身在不同的階段，其內容差別也是十分明顯的。毛澤東最初提出整風，是希望通過“和風細雨”的方式打擊執政黨內脫離人民大眾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接着想要借助黨外知識界的力量完成這一任務。後來轉入反右派運動，卻變成以“急風暴雨”的方式打擊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社會上一切對共產黨不滿的言論和行動，而運動後期的整風，則是在整個社會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黨內整風轉為全民整風。其中只有一點是貫徹始終的，即所有這些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 毛澤東試圖通過整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勝利的政權還有喪失的可能。這種危險的國際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和國外的反動勢力，他們企圖鼓動和利用國內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產黨政權；國內根源則在於人民大眾對執政黨脫離群眾的作風和某些方針政策的不滿和對立情緒。至於在中國，毛澤東認

61 最有代表性的論述見李慎之的《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頁）、章立凡的《風雨沉舟記》（《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第45頁）等。

為，經過鎮反、肅反，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會出現與國外反動勢力結合的危險。今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於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決定以此作為指導思想，採用民主的方式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早在蘇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後，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的思想混亂，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黨內開展以學習理論為主要形式的整風運動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個通知中提出：為了“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有必要在黨的幹部、研究人員和高等學校畢業班學生中，“分期分批”開展一次學習運動，“到1957年7月結束”。⁶² 儘管還沒有直接提出整風，但其意圖是明顯的，即通過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不久，批判對象又加上了官僚主義。⁶³

這一階段，新華社在《內部參考》中陸續披露出黨內工作作風的嚴重問題。如湖北省襄陽專區在夏收預分中“發現許多農業社幹部有嚴重的貪污行為”。長春市企業領導機關“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平時只顧完成生產任務，不關心工人疾苦，妨礙了職工的積極性。內蒙昭盟地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僅據八個旗縣的材料，一年多來就發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預審及監所管理違法亂紀事件32起，非法搜查與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當而造成的嚴重事件13起。由於幹部在工作中強迫命令的做

62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匯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頁。

63 見彭真：《克服官僚主義作風》，1956年8月16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6)》，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頁。

法和無視百姓生活的錯誤，浙江省寧波地區連續發生“群眾自殺事件”，僅慈溪縣就有91起，寧海縣有78起，涉及的鄉鎮達60-85%，而且“自殺者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⁶⁴這不能不引起執政者的密切關注。

八大召開前，毛澤東在第一次預備會議上就提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⁶⁵在八大開幕式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⁶⁶在此前後，報紙上開始報道各地開展整風運動的消息。⁶⁷劉少奇甚至向印度共產黨代表團“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整風經驗”。⁶⁸這裏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風方式主要是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黨的內部進行，這與後來開展的邀請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的整風運動是有重大區別的。第二，之所以選擇“學習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進行整風，是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中共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與蘇共相比，雖然也有，但是並不多。⁶⁹不過，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八屆二中全會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

64 《內部參考》1956年5月30日，第557頁；7月3日，第19-20頁；9月13日，第320-323頁；9月17日，第450-452頁。

65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304頁。

66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0頁。

67 1956年9月1日、10日、12日、16日《人民日報》。

68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75頁。

69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01-102頁；《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5-8頁

中國重演。11月15日，毛澤東在全會最後一天作總結報告時指出：“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至於方法，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⁷⁰正式提出的整風，除了“學習文件”，又增加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內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的，“全會公報的用詞表明”，開展整風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呼籲而不是官方的指示”。⁷¹可以印證這種判斷的是，胡喬木11月23日在社會主義學院講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時，反復講到反對官僚主義和實行民主化，對整風卻隻字未提。⁷²甚至幾個月後，康生在作報告時仍然認為：“二中全會主席提出準備開展整風運動”，只是一次“新的學習運動”。⁷³這就是說，中共中央當時尚未就開展整風運動問題形成一致意見，更沒有做出決議。⁷⁴

然而，事態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執政黨再猶豫了。從長期的發展看，人民內部矛盾將成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執政黨的工作中心應該轉入如何正確處理大量出現的新問題——群眾不滿情緒引發的社會動亂和幹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而後者的存在往往是導致前者出現的主要原因。

情況確實如此。據新華社的報道，當時中國社會上大量出現

70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3—329頁；《毛澤東傳》，第612-613頁。

71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76頁。公報的用詞是“毛澤東同志號召”：“採取整風方法，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鬥爭”。1956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

72 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頁。

73 雲南省檔案館，7-1-867，第28-33頁。

74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在3個月後再次提出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張時，把啓動日期推遲了半年。

的罷工、罷課、退社和游行請願等現象，究其根源都在於執政黨本身的錯誤和問題。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關於中共幹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報告驟然增加。如江蘇省少數基層幹部“作風惡劣、橫行霸道”，內蒙古農村幹部“強迫命令非常嚴重”，河北滄縣專區農村基層黨員幹部中存在“命令主義傾向”，湛江市部分機關和幹部“官僚主義十分嚴重”，江蘇省少數機關“強佔民房嚴重損害群眾利益”，蘭州市一些部門的黨員負責幹部“官僚主義很嚴重”，河北省縣級以上機關、企業部門“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天津國營工廠“幹部的命令主義、懲辦主義作風嚴重”。⁷⁵進入1957年後，情況更加嚴重。新華社福州1月12日訊，中共莆田縣委召開三級擴大幹部會，與會的504名區、鄉主要幹部中，70%左右都有強迫命令、貪污腐化的情況，致使黨群關係十分緊張。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蘇省震澤縣沒有一個統戰對象，卻設有統戰部；江都縣沒有山林地區，但卻設有林業科；淮陰專區有些縣沒有工廠，也成立了工會，還要收會費。浙江省吳興縣部分鄉幹部強迫命令作風嚴重，已經發展到違法亂紀的程度：如鄉幹部捆綁、吊打群眾，私設監牢和公堂，任意關押村民，甚至游街。⁷⁶還有報道說，湖北省部分農村幹部中存在較嚴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闊氣、比排場；怕下鄉、怕進落後社、怕進山、怕勞動。⁷⁷

現在，毛澤東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如何改變執政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問題。

75 《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6日，第1258頁；10月30日，第1328-1331頁；10月31日，第1349-1350頁；11月13日，第331-332頁；11月28日，第683-685、685-687頁；12月7日，第136-138、138-140頁；12月11日，第215頁；12月12日，第239-240頁；12月25日，第521-522、第527-528頁；12月26日，第561-564頁；12月27日，第598-599頁。

76 《內部參考》1957年1月12日，第227-228頁；1月22日，第425頁；2月22日，第325頁；2月26日，第381頁。

77 《內部參考》1957年3月14日，第251-253頁。

2. 對毛澤東整風動員出現的不同反應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了一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試圖用“兩類矛盾”這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哲學語言，解釋國內發生的種種問題，並給執政黨提供指導性方針。毛本人說，他這個講話所談的問題已經“在心裏積累了很久”。⁷⁸

毛澤東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會在中國重演。在這個前提下，毛澤東開始談論人民內部的種種問題。諸如對合作化的評價問題，資本家的思想改造問題，青年學生的政治學習問題，以及關於工商業者安排、失業人員就業、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問題。既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各種不同矛盾，就必須予以解決，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採取與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考慮到這兩個方針自1956年春天提出來以後黨內存在的疑慮，毛澤東強調，百花齊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爭鳴就是也可以講唯心論，但是這沒有什麼要緊的，對毒草和錯誤言論批評就是了。令毛澤東擔心的是，許多黨的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實際上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⁷⁹

毛估計的不錯，後來北京市委在一個報告中承認，對於中央提出的這些方針，直到最高國務會議前，“沒有進行過系統的討論，黨內幹部包括我們在內，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很不深刻的，並且還有許多糊塗思想，許多同志對這一方針實際上是不贊成或不完全贊成的”。⁸⁰ 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總結報告時，毛澤東有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問題。毛指出，政府有缺點應該批評。批評得當，

78 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記錄稿)，1957年3月10日。

79 參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2月27日。

80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頁。

當然好，批評不當，也沒有什麼，言者無罪。人民內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評權；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久，民主黨派就有多久；“監督”就是要批評和建議，批評是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說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但又說可以罷工罷課，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毛答，大民主就是群眾運動，階級鬥爭。過去我們好些做法是這樣，如肅反、土改。現在社會改變了，遺留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說這個“小”不夠，再來一個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風細雨比較好。毛解釋說，現在我講的是有些機關、工廠、學校、合作社連那樣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沒有，就只有官僚主義，這樣就逼出一個大民主，所以出來罷工罷課了。憲法沒有罷工的條文是不好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罷工罷課。我們是提倡用批評的方法解決問題。只有對那些個別的、嚴重的、頑固的官僚主義，才用罷工罷課來解決，首先還是反官僚主義。⁸¹

毛的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黨內整風的動員。會後4天，中宣部長陸定一便在報紙上公開宣佈，中共要“安排一次全黨範圍的新的整風運動”。⁸²毛澤東似乎覺得言猶未盡，決定再講一次。於是，又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與以往不同，這次會議邀請了科學、教育、文藝、新聞、出版各界160多名非黨人士參加，比例達全體與會者的五分之一。⁸³會議的議題是傳達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研究思想動向和意識形態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還連續召集了幾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一邊聽匯報，一邊談意見，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在談到整風的打算時，毛說：“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

81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日。

82 1957年3月5日《人民日報》。

83 參見《毛澤東傳》，第630-631頁。

發一個指示，今年準備，明年開始，這也要醞釀一個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⁸⁴顯然，毛澤東不斷地開會、講話，就是要統一黨內的思想。

3月12日下午，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毛澤東到會發表講話，講了七個問題，可以看作是對會上討論的眾多問題的總結。歸納起來要點如下：一、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這個變動比過去更加深刻。全國各個階級相互關係都發生變化，所以各種不同思想都有所反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個大變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制度要經過好幾年才能鞏固。二、知識分子中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有敵對情緒的只是極少數，90%以上是愛國主義者，擁護社會主義，其中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不習慣，有懷疑，所以對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強迫他們接受馬列主義。三、有些人好像講階級鬥爭為主就舒服一點，講人民內部矛盾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麼過癮了。八大作了結論，人民內部矛盾突出了，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都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四、關於放和收，中央的意見是不贊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亂，亂也好，亂才有辦法，亂然後治。中國不會出現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許可，小民主又沒有，連小小民主都沒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五、共產黨準備整風，中央決定今年準備，明年普遍展開，黨外人士可以自願參加。主要整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整風的方法和延安時一樣，就是學習文件，自我批評，也可以批評，用小民主，和風細雨。最後，毛澤東肯定，這次會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是有益處的，開得很好。他說：我們有兩種會，一是黨內的會議，一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會議，這次會議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來開，是第三種

84 毛澤東同文藝界的談話（記錄稿），1957年3月8日。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49-255頁。

會，是好的形式。⁸⁵ 黨內整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這個想法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來的。

或許是受到與黨外人士輕鬆談話時的樂觀情緒影響，或許是受到黨內外聯合召開會議的新形式的啓發，這時毛澤東感到共產黨整風需要來自黨外的幫助和推動。不過，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對於他所倡導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氛圍中的整風運動，黨內外的反應卻截然相反。

對毛澤東講話反應最熱烈的是知識界和民主人士。徐鑄成回憶了在政協禮堂聽到毛澤東講話錄音後的感受：“從錄音裏聽到他在講話時，不時引起哄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馬寅初等同志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⁸⁶ 章伯鈞聽了毛的講話後也是“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名義進行了傳達，民盟還印發了講話記錄稿。章對“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評價甚高，認為“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論的延續，但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儲安平看到講話的傳達稿後激動不已，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⁸⁷ 傅雷當年在給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覺和理解講得更加具體：“那種口脛，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⁸⁸ 章詒和對此有一段精妙的評述：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章儲二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渴望着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

85 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2日。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82頁。

86 徐鑄成：《親歷1957》，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頁；《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62-263頁。不過，徐說在錄音中聽到劉少奇插話，這裏有誤。劉少奇沒有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因此毛講話時，劉不在場。

87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第12、42頁。

88 《傅雷家書》，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第158頁。

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講話，則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⁸⁹

毛的講話傳達下去之後，反響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國政協召開二屆三次會議，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黨派也先後召開會議。與會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間接聽過毛澤東的講話，反應極為熱烈。大家眾口一詞，表示擁護毛的講話。⁹⁰ 人們談論最多的就是“雙百方針”：馮友蘭稱讚這一政策可以“保證我國學術的正常發展”。⁹¹ 羅隆基認為，這是“掃除黨與非黨間隔膜，加強團結的對症良方”，“不僅可以減少鬱積，消除隔膜，並且是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顯，百川異流，總是同歸於海”。⁹² 在北京市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陳垣說，毛主席講人民內部矛盾時，常常“反求諸己”，在知識分子本身來說，也要有“反求諸己”的精神。王蒙也認為參加這次會議是“勝讀十年書”，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課題。⁹³ 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聽了這個講話以後，對目前國內生活中的許多矛盾現象，都得到正確的解答了，眼界打開了，對今後的事業也更加充滿了信心。“好些過去不肯說話或不多說話的人，這次都解除顧慮，滔滔地暢所欲言。好些座談會上都有激烈的爭論”。這種討論已成為“上海知識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給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氣”。⁹⁴ 正像費孝通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所說：“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⁹⁵

上述很多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名人都是在聽到毛澤東那番激動人心的講話後，決心投入整風運動的，但其中多數人在後來被打成

89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第42頁。

90 詳見《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第30-49頁。

91 1957年3月16日《人民日報》。

92 1957年3月23日《人民日報》。

93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0號，第22-24頁。

94 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報》。

95 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

“大右派”。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此時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究竟是真心實意，還是預設圈套？這裏不妨再聽聽當事人的感受。出席會議的作家舒燕認為，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為我親自聽了他的講話。一個人假也不能假到那個程度吧，何況是毛澤東。這種感覺只有到了現場才會有。”⁹⁶當然，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不是在人們的感覺，而是要搞清一個問題，即毛澤東此時提出整風的目的何在，是要打擊黨內的有害作風和腐敗現象，還是要批判黨外的錯誤或反動言論？從前引(當然不是後來修改的)毛澤東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看，答案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執政黨因自身的問題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整風的矛頭自然也是對準黨內的。因此，應該說毛澤東這時是誠心要請黨外人士幫忙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的主張在黨內遇到了重重阻力。

《人民日報》曾報道，許多著名學者專家認為：毛主席的講話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知識分子、幹部和群眾的普遍重視，但在貫徹執行黨中央的這些方針上，仍然存在着許許多多的障礙，而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來自黨內和領導機關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⁹⁷這種看法符合事實，因為大多數黨員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抱着懷疑和抵制的態度。

在3月25日召開的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很多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表現出憂慮和懷疑。講到雙百方針，“大家都贊成放，但仔細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種種顧慮”，他們“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怕放了毒草，群眾會中毒”。有人說：“百花齊放，放就是收，放了緊接着要收。”有人說：“收是絕對的，放是相對的。”不少人直截了當地提出：“毛主席說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這篇文章，卻看不出有什麼不

96 轉引自謝泳：《雜書過眼錄》，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頁。

97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

好。”⁹⁸ 湖北省委的報告說，毛澤東的講話傳達以後，“有些黨的幹部(包括一部分領導幹部)大吃一驚，他們懷疑人民內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們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認為人民群眾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對於在基層單位放手發揚民主和執行雙百方針顧慮重重，怕“放”出錯誤的東西來難得收場，說“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決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⁹⁹ 甘肅省委報告，對中央的方針“黨外比黨內接受的快，情緒高”，黨內則受到“很大震動”，部分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在思想上還有程度不同的懷疑和顧慮、甚至抵觸情緒”。在高級幹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數人“是原則上通了，也認為中央的方針、政策完全正確，表示擁護。但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與本單位和自己有直接關係的具體問題時，就不通了”。還有極少數人“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認為“革命幾十年都沒叫人監督，現在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說，“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現在更囂張了，不把他們整下去總不甘心”。¹⁰⁰ 山西省委的報告更加具體：毛的講話在各級幹部中傳達後，“爭辯之多，是空前的”。“多數人表示擁護，但對若干原則問題抱有懷疑和抵觸情緒”，他們提出，如此強調擴大民主“是否會助長極端民主化？”“現在已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再要擴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認為“鬧事沒好人，好人不鬧事”，“不承認鬧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也有個別人“公開表示懷疑和反對”，他們提出“這次毛主席報告的精神是否右傾了”，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替民主人士、知識分子、資本家和過去的地主、富農說的話太多了，而替勞動人民說的話太少了”。“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

98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第162-169頁。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文章對雙百方針提出後文藝界的形勢和傾向提出了批評。

99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3-5頁。

100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5-18頁。

於剝削家庭，他們畢業後都將當幹部，難道毛主席就不怕重複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嗎？究竟還要不要專政？誰專誰的政呢？這真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¹⁰¹ 就筆者看到的資料，上述情況，在黑龍江、廣西、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委的報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¹⁰²

在農村基層幹部中，懷疑、抵觸和反對的情緒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質問：“這個報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傳達錯了”。有人說：“過去聽了傳達毛主席關於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裏，今天聽這個報告實在聽不進去”，甚至認為“毛主席這個報告太右傾了”。大多數基層幹部都不同意把這個報告再向下傳達或貫徹。關於兩類矛盾，有的支部書記說：合理提意見的是內部矛盾，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敵我矛盾。還有人認為，成份好的人鬧事是內部矛盾，富農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鬧事就是敵我矛盾。對於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對農民能用，對富農、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對貧農能用，對富裕農民不能用；對先進地區能用，對落後地區不能用。至於雙百方針，認為城市可以實行，但農村不能貫徹。由於感到“黨給群眾撐腰，不給幹部留臉”，不少基層黨員幹部工作消極，想躺倒不幹，甚至有的提出退黨。¹⁰³

至於毛澤東提出的黨內整風，似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既然說整風運動是一年以後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發的一個通知就把正在開展的“學習八大文件，檢查思想作風”的工作與將要開始的整風運動斷然區別開來。通知明確說：“這次檢查雖然是以整風精神進行，但不等於就是一個整風運動”，而只是“整風的思想準備”。¹⁰⁴ 在他們看來，整風並非當務之急，到底怎麼搞，目前還提不上議事日程。

101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9-21頁。

102 《內部參考》1957年4月28日，第9-11頁；5月17日，第3-5頁。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0-12、12-15、18-21頁。

103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1日，第7-9頁；5月25日，第20-22頁。

104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39，第19-22頁。

所有這些材料，無論是來自上層還是基層，無論是黨內報告還是新聞報道，反映的情況都是一致的。面對如此難堪的局面，毛澤東感到，必須親自出馬，再次進行動員。

3、劉少奇與毛澤東的不同關注

仔細品味，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其實提供了兩個新的信息：一是對黨內多數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不滿，他們沒有意識到共產黨執政遇到了新問題，對中央提出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方針有強烈的懷疑和抵觸情緒；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試圖通過整風運動解決黨內的思想問題和作風問題。這兩者之間有着密切聯繫，相輔相成。為了促進整風運動的開展，毛澤東需要同時進行兩方面的工作，既要說服黨內幹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又要鼓勵黨外人士解除顧慮，敢於向執政黨提出意見和建議。在毛澤東看來，只有通過這種新式整風運動，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前進，所以他關注的是“思想動向”，主張首先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解決問題。但黨內多數領導人認為，整風主要還是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在於具體政策的調整，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解決影響執政黨面臨的問題。這種認識的代表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同樣非常關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認為，“人民內部鬧事是個新問題，我們不想好辦法，將來要吃大虧”。¹⁰⁵為此，他決定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研究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從2月18日到4月14日，劉少奇沿京廣綫一路南下，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臨行前，他向隨行人員說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鬧事問題。劉說，“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因此，“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勢必發生像波匈事件那樣的情況”。劉的調查範圍包括學校、合作社、工礦企業，

105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年，第119頁。

涉及農業、工業、商業、教育、城市生活等各個方面，並多次同學生、教師、社員、職工、技術和管理人員，以及地方黨政幹部座談，重點是了解執政黨在政策、方針上存在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與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不同，劉此行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幾乎沒有涉及。¹⁰⁶

社會分配是農民、工人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劉少奇對此特別關注，他提出：“所有制解決了，生產關係的問題出在分配上，表現得很尖銳複雜”，“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講清道理，人民是不會鬧事的”。¹⁰⁷ 在河南新鄉，劉少奇聽取地委負責人匯報農業生產合作社情況，對該地實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三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十分讚賞，肯定這是農村生產關係的一種調整。¹⁰⁸ 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指示：“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中的分配問題。”¹⁰⁹

農業、手工業改造後，生產經營單位普遍過大，也是農業社和手工業社社員產生不滿的原因之一。劉少奇同新鄉地委負責人談話時說：“生產力只是那麼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係超過了生產力。”劉還談到勞動方式，認為“社員勞動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可以“實行分組分戶小包工，分給社員的農活只要求他幾天完成，隨便他什麼時候上地，有個勞動自由。有很多小活適於個人勞動，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劉少奇明確提出農業社要放棄集體喂養牲畜的方式，並指出：分散喂養並不是倒退，只是經營管理方

106 參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6-400頁；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12-823頁。

107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7頁。

108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8頁。

109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1-392頁。

式改變一下。¹¹⁰

商業、服務業過於集中經營，給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緊張，是引發市民不滿的重要原因。劉少奇在聽取地方匯報後，主張實行國家、集體、個體幾個方面同時經營。在長沙，劉少奇提出：市政建設的大項目，如自來水、電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國家投資；那些零零星星的項目，如市民住宅、理髮館、商店、電影院等，應該發動群眾，可以由群眾自己辦。在廣州，劉批評說：“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私商小販做生意能賺錢，國營商業為什麼就不行？”他要求國營商業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採取一些靈活的辦法，如下鄉採購，晚間營業，搞好對市民的蔬菜供應等等。劉很看重自由市場的作用，認為自由市場對國家有利，可以暴露國營商業的缺點，補充其不足，方便人民。¹¹¹

工礦企業的職工住房緊張，也是各地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劉少奇視察株洲湘江機器廠時談到了解決職工住房的問題。他說，我們國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資大，職工住房問題，國家只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解決。今後，集體宿舍還是應該由工廠解決，家屬宿舍工廠不能再蓋了。凡是青年職工要結婚的，都要他們參加房屋合作社，自己蓋房子。工人自己蓋的房子，一輩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屬於自己所有，將來如果調動的話，還可以出賣、出典、出租，本錢可以撈回來。¹¹²

中小學的辦學、中小學生的升學和就業，是劉少奇此行關注的又一個問題。他聽取湖南省領導人匯報教育工作後，要求放手讓群眾辦學。劉提出，在農村是社員辦學，而不是合作社辦學；在工廠是工人辦學，而不是工廠辦學。“現在除了國家辦學校以外，還可以集體辦學、互助辦學，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職業者辦私塾。”對於

110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8、389、397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頁。

111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0-391、393、395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45-346頁。

112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2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42-344頁。

升學和就業問題，劉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和青年組織對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採取負責的態度，分別情況，作好統籌安排：除了再辦一些小學、中學，組織學生自學的辦法外，還有就業的途徑。除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學生，城市裏的服務行業和手工業需要增加一部分學徒和職工外，劉少奇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生的主要方向。¹¹³

在劉少奇調查研究的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在積極制定和頒佈各種旨在解決社會生產、生活問題的政策和規定。1957年1月11日，陳雲便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14日陳雲又出席全國農村自由市場會議並講話，提出要對市場物資供應緊張暴露出來的矛盾加以研究並找出辦法。¹¹⁴ 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時，指出由於對市場管理過嚴過死，帶來一些副作用，強調開放農村自由市場對於活躍城鄉物資交流、刺激農業生產、改善國營和供銷社商業的經營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動和刺激作用。¹¹⁵ 2月6日上午，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要求制定若干主要農產品的比價，解決好收購和零售差價過大的問題，適當改變偏遠地區某些農產品收購價偏低的現象。當天下午，陳雲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1957年面臨巨大就業壓力，需研究解決辦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數必要外，職工到60歲應該退休，女職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約55歲)。會議還討論了發展養豬生產的問題。¹¹⁶ 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大幅度提高生豬收購價格，要求各地農村貫徹執行生豬“私有、私養、公助”的方針，並在供應飼料和收購價格上合理兼顧社員個人利益和合作社集體利益，以改變

113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0、391、394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30-331頁；《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94頁。

1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頁。

115 1957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

116 《陳雲年譜》中卷，第366-367頁。

生豬生產下降的趨勢。¹¹⁷ 2月7日，陳雲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特別講到不能把人民鬧事“看成反革命”，對人民鬧事問題的處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對的，都應滿足；不對的，要批評；有困難的暫時解決不了的，要講清楚，說老實話；除現行反革命外以外，一律不抓、不開除。¹¹⁸

3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農業社必須堅持民主辦社的方針，按時公開財政收支，包括產品分配、銀行存款、國家預購款、國家的貸款及用途、生產資料和用具的購置、幹部的補貼、社員的預支、國家的救濟款等，決定社隊問題要同群眾商量，幹部要參加生產。¹¹⁹ 3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允許合作社將小型役畜轉給社員私有、私養、私用，或幾戶社員夥有、夥養、夥用，滿足社員家庭副業生產和日常生活對畜力的需要；同時適當調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養牛的積極性。¹²⁰ 同日又發出有關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並社和轉高級社的工作應該停止；過大的社可以根據本地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多數社員的意見，採取簡便方式進行必要和適當的調整。¹²¹ 3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承認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游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沒有作好，特別是由於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指出防止這類事件發生的根本辦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¹²²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透露中央準備在年內召開中央會議，專門討論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問題；職工生活問題；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和教育問題；企業中黨、工會、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問題。¹²³

毛澤東是否關注到劉少奇的南巡講話，目前不得而知，但毛的

117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第75-77、87頁。

118 《陳雲年譜》中卷，第368-369頁。

119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128-130頁。

120 《陳雲年譜》中卷，第373-374頁；《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8號，第76-78頁。

121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8號，第70-73頁。

12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154-163頁。

123 同上，第166-173頁。

思路與劉不同，卻是十分明顯的。劉少奇出發一個月後，毛澤東決定也進行一次南下巡視，目的是進一步在全黨推動整風。不過，毛選擇的是津浦綫。臨行前，毛澤東審閱並批准了《中央關於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指示》，其中特別講到：“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這不但對於密切黨員與非黨員的團結有好處，對於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討論和研究問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也是很有好處的。”這個指示要求各地“應該同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並且像中央召開的這次宣傳工作會議一樣，吸收黨外的教育、文藝、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界人士參加”，會議“應當充分發揚民主，特別要讓黨外人士講出內心的話”。¹²⁴ 從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到了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處，都要召開座談會，對當地黨員幹部發表講話，走一路，講一路，毛自己說他“變成了一個游說先生”。¹²⁵ 這次沿途演講，實際上成了全黨整風的思想發動。¹²⁶

關於整風問題，毛澤東在天津說到，這沒有什麼可怕，就是學習和檢查，對錯誤嚴重的同志要幫助他改正，但不用開大會鬥爭的方法。今年準備試行，明年再正式開始，黨內這麼做，黨外自願參加。¹²⁷ 到濟南又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人民內部矛盾就發展起來，解決思想問題，正確的方針不是收起來，而是還要放，現在還放得不够。共產黨政府有工人、農民作基礎，有馬克思主義指導，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那一套東西。共產黨有時候還要借黨外的力量幫個忙，叫做內外加攻，把官僚主義這些東西吹掉一些。“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

1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31-134頁。

125 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

126 《毛澤東傳》，第642頁。

127 毛澤東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7日。

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¹²⁸在南京，毛澤東說：這些年知識分子還是有進步的，應該肯定這一點”，“民主黨派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提出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這些方針應該堅持下去。“如果我們身上有官僚主義，有缺點，首先讓黨內批評，然後黨外批評，批評我們的缺點，把我們的官僚主義改一改，把缺點改一改，不就好了嗎？會不會倒呢？不會倒的。”對於民主黨派，毛澤東主張“要同他們講真心話”，“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關於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講，黨內是這樣講，跟黨外也是這樣講。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講罷工、罷課、游行示威，暴露我們官僚主義的這樣一些材料，可以印發給他們看。他們平時看不到，這樣一來，反比較好。有時可以開兩個黨共同的會議，黨內黨外同時參加。”¹²⁹

到了上海，毛澤東重點談群眾鬧事問題。他說，凡是有官僚主義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鬧事。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這類事情，應該看作正常現象，並且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關於整風，“中央還沒有做出正式決定，準備這樣做。今年準備，明年、後年兩年實行，以三年時間”，“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批評”。毛強調，整風只會增加共產黨的威信，共產黨要民主黨派進步，首先自己就得進步，共產黨把作風整頓好了，取得了主動，黨外人士就會自願參加，進行自我批評和整風。他們中的左派和中間派會來參加，右派恐怕就不幹。現在問題是，在相當多的地方“黨內黨外隔一層”，“溝太深”，應該“把溝填起來”。最後，毛澤東強調，批評共產黨的缺點，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擴大民主是為了加強民主集中制，這是原則。但是還要有靈活性，不能碰到罷工罷課，碰到錯誤的言論，就拿“破壞黨的領導”當擋箭牌。這樣，“我們國家的文學、藝術、科學就可

128 毛澤東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內容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84-285頁。

129 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內容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85-287頁。

能希望繁榮、發展起來”，“我們的希望就可能達到”。¹³⁰

此行最後一站是杭州，毛澤東在這裏召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思想動態的匯報，並針對黨內提出的問題，發表了一些很有針對性的看法。如上海幹部反映：現在搞百家爭鳴不是時候，百家爭鳴與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傳達要求先黨內後黨外，一下推開感到難辦。毛澤東針鋒相對地說，八大已做了結論，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時候。什麼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為了爭取群眾嘛。不考慮爭取群眾，談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現在黨與非黨之間有條溝，而且很深。我並不是說黨與非黨不要有界綫，應該有條綫，混起來不好，但不應該變成鴻溝，脫離群眾。接着，毛談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的問題：黨內黨外一起來好，這樣快，就把許多人推上政治鬥爭舞台，不然兩三年也不得解決。現在黨外傳達很快，黨內反而遲，報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幹部反映：“黨外的人士聽了主席的報告之後都很興奮”。毛警惕地問：“黨外興奮，黨內呢？”聽說省委準備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毛又追問：“有沒有黨外人士參加？縣裏來不來人？”接着不滿地質問隨行的陸定一：“我們的宣傳工作會議為什麼不報道？有黨內外人士都參加的會議為什麼不報道？最高國務會議一聲不響，宣傳工作會議還不響。《人民日報》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聲不響。”聽說很多人過去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澤東更加生氣了：“陳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所以，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想法抵觸嘛。”¹³¹

這次南方之行對毛澤東的觸動很大，並引起了他新的思考。他了解到，對他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黨內外的反響完全不同。黨

130 毛澤東在上海市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1日。

131 《毛澤東傳》，第654-661頁。參見毛澤東在聽取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市負責人匯報時的插話(記錄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反應積極，雖然對鳴放還有顧慮，但普遍表示擁護和贊同。而在黨內，從各地匯報的情況看，大多數幹部還是對雙百方針的提出是否正確、是否適時有懷疑，不敢放、不願放、不想放。黨外傳播迅速，黨內傳達遲緩，黨外報紙反應強烈，黨內報紙一聲不響。這種反差表明，黨內的思想認識已經跟不上形勢的變化，甚至落在民主黨派的後面。對於這種狀況，毛澤東十分不滿。

所有這些都表明，在中共最高決策層，對於當時普遍出現的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社會現象，關注點是不同的，解決問題的主張也是各有側重。同樣是處理“少數人鬧事”，同樣是整頓黨風，毛澤東顯然更傾向於開展思想教育運動，從意識形態方面下手，而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則比較重視調整政策，強調解決人民當前利益、處理好人民生活問題。這一點，從上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就已經可以看出。¹³² 不過，這並不說明中共高層存在着原則性分歧。國外有研究者認為，自1956年下半年以來，劉少奇便與毛澤東有嚴重分歧，並抵制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這個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測和推論得出的，而缺乏文獻的依據。¹³³ 仔細研究劉少奇這一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其實他對兩類矛盾問題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澤東一樣，劉少奇也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內部問題，群眾鬧事的主要根源在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而且還有過全面而精闢的論述。¹³⁴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並不在這裏，而在於解決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點不同。對於毛澤東提出的整風運動，劉和其他領導人都不可能原則上表示反對。但是，劉少奇一直強調整風是一次學習

132 參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3-329頁。

133 參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95、323-327、366-368頁。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對於整風的目的，毛澤東強調的是批判官僚主義，而劉少奇始終把主觀主義擺在第一位。其實，毛澤東有時講話也把主觀主義排在第一（見本文），而劉少奇有時講話則重點批評官僚主義。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2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251頁。

134 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95-309頁。

運動，批判和自我批評也限於黨內的和風細雨方式。筆者逐一查閱了劉少奇此期的講話和報告，發現他幾乎就沒有談到過雙百方針，更不用說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甚至到5月7日整風運動已經全面開展起來以後，劉少奇在高級黨校的談話中仍然認為，整風就是“聯繫個人思想問題，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同時也要“進行同志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批評”。劉嚴厲地批評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但強調應採取“妥協性的辦法”處理，還特別指出，“凡是黨內的矛盾，都是非對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撥離間、破壞黨的活動，也可以把這種矛盾搞成對抗性的。”¹³⁵毛澤東明明說，這次整風是解決黨群關係，解決黨與非黨之間的矛盾，並且邀請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起整風，劉少奇卻在這裏強調“同志間”的批評，“黨內”的矛盾。毫無疑問，劉少奇的這種態度和觀點代表了當時黨內多數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的心聲，而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澤東下定了決心。

4. 毛澤東決定提前開展黨內整風

根據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精神，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主要內容是：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1957年進行準備工作，並在適當範圍內試行，1958年全面開展，大約在二至三年時間內完成。毛澤東回到北京後，4月9日，審閱和修改了這個決定。毛在修改時特別加了一句：“此件以早發為有利”，同時又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試行這一決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過，這個決定(草案)和通知最後都沒有下發。¹³⁶其原因就在於通知中確定的整風開始時間——1958年，對於毛澤東來說，已經顯得太遲了。

面對黨內普遍的消極情緒，毛澤東決定提前開始整風，並拿

13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250-251、258頁。

13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21-422頁。

《人民日報》作突破口。《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長時間對雙百方針沒有進行主動宣傳，報道也很少。特別是1月7日發表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後，一直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甚至毛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後，也遲遲沒有動靜，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發表了一篇通訊，內容只是各地關於此文的報道情況和讀者來稿來信。關於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的這兩次會議，《人民日報》的報道異常簡單。最高國務會議開完後，《人民日報》刊登了來自新華社的一條不足200字的消息，還是安排在一篇關於經濟問題的社論後面，位置並不顯要，而對毛的講話只提了一句。至於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報上連個消息都沒有發。¹³⁷這就是毛澤東在杭州質問陸定一的原因。

回到北京後，毛澤東怒氣未消，決定對《人民日報》“動手術”。4月9日晚上，毛把胡喬木找來談話，嚴厲批評《人民日報》總編輯兼社長鄧拓說：“《人民日報》違反了黨中央的政策方針，為什麼三令五申後，至今三月有餘一直避不表態。《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但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上，一直不聲不響，完全沒有領導，領導權被別人拿去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黨外很活躍，黨外報紙或青年報紙很活躍，唯獨黨的報紙保持沉默，有異己傾向，己是馬克思主義之己。新華社不知怎樣？是否報導了這方面的消息，誰領導。我早說過，鄧拓要走路，到別的地方，現在沒有其他辦法，只好讓人走路。”¹³⁸

胡喬木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報》便登出了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當天看過報紙後，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和報社負責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處，還特意請來了社論的執筆王若水。毛澤東一上來就大發雷霆：“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

137 見1957年3月3日《人民日報》；《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

138 《林克日記》（手稿），第30-31頁。

以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還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主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鄧拓趕緊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公佈前，也不引用。我對這件事沒有抓緊。毛緊追不捨：“中央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麼不發社論？消息也只有兩行。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會議不發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毛澤東對鄧拓發了一通火後，把話題轉向了知識分子問題，說：“現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麼？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要接近黨外知識分子，了解他們。要跟非黨知識分子交朋友。我願意同民主人士、中間派談，比如李鼎銘。黨員的黨話太多。近來我在找黨外的教授、工程師談。”還說：“現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相當緊張，知識分子魂魄不安。黨內也緊張。還要繼續緊嗎？我主張鬆，這樣他們就靠攏我們了，有利於改造。不能緊，越緊他們就和我們的距離越遠。過去太緊，現在要鬆一點，使他們靠攏我們一點。”“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愛國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許他們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的政策是‘放’，還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這一點。”最後，毛澤東又批評黨報不如非黨報紙：“《光明日報》接連發表幾篇文章，都是討論當前重要政治情況的。這些情況《人民日報》編輯部也應該討論。”“這次出去看一看《新民晚報》，覺得那個報紙還是嚴肅的，沒有什麼黃色的東西。有些東西還硬了些，不

敢放開講。《光明日報》有幾個副刊也還好。”毛還給幾家報紙排了隊：“《文匯報》，《中國青年報》，《新民晚報》或者《大公報》，《光明日報》，最後是《人民日報》和各地黨報，這樣一個名次。”¹³⁹

指責《人民日報》“抵觸”中央方針、同中央“唱反調”，未免言過其實。不過，黨報4月10日以前很少宣傳毛澤東提出的新方針，卻是明顯的事實，而這恰恰反映了黨內多數幹部的情緒。毛澤東遷怒於《人民日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時的感受使然。黨內多數幹部對他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冷漠處之，毛澤東看在眼裏，急在心上，本來就有一肚子火，看見《文匯報》、《新民晚報》以及《光明日報》這些非黨報紙接連發表文章，贊同鳴放，針砭時弊，感覺到“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積鬱的不滿才爆發出來。胡喬木回憶說：毛澤東“到上海以後，一看《文匯報》、《新民晚報》搞得很熱火，《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按兵不動，他就火了，就說要搞大鳴大放。”¹⁴⁰

毛澤東當然不只是發火而已，為了推動整風，他一連氣親筆起草了幾個中央文件。

4月17-19日，毛澤東連續三次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開會。¹⁴¹會議的內容目前尚無史料說明，但很可能就是討論整風問題，因為4月19日這天，毛澤東親筆擬了一個黨內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檢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並把討論中“黨內黨外贊成反對兩方面的意見”，各級領導的意見及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寫成報告”，在15天內用電報(外地)和書面報告(北京)送中央。¹⁴²在毛澤東的這個指示

139 毛澤東同人民日報負責人等談話記錄，1957年4月10日。轉引自《毛澤東傳》，第664-665頁。參見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第319-327頁。

140 胡喬木：《胡喬木論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頁。

141 《陳雲年譜》中卷，第377頁。

1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32-433頁；吉林省檔案館，

中，調查之廣泛、詳細，要求之嚴厲、急迫，足見其急於打開黨內局面的心情和決心。目前沒有資料顯示這幾天中共高層的活動，不過，從周恩來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要立即開始整風的想法已經得到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認同。周說：“正確地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首先要將共產黨搞通”，為此“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整風主要是三個口號，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宗派主義。”¹⁴³

不等各地、各部門的匯報到手，毛澤東已經開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澤東在游泳池召見彭真，談了對整風指示稿的修改意見。¹⁴⁴ 4月27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這一文件。¹⁴⁵ 同日，毛澤東還親筆起草了一個關於整風和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作為“吹風”，發至基層黨委。文件指出：“黨的整風指示，日內即可發出，即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揚正確的思想作風，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的思想作風。”¹⁴⁶ 4月28日，毛澤東又對整風指示稿作了修改，並批示：“準備5月上旬或中旬公開發表。”¹⁴⁷ 29日晚，毛澤東再次召集劉、周、陳、鄧、彭等人專門討論有關開展整風運動的問題。¹⁴⁸ 與此同時，毛澤東繼續關注並鼓勵黨外的鳴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很滿意，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為該文重新擬了一個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按語說：“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

1-13/1-1957.72，第1-2頁。

143 轉引自《周恩來傳》下卷，第1329-1330頁。

144 《毛澤東傳》，第670頁。

145 《陳雲年譜》中卷，第378頁。

14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94-295頁。

14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51-452頁。

14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06-607頁；《陳雲年譜》中卷，第379頁。

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¹⁴⁹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30日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文件，緊接着再發出修改稿，又做了幾處文字改動。¹⁵⁰ 文件首先批評黨的許多幹部“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並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這種新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澤東兩個講話傳達以後，“引起了黨內黨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對於在整風運動中檢查出來犯了錯誤的人，不論錯誤大小，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上的處分”。文件最後還特別指出：“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¹⁵¹

儘管在文件中沒有明確表露開門整風的意圖，而只是提出歡迎非黨人士參加整風，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開始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當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整風動員。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主要領導人和26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這次講話，毛澤東顯得情緒激昂，比前幾次更加放得開，重

14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53-454頁。根據毛澤東的建議，5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150 陝西省檔案館，123-43-1，第11-16、17-19頁。

151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

點在於鼓勵非黨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整風即將開始，毛有些得意地說：“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講到大鳴大放，毛更加樂觀：“現在報紙天天在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類。攻就趁此機會，只要找出證據，就能站住腳，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至於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毛說：“規定非黨員自原參加，自由退出。最近兩個月就是這個方式，就是整風辦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風，已經整了兩個月。”這個說法，與整風指示中說的方式已經有些區別了。為了鼓勵黨外人士站出來講話，對於當時正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教授治校”，“共產黨有術無學，不能領導科學”等，毛澤東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贊同民主人士的意見的。¹⁵² 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此前的言論，這番講話更具鼓動性和影響力。不過，積極起來響應的還是在黨外，而不是黨內。這就難怪運動開展起來以後，雖然說是共產黨整風，但真正積極參與其中的卻大都是知識界的非黨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一場轟轟烈烈的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了。¹⁵³ 如上所述，毛澤東決心對執政黨發動一次整風運動的思維邏輯是：經過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是不多了，舊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大多數雖然還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他們對政

152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4月30日，參見《毛澤東傳》，第670-673頁。

15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的注解說“根據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報》刊印”(見該書第226頁)，有誤。

權已經沒有威脅，而思想改造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黨內，在執政黨本身；只要通過整風，改變執政黨的作風和形象，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權就會鞏固，就會發展。

然而，一旦這個邏輯的前提發生變化，毛的估計和自信受到打擊，所謂整風就必然會轉向性質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場運動。

三、黨內整風是如何轉向反右派運動的

如果承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確實是針對執政黨內部問題的，那麼在反右運動史研究中，留給人們的最大懸念就是：整風運動為什麼會轉向反右運動？這個轉變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哪些因素導致毛澤東改變了他以前的估計和判斷？或者可以歸結為一個人們常提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麼和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關於這個問題，研究者眾說紛紜，各種解釋不勝枚舉。¹⁵⁴ 從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全黨整風的指示，到6月8日《人民日報》發出反擊右派的號令，前後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各大城市、各個階層、黨內黨外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且錯綜複雜。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將沿着兩條綫索展開：一是整風事態發展的過程，一是毛澤東思想變化的過程。

1. 毛澤東積極倡導實行開門整風

毛澤東所以倡導開門整風，是出於他當時對知識分子¹⁵⁵的這樣一些認識：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以後，國家建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

154 例如轉變的原因，有的認為是迫於黨內反對派的壓力，有的認為是擔心經濟建設受到影響，有的認為是有極少數知識界和黨外人士想要推翻共產黨。至於決定轉變的時間，有說是6月6日六教授召開會議時，有說是5月19日北大發生風波時，還有說是5月15日寫作黨內指示時，甚至有人認為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時就已經決定發動反右了。如此等等，詳見下文。

155 毛澤東認為“民主黨派都是知識分子”。見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

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多數不接受馬克思主義，對他們必須長期改造，但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因此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他們一定的民主和自由；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任務是解決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方法就是整風。在這方面，因受到黨員幹部的抵觸而需要知識分子給以幫助。於是，就出現了“在貫徹雙百方針的氛圍中進行開門整風的背景，其方式就是在會議上和報紙上“大鳴大放”，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原來設想的“和風細雨”變成了“急風暴雨”，由原來設定的“小民主”變成了“大民主”。這一切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一手造成的，儘管他的本意或許並不在此。在毛澤東看來，廣泛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對這次整風能否取得成效關係甚大。他有意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黨整風的指示登報前一天發表的長篇講話，對於黨內是吹風，對於黨外則是動員。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當然是為了配合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但人們應該注意到，社論沒有提到雙百方針，沒有提到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顯然是忽視了毛澤東4月30日講話的意圖和精神。無論這樣做是有意還是無意，社論的發表迎合了多數黨內幹部的心理，並立即在地方上有所反應。5月3日雲南省辦公廳發出整風通知說，“省委醞釀的精神”是：第一，肯定要學習，在這個重大關頭，“一定要跟着搞”。第二，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要勁頭一來了，就搞個大民主轟一下”。所謂有步驟，就是5-6月只能傳達中央精神，“至於認真地從思想上系統地檢查，看來要到7月”。¹⁵⁶

面對如此狀況，5月4日，毛澤東又專門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毛首先肯定開門整風已成事實，且效果良好，應該繼續。又說：“大多數的批評是說得中肯的，對於加強團結，改善工作，極為有益。即使是錯誤的批評，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於我們在將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接

¹⁵⁶ 雲南省檔案館，2-1-2745，第1-2頁。

着指出了整風正式開始以後的做法：“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他們同意此種做法。只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裏首先指知識界)。”¹⁵⁷ 有一種看法認為，這個文件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在逐步形成，理由是毛澤東在此提到“暴露”一些人的面貌，以利於“將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¹⁵⁸ 其實，這不過是毛澤東開展思想鬥爭的一貫做法，錯誤思想沒有暴露，如何對它進行改造？應該注意的是這裏的提法：“即使是錯誤的意見……”。毛的主旨是強調“大多數的批評是說得中肯的”，是“極為有益”的。因為對這種已經出現的形式感到滿意，毛澤東才正式在黨內指示中提出，並希望繼續下去。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還在中共中央整風運動指示發表之前，社會上非黨人士在座談會和報刊上已經發表了不少意見。如4月1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在天津邀請10位教授舉辦的座談，4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的中共上海市委接連舉行的科學家座談會，4月26日《光明日報》報道的上海知識界鳴放的情況，以及4月30日和5月1日在郭沫若邀請下舉辦的科學家座談會。¹⁵⁹ 《人民日報》還在4月份專門開闢兩個專欄：“科學家談黨對自然科學的領導”和“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刊登一系列知識界人士的文章。毛澤東5月4日的指示下達後，中共更是主動組織各種座談會，特別是非黨人士座談會，向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見。5月6日和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清華大學召集座談會，研究高校裏中共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關係問

157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96-297頁。

158 如兒子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4頁；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99年，第99-100頁。

159 1957年4月21、22日23日、5月1日《人民日報》；1957年4月26日《光明日報》。

題。主持座談會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發表了頗為開明的講話。他說，各民主黨派要求發揮更多的作用，在政治生活中，他們不僅要參與“設計”，還要參與“施工和檢查”，“這是對的，應該肯定”。李維漢指出，要重視民主黨派，在政治上信任他們，在思想、學術上允許爭、放，解除某些壓力，克服中共黨內的宗派主義，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去掉中共黨員與民主黨派成員之間的“鴻溝”。李甚至鼓勵說，“校務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可以同黨委的意見不一致。共產黨可以在校務委員會上提出方案，民主黨派也可以提出方案，個人也可以提出”。¹⁶⁰ 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市委也召開了作家座談會，對文藝作品少、文藝創作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現象，特別是黨的文藝幹部的宗派主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批評。¹⁶¹ 這一階段的鳴放言論，基本上是針對基層單位的，所批評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也都是具體工作中的表現，而且完全沒有超出毛澤東歷次講話指出的範圍。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這些都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

林克在日記中記錄了毛對這些言論的一些反映。如4月24日談到馮友蘭、賀麟的文章時，毛說：教條主義學問不多，未摸清舊知識分子的底，而舊知識分子被壓迫了一下，他們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摸清了我們的底。因此，現在應該壓一下教條主義，埋頭幾年學些學問，糾正教條主義，將來主要還靠他們。現在舊知識分子尾巴翹起來了，但最後教條主義糾正了，用說服辦法來說服舊知識分子。現在舊知識分子威風了，教條主義抬不起頭，會不會亂，不會亂，因為群眾有鑒別力。¹⁶² 很明顯，對於教條主義者和知識分子，毛澤東內心是有遠近親疏之分的。但說到他們之間的分歧，毛在這裏指的顯然是學術思想爭論方面的問題。對此，他沒有任何擔心。5月6日的日記是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針對當時社會上有關

160 1957年5月8日《人民日報》。

161 1957年5月8日《解放日報》。

162 《林克日記》(手稿)，第34-35頁。馮、賀的文章發表在當天的《人民日報》，足見毛澤東對鳴放情況的關注。

“釣魚”的說法，毛澤東說，“釣魚，有人很怕，說百家爭鳴是為釣魚。這看如何理解，百家爭鳴是方法還是目的？為了認識真理，那麼也可以說是釣魚，不過是釣兩條魚，而不是一條魚，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的魚，一條是非馬克思主義之魚，不僅是釣魚，而且是撒網。”¹⁶³毛在這裏有些戲言，不過講的還是在兩種世界觀之間明辨是非的問題，而不是政治運動的策略。這裏所說的“釣魚”與後來的“引蛇出洞”完全不是一回事。

從這段時間毛澤東對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傾向。根據秘書胡喬木整理的記錄稿，4月24日到5月7日，毛澤東改出了“自修稿第一次稿”。其中增加的內容主要有：“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把另一個側面給否定掉”；我國私營工商業改造“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密切相關的”；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最近幾年中有了很大的進步，強調團結知識分子，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進步；“無論是共產黨，或者是民主黨派，監督它們的首先是人民。再則，政黨的黨員又監督政黨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加上一條，各個政黨互相監督，這樣豈不是更有益處嗎？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一批評一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花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關於如何處理罷工、罷課等事件”，保留了原講話處理鬧事的四條原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義，使之不鬧；二、要鬧，就讓他鬧；三、讓他鬧够；四、對鬧事的頭子不開除。又加了一句：“應該把群眾鬧事看作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手段。”5月8日毛澤東又接連改出兩稿，補充的相關內容主要有：不能把維護社會秩序的行政命令與說服教育的方法混為一談；人民群眾決不會“無故鬧事”，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重大驚小怪，倒是足以調整社會秩序，懲罰官僚主義”；“所謂公民

163 《林克日記》(手稿)，第36頁。

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閑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¹⁶⁴ 從上述增加的內容看，對群眾鬧事、知識分子、民主黨派、雙百方針等問題的論述，與5月4日的指示精神都是一致的，而在言詞上顯得更加放得開。這說明毛澤東對整風運動開展一周前後的情況是滿意的。

2. 毛澤東感到事情起了變化

那麼，毛澤東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警覺的？到底哪些言論讓他感到不安了？

關於毛澤東開始警覺的時間，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是5月中旬。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接受，但是過於籠統，因為就是在這幾天當中，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究竟怎麼變的，絕不是一個“5月中旬”可以解釋的。況且，很多論著提出這種說法的依據是靠不住的。人們最常引用的是李維漢的回憶。李維漢說：民主黨派和工商界“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5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決定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

164 以上修改文稿的內容，均見《形成過程》，第21-25頁。

派的決心。”¹⁶⁵

李維漢的這段記憶很不準確。統戰部的報告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這應該是事實。¹⁶⁶ 但是第一，目前所有(內部和公開)的資料都不能證明在5月15日前的座談會上有誰發表過“輪流坐莊”、“海德公園”之類的言論。像這樣刺激的言詞大概不會逃過記者的眼睛，而當時統戰部對各種報道又均未作刪改。¹⁶⁷ 第二，從座談會一開始《人民日報》就有詳細報道，而不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匯報後才開始的。第三，羅隆基說“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這番話，是在1956年民盟工作會議期間，而不是在1957年座談會上。¹⁶⁸ 至於“外行領導內行”的說法，更早在整風運動之前就有，毛澤東曾多次提及，並認為有一半道理。¹⁶⁹

李維漢所說的毛澤東5月15日“寫出”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正是他和其他許多人判斷毛澤東何時決定開始反右的依據，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這篇文章發出了反擊右派的信號”。¹⁷⁰ 這是完全錯誤的理解。該文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刊載時，所署時間確是5月15日，但編者有題注稱：毛澤東在第一次審閱樣稿時注明：“此文是5月中旬寫的”，署名“中央政治研究

16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833-834頁。

166 根據毛的秘書陳伯達回憶，統戰部在一份報告認為，座談會發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錯誤的。這個報告對毛主席有較大的影響。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1998年，第148-150頁。

167 統戰部1957年5月12日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稱，新華社和報紙關於座談會內容的報導均未經統戰部審稿。

168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5號，第100頁。據吳晗的發言，羅隆基說的是“今天的矛盾是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的矛盾”，與李維漢的回憶略有不同。羅隆基後來在報紙上公開檢討5月10日座談會的發言時，確實提到了這句話，但他說明那是在民盟工作會議講的話。[1957年7月16日《人民日報》。]有研究者認為，正是羅隆基這句話刺痛了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毛澤東，他才決定開始“收網”的。[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第50頁。]這裏的誤判顯然是因為作者沒有仔細核對史料。

169 參見毛澤東在聽取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市負責人匯報時的插話(記錄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170 《陳雲年譜》中卷，第382頁。

室”。同時對清樣作了少量文字修改。這次修改和批注的時間是6月11日。6月12日，該文印發黨內。在閱看已經印發的這篇文章時，毛刪去了原來的題下說明，改署名為“毛澤東”，改時間為“5月15日”。¹⁷¹ 如此看來，第一，此文應是5月中旬起草，6月11日定稿的，所以人們看到的文字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毛澤東5月中旬的想法，而是反右運動開始以後的想法。第二，此文原是毛澤東準備為《人民日報》寫的評論員文章，後來才改作黨內文件，所以其用意可能會有很大不同。因此，這篇文章根本就不能作為判斷5月中旬毛澤東有何想法的依據，而作為發動反右的“信號”更是無稽之談(文件是反右開始後發出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修改這篇文章時標明的日期——5月15日，很可能反映了他思想轉變的時間。¹⁷²

至於哪些言論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很多研究者和當事人的推斷都是：“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等，認為毛澤東受到這些言論的刺激，才決心反右的。¹⁷³ 不錯，這些說法可能最令毛澤東惱怒和反感，後來也確實成為反右派運動集中批判的靶子。但是，在中共中央發出準備反右和“引蛇出洞”的指示之前，上述言論都還沒有發表，因此不可能成為引發毛澤東改變主意的依據。

李維漢有一個說法很在理：“中央當時發動這一場鬥爭，有一個醞釀和發動的過程。”¹⁷⁴ 筆者將能够找到的有關文獻、史料

17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75-476頁。此文首次發表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172 順便說一句，很多論著在研究毛澤東如何決定進行反右的問題時，都非常看重此文。但筆者的考察結果認為，對於所要回答的問題而言，與其他相關的文獻和史料比較，這篇文章的研究價值最低。理由：此文是毛澤東後來修改的，如果研究者不知道修改的內容和過程，那麼在這裏可以看到的，充其量是毛澤東自知對知識分子估計過高、對局勢判斷失誤後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心情及文過飾非的手法。況且，文中所述內容，在其他文獻裏也大多講過了。

173 如見李新：《反右親歷記》，蕭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5-17頁；林克等：《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5-46頁。

174 《回憶與研究》，第833頁。

按時間順序排隊進行分析，希望能看清毛澤東這段時間思想變化的軌迹。

首先是5月12日林克的日記，這則史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可以說明毛澤東最初思想變化的證據，故極為重要。這一天的日記如下：

毛主席在同我談話時說，目前全國已經爭鳴和齊放起來，知識界爭得最響。民主黨派不那麼響，工商界最先神氣，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陳銘樞等人發言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20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說是一種典型。有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來到，各種蛇也開始動起來了。民主黨派某些人及資產階級某些人的鳴放，並不增加他們長期存在、共同監督的資本，相反某些言論會使它[他]們在群眾中喪失威信，這樣就不是長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張奚若談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主席還談到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問題。他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但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有左的片面性，他們克服了片面性會大進一步。他們所以寧左勿右，他們是要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人則比較危險。

毛主席進一步談到爭鳴和齊放的限度是什麼？限度就是不能火燒房子。批評應該：(1)有利於人民民主專政；(2)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3)有利於黨的領導。而共產黨的領導是有決定性的。

毛主席在談到新聞自由問題時說：新聞就是要控制，新聞應該服從國家的經濟的基礎，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為無政府主義的經濟服務。例如：1956年上半年農業合作化時，只能宣傳發展合作化的方針，不能存在(宣傳?)削減農業合作化的方針。黨內存在兩條方針就會為工作造成損失……[此處幾句字迹不清]更不允許煽動性報道。

目前有三方面情況不報道或加以控制：(1)肅反案件；(2)物價；

(3)外交政策。

關於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這有利於我們。¹⁷⁵

由此可以判斷，這時毛澤東已經發現鳴放中有問題了，雖然不是多嚴重，但主要有兩個“危險”傾向：“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有所表露”。核查被點名的這幾個人當時的言論，引起毛澤東注意的應該是民主黨派座談會上章伯鈞、章乃器關於改變機關黨組制和要職要權的言論，陳銘樞和羅隆基改變學校黨委制的言論，以及羅隆基要求給予民主黨派“平等、獨立、自由”的言論。¹⁷⁶於是，毛澤東提出了鳴放的三個“限度”，核心是黨的領導。還有，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各種蛇”開始動了，又說“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表明他這時開始產生了“引蛇出洞”的念頭，雖然具體做法還只是“放”蛇出洞。再有，對新聞報道提出三個禁區，說明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開始有些擔心了。不過，這裏也有一點疑問：張奚若講“先要正己方能正人”是在5月13日（《人民日報》14日刊出），毛如何在12日就引證呢？或許張奚若以前也說過這話，或許林克習慣第二天追記日記？這倒不是很重要，但有一點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時肯定還沒有看到張奚若5月15日關於“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發言，否則就不會以讚許的口氣提到他了。總之，毛澤東此時還只是有些疑心，他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甚至沒有同其他領導人進行溝通。

5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兩篇文章表示情況如常。一篇是讀者來信《不能強迫非黨同志參加整風》，一篇是《解放日報》5月9日社論《好得很，還是糟得很？》，批評黨內幹部對大鳴大放的錯誤認識。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談職工鬧事》指出：“凡是鬧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義比較嚴重的地方；職工不能通

175 《林克日記》（手稿），第37-39頁。方括號內是筆者加寫的校正或說明的文字。

176 參見1957年5月9、10、11、12日《人民日報》關於民主黨派座談會的詳細報道。

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時候，才被迫走鬧事這條路。”至少到這時，毛澤東還沒有做出新的決定。從各方的文獻材料看，政治局10日開會通過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後，直到13日，毛澤東沒有召集過會議。還有，13日陳雲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電報，其中指出：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方面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普遍存在，要求“各地各部門應在整風運動中發動群眾予以揭露，組織力量，抓住重點，進行系統地檢查、糾正”。¹⁷⁷ 電報的口氣和內容，也絲毫沒有脫離中共中央整風指示的框架。

14日發生了變化，但在不是白天。這一天毛澤東要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閱讀5月10日《解放日報》，該報第二版以《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為題，整版刊登了上海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摘要。毛澤東寫了批語：“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又批示：“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匯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¹⁷⁸ 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在這裏是要提醒人們注意運動出現的危險傾向。¹⁷⁹ 這個解讀恐怕有些偏頗。仔細翻閱這份《解放日報》可以發現，報上所载言論雖然數量很多(整整一版)，但涉及的都是基層單位、下層領導和具體問題。¹⁸⁰ 同《人民日報》刊登的民主黨派座談會發言相比，上海中小學教師們所提意見要溫和得多，且沒有涉及政治制度、幹部人事制度、經濟方針、歷次運動遺留問題等。如果毛澤東要提醒中共領導人注意極少數人的錯誤言論，完全可以指出民主黨派座談會的發言，正如他本人注意到的那樣，而不必舉上海教師座談會為例。筆者認為，毛澤東要求劉少奇等人“過細”地看這張報紙，其用意還是在於說明發動整風的必要性，說明黨內

177 《陳雲年譜》中卷，第381頁。該文件5月19日發出，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274-275頁。

17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68頁。

179 《毛澤東傳》，第689-690頁。

180 詳見1957年5月10日《解放日報》。

問題的嚴重性。或許毛澤東想以此證明發動整風運動是正確的，但更大的可能是，毛澤東在意識到危險傾向開始出現的同時，仍然認為執政黨本身的官僚作風和腐敗墮落也是危及政權的重要因素。

5月14日晚上9時至次日凌晨1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¹⁸¹ 儘管目前沒有關於會議的任何材料，但可以肯定他們在討論整風問題。會議通過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內容是：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但是，在報導中，有三類言論必須加以領導和控制，即：(一)對於市場物價容易發生影響的消息和言論；(二)違背國家外交政策，易為帝國主義挑撥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論，其中包括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消息和言論；(三)涉及個別肅反案件具體事實的消息和言論。

以上各點，請即召集黨報負責同志加以佈置，至要。¹⁸²

181 《毛澤東傳》，第690-691頁。

182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8頁。鄧小平在兩天後的一次談話中說到，該指示是政治局會議做出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16日。

解讀這個文件應該看到：第一，中共高層領導這時已經一致認識到，整風運動中暴露出一些“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第二，應對這一現象的措施是讓他們繼續暴露，在報道時不作任何刪節。這與毛澤東12日私下談話的思路相同，“引”蛇出動的策略尚未最後形成，但呼之欲出；第三，區別使用“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這兩個概念說明，在未來的鬥爭中，還是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屬人民內部矛盾，後者屬敵我矛盾；第四，對輿論的領導和控制還是限於毛澤東12日談話指出的三個方面，只是順序調整一下：物價、外交、肅反，顯然是有些擔心出現社會動亂。看來，毛澤東把《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寫作時間改為5月15日不是沒有道理，但其用心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也是十分明顯的。

在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解釋了中央的指示，他強調說：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¹⁸³ 這個講話貫徹了14日指示的精神，但使用的是“右派”這個概念，說明此時還是把這些人作為人民內部問題的。

5月16日晚9時至次日凌晨1時20分，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當天，毛澤東又親筆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¹⁸⁴ 文件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仍然強調的是發動整風運動的宗旨，言語之間透出一種急迫的心情。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最後提到了幹部調動的問題，這與動員時所說重在思想教育，不做組織處理的原則就有差別了。顯然，毛澤東急於看到轉變黨內作風、密切黨群關係、恢復黨的威信的結果，以便按照原來的部署，在結束黨內整風後，進行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其他各界整風。對於這一階段的鳴放言論，毛

183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16日。

184 全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77-478頁。

澤東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就連傅鷹那樣言辭激烈的“鳴放”，都認為“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傅鷹在北大一個小型座談會發言時，情緒激昂，口無遮攔，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派往北大蹲點的龔育之當時聽了發言後，即認為“內容尖銳”，“十分重要”，且“因為傅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故堅持整理出全文刊登在《宣教動態》（1957年第51期）上。¹⁸⁵ 可以斷定，如果不是毛澤東的金口玉言，傅鷹這個發言在反右時必定被作為典型的右派言論。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指示中特意對這樣一個“代表人物”點名保護，一則說明他當時還是有意保護大多數鳴放者的——他們畢竟是在毛的鼓動下站出來給黨提意見的，二則說明他當時對哪些人屬“右傾分子”或“右派”是心中有數的——因為他們的言行超越了毛一貫堅持的政治界綫。文件第二部分正是針對這些人的：“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處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與14日指示相比，這段文字顯得明確而嚴厲。說這些“右翼分子”或“右派”具有“反動面目”，“帶有反共情緒”，又說他們“企圖”把運動“引導到錯誤方向去”，表明毛澤東更加深了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僅“不要反駁”、“不加粉飾”、不要“刪節”，而且還要“放手讓他們發表”，表明運動進行到這時，中共高層開始醞釀反擊“右派”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已露出端倪。

就在這一天，行動開始了。到5月16日，統戰部召集的民主黨派座談會已經開了7次，按照原來的計劃，這時應該結束座談會了。5月12日統戰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時就說，座談會“再繼

185 龔育之：《毛澤東和傅鷹》，《百年潮》1997年第1期。文中轉引了傅鷹的大部分發言內容。

續兩三天即可結束”，並準備採取以下幾項措施結束會議：一、恢復以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基礎的座談會，討論國內時事政治問題、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問題和國際問題；二、根據民主黨派的要求成立一個有關黨派事務問題討論會，由各黨派和統戰部負責人組成，研究各黨派之間的相關的問題和需要統戰部幫助解決的具體問題；三、將座談會上提出的問題整理為兩類，分別交給上述兩個座談會處理。同時採取個別交談、中層座談會等辦法繼續聽取意見；四、對座談會提出的各種批評和意見，統戰部準備分為三類，分別供中央考慮、由中央統戰部處理和交有關部門考慮。¹⁸⁶ 這些安排，分明就是要進入下一階段工作——處理這些鳴放意見了。然而，在16日會議結束時李維漢卻突然宣佈：休會幾天，成立一個小組，把與會者談的問題加以排隊，準備以後繼續開會，因為座談會“對全國整風運動起了推動作用”。¹⁸⁷ 在此前一天，統戰部還聯合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召開了工商界座談會。

這一切表明，是5月8日至11日民主黨派座談會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時間應在12日。14日中央統一了思想並決定讓右派繼續暴露，從16日開始，“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式實施——整風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

3. 毛澤東親自策劃的所謂“陽謀”

對於發動反右運動的策略，毛澤東不承認是陰謀。他後來在《人民日報》上公開講：“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

186 中共中央統戰部致彭真同志核轉中央書記處，1957年5月12日。

187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

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¹⁸⁸

毛澤東的話至少有一點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即這裏所說的中共中央指示，實際上是在5月14日和16日分別發出的，而不是在5月8日或此前發出的。毛澤東這樣說的目的，是要讓人們以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會有“右派言論”，是有意讓他們這樣鳴放的。如此，一方面把座談會上令他感到不悅的人物說成是“牛鬼蛇神”，把那些“帶有反共情緒”的發言定性為“毒草”就順理成章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這一切都是在他的預料之中的，以阻塞黨內(特別是蘇共)對他鼓動大鳴大放的“不慎行動”的質疑。至於說在提出雙百方針時就已“安民告示”，更是強詞奪理——只要把他一年來的講話都翻出來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澤東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被人指責為“言而無信”，更主要的是可以在蘇共和中共幹部面前掩蓋他對中國社會情緒和局勢發展的判斷失誤。正因為如此，他在5月中旬後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運動中，其熱情和關注程度，比發動整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5月上半月，真正實行開門整風的主要還在中央，也就是統戰部召開的引人注目的座談會，而絕大多數單位和地方都行動緩慢。所以，在中央開始轉向的時候，各地的整風運動才剛剛開始。比如雲南省，就是在5月14日這一天，成立了以謝富治為書記的12人整風領導小組。¹⁸⁹ 謝富治在當天的整風運動動員報告中，講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月初整風指示的精神：強調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重重矛盾，首先必須認清黨的責任，把黨風整頓好；處理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論是哪方面的錯誤和缺點，責任主要是在我們這一邊”；“工人、農民、學生中間鬧事，固然有種種的原因，但是

188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6-437頁。

189 雲南省檔案館，2-1-2742，第46-47頁。

主要是我們的官僚主義，不了解情況，不傾聽群眾的意見”。¹⁹⁰ 5月16日，雲南省委研究整風問題的精神傳達到基層，仍然是宣講中央整風指示，只是態度比較慎重。省委要求“各地注意保持頭腦清醒，不要輕易發動群眾搞反領導上官僚主義的運動，以免陷於被動”。按照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風只在省委、地市委中開展，整風的重點只是縣以上幹部”，其他人主要是學習文件，“正面體會”。¹⁹¹

即使在北京，情況也是如此。直到5月16日，北京市委才發出了整風計劃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學習文件全面開展，工作和思想作風檢查分批進行。在學習和討論文件的同時，開始有計劃地分別找黨內幹部和黨外人士開座談會，廣泛地徵求意見，廣開言路，充分發揚民主，放手鼓勵批評，解除各種顧慮。檢查的方式，既要嚴肅認真，又要和風細雨，凡是有不同意見的，就要展開爭論，應當允許進行反批評和申辯，對於一些帶原則性的問題，在討論以後應當作出結論，同時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¹⁹²

這些部署顯然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趕上新的安排。正是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錯位現象，給人一種感覺，“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從整風運動一開始就設計好的。實際上，整個“陽謀”是從中共中央接連發出兩道密令(14日和16日)後開始的：一方面在社會上大力宣傳，公開鼓勵和號召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一方面在黨內迅速分級傳達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做好反擊的準備。

5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評論指出，“在整風運動期間，我們所要求於非黨同志的，

190 雲南省檔案館，2-1-2741，第2-14頁。

191 雲南省檔案館，2-1-2745，第5-6頁。

192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第269-276頁。

是大膽尖銳毫無保留地揭發我們各方面的缺點和錯誤，幫助黨員進行整風。”形式主要是“邀請各方面的非黨同志舉行各種座談會”，“黨組織可以更廣泛地運用這種形式。部可以召開座談會，局、司、處、科也可以召開座談會；可以邀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高級知識分子、擔任領導工作的非黨同志進行座談，也可以邀請機關中一般的非黨幹部進行座談；座談會的規模可大可小，不用會議形式而用個別的訪問談心也可以聽到很多對黨的意見”。總而言之就是採取各種方式讓黨外人士說話。5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繼續爭鳴，結合整風》，社論說：“我們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這就應該讓各個方面人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都講出來，大家推心置腹，暢所欲言。這樣才算真正地實現了‘百家爭鳴’，同時幫助了我們黨的整風運動。”有些用語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不過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而且主要是說給黨外人士聽的。

中共中央14日和16日指示如何傳達的情況，目前尚無文獻資料可以說明，但筆者看到的兩個回憶史料說明，文件的傳達非常迅速，範圍也比較廣泛。

時任《人民日報》四川記者站負責人紀希晨證實：5月17日晚10點多，《人民日報》編輯部電話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劉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時期，全黨開展整風，北京、上海動得早，開始鳴放，但全國還沒鳴放起來，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全國各省市都要開展鳴放，幫黨整風。各民主黨派，黨內黨外，什麼話都可以講，就是罵共產黨的話也要讓他們放出來，記者要按原話寫。各記者站都要發整風鳴放稿件。你們四川明天就要發條消息來，沒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廳、統戰部看看，舊材料也可以發來”。第二天，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召集常委擴大會議，聽了記者站匯報的情況後，決定立即開展鳴放。¹⁹³《人民日

193 紀希晨：《在風口上——從反右派到反右傾》，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352-353頁。作者記憶的政治局會

報》編輯部這個通知顯然是按照中央的新精神傳達的，只是對記者們不能明說而已。省委召開緊急常委會，當然不只是聽編輯部的電話通知；當場便佈置鳴放工作，則說明此前省委必定已經接到中央的指示。

當時負責《文藝學習》編輯部工作的作家黃秋耘證實：5月18日晚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聊天時，文化部黨組書記周揚來電要邵去參加緊急會議。邵接聽電話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臨走時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又叮囑說：“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¹⁹⁴ 很明顯，周揚要在緊急會議上傳達的，也是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而且，對於整風運動將要轉向，省部級領導人已經心知肚明瞭。

甚至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也事先接到了通知。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談會的書面發言，與其說是給中共提意見，不如說是對民主黨派的告誡和責備。何希望各民主黨派誠懇幫助領導黨，“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意背道而馳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講國民黨的右派歷史，然後聯繫到現實說：“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責“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¹⁹⁵ 人們當時或許沒有注意到，自開展整風運動以來，這是“右派”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而此前只有中共中央在內部文件中使用過。

於是，各種“引蛇”和“釣魚”的行動便大規模展開了。根據

議時間顯然有誤。

194 黃秋耘：《風雨年華》（增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75-176頁；黃秋耘：《中國作協的幾番風雨》，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124-135頁。

195 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

5月下半月《人民日報》的報道，各部委、各地區、各大學、各學會都紛紛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所有這些座談會，就是要鼓動非黨知識分子站出來講話，給共產黨“提意見”。5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佈置工作時說得再明確不過了：市府各局、市委各部機關必須立即開始大放鳴， “黨外普遍徵求群眾意見，黨內討論目前報紙上發表的文章，發揮自由思想”，還特別提出“對於知識分子多的幾個部門要大‘放’特‘放’”。¹⁹⁶

在此期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密切關注着鳴放的動態，指示更加具體，要求更加嚴格。5月20日中共中央發給各地黨委的《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就是一個範例。指示規定各地黨報的報道方針應該是：1. 繼續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最好是刊登“那些能夠充分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的言論(越反動的越好)”。但“右翼分子在報上所佔比重應逐步縮小。特別是那種一般性批評和謾罵的東西，更應少登或不登”。2. 特別注意刊登中間分子那些比較公道的批評右翼分子的言論，並“應該逐步增多，佔到報紙的主要篇幅”。3. “應該逐漸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論，但暫時不宜過多，特別注意登他們一些有說服力的東西。不要登他們那些沒有說服力和火氣太大的，特別是亂扣帽子的東西。”4. “應該登載關於改進工作的事實報導”。5. “在一個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要“立即着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予以反駁和批判。此外，在各種會議上，“應該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間分子的發言”，並給予報道。¹⁹⁷ 所以可以肯定，整風運動中被引出的“蛇”和被釣上的“魚”，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確定了新方針到6月8日宣佈全面反擊右派期間冒出的人物和言論。

實際上，真正的大鳴大放也確實出現在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針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和言論，不僅數量猛然增加，範圍

196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第5-6頁。

197 雲南省檔案館，2-1-2736，第27-31頁。

迅速擴大，而且情緒日益激昂，言詞愈加刺激。毛澤東後來對這時的情形有一個概括：少數右派和反動分子一時間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的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¹⁹⁸ 又說：“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這些資產階級右派人物“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¹⁹⁹ 現在看來，毛澤東的這些看法無疑是過於偏激和敏感了。不過，“引蛇出洞”的結果，確實造成了混亂的局面。這主要表現為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鳴放言論；從北京大學開始並引向全國的學生民主運動；共產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影響力驟然下降。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發生動亂的苗頭和趨勢。

為便於理解毛澤東的反映和思想變化，筆者特意找出這一時期內容敏感、用詞激烈的鳴放言論進行了認真研究。²⁰⁰ 但細細品味這些言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尤其是與上述被毛澤東點了名的那幾位“大右派”的言論相比，除了儲安平的名言“黨天下”外，都沒有更過份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屬

19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503頁。

19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5、492頁。

200 除當時的報紙外，筆者還看到的一些右派言論集，如美國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五十年代後期“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歷史資料專輯》第二十二輯(第二、五、八分冊)，洛杉磯，2003年；中國政法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內部讀物)，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於思想認識或世界觀的問題。²⁰¹ 其實，這些言論是否真的帶有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此時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言論已經傳播，並在知識界“中間派”以及廣大學生中產生了共鳴。在這方面突出的反映就是學運風潮。

有研究者認為，5月中旬，毛澤東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如何通過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北京大學5月19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之後，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²⁰² 這個判斷似欠準確。不錯，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整風的初衷，但是如前所述，到5月中旬，他關注的重心已經開始移動，只是還沒有做出如何糾正右派“錯誤傾向”的最後決定。不過，北京大學引發的學生運動確實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注意，並且對促使他下決心全面反擊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思維敏捷而感情衝動的青年學生，其言論尖銳和大膽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民主黨派和教授們的意見。後來，共青團中央大學工作部把大學生的言論進行了收集、整理和分類，其中特別激烈的觀點如“建國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憲法上賦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概無保障。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全體人民，黨即國家，黨即法律”；“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產黨打的，不能由共產黨一黨獨斷和壟斷，必須各政黨競選”；“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下，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馬克思主義好比聖經，各地黨委書記好比教區主教”；“文王殺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殺了七十萬！簡直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

201 儲安平的發言詳見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所謂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發言被有意篡改。見葛佩琦：《葛佩琦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37-138頁；李新：《反右親歷記》，第24-25頁；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

202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頁。

儒’。”²⁰³ 上海市整理匯報了類似的材料，言論同樣十分刺激：“共產黨和過去封建王朝一樣，整個黨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風主要應整老和尚：整風的根本問題在於黨中央，關鍵要整黨中央”。²⁰⁴ 如果僅僅是一些“年輕娃娃”的過激言論，未必會引起毛澤東動怒，但學生風潮的發展趨向確實令人擔憂，特別是學生鳴放時出現的停課、請願、自發組織小團體等行為影響到社會，且與社會騷動融為一體的趨勢，已經構成了對共產黨統治和社會安定的威脅。

在知識界和大學生轟轟烈烈地進行大鳴大放時，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也呈現出一種動蕩的局面。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學畢業生約有3萬人不能升學。問題重大，不能忽視，如果處理不好，就很容易鬧事。報告說，“去年以來到現在，北京市共發生罷工、罷課事件七起，參加人數約四百多人。發生推派小型代表團請願、包圍領導者等類似事件約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報告：“今年以來，許多商品價格上漲，或者變相上漲，許多商品又供應不足，引起廣大群眾的憂慮和不滿。現在，群眾心理普遍緊張，不少人懷疑‘共產黨穩定物價的政策是否保險’。”²⁰⁵ 這種不滿情緒和不安定因素與大鳴大放的社會氣氛攪在一起，後果可想而知。

5月下旬學校面臨畢業，很多學生因畢業後不能升學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鬧事。5月22日《內部參考》刊載了內蒙豐鎮中學應屆初中畢業生鬧事的情況：700多學生集體罷課，還有一部分人“整隊到大街游行，演說、呼口號，企圖取得群眾的同情和支持”。²⁰⁶ 湖北醫學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間因要求改善校舍、設備等條件，發生全校性的停課風潮。風潮的矛頭直指中共湖北省委。²⁰⁷ 5月27

203 陝西省檔案館，123-43-472，第1-11頁。

204 上海市檔案館，A23-2-232，第1-30頁。

205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第172、228-230頁。

206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2日，第18-19頁。

207 《內部參考》1957年6月4日，第17-23頁。

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學部分應屆初中畢業生成立了“秘密組織並串連其他學校”，“印製傳單，散布錯誤論調，積極拉攏同學，準備游行”。²⁰⁸ 5月29日，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學生也因此連續給國務院總理和交通部發電報，鬧事的情況有繼續發展的趨勢。²⁰⁹ 陝西地區高等學校在鳴放過程中不斷發生各種風波和鬧事事件，學校領導“處於緊張被動狀態，‘四面作戰’，招架不住”，情況嚴重的有西安航空學院、西安建築學院、西安動力學院、交通大學、陝西師範學院等。²¹⁰ 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設工程學校學生因校方領導的官僚主義罷課三天。6月1日，瀋陽俄專部分學生因對畢業分配方案不滿罷課。6月2日，因一個學生遭公安局無理拘留，廣州師範專科學校1200個學生自動集會，表示抗議。²¹¹

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學校風波已經影響到社會。6月1日，武漢大學學生到漢口繁華商業區一帶張貼大字標語，要求“派記者到我們那裏去”，“反對新聞封鎖”等。貼到《湖北日報》社和《長江日報》社門口的標語被撕掉後，引起學生不滿。3日，學生代表41人到報社質問、抗議。雙方進行了長時間談判，無果而終。²¹² 南京發生了同樣的事件，而且鬧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學學生把大字報貼到《新華日報》社門前，質問為什麼不發表南大鳴放的消息，圍觀者達2000多人。學生與圍觀群眾發生爭執，並展開激烈辯論，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去。由於大字報被撕去，南大學生3日派出代表兩次到省委請願，受到省委書記接見後，事態才平息。²¹³

城市工人鬧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響力的當屬上海。上海市總工會報告：“最近幾個月來，職工罷工鬧事數量有了增加，從

208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第13-14頁。

209 《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第7-10頁。

210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第14-17頁。陝西省檔案館，123-43-38，第1-9頁。

211 《內部參考》1957年6月9日，第32-34頁；6月1日，第14-15頁；6月4日，第3-5頁。

212 《內部參考》1957年6月4日，第3頁；6月6日，第3-6頁；6月7日，第41-47頁。

213 《內部參考》1957年6月3日，第7-9頁；6月4日，第8-11頁。

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發生大大小小的鬧事事件200多起，涉及工廠企業單位約有240個，參加鬧事的群眾有10000人左右。”特別進入5月以後，鬧事情況日益嚴重：“4月份有39件1200餘人，5月份卻有160餘件8200人，4月份一般只是工業系統，5月份逐漸向其他行業蔓延。同時，內容也比以前更為複雜多樣，而較多的是經濟上、政治上算老賬，因此，處理上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簡單。”²¹⁴

5月27日《內部參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廠企業內部情況很緊張》為題報道，5月上旬藝徒罷工請願一度“鬧得很兇”，剛剛有所穩定，矛盾又轉向其他各類職工。“部分工廠的職工醞釀‘放’、‘要求放’的情緒日旺。榆林、徐匯等區職工罷工、集會、準備游行等事件逐漸增多：普陀等區的部分職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動。”報道說：“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廠裏，群眾自己組織起來鬧事，把共產黨和幹部撇在一邊，幹部要召集他們開會開不起來，連情報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廠企業黨員幹部大會上說：“這種情況值得所有的廠警惕，如果任其繼續發展下去，上海要大亂。”²¹⁵兩天後又報道說，在知識界鳴放之後，“上海基層工廠的職工要求‘放’的情勢最近已日趨緊張”。最近幾天來新的罷工、集會、準備游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廠則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時處理，很可能也要延燒開來。報道特別指出，儘管沒有在工人中發現政治歷史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鬧事有向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方面發展的趨勢”。²¹⁶

到6月初，情勢更加緊張。6月7日《內部參考》報道：“上海基層單位職工鬧事的情況，最近一周多來繼續擴大並有繼續發展的趨勢。據極不完整的統計：幾乎每天都發生職工鬧事事件，少則七、八起，多則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員會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幾

214 上海市檔案館，C1-1-189，第1-9頁。

215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7日，第23-25頁。

216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第20-22頁。

十批人民來訪，職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資、福利方面。”鬧事的形式“一般是罷工、怠工、集會、貼標語、代表或集體請願”，甚至有“打罵或恐嚇殺人”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鬧事的面擴大了。前一時期主要是新公私合營工廠的職工鬧，現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營廠、國營廠、交通運輸工人、搬運工人、過去動員回鄉又倒流回滬的三輪車夫與失業工人、機關幹部，甚至家庭婦女(要求就業)等。”鬧事的工廠在全市企業所佔的比重雖小，但波及面很大，“已開始影響到正常生產，而且目前情勢還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批領導幹部陷於其中”。²¹⁷據上海市工會聯合會統計，1至4月份發生鬧事約有44個工廠，參加鬧事的職工約3200餘人，但在5-6月間，鬧事風潮陡然擴大，涉及548個工廠企業，參加鬧事的職工達31000餘人。²¹⁸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鬧事的情況說明，“無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已經十分嚴重，更加危險的是，這種情緒正在與知識界和學生界的鳴放匯合。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局勢更加混亂無序，鬧事風潮也發展得更加嚴重，更加迅速。目前尚未發現有關5-6月農村鬧事狀況的綜合統計資料，不過，一些局部地區的情況，也能反映出大體的趨勢。

浙江省的一個農村調查報告曾經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該報告講述了仙居縣農民鬧事的嚴重情況。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台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報告認為事情發生的原因主要是農村幹部在發展高級社的過程中產生了驕傲和急躁冒進的情緒，結果政策不明，管理混亂，嚴重減產。

217 《內部參考》1957年6月7日，第3-7頁。

218 上海市檔案館，C1-1-187，第1-15、74頁，《內部參考》1957年9月28日，第12-14頁。

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²¹⁹

山西省自去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50000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佔到62%。鬧事者有的要求救濟，有的要求增加口糧，有的是對幹部有意見，其中大部分是富裕農民，其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5月間開始，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加上其他退社戶，共有40000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²²⁰

黨內的狀況也很令人擔憂。大部分黨員幹部對鳴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觸和不滿情緒，有的公開抵制鳴放，有的態度消極、情緒低落。但也有少數人參與到鳴放運動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這兩種情況都是毛澤東不願看到的，因為這反映了同一個問題——黨的號召力和戰鬥力受到嚴重損害。

中共基層黨組織對整風本來就很消極，對大鳴大放更普遍採取了抵制的立場。據報道，廣州市有些基層領導對少數敢於發表意見的黨外人士變相施加壓力，有的甚至進行追查、質問和議諷。重慶市不少幹部態度蠻橫，有的公開講：“意見隨你們提，充其量撤我的職。”有的拍胸膛說：“老子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沒貪污，二沒違法，你們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還有的認為鳴放是“自己討打”，把幹部隊伍“弄得烏天黑地，簡直無臉見人”。《廣西日報》總編輯甚至“破口怒罵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是烏

219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第691-697頁。

220 《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第25-29頁；6月5日，第15-17頁；10月9日，第3-14頁。

龜王八蛋，說他們想拆散省委”。²²¹ 陝西省委5月25日報告，“整風運動開始以後，有些領導同志由於沒有足够的精神準備，看到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或者聽到下面幹部在學習文件階段剛剛提了一些意見，就張慌失措起來，有的感到不服氣，不高興，甚至拒絕批評，有的悲觀消極，抬不起頭。總而言之，不積極主動地領導群眾開展整風運動，而是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一般幹部中也有很多顧慮。”此外，“從目前各高等學校的情況來看，還有不少黨員和群眾在一起向領導提意見，不分黨內黨外，不管黨內秘密，特別是鬧事的學校，黨團員在學生中，雖然佔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是，人家一沖就垮了。甚至於黨團組織對黨、團員也失掉了領導和控制的力量。”²²² 雲南省也有類似情況，一些不堅定的黨員、團員“相繼動搖、思叛以致倒戈投降”，僅據雲南大學統計，這樣的共青團員佔團員總數的30%。²²³

在5月29日晚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集黨內會議上，各系主任和黨總支書記匯報的情況很有典型意義。一、多數基層幹部抵觸情緒很大，反對繼續搞大鳴大放。教務部部長李培之激動地拍桌子說：“我實在受不住，你看看這些大字報，什麼亂七八糟，烏烟瘴氣的東西，黨給糟蹋得像什麼樣子”。副部長李新也是同樣態度，他要求保留意見，甚至表示可以辭職。老黨員何干之、經濟系主任宋濤擔心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要推廣到工廠、農民、市民中去”，這些情緒帶到全國“要出大亂子”。二、廣大黨員思想苦惱，不知所措。很多人匯報，現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動，“只能湊合群眾一起貼大字報”。經濟系總支書記方志西說：現在黨員堅持立場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場的似乎說成是積極的，這很值得注意。²²⁴ 不知所措的豈止人大，鞍山市委書記這樣說：我們不知道是應該大膽地“放”，還是按照我們的規定來“放”？總之，市委處於完全

221 《內部參考》1957年5月25日，第27-28、23-26頁；5月31日，第3-7頁。

222 陝西省檔案館，123-43-38，第1-9頁。

223 雲南省檔案館，2-1-2743，第106-113頁。

224 《內部參考》1957年5月30日，第5-9頁。

“被動的姿態”。廣東省直屬機關和廣州市級機關的領導幹部也感到左右為難。²²⁵

進入6月以後，隨着鳴放的開展，黨內感到壓力越來越大。北京外語學院的黨員苦惱得很，“有些群眾逼他們發言，特別是關於肅反問題，他們不發言，有些群眾就把紙條貼在他們背上，有的把字條硬塞進黨員的口袋裏去，有的寫大字報貼在黨員的宿舍門上”，而“黨組織在運動中已不起作用”。“現在的黨員就像失掉母親的孤兒，像被擊潰了的分散活動的游出隊員。”中央音樂學院的黨團幹部在鳴放中也完全處於“思想混亂”的狀態。²²⁶在中央國家機關中出現了兩個極端的情況：一方面，有的黨員幹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報，有的則乾脆“以牙還牙”，也用大字報反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黨員“立場動搖”，有的泄露了肅反時如何整人的“機密”，有的在群眾大會上公開迎合對肅反運動的批評意見。²²⁷有不少人直接給中央寫信，訴說衷情。如北京大學張錦文給中央書記處寫信，表示反對報紙上誇大人民內部矛盾、單方面發表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見的現象，對《人民日報》也這樣做，更無法接受。6月8日有一匿名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前天工業幹校有一黨員老幹部，自己先買了棺材，然後上吊自殺身死，他留給你的遺書，不知你見到了沒有？為什麼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裏，共產黨老幹部捨不得自殺，而入城後卻發生這樣可憐的事件呢？難道你們能對此無動於衷嗎？”寫信人警告說：“這樣下去，他們會認為共產黨太軟弱可欺了，他們會得寸進尺，就會請你毛主席下台。”²²⁸

毛澤東本人未必能夠看到這封信，但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言論的影響，北大學潮及其在全國高校引起的風波，城市和農村出現的動亂跡象以及黨內的不安定因素，這一切匯合起來使毛澤東感到，共產黨的統治地位正處於某種危險狀態。

225 《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第10-12頁；5月30日，第16-17頁。

226 《內部參考》1957年6月5日，第32-35頁；6月7日，第37-39頁。

227 《內部參考》1957年6月6日，第26-29頁。

228 陝西省檔案館，123-43-466，第58-59頁。

4. 中共中央決定全面開展反擊右派運動

5月中旬發現民主黨派的言論有“危險企圖”和“錯誤傾向”後，毛澤東本來可以採取一種懷柔的應付辦法，像發動整風時那樣召開小範圍座談會，對那些他認為的“右派人物”（不過數人而已）進行規勸或提出警告，請他們並通過他們影響黨外人士，在規定的限度內鳴放，繼續幫助共產黨整風。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對於階級鬥爭和思想動向的敏銳感受和觀察，促使他下決心繼續鼓勵鳴放，甚至“引蛇出洞”。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放棄整風的打算，對於將要開展的反擊右派運動，也還沒有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他就是要看一看，經過近八年的宣傳、教育和改造，廣大知識分子和群眾面對小小的風浪，究竟是繼續跟着共產黨走，還是會被這幾個社會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懷疑論者證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英明正確。然而，“引蛇出洞”後二十多天的風雲變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轉而憤怒，毛澤東決心結束黨內整風，而開展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和目的的反右運動。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的？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即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將在6月3日召開人大會議。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勵結合整風，繼續開展爭鳴。²²⁹還有，5月18日文化部發佈通令，將所有曾禁演的戲曲劇目全部解禁，其中包括1950年到1952年間陸續禁演的20多個劇目。²³⁰這些迹象都說明，當時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都沒有感到有什麼非常現象足以打斷國家機器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也就是說，至少到5月18日，毛澤東還沒有決定要採取任何重大措施或舉動。這一點似乎沒有疑問，但很多研究者以為，5月19日的北京大學風潮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所以第二天，即5月20日中共中央便做出《關於加強對

229 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報》。

230 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4卷，1991年（未刊），第206頁。

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從而表明毛澤東決定開始反右。這裏有兩點解釋不通。第一，北大發生學生運動的情況，毛澤東是通過新華社和北京大學黨委反映後才得知，然後又派人去調查的。²³¹這至少要兩三天，所以5月20日的指示與北大事件無關。第二，從5月20日指示的內容看，並沒有改變14日和16日的部署和安排。

5月19日和20日連續兩個夜晚，毛澤東召集劉、周、鄧、陳等領導人開會。²³²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分析說，“現在的情況是，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接着引用16日指示的話說：為了“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漸孤立右派，爭取勝利”，需要“繼續登載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暫時不宜過多”反駁，“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顯然是為了防範“右派”言論的影響，指示要求“不要到外點火，特別不要同時在工廠和學校中發動工人和學生的批評運動”（這也說明北大的情況此時尚未匯報到中央）。指示還用大量篇幅教育黨員要正確對待批評，改變思想作風。最後要求結合5月14日和16日兩電“一並研究執行”。²³³這就說明，5月20日指示不過是對前兩次電報的補充和強調，而沒有做出新的決定。

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報紙的宣傳報道問題。目前可以看到的會議摘要記錄是：“鬥爭的目的：同黨外人士的鬥爭，是孤立右派，爭取中間派，教育左派，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黨報不要趕時髦。運動結果即勝利的標誌是是否團結了中派，右派面目是否暴露了。”會議認為《文匯報》、《光明日報》刊登民主黨派的言論是“爭取領導，宣揚右派，爭取中間”，並擬定了一批題目，確定了作者和交稿日期。²³⁴從簡短的記錄文字看，運

231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48頁。

232 《陳雲年譜》中卷，第383頁。

233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第19-22頁。

234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記錄稿)，1957年5月21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15頁。

動的目的是團結中間派，暴露和孤立右派，還沒有提出反擊右派的問題，不過是準備寫幾篇文章而已。

當天，毛澤東對秘書林克也說到了右派問題：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共產黨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都是騙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們違背了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意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毛還談到對肅反中一些案件進行復查的程序問題：今後黨組議論時可以先不定死，議一下，交給非黨人士議，然後根據他們的討論，黨組再詳細討論定案後，再交行政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向林克講解了他的詩詞《沁園春·雪》。²³⁵顯然，毛澤東此時還在對民主黨派“違背諾言”，向共產黨爭權的意圖耿耿於懷，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們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為自己的“上當受騙”而感到憤怒，所以他必須打擊這些“右派人物”。但到目前為止，毛澤東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說到肅反案件復查時，他仍然提出先交給黨外人士議論，甚至還有心情談論自己十幾年前的舊作。

5月22日仍然沒有變化。劉少奇在這一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問題。這時並沒有提出推遲會期，而劉少奇只是在發言中順帶談到了整風運動和孤立右派的問題。劉繼續強調：我們黨實行整風，很有必要。現在黨外有很多的意見，黨內也有意見。相當嚴重地脫離群眾，不整風，我們黨就會慢慢地毀滅掉。自然也談到了鬥爭策略，劉說：我們國內各條戰綫現在都在發生重新改組的問題，各個階級都有左、中、右三派。我們要考慮做中派的工作，使右派孤立起來，辦法就是充分暴露右派。²³⁶這裏還是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戰鬥部署。

5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

235 《林克日記》(手稿)，第40—41頁。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由人大和政協主持。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記錄稿)，1957年2月27日。

236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401頁。

在會上報告了整風鳴放的情況和工作部署，周恩來、朱德、陳雲、陸定一、康生也通報了一些情況。劉少奇最後說：小平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²³⁷ 既然鄧小平傳達的是5月19日和20日毛澤東召集會議時確定的方針，那就是說，這次會議關於整風運動的工作部署仍然沒有超出中央5月中旬指示的框架。鄧小平在報告中說：“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的高級幹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們在那裏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裏不着急呀，我看也難設想，我就有點着急。開始幾天，人心裏面有點急。後來看到那個反動的東西愈多，心裏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擔心是不是會出亂子。總的估計是出不了亂子。”²³⁸ 鄧小平如此放心，當然是還不了解正在北京校園裏發生的事情。可以為此判斷提供的另一個證明是，陳雲在會上討論整風問題時指出：業務機關要做到整風、業務兩不誤，上級機關要切實督促，抓好這件事。²³⁹ 看來，23日在中共高層還沒有發生特別情況。

第二天，作為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在北京市傳達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具體內容。彭在報告中繼續強調整風，特別是開門整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肯定絕大多數鳴放意見是正確的，“有些人的批評是從右的觀點出發的，是從資產階級觀點出發的，但是右的方面的意見也可以起積極的作用，毒草也可以作肥料，起好的作用，事物總是在矛盾的鬥爭中發展的。”又說：“整風已經開展起來了，但總的還是放手得不够，對黨外人士發動得不够。有些大專院校還沒有開展起來，中央有些部還沒有展開，市里有好些單位還沒有展開。由於有些同志還了不解發動黨外人士對黨展開批評的好處，因此他們就沒有決心去放手發動黨外的批評，不敢放火

237 《毛澤東傳》，第697頁；《劉少奇年譜》下卷，第403頁。

238 《毛澤東傳》，第696-697頁。

239 《陳雲年譜》中卷，第383頁。

來燒掉自己的錯誤，特別是當着有些右翼分子、極少數對黨憤恨的分子，對黨實行惡意攻擊的時候，就更沒有勇氣下這樣的決心。”

“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當然不會都是正確的。但是為了鼓勵和開展這種批評，對於一切意見，應該耐心地、冷靜地傾聽，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管是好的壞的，都應該耐心地冷靜地傾聽，這是很難的，但是必須這樣做。就是對於錯誤的、甚至反動的意見，目前也還不要忙着進行批駁，以免阻塞言路。”“現在的批評已不是和風細雨了，的確是狂風暴雨了。因為發動黨外人士、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給你提意見，人家有話就要講，講了以後就要登報，有黨的報也有不是黨的報，這樣大家集中起來批評不就成了狂風暴雨了嗎？”²⁴⁰ 應該說，這個報告反映了5月14日到23日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和方針，至少彭真本人的理解是這樣。

至此，可以對“引蛇出洞”策略實施後的整風方針進行一下總結了。這裏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鳴放中出現了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的言論和意見，並且對多數中間派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必須堅決回擊和批判這些右派言論。由於這些人物和言論有很大影響，且其反動性暴露得還不徹底，因此應該採取欲擒故縱的策略，讓他們走到極端，走到反面，才利於分化瓦解。但是，第二，這個鬥爭還是在人民內部，還是屬於思想領域，就是說仍然在整風運動的範圍內，只是從黨內跨到了黨外——這是毛澤東原打算在黨內整風結束後進行的工作。因此，整風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都沒有改變，改變的暫時只是策略。然而，在5月底的這幾天，一切都改變了。

筆者注意到，毛澤東沒有參加19-20日的政治局會議(這也可以說明會議沒有新內容)，他正在關心的無疑就是北京大學出現的新情況。那幾天，毛澤東不斷派他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和林克去北大了解情況，每天向他匯報。據林克回憶，當時“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憂慮的。他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

240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第277—286頁。

亂？”²⁴¹ 毛澤東的確對局勢做出了相當嚴重的估計，他認為清華大學的黨組織已經垮掉了，“幾十個支部瓦解了”，而副校長錢偉長就是“納吉”，其“本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且幾乎每一個大一些的學校和工廠的“知識分子中間都有右派”，他們“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²⁴² 他甚至設想了最壞的情況——打算再上延安。²⁴³ 後來毛本人也曾談到當時的心情：“我這個人就是常常有憂愁，特別是去年五月底右派進攻，我就在床上吃飯，辦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儘是罵我們的。”又說：“右派猖狂進攻時，哪個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點着急。我就是一個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²⁴⁴ 毛澤東想出的主意就是一方面繼續共產黨整風，一方面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運動。

在注意整風鳴放的新動向同時，毛澤東又開始修改他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並於5月24日改出了徵求意見的第二稿。這次所作的重要修改和補充有：增加了關於知識分子必須完成世界觀上的根本轉變的一大段論述；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改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結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還是尖銳的，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增加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內容。²⁴⁵ 總之，強調思想鬥爭的尖銳性，強調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強調批判修正主義的重要性，是這次最主要的修改。當晚，毛澤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²⁴⁶

就在25日這一天，劉少奇主持的人大常委會七十次會議討論人

241 《歷史的真實》，第45-46頁；《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48頁。

242 毛澤東與卡達爾談話記錄，1957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4-00054-04，第2-7頁。

243 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244 《毛澤東傳》，第696-697頁。

245 《形成過程》，第27頁。

246 《陳雲年譜》中卷，第384頁。

大四次會議的會期問題，決定從原定的6月3日推遲到20日召開。²⁴⁷ 官方沒有說明會議推遲的原因。國外學者引用的一個資料說，是因為劉少奇對整風運動出現的學潮和“人民會走上街頭”的狀況表示擔憂。²⁴⁸ 筆者沒有找到相關的文獻證據，但推斷這一定與24日夜晚毛澤東召集的會議有關，而且可以判定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這時的注意力已經被學生運動的發展勢頭所吸引。也是在2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主要領導人一起接見了出席青年團三大的全體代表。毛澤東發表了“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的講話，語氣中流露出來的是警告和暗示。²⁴⁹ 簡短的幾句話，幾近捅破窗戶紙，反擊右派的意思昭然若揭。參加接見的薄一波後來說，這個講話是“反擊右派的公開動員令”。²⁵⁰ 這樣說也許不大確切——畢竟還沒有宣佈開始反右派運動，不過，一場反右派運動的風暴已經濃雲密佈、雷聲隱隱了。

這些都說明，這時毛澤東已經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了真正的威脅。這個感受，也體現在他對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中。5月25日，毛澤東改出了講話第三稿，並在批語中特別注明：我對“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談到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問題時，增加了“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以及“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說法；增加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並說“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提意見，作批評，要看那些意見、批評是否合乎上述六個政治標準。如果不合，那就會喪失監督的資格。”²⁵¹ 可以看出，這些修改已經是在為新的戰鬥做輿論準備了。

5月26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周、朱、鄧、陳等人開會，聽取各

247 《劉少奇年譜》，第403頁；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報》。

24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345-346頁。

249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報》。

250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14頁。

251 《形成過程》，第27-28頁；《修改始末》，第68-69頁。

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匯報。²⁵² 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目前未見披露任何資料，不過，第二天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的講話記錄，應該反映了這時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的決定。從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匯報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已經相當嚴重。柯講到，上海文化、出版、發行界“暴露很厲害”。在“放的過程中，最壞的是民盟”，“他們的方針是一放到基層，二撤換幹部，三算政治舊賬”。他們企圖“瓦解我們黨，動員黨員‘坦白’秘密”，還把手伸向了工會。在民盟內部則是要改選，啓用那些“我們傷害過的人”。知識分子也“有很大暴露”，過去沒有講話的人，如巴金，都出來講了。王造時、陳明樞提出搞私法問題，“影響很深”。在柯慶施看來，更嚴重的情況是這種氣氛已經感染了社會。工廠鬧事增多了，牆報很熱鬧，機關、銀行、稅局也在鬧。貿易公司醫藥批發站、劇團、影界、廣播、大學都在鬧。最令人擔憂的就是黨內的問題：有的黨員把黨外作家當作後台，有的黨員提出脫黨，還有的把黨內事情告訴黨外人士。王若望就同右派站在一起，說出現納吉也不為怪。（這時劉少奇插話：有些共產黨員和裴多菲俱樂部一個樣子。）“幹部對主席報告開始擁護，第二步有不同意見，第三步抵觸”，認為對右派“現在不整心不甘”。²⁵³

鄧小平的報告講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慮和部署。鄧說，整風運動開始的目的是搞黨內的三大主義，因為問題很嚴重，最初用的是內外夾攻的辦法。運動開展以後，絕大多數的意見是正確的，有益的，90%對我們有幫助，“但很顯然有部分右派跟我們爭領導權。這個鬥爭不只是在思想領域，已經擴及政治範圍。有人提出的綱領很謹慎，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要我們退出陣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鬥爭，他們已

2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7頁；《陳雲年譜》中卷，第384頁。

253 柯慶施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經(這樣)做了”。因此，“黨內外歸結起來一個目的，加強黨的領導”。接着說到運動的方法，鄧指出：關鍵是能不能團結中間派。右派在爭取中間勢力，左派、我們也在爭取中間勢力。我們爭取中間勢力有兩條：一是改正自己的錯誤，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間派，使中間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劃清界限。鄧說，現在“右派大體都出來了”，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等等。鄧指出右派活動現在有兩個傾向，一是“向基層發展(康生插話：《光明日報》昨天對北大的報道有動員性質)”，二是“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明顯了”。談到今後的方針，鄧說：還可以繼續鳴放，主要在機關、大專院校，讓右派進一步暴露出來。黨團隊伍也要考慮整頓。但工廠、中小學不要觸動，關鍵是不能“出大亂子”。最後，鄧談到“中央有個設想”，即“運動下一步我們要建議黨外整風”，“黨外幾百萬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能放鬆”，還是採取說理的方法。²⁵⁴彭真結合北京情況的講話更加具體、更加明確：開始只是整風，現在又加上一個“階級鬥爭”。鬥爭主要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思想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主要在機關和大專院校，工廠和中小學不要搞，不停課，不上街，不下廠，就不會出大問題。²⁵⁵

5月28日，毛澤東同林克談到他對運動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勢，還應該繼續大放，目的是整黨、爭取中間派、孤立和分化右派。但對右派也是和風細雨的方針。北京大學的情況不會發生大問題，學校教授、副教授的11%是右派，左派39%，中間派50%。講師、助教不在其內。8000學生中，右派只有70餘人，有200人左右支持他們。²⁵⁶6月1日，毛澤東又對國務會議講話稿作了一次較大改動，其中增加的新提法是：“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而且指出，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向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

254 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255 彭真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256 《林克日記》(手稿)，第42頁。

的最好助手。²⁵⁷

上述材料表明，到5月底6月初，毛澤東要進行反右運動的設想又進了一步：同右派的鬥爭已經不是整風的一部分，而是與共產黨整風並行的一場“階級鬥爭”；這場鬥爭已經不再局限於思想領域，而是有了政治鬥爭的內容；在理論上和口頭上還沒有放棄整風，但是修正主義的危險性已經提到首位，而這些恰恰不在整風的範圍內。還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內事態發展的嚴重性也有了進一步認識，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言論——他們的話已大體說完，陣綫已基本清楚，右派只是極少數；也不在於學生運動本身——那裏不會發生大問題，因為右派也是少數。最危險的就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煽動性言論，與波及全國的學運風潮匯合起來，再同時涌向社會，影響到工廠、農村和中小學，其結果將是“天下大亂”，將會真正危及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這時開始擔心：中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了。²⁵⁸這就是毛決定提前反擊的真正原因。開展一場反右鬥爭的基本方針已經確定，主攻方向也已經明確，餘下的就是何時開始戰鬥，如何開始戰鬥了。

5月27日省市區書記會的召開標誌着新方針的確定，此後就是審時度勢進行落實的問題了。

首先是繼續在黨政機關和民主黨派中鼓勵繼續鳴放。雖然黨內討論時已經意識到危險的存在，但在表面上社會的鳴放浪潮還在繼續。5月29日，民革中央委員會發出了關於積極幫助中共進行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熱烈響應中共號召，“消除一切顧慮，實事求是，誠懇坦率，提出批評和建議；各級組織應將所提出的意見反映給中共黨委參考”。²⁵⁹《大公報》也在29日發表社論《工商聯要幫助工商業者鳴放》，勸告中下層和中心城市的工商業者“解除顧慮，勇敢地鳴放”，並要求“工商聯特別要負起

257 《形成過程》，第28頁。

25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285頁。

259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編：《中國民主黨派史文獻續編(社會文化時期)》，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印行，1986年，第54-55頁。

責任，一方面把自己所看到的問題向有關部門提出，一方面要充分發動工商業者把心裏的意見和要求都講出來。”

5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讓大家暢所欲言”的報道，明確提出：“各單位要拿出具體措施，廣開言路，繼續貫徹大‘放’大‘鳴’的方針”，同時強調要加強黨對運動的領導。6月5日《人民日報》在第1版以“人民內部需要經常開展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永不收兵”為題，轉載了南京《新華日報》6月1日的社論《把整風運動繼續深入開展下去》。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此時的媒體運作都是在呼應中共“引蛇出洞”的鬥爭策略。

為避免事態繼續惡化，在鼓勵民主黨派、工商界和國家機關繼續鳴放的同時，對於工廠、農村和中小學則是嚴格把關。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江蘇省委關於正確處理農村人民鬧事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認真學習江蘇的經驗，並按照同樣的辦法，“認真地分析一下農村人民鬧事的原因”，“主動地去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以使防止人民鬧事事件的發生”。²⁶⁰ 6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一）各學校、機關出大字報和學生舉行辯論會、控訴會等新聞，一律不要在報紙上發表，以免影響到中等學校和工廠。（二）凡出大字報的學校和機關應宣佈一律不准貼到門外和街上，以免妨礙社會秩序。²⁶¹

與此同時，反擊右派的鬥爭已經在進行各種準備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從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刊登反駁右派的報道和文章的數量明顯增加。²⁶² 如《承認兩面性，才有利於自我改造》、《黨委治校，還是教授治校？》、《誰說公方代表領導不好生產？》、《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等。²⁶³ 毛澤東本人

260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第686-689頁；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9，第17-19頁。

261 雲南省檔案館，2-1-2736，第107頁。

262 鄧小平在27日的報告中要求在報紙上“左派的東西逐漸增加一點”。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263 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報》。

也親自挑選文章。5月29日《新聞日報》刊登了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毛澤東早已把章乃器內定為大右派，看到這篇文章後，第二天便批示胡喬木：此篇似可轉載。²⁶⁴還有6月6日《文匯報》刊登的《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一文，毛澤東也在第二天批示胡喬木：此文很好，可以轉載在顯著地位。²⁶⁵

除了輿論準備，基層單位黨委也接到了任務。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的施平回憶說：反右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佈置各校抓緊時間，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最後又交待說：“時間不多，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²⁶⁶

6月3日統戰部召集的民主黨派座談會進入最後一天，李維漢事先把發言稿送毛、劉、周審閱，並請示要不要提反右。毛澤東審閱稿時，加了一句話：座談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周恩來說，關於反右問題，柯慶施在上海已經有所表示，你可以講。²⁶⁷同一天，彭真在北京市部分黨員幹部會上發表講話，向基層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針。彭指出：當前有兩個鬥爭，一個是黨內的思想整風，另一個就是階級鬥爭，並強調“這一時期主要是”搞階級鬥爭。雖然把這種階級鬥爭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但彭真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右派正在煽動農民、工

26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89頁。6月8日發動反擊的第一天，該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26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95頁。該文後來未見轉載。

266 轉引自《1957年：大轉變之謎》，第202頁。

267 《回憶與研究》，第835頁。

人和學生。在如此激烈的鬥爭面前，彭真呼籲工人不要再鬧事，而應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²⁶⁸

另據黃炎培日記中記述，6月5日夜晚，毛澤東緊急召見他和陳叔通，大概因為這兩位老先生日前曾聯名上書，請求毛不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毛心存感激，不願他們被捲入進去，故提前向他們吹風。毛澤東談到，在鳴放中“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還說章伯鈞與羅隆基已經勾結起來，並希望黃回到民盟去主事。²⁶⁹這表明，中共在發動反擊行動前，已經在考慮改組民主黨派的領導班子了。

6月4日毛澤東對林克的講話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對右派的性質又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中的右派表現得最猖狂，帶有一種最後掙扎的性質，他們和蔣介石與帝國主義有共同點。”第二，對雙百方針也有了新的解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口號是無產階級性的，如果這個口號執行的結果不能駁倒謬誤，整倒右派，那麼這個口號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這是反動的。”第三，進一步確認右派已經處於孤立狀態：“右派有些衝昏頭腦，以為中間派是屬於他們的，其實是做夢。”²⁷⁰說右派是“最後掙扎”，與蔣介石“有共同點”，這顯然就不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更不是思想領域的問題了。這種認識為後來的反右鬥爭採取“急風暴雨”的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對雙百方針這種後退一步的說法，一方面是毛澤東為實行雙百方針的“失敗”尋找的一個台階，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準備放棄或暫時收起這一方針了。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做出左派已經佔有優勢的判斷，則意味着全面進攻可以開始了。現在只是要尋找一個合適時機。

6月5日晚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彭真和羅瑞卿談整風問題。²⁷¹具體會談內容不詳，但特別召公安部長羅瑞卿覲見，很可能與追查一則“謠言”有關。6月4日《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說，北京大

268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第306-311頁。

269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第48-49頁。

270 《林克日記》(手稿)，第44-45頁。

271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49頁。

學有一學生寫了一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造謠說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毛主席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這篇文章油印後在校內外散發，震動很大。陸定一認為事情十分嚴重，於6月5日將《簡報》報送毛澤東，並附信說，右派正在進行大陰謀，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現一種激烈鬥爭，包括我們現在還估計不到的東西，例如提出胡風案，對某些同志的人身攻擊，等等。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第二天批示：“印發在京各中委一閱。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²⁷²就在批示發出的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

《指示》首先通知，6月15日將在報上發表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兩次講話，並要求“各省市一級機關、高等學校及地市一級機關用大放鳴方法的整風，請即加緊進行”。除了說明大字報的形式“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外，毛澤東強調，“機關學校出大字報的消息，報紙不應登載，以免影響中等學校及工廠”。《指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擊右派的行動安排：“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毛澤東還提醒說，“暑假將屆，京滬及各地大學生將回家，其中有些人將到處活動，你們應爭取主動，並準備適當應付”。²⁷³按照毛澤東的這個設想，大約10天以後，也就是他反復修改的講話稿發表之際，反右運動將全面展開。然而，一個突發事件導致戰鬥提前打響了。

在權力鬥爭中，毛澤東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在前引鄧小平27日的報告中就談到民主黨派有“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6月初，這方面的情況開始連

27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93頁；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1-223頁。

27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91-492頁。

續披露。6月5日《內部參考》報道，5月19日王造時曾約人座談，討論恢復抗戰時期的民間組織“救國會”事宜。據反映，王在會上說，毛主席、周總理都關心救國會的恢復問題，在北京徵求“七君子”的意見時，史良、沈鈞儒不贊成，沙千里贊成，章乃器不熱心。會議商談的結果，認為救國會有恢復組織的必要，對於解放台灣、聯繫華僑都有益處。會議決定“積極調查原救國會的幹部、群眾，分別收集名單”。²⁷⁴ 6月6日《內部參考》又披露：最近發現有些機關內民主黨派的組織有不正常的活動。在手工業管理局工作的農工民主黨黨員宋子榮積極做發展工作。他所發展的都是被我們鬥過的人。他們公開地說，我是這個單位民主人士的代表。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手工業管理局要給我地位，給我機會。僑委中國新聞社的民盟組織也積極展開活動，他們說，中國新聞社的黨組織已脫離群眾，不能居於領導地位，我們民盟組織應該起來團結群眾，領導新聞社的工作。²⁷⁵

更嚴重的情況出現在早已被毛澤東列入“黑名單”的民盟，這就是著名的“六六六事件”。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樂部邀集曾昭倫、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教授討論時局問題。關於這次聚會，反右運動開始以後，被作為右派陰謀活動的典型事例受到批判，所根據的材料是與會者閔剛侯在7月4日《人民日報》上披露的會議討論內容。後來，當事人葉篤義和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也曾講到會議情況，所述內容與前者差距較大。²⁷⁶ 章伯鈞和六教授在會上究竟說了什麼話，目前沒有文獻證據，無從核實，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與會者都認為由於學生鬧事，大字報上街，共產黨面臨危局；第二，民主黨派此時應該站出來，承擔起收拾局面、平息內亂的責任。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民主黨派此時挺身而出的目的有完全不同

274 《內部參考》1957年6月5日，第44-45頁。

275 《內部參考》1957年6月6日，第26-29頁。

276 參見《雖九死其猶未悔》，第100-101頁；《最後的貴族》，第12、63-65頁。

的理解，當事者認為自己是為了幫助共產黨擺脫困境，而當政者認為他們是要乘機推翻共產黨。仔細閱讀和對比所有相關材料，筆者認為，說當時民盟要推翻共產黨，那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猜測，但在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章伯鈞等人確實想通過幫助共產黨渡過難關，從而為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爭得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最忌諱的，在他們看來，這不是乘人之危嗎？況且毛澤東早就認為在民主黨派中民盟是“最壞的”。

還在6月2日招待法國總理的酒會上，章伯鈞就曾向周恩來表示：武漢交通部學校的學生們要到北京來請願，請把這件事交給他來處理。周恩來當時笑了笑沒有說話，但心裏想章伯鈞“腦袋膨脹得很，熱得很，他覺得共產黨不能維持了”。²⁷⁷ 此時中共已經確定了反擊右派的方針，故周有此態度，但章伯鈞肯定沒有認真體會周恩來的反應。6月6日他再次提議，要史良當晚利用參加國務院會議的機會，向周恩來反映他們的想法——由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局勢穩定下來，並希望周接見六教授，當面請示機宜。第二天去國務院開會時，史良告訴章伯鈞：“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於是，章伯鈞在會上給周恩來寫了個條子，說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²⁷⁸ 到了這個時候，無論章伯鈞和民盟提出任何建議，都不會有好結果。周恩來的感覺是：他們看到大字報上街，學生請願，工人罷工，農村合作社也有問題，認為就是匈牙利事件了。“他們這樣的相信，這樣的估計，6月6日他們是高興的”。²⁷⁹ 毛澤東對此事的反應體現在他後來寫的文章中：“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

277 周恩來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57年7月7日。

278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烟》，第11頁；《最後的貴族》，第12-13頁；《雖九死其猶未悔》，第100-101頁。

279 周恩來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57年7月7日。

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²⁸⁰

這時的毛澤東感到，防止民主黨派與學生結合，防止學潮涌向社會，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已經刻不容緩，反擊行動必須提前。恰在此時，又發生了“盧郁文事件”，毛澤東及時抓住了這個機會。盧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員，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助理。他在5月25日和29日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言，批評現在一些人提意見有片面性，只許自己提意見，不許人家作說明，並與譚惕吾發生爭議。²⁸¹在6月6日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宣讀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說盧郁文“為虎作倀”，“無耻之尤”，並要他“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恕你的”。匿名信還說，“共產黨如果只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²⁸²6月7日上午毛澤東看到報紙上的這條消息，喜出望外，對應約而去的胡喬木和吳冷西說：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²⁸³

於是，反擊右派運動的號令就這樣產生了，一場波及全國、影響數十萬人命運乃至共和國發展方向的反右派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2007年3月完稿

280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7頁。

281 1957年5月26日、30日《人民日報》。

282 1957年6月7日《人民日報》。

283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39-40頁。

“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

章立凡

引言：中國知識分子的結社傳統與近代政黨的會黨特徵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結社可分為知識分子結社和民間結社兩種。前者(如東漢黨人，唐代“清流”、宋代“元祐黨人”，明末東林黨和復社)基本上是公開活動而相互間信守一定的秘密，無論在朝在野，多屬清流議政。後者則以地下活動為主，帶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如東漢張角“五斗米道”即是以宗教迷信為外衣的民間結社，歷時元、明、清三代的白蓮教，則是其最著名的例子，清代林清、李文成起義及義和團暴動，皆有該教之血脈)，中國農民的造反以及黑社會的活動，多與後者有關。到了明末清初，漢族為反對異族的統治，這兩種結社開始相互融合。自黃宗義、顧炎武、朱舜水、傅青主等大知識分子與民間勢力結合“反清復明”起，逐漸形成洪門的天地會、哥老會、三合會等秘密會黨。

中國近世政黨往往帶有會黨色彩，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現代政黨。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首創知識分子利用外來宗教、經秘密結社發動農民起義的先例，但也利用過天地會的組織；戊戌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等，皆與會黨有密切聯繫；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均利用會黨的力量從事革命活動，如孫中山是美國洪門致公堂的“洪棍”(執法者)，黃興與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結盟，陳其美是青幫大老，等等。

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時，就要求黨員宣誓效忠於他本人，曾遭到黃興的抵制。蔣介石本人是青幫分子，執掌政權後，繼續會黨政治作風，推行個人獨裁和特務統治，抵制民主憲政，也受到強烈的批評。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帶有民粹派傾向的知識分子精英，主張直接與社會下層群眾結合發動暴力革命，因此也有部分會黨人物加入了革命隊伍。中共是一個農民成份佔90%以上的政黨，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游民無產者，這種人最易成為會黨政治的擁護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會助長決策的不透明和家長作風；而在白色恐怖下險惡的生存環境，亦需要經常以嚴酷的紀律來控制內部。中共黨史上一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事件，皆與會黨政治的傳統有關。

毛澤東是一個出身農家的革命領袖，他思想中有很多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成份。這種思潮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產物，帶有明顯的反城市化傾向。它的擁護者大多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的受害者，包括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及代表他們的知識分子。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同，烏托邦主義不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文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把現代工業社會所造成的大城市視為罪惡的淵藪，認為城鄉差別、社會分工是違反自然、違反人性的，主張建立以鄉村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小型社會主義公社，用道德的力量和平等的分配制度，對抗以城市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在被毛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烏托邦社會主義恰好與中國農民的平均主義傳統觀念相重合，特別是在具有強烈農民革命色彩的中共內部有着很大市場，中共歷史上的延安模式和“南泥灣精神”就是這類烏托邦的現實典範。會黨政治加上烏托邦主義，使中共難於進入現代政黨的行列。

抗日戰爭後期，一些主張民主憲政、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民主黨派，與中共達成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共識。但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中共作為中心政治勢力，未能擺脫會黨政治的傳

統；民主黨派的民主憲政理想，最終在一黨專政下消失，成為政治上的附庸。

一、前世：知識分子黨派與農民會黨的結盟

1. “第三方面”及其與中共的“聯合政府”共識

抗日戰爭期間，除擁有軍隊國共兩黨之外，還存在一些持中間立場的小黨派，形成於各個歷史時期，茲簡介如下。

國家社會黨：主要成員為民國初年國會中梁啟超的進步黨人士，以及梁系知識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張君勱整合成國家社會黨。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憲政黨合並，組成民主社會黨。

致公黨：陳炯明與孫中山分裂後，組合海外洪門人士，在美洲洪門致公堂的基礎上，於1925年在美國成立了致公黨。

青年黨：五四時期，受西方影響的自由知識分子結社，成為一時風尚，以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成員形成的國家主義派，於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組成青年黨。

第三黨：大革命後期國共分裂，鄧演達、譚平山等原國民黨左派及中共脫黨人士，在國共兩黨之外另組第三黨。鄧被蔣介石殺害後，改由章伯鈞、彭澤民等領導。

在這些黨派以外，還存在一些有獨立政治主張或利益訴求的團體。如沈鈞儒、章乃器等知識分子於1935年發起的救國運動，主張國共兩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形成救國會派。以梁漱溟為首的鄉村建設學會，被稱為鄉建派。以黃炎培為首的中國職業教育社，被稱為職教派。

除致公黨有較多的會黨特徵外，這些黨派的共同特點，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主張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憲政，對國共兩黨極端對立的政治立場持批評態度，但不具備軍事實力。

抗日戰爭時期，這些中間黨派在大後方發起憲政運動，要求廢

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開始形成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斷提出實施憲政的政見，批評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呼籲實現西方式民主。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黨三派負責人在重慶舉行會議，參加者有：羅文幹、羅隆基、胡石青(國家社會黨)，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青年黨)，章伯鈞、丘哲(第三黨)，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救國會派)，黃炎培、江恒源、冷邁(職教派)，梁漱溟(鄉建派)，以及無黨派人士張瀾、光升等人。章乃器、左舜生起草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簡章》。

《信約》共計十二條：主張“憲法頒佈後，立即實施憲政，成立憲政政府，凡一切抵觸憲法之實施，應即中止，一切抵觸憲法之法令應即宣告無效”；“凡遵守憲法之各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但各單位間應有一有聯繫之組織，以共同努力，為固定國策之決定與推行”；“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鏟除貪污，節約浪費，為其最低條件”；“尊重學術思想之自由”；“一切軍隊屬於國家，統一指揮，統一編制”；反對“一切國內之暴力鬥爭及破壞行為”，“嚴格反對一切內戰”；並從團結抗日出發，提出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力促其領袖地位之法律化”，“求得國家之統一。”¹

統一建國同志會的成立，為各中間黨派的進一步聯合奠定了基礎。該會於1942年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而其《信約》中的原則，後來也被應用於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的政綱等文件。

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運用統一戰綫策略爭取救國會等中間勢力的支持，擺脫了被國民政府剿滅的命運，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並在抗戰期間坐大。在抗戰的大後方重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又利用國民參政會等機構，成功地團結了“第三方面”的中間黨派及社會賢達。統一戰綫策略被中共奉為革命致勝的法寶。

1 《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1939年11月。

抗戰勝利前夕，民主憲政運動再度興起。1944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一黨政府、建立一個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受到“第三方面”的歡迎。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也敦促國共雙方聯合其他國內政治力量，建立一個聯合政府。11月9日，美國特使赫爾利在延安與毛澤東簽署了五項協議。其中確認：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佈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

毛澤東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提出組成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認為：“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²對於當時中間黨派所主張的“軍隊國家化”，毛也表示了謹慎的贊同。

中共是當時擁有軍隊和地盤的最大在野黨，其在陝甘寧邊區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樣板和毛澤東的聯合政府主張，與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統治模式形成鮮明對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1945年7月，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六位國民參政員聯袂訪問延安，當黃向毛提出如何擺脫政權更迭的“歷史周期律”時，毛澤東聲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與“第三方面”的蜜月由此開始，並在抗戰勝利後的重慶談判期間達到高潮，國共雙方達成了《雙十協定》。與此同時，在國內形成了一股組黨風潮，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組成了民族工商業家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建國會，教育界知識分子馬序倫、王紹鰲等組成了民主促進會，許德珩等大學教授組成了九三學社，“第三方面”的陣營擴大了。

2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1頁。

在這些“第三方面”黨派中，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分別代表自由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其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也是最系統和明確的，建設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政、人權、經濟民主、軍隊國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備的體現。羅隆基提出：“中國需要第三個大政黨”，“目前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兩黨擁有武力對峙的局面”；³章乃器在為民主建國會起草的宣言中，公開以“不右傾，不左袒”為揭槩⁴；施復亮提出“必須在國共兩黨以外形成一個進步的民主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舉足重輕的地位，既可以做雙方團結的橋樑，又可以做共同團結的基礎”⁵；張東蓀主張：“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採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採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鬥爭。不要放任故不要資本家壟斷，不要鬥爭故不要階級鬥爭。”⁶對於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綫和土地改革，“第三方面”一直持反對立場。

1946年1月31日，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五個方面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國民大會案》、《憲法草案案》、《政府組織案》、《軍事問題案》、《和平建國綱領》五個決議，確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政協會議的成功，滿足了社會各階層對國內和平及民主建國的憧憬。但和平的迷夢很快被內戰的陰影所替代，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軍事集團的摩擦階段，“第三方面”積極奔走調停，同時不斷對兩黨提出批評，堅決反對內戰，招致了國共兩黨的強烈不滿。

3 羅隆基：《中國需要第三個大政黨》，《民主週刊》第1卷第16期，1945年9月。

4 《平民》周刊民主建國會成立紀念專刊，1946年1月。

5 施復亮《我的答案》，《新華日報》，1946年1月1日。

6 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綫》，《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1946年國共兩黨內戰的爆發，導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組合：國民黨中的反蔣人士，組成了以李濟深為首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中的民社黨、青年黨及部分社會賢達，參加了國民黨政權召開的國民大會，大會通過了以張君勱等在1936年起草的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為藍本的《中華民國憲法》；另一部分黨派則採取了抵制的態度，並進一步受到國民黨的壓迫。1947年是個轉折之年，10月27日，民主同盟於被當局宣佈為“非法”，以這一事件為標誌，迫使持“第三方面”立場的黨派逐漸放棄“中間路綫”，選擇了與中共合作。這些黨派後來被稱為“民主黨派”。

關於中國內戰後的政治格局，中共與“老大哥”蘇共曾有所切磋。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斯大林不贊成毛的意見，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複電中說，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⁷

斯大林一錘定音，決定了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格局；而此時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心態，則成為10年後發動“反右”的一個注腳。有研究者質疑這兩封電報的真實性，但從此後的歷史進程來看，筆者認為存在可信度。

7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5期。

1948年，隨着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重新洗牌。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主張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響應。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開始秘密輸送各黨派負責人分批北上，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中共的軍事勝利比預計提前了兩年，但作為一個以農民為群眾基礎的政黨，文化教育的平均水準低於國民黨，缺乏接管一個大國的人才儲備，因此，與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合作，也是時勢使然。

1949年，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念。他從政治和經濟的現實出發，反對破壞工商業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仍主張“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⁸；他同時主張“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的地位”，並指出在將來實行企業國有化時，“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⁹毛在這一時期的言論，較關注新政權國體和政體的思考及革命隊伍的自律，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及推行計劃經濟的思路也初現端倪，顯示出與《論聯合政府》一文的立場已有所不同。

2. 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底牌

將人群貼上“左”、“中”、“右”標籤加以劃分，是中共的一種習慣性思維模式，在各革命階段的中共文件及毛澤東著作中屢見不鮮。1949年籌備新政協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一份綜合報告中，對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的“左、中、右”有詳盡的分析。

其中談對民盟的分析是：中央常委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

8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4頁。

9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第1483頁。

多數，左派分子僅佔兩個，但其總部及各地區的實際領導權已逐漸轉移到進步分子手裏，現在它的組織內部主要是人民救國會、農工民主黨與無黨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文件認為沈鈞儒、史良、胡愈之領導的人民救國會，“會員中進步分子佔優勢”；而農工民主黨“上層多右派分子”，並特別指出：

章伯鈞有江湖政客作風，在黨內實行家長制的統治，常以民主同盟的名義發展他的黨員，引起同盟內部的不滿。過去他一貫企圖在國共兩黨對立下，造成第三方面的地位；他和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打成一片，又與一些地方實力派有聯繫。但因與我黨關係較久，仍可能爭取與我們一道。

民盟著名領袖除沈鈞儒、章伯鈞外，尚有張瀾、黃炎培、張東蓀、羅隆基，他們在民盟群眾中的威信雖已降低，但仍成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張瀾與西南地方勢力向來保有聯繫。羅隆基是親美分子，主張聯合政府中容許反對派。張東蓀企圖做民盟主席，拉攏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排斥沈鈞儒、史良以至章伯鈞。

報告也透露了中共對民盟的改造意圖：“民主同盟應該而且可能成為各被壓迫階級的聯盟。但須採取改組中央常委、建立進步分子為主導的核心、容許共產黨員在內等措施，但這不是很容易的和一蹴即成的事情。”

對於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報告也作了詳盡分析：

李濟深及其“親信”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本是想取蔣介石的法統而代之，他在實質上是受蔣排擠的地方實力派(失去地盤乃至尚有地盤的)代表人，其秘密黨員中顯然有不少這類分子，據說龍雲、盧漢、劉文輝、張軫皆其秘密中委。李之容納一些進步分子在其黨內及其左右，是為了做幌子，而實際工作則盡量交給右派

做，進步分子只能在裏面起號召和牽制作用，沒有獲得實權。何香凝、柳亞子、譚平山等元老，也只是使李有所顧忌，尚未取得領導權。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以李濟深為首的右派集團，在政治上主張：以三民主義為建國最高原則，而不願用新民主主義；希圖結合資產階級右翼，形成反對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張保留蔣黨“起義”部隊的編制，以圖收集殘餘的力量，並聯絡地方軍閥，策動地方武裝，從而培植其爭奪領導權的資本……

報告認為：“譚平山、王昆侖領導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比較進步的力量”，而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實際上是以李濟深、蔡廷鍇為中心的一個封建性小集團”，並提出應使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起積極作用”。

這個報告對民主建國會的分析是：

其中下層中也有不少小資產階級進步分子及革命知識分子，但尚不能起決定作用。該會政治傾向一般代表產業界自由資產階級的要求，黃炎培、章乃器為他們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統曾經公開地主張中間路線與改良主義，章乃器於此，比施存統更來得堅決，他說“在國共兩條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條道路。”只在他們進入解放區後，言論見解，才有若干改變。

報告對民主建國會與產業界出席新政協的代表成份的預測，顯得更加悲觀：“將只能以右派並力爭中派居多，可以有個別的進步分子在代表團裏面，但不可能單靠他們起積極作用。”

報告還認為：“以馬序倫為首的中國民主促進會，其政治傾向，迄今為止是代表中等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其組成分子中有一批進步的文化人，這是使它左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實際上屬我黨領導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與它相結合，推動它左傾。”

對於洪門華僑組成的致公黨，報告認為其內部分子複雜，並溯及其領導人陳其尤與陳炯明的親屬關係，稱李濟深是該黨秘密主席，“實際上支持李濟深的政治意圖”“該黨帶有極濃厚的封建性質，其主要的組成分子上層為封建官僚，下層有小部分流氓無產者。”¹⁰

在總體表述上，報告透露的長期目標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至此，中共對政治盟友的親疏好惡及政治盤算已經一覽無餘，而八年後“反右”的一些主要目標人物，皆已列位彀中。

此外，劉少奇在1949年7月訪問蘇聯時，給蘇共中央斯大林報告中也談到：

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人，其中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的只有12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委會中另外還設立了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¹¹

3. 《共同綱領》與聯合政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在北京召開，這個由各黨派、各階層和利益集團的著名精英所組成的會議，雖不是經由選舉產生，但較此前任何一屆制憲會議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與會的四十五個單位，分為黨派、區域、軍隊、團體、特邀五類。十四個黨派單位中，除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三黨)、中國人民

10 《新政協的陣營》(中央統戰部的綜合報告)，1949年2月28日。

11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7月4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民建)、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十一個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

以許德珩為首的九三學社，本是一個以大學教授為主的鬆散團體，有政治主張而無政治綱領；以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二二八”事件主角之一謝雪紅為首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員皆系台籍反國民黨人士。這兩個黨派並未申請參加新政協，但被安排與會。還有一些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如沙彥楷為首的民社黨革新派、許聞天為首的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安若定為首的中國少年勞動黨、董時進為首的中國農民黨，皆以“組織不純”“成份複雜”等理由未獲准與會。這些黨派先後自行宣告解散，其代表人物被邀以個人名義出席。此外，要求與會的還有光復會、中國民治黨、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被認為“成員十分複雜，性質多屬反動”遭到拒絕。

在出席新政協的662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佔44%，黨外人士佔56%，其中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佔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佔30%，基本上實現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則。中共以及“老大哥”蘇共都承認新政權是一個聯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新政協及其制訂的大憲章式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文件帶有臨時憲法的性質，宣佈“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確認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權”。

《共同綱領》保留了聯合政府的理念框架，並未從字面上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軍隊的掌控，其對新政權的性質表述如下：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

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¹²

對於國家的武裝力量，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¹³從文字表述上與“軍隊國家化”並無抵觸。

《共同綱領》最難產的是經濟政策部分，幾經修改，最後由毛澤東敲定，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通過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¹⁴

《共同綱領》頒佈後，各民主黨派隨即宣佈以《共同綱領》為本黨的綱領，並加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表述。但中共仍保留了自己黨章中的總綱。

新政治協商會議被認為是中共統一戰綫策略的成功範例，它顯示出新政權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共產黨對其他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的尊重。中央人民政府除毛澤東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張瀾、李濟深、宋慶齡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約佔半數；政務院名單

1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第331頁。

1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34頁。

14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35頁。

中，非中共人士黃炎培、郭沫若出任副總理，章伯鈞、馬敘倫、陳劭先、王昆侖、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竑、譚平山、蔣光鼐、朱學範、李書城、梁希、傅作義、沈雁冰、張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擔任了政務委員和部長職務，聯合政府的色彩濃厚。

由眾多委員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與政務院的關係，根據劉少奇同年7月訪蘇時向斯大林的解釋：“中央政府主席團及主席團與內閣關係(即主席團是集體的總統，內閣服從主席團，為中央政府的執行機關)”，斯大林認為：“這個制度可能對於目前的中國是很適當的”。¹⁵

中共在新政權的領導作用，首先體現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黨派在新政協的代表名額分配與新政權的職務安排，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共。劉少奇在1949年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

……它們的組織散漫，內部極不團結。例如所有民主黨派都無法提出自己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名單，因為他們內部爭吵。它們的代表名單，都必須由共產黨發表意見，才能提出。但各民主黨派都有幾個領導人物，這些人物因為在中國進行長期的政治活動，在人民中是有些影響的，它們的黨組織就靠這些領導人物來維繫。在某(每)一個黨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種分子……。¹⁶

圍繞新政協代表的提名，各民主黨派內爭不斷。如身在上海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即因代表名單問題與沈鈞儒發生爭執；救國會代表宋雲彬在1949年7月18日的日記中記載，沈鈞儒對力爭代表資格的龐蓋青說：“名單必經統戰部同意，而代表亦非運動爭取得。”¹⁷ 黃炎培也在1949年7月16日的日記中談到，代

15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7月4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注釋[16]。

16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第8頁。

17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表名單“取捨及先後完全以中共提出為憑”，民建內部多人反對提名冷邁任政協代表，但“潘漢年堅持，越反對越堅持，卒不敢有異議。”¹⁸嗣後成立的新政府，各黨派在職務分配上也存在競爭，中共同樣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聯合政府的人事安排在中共黨內也引起了不滿，對此，毛澤東回答說：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裏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¹⁹

4. 民主黨派發展領域的限定與劃分

新政協召開前，即已傳出救國會不久將解散的風聲，會後更有取消、縮編一些一些民主黨派的方案。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隨即並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救國會不久也宣佈解散，其成員多數溶入民盟並掌握了領導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與中共關係密切，救國會則是在各民主黨派中與中共關係最親密的，這兩個偏左黨派單位的“摻入”，事實上改變了民革、民盟中的內部成份，顯然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最終形成了延續至今的八個民主黨派格局。

一些民主黨派成員有軍事上的背景，如民革中有原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或“起義將領”，農工民主黨、民盟的某些成員曾是軍人，或從事過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新政權成立後，民主黨派“軍隊國家化”夢想首先被打破。中共的成功經驗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語），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宣佈：“各民主黨派已決定不在工人、農民和人民

2002年版，第142頁。

18 《黃炎培日記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第五輯，第201頁。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34頁。

武裝部隊(包括軍事學校和機關)中進行黨派活動。”²⁰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於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關各民主黨派組織活動的決議》：

各民主黨派不在人民解放軍包括公安部隊在內的部隊中及其軍事機關、學校以及軍事企業中發展黨員，已經取得民主黨派黨籍者，繼續工作或學習，並得與所屬黨部發生個別聯繫，但須嚴格遵守人民解放軍的紀律，不得在部隊中及其機關、學校和軍事企業中從事有關民主黨派的活動(組織宣傳等)。並須將本人所屬黨籍向所屬的部隊、學校機關及企業的政治部門報告。凡新參加人民解放軍部隊或新考入軍事學校、機關或軍事企業中工作或學習的民主黨派的黨員，均同此辦理……

上述決議已經(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一致通過，並決定各民主黨派在下列機關學校亦不進行組織的活動：(1)情報機關。(2)革命大學。(3)舊人員訓練班。(4)使、領館。²¹

另據民主建國會總會同年7月26日關於執行這一決議的通函，根據政協全國委員會的指示，活動禁區還包括少數民族地區，²²翌年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指示，禁區又擴大到鐵路系統²³。應中共的要求，一些黨派(如民建)還撤消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

經中共中央統戰部確認，各民主黨派劃定了發展成員的分工領域。李維漢1950年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說：

20 李維漢：《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新的形勢與任務》(李維漢同志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綫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3月21日。

21 中共中央《有關各民主黨派組織活動的決議》，《中國民主建國會歷史文獻選編》(2)，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5頁。

22 《民主建國會關於不在軍隊等系統發展組織的通函》，《中國民主建國會歷史文獻選編》(2)，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頁。

23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各民主黨派暫時不在鐵路系統發展黨員問題致各地統戰部電》(1951年3月12日)。

除農工民主黨經其第五次全國幹部會議決定已學習為主，停止發展外，各民主黨派大體上決定了它們的主要活動範圍和發展對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對象為轉向過來的國民黨員，主要是中層的國民黨員。民主同盟的對象為知識分子，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民主建國會的對象為民族工商業家及與之有關的從業人員和知識分子，並吸收有關的公營企業幹部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以自由職業者為主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與民主促進會相類似，它們在現有基礎上適當發展。致公黨的基礎原在華僑中的洪門，已勸告該黨首領整頓組織，並不向國內發展。²⁴

李維漢認為：“其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國會是三個主要民主黨派，需要幫助它們依其必要和可能，在頭二等城市中和建立和發展其組織。”²⁵上述發展領域的劃分，在民主黨派中被戲稱為“防區制”，並最終明確為：民革，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業家和與他們有聯繫的知識分子；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科學界知識分子；農工民主黨，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致公黨，歸僑、僑眷；九三學社，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醫藥衛生界知識分子；台盟，台灣省籍人士。

5. 民主黨派的組織、人事改造

對民主黨派的組織、人事改造，也在新政權成立後不久開始。中共將“以進步為骨幹”內定為對民主黨派改造方針，並着重在改變其組織成份。1951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須幫助各民主黨派，在大中城市發展黨員一倍至兩倍，動員一批進步分子、中左分子和適量的中間分子加入進去，並幫助他們訓練幹部，以鞏固其組織，提

24 李維漢：《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新的形勢與任務》，1950年3月21日。

25 同上。

高其水平。”²⁶ 1952年又提出：“在各民主黨派內應當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非黨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與左翼分子結合起來，形成骨幹，共同執行團結中間分子，爭取右翼分子的任務，使各民主黨派能夠成為我黨團結教育和改造上述各階級、階層的助手。”²⁷ 中共中央統戰部將這一組織改造方針規劃為：

各民主黨派將來的發展仍應更多地吸收中間分子，也吸收一部分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中右分子，同時保持一定數量的進步分子和中左分子。但目前則應大量吸收一批進步分子和中左分子。其中包括十分之一、二的共產黨員和新青團員，以便培養新的骨幹，建立一個鞏固前進的基地。²⁸

歷史上各民主黨派內都有中共秘密黨員，如民盟的胡愈之、沙千里、薩空了、周新民、李文宜，民建的孫起孟，民進的趙樸初，致公黨的嚴希純，台盟的謝雪紅等。新政權成立以後，一些共產黨人如南漢辰等曾被公開安插進民主黨派。中共中央統戰部還提出：“應當按照中央規定吸收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中合乎我黨黨員條件的入黨，以便從民主黨派內部密切黨與非黨的關係”。²⁹ 例如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吳晗在1957年3月加入了中共，而無黨派人士郭沫若的中共黨員身份早就存在，1958年又以重新入黨的方式予以公開；還有一些要求入黨的“民主人士左派”如沈鈞儒、史良等，則仍根據“革命的需要”作為“黨外布爾什維克”被留在黨外。

根據統戰部1953年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1952年6月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中所規定的六個民

26 《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綫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28日。

27 《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1952年6月全國統戰部長會議通過)。

28 中共中央：《1951年協助各民主黨派發展黨員的建議》(1月20日中央統戰會議擬定)。

29 《1956年到1962年統一戰綫工作的方針》(1956年3月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決議)。

主黨派的發展方針是：着重吸收它們所聯繫的階級、階層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層人物。民建、民盟已在逐步實現這一方針(民建新發展的會員中，工商業資本家佔62%，大中資本家所佔的比例，在上海、青島、濟南、無錫、重慶等地達到60%-90%。民盟新發展的盟員，文教界佔80%，中上層分子佔其發展總數的68%，尤以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為多)，因而增強了代表性，增加了對中上層的聯繫和影響……

截止到目前為止，民主黨派在國內的黨員總數為三萬二千多人(加上民盟、民革和致公黨在國外的黨員約一萬人，總計四萬多人。但近年來他們對國外成員聯繫很少，亦無確數)，較之1950年國內一萬一千餘人，發展了兩倍。兩年來，除致公黨很少發展和台盟無發展外，其他各黨派發展的速度均較快，(民盟由1950年底的五千八百多人，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增加了一倍半強。民建由一千六百餘人到六千人，增加了兩倍半強。民革由一千五百餘人到六千人，增加了三倍。民進由二百餘人到一千二百人，增加了四倍。九三學社由一百二十人到八百人，增加了五倍半。農工民主黨因發展較遲，由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三百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現在各民主黨派均有意求大量發展的表現……³⁰

雖然人數有所增長，但比起中共發展黨員的速度和規模，民主黨派難於望其項背。它們對中共制定的組織發展方針也存在異議，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民革的李濟深等“從其根深蒂固的國民黨黨統思想出發，總想把所謂國民黨員全部接收過來(除開現在還公開反共的一小撮)”；民建的章乃器等“一向主張以有代表性的老闆階級即上層工商業家為主要對象”³¹。章還要求確認民建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中共的因應之道，是成立由中共

30 《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關於兩次黨派工作匯報會的綜合報告》，1953年4月。

31 《李維漢同志關於各民主黨派中央會議情況及對黨派統一戰綫工作方針向中央的報告》，1950年12月14日。

黨組領導的全國工商業者聯合會(工商聯)，對民族工商業者實行分流。工商聯因此成為與八個民主黨派並列的人民團體。

1956年出走香港的民盟中常委周鯨文，在談到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工作時說：

……它的機構內專設“民主黨派處”，凡是民主黨派的事，不論大小，它都過問；如民主黨派開會，主要討論的題目內容，也請示統戰部，會後把議決或聲明，須得送統戰部看過。選舉的人名單先請統戰部批准，會中還得很榮幸的請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臨致訓指示。在地方也請地方統戰部長。在會議中每天都有情報員向統戰部報告與會的人們思想動態，有時統戰部的工作人員親自列席旁聽，親自取得第一手資料。

平常的事務如佈置什麼座談會，怎樣工作，也得請示統戰部。有時吸收某人入盟入黨，也得徵求統戰部的意見。統戰部點頭則可，搖頭就等於判定那人還有可疑之處。³²

各民主黨派的經費，以往都是通過捐助等方式自籌，例如民盟在北京購置中央總部的辦公房舍，即是由民建捐助的。自從成為新政權的成員之後，民主黨派的經費及人員工薪變成由國庫支出。據周鯨文記述：

民主黨派的章程上，必印一條“黨費由黨員交納或自由捐獻”。外國頗注意這一點，以為黨由自己收費開支，這個黨就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外國人問到這一層，我們就說“黨費由自己捐獻交納”。實際上所有黨派的開支，無論上級和下級，全由國庫開支。從1949年到1954年，我是民盟中央委員會下的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我可證實這種情況。頭兩年所有民盟上下級組織的經費，都是由我出名向財政部領取，然後年終向它報銷；後二年地

32 周鯨文：《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1959年版，第69頁。

方組織經費，由當地組織向財政機關去領，免去了由中央領取再發的多層手續。³³

另據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1956年的報告：

民主黨派機關幹部的編制很少，八個民主黨派的總部和省、市級組織，全國共有三百七十一人，僅有幹部二千五百一十六人，平均每個組織只有六個多人，他們要求調幹部，常常遇到很多困難，有些地方，幹部的生活待遇偏低。民主黨派的經費開支，為數很少，八個民主黨派總部的開支數，1955年度決算為七十三萬多元，1956年度預算數為一百二十四萬多元，有些地方民主黨派的辦公費不夠開支，政治活動和業務活動的招待費不能報銷，辦公地方既小又壞，交通工具得不到解決。³⁴

6. 有職無權與意見分歧

在民主黨派人士擔任部長的政務院各部，中共中央書記處都派駐了黨組，由中共的副部長擔任書記並掌握實權，民主黨派部長往往有職無權。對此，有的民主黨派人士很有意見。

例如在章伯鈞擔任部長的交通部，部黨組在日常工作上“事前不請示，事後也很少報告”，“幹部有事，都到×××處去談話，不請示章伯鈞。由此，章有插不上手之感”；“在人事配備上，事先未與他商量請示，常有臨時告章，在部務會議上通過的情形”³⁵，等等。章伯鈞在與周恩來談話時反映了上述情況，中共領導人當時還很重視維護統一戰綫形象，周恩來、陳雲曾責令交通部黨組檢討，並由中央財經委員會分黨組發通報批評，毛澤東於1950年11月17日作出批示說：“此件請發給中財委系統以外的各部門黨

33 周鯨文：《風暴十年》，第64頁。

34 李維漢：《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幾個問題》，1956年10月。

35 《交通部黨組關於團結民主人士問題的檢討》，1950年11月6日。

組研究。對那些問題嚴重的部，要他們照交通部黨組辦法寫出檢討申明書。”³⁶

章乃器在1952年就任糧食部長時，曾對奉派出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范式人申明：

你是共產黨員，我是民主建國會成員，我們的領袖都是毛主席，我們的共同經典都是毛主席著作，我們是革命同志。但在工作上，我是部長，你是副部長，你是我的下級和助手。因此，你必須絕對服從我的領導，你們黨組不許背着我自行其是。這是原則問題，必須首先講清楚！³⁷

為此，這位黨組書記拂袖而去，拒絕到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不得不另換人選。

中共宣佈在外交上實行親蘇的“一邊倒”政策，曾遭到民主黨派中主張“兼親美蘇”的自由知識分子強烈質疑，毛澤東為此在1949年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等雄文予以駁斥。民盟中主張與美國保持關係的重要人物張東蓀，被扣上“出賣情報”的罪名而遭到整肅。

中共在1950年代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也對民主黨派造成相當的衝擊。例如民革主要是國民黨內分化出來的政治勢力，但與舊軍政及地方勢力淵源較深，在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受到的觸動較大；軍警曾包圍民革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的住宅，從他家中抓走訪客，李深為不滿。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業家為主體的政黨，“五反”運動中，中共統戰部一度提出“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的口號，很多會員遭到鬥爭甚至自殺。思想改造運動和對胡適、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觸及了很多民主黨派內的高級知識分子。

36 轉引自：《中財委分黨組關於交通部黨組團結民主人士問題檢討通報》，1950年11月。

37 周伯萍：《我在糧食部十二年》，《黨史博覽》2007年第4期。

但民主黨派對於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評權。黃炎培等曾主張“江南無封建”，對土改政策提出質疑，並批評國家在重要物資上的壟斷是“與民爭利”；梁漱溟因反映農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澤東的辱罵時，陳銘樞當場要求毛為梁的觀點定性；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民建發展組織應以“中小(資本家)為基礎”，章乃器一再表示反對，最終統戰部承認這一方針是不適當的。對於出兵朝鮮、糧食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民主黨派中也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

7. 過渡時期總路綫與一屆人大變局

1952年“五反”期間，習慣於用政治、軍事思維規劃一切的毛澤東，開始考慮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上，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他在審閱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的《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時作出批示：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³⁸

1953年毛澤東又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把原來設想中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表大大提前了。同年9月7日毛澤東邀請黨外人士座談，發表了《改造資本主義的必經之路》的講話。從第二年一起，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私人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進程就開始了。

劉少奇於1953年訪問蘇聯期間，曾與斯大林討論中國將在1954年進行選舉和制憲的計劃。斯氏指教說：

38 毛澤東：《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7頁。

你們現在的政府是聯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對一黨負責，而應當向各黨派負責。你們很難保密。如果人民選舉的結果當選者共產黨員佔大多數，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政府。各黨派在選舉中如落選了，你們不應當使統一戰線破裂，你們應當繼續在經濟上和他們合作。”³⁹

從後來的實踐看，中共在主導思想上採納了斯大林的策略，但在具體操作上更為巧妙。1953年公佈的《選舉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省、縣和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由其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之。”根據這種“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的選舉制度，只有最基層的人民代表由選民直接選出。而從基層到全國人大各級代表的產生，毫無例外地來自官方的分配和提名。

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原先的《共同綱領》相比，“五四憲法”首次明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前提，並增加了過渡時期總路綫、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內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對政府機構的調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不復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被取消，改設諮詢機構性質的國防委員會；政務院改稱國務院，增設國防部，擔負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國防建設及軍事行政管理職能。

大會所通過的人事名單也令人矚目：毛澤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劉少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國務院的十名副總理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部由中共高層人士出任。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務院副總理的黨外人士，皆轉任人大常

39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頁。

委會副委員長。

至此，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中共領導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聯合政府的色彩漸趨淡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過重要作用的政治協商會議，變成了名義上為“統一戰綫團體”的諮詢機構。

為開展對黨外人士的思想改造，政協全國委員會曾於1952年1月9日通過“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決議”，並成立了學習委員會作為在全國領導這一運動的機構。1954年4月24日，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五十四次常委會議通過了常務委員林伯渠(中共)提出的關於撤消學習委員會的建議。決定今後地方協商委員會組織的學習，由地方學習領導機關統一佈置，本會學習座談會幹事會仍保留，負責學習座談會的工作。

政協地位發生變化後，因為無所事事，學習更成了主要任務。1955年冬，幾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提出：黨(指中共)有黨校，團有團校，各界民主人士也應有一所學習政治理論的學校。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學校定名為“社會主義學院”。1956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將《創辦社會主義學院的實施方案(草案)》上報周恩來並中共中央書記處，獲得批准，並決定仿效中共中央黨校的建築標準營建。

1956年10月15日，社會主義學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該院被稱為“民主黨派的黨校”，招生對象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高層民主人士，職務或級別與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員大體相同，其中包括：全國政協委員，正副秘書長等；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正副秘書長以及各部委正副負責人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性人民團體常務委員、委員，候補委員，正副秘書長等。此後，民主黨派的幹部任職晉升，皆須通過該社會主義學院的培訓。

1956年毛澤東對民主黨派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了這一方針。但有不少民主黨派成員私下表示“監督不了”、“監督不敢”。

1956年年底，“對資改造”基本完成，這是毛澤東引以為榮的另一成就。事後，他在黨內會議上亮出底牌說：對於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需要“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方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給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裏，而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⁴⁰

二、無間道：在“陽謀”中陷落

1. 1950年代中共黨內鬥爭的背景

輝煌開國的榮耀漸漸淡化之後，毛澤東逐漸感到他“熟習的東西”正在閑下來，而以往所不熟習的經濟工作，卻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戰爭年代那樣指揮自如。黨內高層在“過渡時期”的建設方針上，一直存在不同觀點。例如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綫時，毛與劉少奇就發生分歧。

薄一波在談到這一分歧時曾說：“在農民問題上，毛主席強調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則認為不能過早輕易動搖農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不要怕農民冒富，黨員也可以先當富農……毛主席主張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安排好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張則與其相反。在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上，毛主席在1952年就開始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少奇同志則主張多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待條件成熟後再轉入社會主義”。⁴¹

毛對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制定的“新稅制”也十分不滿，據薄一波回憶：毛聲稱“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並批評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40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7頁。

4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60頁。

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的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⁴² 毛認為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提議中共中央於1953年3月作出決定：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准；此外還撤消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將政府工作分解為計劃、政法、財經、文教、外交等方面，由被指定的領導人分工負責。

毛又在同年5月針對劉少奇等重申自己的個人權威：“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⁴³ 這些分歧後來成為“高饒事件”的誘因。在1953年6月13日開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發動了對主持制定新稅制的薄一波的批判，於是才有了高崗、饒漱石“射薄批劉”、取代劉、周的密謀。但陳雲、鄧小平等的表態令毛戛然而止，並最終拋棄了高、饒，高崗因而自殺。

2. 1956年的“冒進”與“反冒進”

領袖與實際治理國家的領導層都希望擺脫蘇聯模式，但詩人氣質的毛更喜歡打破一切常規和官僚化的管理制度，來一次浪漫的飛躍；而務實的領導層則主張使工業化進程變得更符合經濟規律和中國國力。毛澤東的躁進思想與政治局的穩進戰略發生了矛盾。他本人雖仍擁有巨大的威望，但其激進的烏托邦理想無法在上層推行，分歧在1956年幾乎達到了公開化的程度。毛把這歸咎於黨和政府的官僚化。

4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34、235頁。

43 毛澤東：《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0、81頁。

毛澤東1949年後在黨內批評得最多的就是官僚主義。這個名詞到後來發展成為“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了修正主義的代名詞。

由於“一邊倒”的影響，蘇聯模式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產生了重大影響。蘇式計劃經濟的推行和秩序的重建，企業的管理廣泛採用了蘇聯的“一長制”。隨着分工的日趨精密和責任制的推廣，在體制中出現了現代化理論中的“科層制”管理結構，而官僚主義的弊端和腐敗現象也日漸凸顯，尤其是在基層和中層。機構變得日益龐大和臃腫，權力過度集中造成運轉不靈，效率低下。權力的腐蝕也使以往充滿活力的革命者正在蛻變為循規蹈矩的官僚主義者，命令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盛行，腐敗和脫離群眾的現象也在悄悄地滋長，共產黨的社會理想要求縮小社會差別甚至消滅社會分工，而實現工業化則必定會擴大差別和分工。這些都是與毛澤東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的。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國內非斯大林主義思潮抬頭，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以及波匈事件的發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發了地震。1956年4、5月間，毛澤東在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兩次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認真提出脫離蘇聯模式的問題。非斯大林化思潮顯然在毛心中重新燃起民族主義的火焰，但他反對全盤否定斯大林，則透露出一種希望成為繼任導師的心態。在意識形態上，他針對斯大林在遺傳學領域抬高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做法，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1957年毛澤東正式闡述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顯然是作為自己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

在經濟領域，毛澤東急於探索一條比蘇聯更高速發展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經濟高速增長的社會，以為通過“一化三改”改變生產關係之後，生產力會飛速發展。他盲目偏重於多和快，主張利用國際和平時期，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對堅持務實路線的鄧子恢

發動批判，引來了1955—1956年間的全面冒進，並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

周恩來自1956年1月下旬開始，就不斷地對冒進的形勢進行抵制，要求“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⁴⁴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並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於6月2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發表前劉少奇曾將這篇社論稿批交毛澤東審閱，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後毛曾抱怨說：“罵我的我為什麼要看？”周恩來、陳雲在主持敲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方案時，將冒進時提出的過高指標全部降了下來，毛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也被束之高閣。如果不是周恩來、劉少奇等的抵制，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災難很可能提前降臨。

3. 毛澤東的戀棧心態

毛澤東自1949年10月1日起，就以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身份，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個禮儀性的職務，主要是出席國家重大活動、頒發政令和任免事項、接見國賓，令習慣於山中自在的毛澤東漸漸不勝其煩，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1957年毛澤東正式提出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動議；1959年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接受了他的提議，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1966年毛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1970年他堅決反對設立國家主席，最終導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

研究毛澤東晚年行止，最費解的是他對國家主席一職近乎病態的惡感，自己不想當又不喜歡別人當。但毛澤東的這一情結，其所由來者漸矣。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到自己在歷次黨代會上當選和落選的情況：“大概我這

4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32頁。

個人逢雙不吉利”(指第二、四次黨代會落選中委，第六次黨代會未入政治局)；還談及三次“左”傾路線時期受到的各種處分、打擊，“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⁴⁵ 9月13日他又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⁴⁶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劉少奇在政治報告報告中強調了反對主觀主義和貫徹黨的集體領導原則。此時正值國際共運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當口，“老大哥”蘇共也歷來不承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重申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原則。新黨章將原有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刪除了(據說是根據毛本人的提議)，並真的接過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條第五款為他預設了一個職位：“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毛澤東在“八大”期間繼續作出後退姿態，提出“兩個主席都辭掉”，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不想當了。中共八大，他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⁴⁷ 他還說：“我本想辭掉主席的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這次黨章草案中有一條，必要時可以設名譽主席。我這是準備後事。現在同志們都不贊成我下台，我說，拖幾年也可以。所以，設了四個副主席。現在還是逃不脫。我的方針是兩個主席都辭掉。”⁴⁸

毛澤東在“八大”仍當選連任黨主席。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

45 毛澤東：《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46 毛澤東：《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11頁。

47 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2頁。

48 轉引自劉志勇：《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4期。

作會議期間，自稱“跑龍套”的他再度放風：“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紙上闢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⁴⁹ 4月10日，他同《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再度變調：“我辭去國家主席之後，可以給你們寫些文章。”⁵⁰ 此後就不再提辭黨主席了。

這些都是他1957年4月30日正式提出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前奏。待到5月1日黃炎培、陳叔通兩位黨外大老上書挽留之後，毛澤東在該信的批語中說出了最關鍵的話：“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我仍存在，維繫人民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他表示不排除在“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出現時再度出任國家主席的可能，但堅持要求“從1958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做主題報告)。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⁵¹

毛澤東在1959年卸去了國家主席職務，但終其一生，皆連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再也沒有辭職的舉動。“八大”與“九大”居然間隔了十三年，接班人問題成了他後半生最大的心病。從“八大”前夕提出不當黨主席，一變為兩個主席都辭掉，再變為讓出國家主席而留任黨主席，直至十年後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並廢除這個職務。雖然事態的發展有歷史背景上的階段性，心路歷程卻歷歷在目——“黨是領導一切的”。

李慎之注意到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把與馬列主義並列的“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的情節，認為“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對八大是不會高興的”；還評述了毛在“反右”後清算“反冒進”，“直接孕育了大躍進”的史實等。

49 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65頁。

50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頁。

51 毛澤東：《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1957年5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58-460頁。

應該說，到1956年“八大”時，毛澤東已明顯感到自己的主張在黨內很難推行，需要重新樹立個人權威。從他的性格和歷史經驗上看，發動一場群眾政治運動來排除障礙，顯然是一種必要的選擇。但運動需要有主題和相應的能量源，而最合理的選題，就是針對廣大群眾和知識分子最反感的“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發動一場“大民主”，以釋放出足夠的能量。

毛澤東從匈牙利、波蘭民眾的“大民主”中，找到了釋放能量、重建個人權威的靈感——把下層的怒火引向上層。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用“大民主”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⁵²

從毛澤東這番話中，可以毫不費力地尋出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源。他還宣佈：將在下一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4. “整風”之前民主黨派的批評

1956年是個多事之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共產主義世界引發了地震，不久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澤東的警惕。這警惕也分為兩種：一是對黨內接班人否定前任功績的警惕，二是對黨外政治力量問鼎權力的警惕。

5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4-326頁。

自1956年9月以後的近半年中，全國各地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民主黨派的政治批評也在一些內部會議上出台。據李維漢回憶，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以章乃器、章伯鈞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銳、嚴厲的批評，廣泛涉及黨的領導、國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對於中共提出的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章伯鈞等提出：一、監督應有法律保障，民主黨派向相當政府部門應有質詢權；二、民主黨派可在人大設“議會黨團”，有權單獨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三、政府部門和政協對民主黨派所提批評建議，應認真處理，不得敷衍。

關於民主黨派的發展方針問題。章乃器批評中央統戰部1952年提出“中小為基礎”的建議，是團結中小、排斥打擊大資本家，是製造階級鬥爭。對於過去協議的各民主黨派重點分工範圍，章伯鈞一再表示不滿，主張要打破“防區制”“包乾制”。有些人對我黨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認為是“對九三學社的威脅”。有些人從增強民主黨派的實力出發，主張取消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四個黨派，另組一個知識分子的大黨。

章乃器批評中央統戰部有階級鬥爭簡單化、統戰工作庸俗化的傾向，指責部分黨員、進步分子懷疑和歪曲黨的和平改造方針，執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業者受到無情打擊，主張重新審理“三反”、“五反”案件，處分過重的予以平反。羅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產黨員和非黨員不平等，黨外人士怕黨員，見到黨員唯唯諾諾，覺得自己比黨員低一等。座談中普遍反映黨外人士有職無權，對黨員幹部的官僚主義十分不滿，有人指出：“現在官氣之重，比國民黨還甚”。許多人對中共劃定的民主黨派發展方針表示不滿，對政協的工作感到有名無實，章伯鈞主張實行“兩院制”，將政協變為上議院。⁵³

同年11月，民建一屆二中全會曾組織對章乃器的“紅色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已經大體消除”等觀點的批

5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第820、821頁。

判，中共中央統戰部認為章乃器的觀點“反映了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資產階級要求擴張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政治要求”，同時又認為“他確實抓住了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偏差”，“對章乃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和勇於同我們唱對台戲的積極性，不僅不應打擊，而且應當加以重視，對章的錯誤和毛病，則必須進行適當的批判。”⁵⁴

對於黨外人士的批評，中共中央統戰部確實認真加以研究，並提出了具體改進意見。據說中共領導人劉少奇亦有實行“兩院制”的想法⁵⁵，章伯鈞才提出此建議。中共中央於同年12月批准統戰部《關於加強政協地方委員會工作的意見》的指示中，認為“政協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僅具有統一戰綫組織的作用，而且在實際上起着類似“上議院”的作用。”

毛澤東在這個指示中加了一段話：“大約在1957年夏季，中央將召開一次專門討論全國統一戰綫工作的會議……對於有些在黨外人士面前愛擺老爺架子，宗派主義作風極為嚴重的同志，應當認真地給以批評和教育，端正他們的態度和作風。”⁵⁶

至此，1957年“反右”的三個主要目標人物，已全部進入毛澤東的視野。毛的視角與劉少奇及做具體工作的中央統戰部顯然不同，他認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⁵⁷毛未嘗沒有“引蛇出洞”的意圖，不過對黨外講得隱晦，在黨內就比較放得開。1957年1月，他在黨內會議上談到“對台戲”時說：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不錯的可以彌補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

54 《中央統戰部關於民主建國會二中全会的報告》，1957年2月5日。

55 閻秉華：《章伯鈞拒絕給劉少奇加罪》，《炎黃春秋》2006年第11期。

56 毛澤東：《對中央轉發統戰部關於加強地方政協工作意見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276頁

57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79頁。

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⁵⁸

5. 毛澤東號召“整風”

多數研究者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反右”的外部因素，肇端於1955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以及不久後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至於國內因素，可分為黨內動因和黨外動因兩種。大體上有兩說。

一是李維漢說：認為一開始鎖定在黨內整風，中途轉為反右，但不是“引蛇出洞”。二是李慎之說：認為事先已鎖定黨外目標，是“引蛇出洞”。

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是領袖早有成算在胸。他事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過：“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此話是否“引蛇出洞”最早版本，待考）。發動“反右”時他又在《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通訊中解釋說：“大量的反動的烏烟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對於上述說法，筆者感到仍有言猶未盡之處，需要從事件的歷史淵源、本質與表像進行科學的邏輯分析。1957年的政治風潮，可分為兩個階段：先是黨內“整風”，後有全國“反右”。只有把“整風”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歷史的內幕和人物的心態都是複雜的，從前因後果上看，整風的目的未必純為“引蛇出

58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5頁。

洞”，只因“反右”的創痛太慘烈，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風”也是有目標的。需要從中共黨內、黨外兩條脈絡，分析誰是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在1957年2月27日的第十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與會的黨內外人士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這篇長達四個小時的講話的真實內容，已被他本人在四個月後改得面目難辨。但有幸聆聽者都認為，這是毛生平最富於民主精神的重要講話。講話的內容被迅速傳達到全國，掀起了一股清議之風。

在3月間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再次重申“不能收，只能放”，鼓勵批評，並宣佈年內開展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講話中首次強調了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從歷史上看問題，“整風”必整人，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只是整人的一部分，真正要整的目標在高層。具體來說，就是毛澤東與劉少奇聯手，整倒了王明，整服了周恩來。仔細分析“反右”前後的歷史事實，毛澤東襲用“延安整風”的故智，選擇1957年春天發動“整風”，確有重樹黨內個人權威的意圖。

中共中央於4月27日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強調這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主張“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召開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提出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個方面的矛盾，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他解釋說：“整風會影響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最近兩個月就是這個方式，就是整風方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衛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

解決。”毛還對黨外人士有職無權表示同情：

過去是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跟共產黨一道混，民主人士確是不好當，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以後無論哪一地方，誰當長的就歸他管。”⁵⁹

他指定由鄧小平負責，向黨外人士徵求這方面的意見。並宣佈：“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界宣戰。”⁶⁰

值得玩味的是，在這次會上，毛以退為進，首次對黨外放出了辭去國家主席的口風，以試探各方反應。領會意圖比較到位的黨外人士黃炎培、陳叔通二老，立即上書劉少奇和周恩來說：“在此期間，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變動為好。誠然要強調集體領導，但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仍是維繫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⁶¹這番話通過黨外人士的口說出來，份量當然就不一樣了。

6. “整風”引出的批評

5月4日，中共中央再度發出指示，組織黨外人士對黨和政府展開批評。其實經過土改、“鎮反”、“三反”運動，在地主士紳和民族資產階級中有影響力的民革、民建等黨派已改造得差不多；思想改造和“肅反”運動之後，文化教育界人士也多已緘口不言；只剩下民盟、農工等黨派還有待改造。毛澤東的竭誠邀請，重新激發了黨外老朋友的參政熱情。民主黨派的批評，多集中在中共與非黨

59 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談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957），第222頁。

60 同上。

61 轉引自毛澤東：《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58頁。

人士的關係上，批評了“以黨代政”造成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章伯鈞在5月8日的發言中指出：選拔留學生，學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條件，有些有能力、有專長的人，常被認為歷史複雜而不能人選，非黨人士出國學習的機會不多。非黨幹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難，黨員提升得快，好像只有黨員才有能力，有辦法……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這是形成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

同日，章乃器在發言中要求中共檢查一下自己的“大黨主義”和“以黨代政”，並指出：

要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這樣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現在有一部分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有人批評了黨，明明提的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儘管是符合黨的政策，但是只要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

羅隆基在5月10日的發言中說：

現在各民主黨派都參加了政權，但是過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問題，往往都是在領導黨內討論以後才拿出來協商。他希望今後這些問題要在黨內討論的同時，也交民主黨派去討論，並由有關方面事前提供情況和資料。又說，現在黨決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過行政，而從黨的系統向下佈置，只能使擔任行政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感到有職無權。⁶²

對於“以黨代政”，章乃器在5月13日的書面發言中批評：“不但國家行政機構沒有被足夠地運用，國家權力機構也沒有被足

62 《中共中央統戰部邀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新華半月刊》1957年11期。

够地重視——縣以下的人民代表大會開會不正常和不充實的情況是嚴重存在着的。”他以比喻方式建議：

黨組織有如戲劇的編導，其他國家機構有如演員、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編導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應代替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這樣，黨組織可以使自己的頭腦更加清醒，領導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動。⁶³

上述發言都涉及中共的領導角色及黨派關係，章伯鈞5月21日的發言比較簡短，卻帶有對這些問題的總結性，並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方案——“政治設計院”：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⁶⁴

羅隆基在5月10日的發言中，還談到民主黨派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首先要解決民主黨派長期存在的問題。現在有些知識分子不願意參加民主黨派，怕別人說他“落後”，而願意爭取加入共產黨。有人問：加入民主黨派是否影響加入共產黨，如果有影響，就不參加。黨如果吸收了這樣的人入

63 章乃器：《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人民日報》1957年5月14日。

64 《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繼續座談》，《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

黨，不但影響黨的威信，而且勢必使民主黨派發展的人都是挑剔下的。共產黨在工農群眾中發展，而民主黨派就不能在工農群眾中發展，主要在舊知識分子中發展，而他們多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這個矛盾應該盡快解決，否則就很難共存下去。⁶⁵

這也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對於中共劃定的各民主黨派發展領域，民主黨派內一直有不滿情緒，1956年章伯鈞主張打破“防區制”、“包乾制”，民盟葉篤義主張將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四個黨派取消，另組一個知識分子的大黨。1957年3月民盟召開全國工作會議，章伯鈞提出要大大發展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可以發展幾十萬人，幾個民主黨派合起來可以發展一二百萬人，組織發展到縣一級。他提出，民主黨派的性質與任務要重新估價。上述這些觀點，後來被毛澤東概括為“黨要擴大，政要平權”。

中共一直將民主黨派定位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毛歷來關注的黨外動態重點，一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動向，二是民主黨派的動向，此時這兩個方面代表人物的言論，被認為是在向中共爭取更多的權力。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的言論固然“出綫”，但“出綫”更多的，則是《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關於的“黨天下”言論，他在6月1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提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並直接向毛澤東、周恩來喊話：

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

65 《中共中央邀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新華半月刊》1957年11期。

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⁶⁶

儲安平의發言，是在向毛澤東重申1949年建國時的聯合政府共識，觸及了中共與民主黨派關係的底綫。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都習慣於將國家名器視為戰利品，儲安平“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的言論，直接涉及到現政權格局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共絕對不能容忍的。

限於主題和篇幅，本文僅摘錄了關於中共與民主黨派關係的代表性言論。這些只是1957年“整風”中大量言論的一部分，在當時的報刊及丁抒的《陽謀》、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等著作中都有收錄，為緊扣主題，不再一一詳述。

7. 形勢失控與中共轉舵

對於整風，領教過1942年延安整風的黨內幹部大都心有餘悸。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都有抵觸情緒。“整風”發動前，劉少奇在上海對黨內幹部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低調講話，除對毛的觀點進行詮釋外，對社會分配、等級制度造成的差別也表示了不安。但劉力圖淡化矛盾，認為鬧事“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質的切身問題”，屬政治性質的“很少發生，也不容易發生。”他主張以溫和方式化解批評，“要允許小民主。不允許小民主，勢必要來個大民主。”他試圖分散批評的焦點，認為“官僚主義，上面有責任，下面也有責任”，“還有很多事情不是部裏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廠、基層單位應該負一定的責任。”⁶⁷

66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67 劉少奇：《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04—306頁。

民主黨派代表人物的言論，影響迅速波及全國。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的批評，更廣泛地涉及政治、外交、經濟、司法、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毛澤東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來衝擊官僚體制，卻產生新的兩難境地：如果批評之火僅燒到毛點名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衛生等幾個國務院部級單位，甚至國務院本身，或者出幾個“小匈牙利”，似乎都在可控範圍之內。“大民主”危及到黨的一元化領導，或許是他始料所未及。儘管捲入其中的絕大部分人從未想過要推翻共產黨，而是要求政治改良，實踐執政前的民主諾言。但青年學生與民主黨派人士合流的迹象，也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民主黨派人士鳴放，尚能坐而論道，不失雍容氣度。青年學生卻是熱血沸騰，群情激昂，抨擊時弊不遺餘力。學生們的言論不受黨派關係和社會地位的約束，廣泛涉及前輩們尚未問津或不敢直道的領域。北大學生領袖譚天榮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一種新穎名詞”，“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一切無自由”；他指責《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主張實行全民直接選舉，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學生們結成各種社團，編印各種刊物，並主動與民主黨派人士聯絡以尋找“領袖”。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形容當時的校園氣氛說：這好像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夕。

李維漢每天向中共中央常委匯報運動的情況，據他回憶：“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着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⁶⁸ 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清華大學黨委常委袁永熙曾透露：“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麥克法誇爾等西方學者認為，毛在黨內的巨大壓力下改變了主意。

6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4頁。

作為擅長運動戰的謀略大師，毛澤東的思維模式往往是“草鞋無樣，邊打邊象”，“猴氣”十足，隨時可以拆掉重來。他並非一貫料事如神，觀察他從“整風”、“反右”乃至“文革”的行至，雖有戰略目標，但失算之處也不少，而從戰術上則變數甚多，足以左右逢源，轉敗為勝。

毛澤東慣用的權術，是利用中央號令地方，利用地方挾制中央；利用黨外制衡黨內，利用黨內壓制黨外。當他的黨內權力受到威脅時，會偏右一點，以借助黨外力量壓制黨內；當黨外力量上升時，會偏左一點，贏得黨內支持一致對外。

在黨內權力制衡關係中，毛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各中央局和省級幹部，這些人憂心如焚，呼籲他將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在中央高層中，對“整風”的看法雖未盡一致，但對於“反右”的看法卻空前一致，因為這關係到政權。5月1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了“反右”決定。毛澤東的英明決策，使被“大民主”燒得寢食難安的各級領導如降甘霖，得到從中央到基層的一致支持。他的個人權威也開始重新樹立。

對毛澤東而言，“大民主”是一把兩刃劍，既可用於黨內，又可用於黨外，劍柄則操之於己。“蛇”被引出“洞”後，是“放蛇咬人”還是“斬蛇七寸”，完全根據形勢需要而定。重樹黨內個人權威和整肅民主黨派，都是其戰略目標。這兩個目標後來都實現了。

8. “反右”的策略與部署

作為群眾運動大師，毛澤東善於利用形勢實現自己的目標。“整風”急轉“反右”之後，很快把“右派”書生們打得落花流水。關於“反右”的全過程及毛的有關論述，本文不贅述了，僅觀察毛澤東利用民主黨派內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若干關鍵細節。

6月3日民主人士座談會結束時，毛澤東在統戰部長李維漢的總結發言稿上加了一句話，說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

是錯誤的”⁶⁹。

另據毛澤東的文膽陳伯達晚年回憶：

我的印象，整風開始以後，李維漢代表統戰部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民主黨派中一些人的發言，認為這些發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錯誤的。統戰部的報告對毛主席有較大的影響。後來民主黨派互相之間也出現矛盾。黃炎培給我打了個電話，要求約我談話。我過去沒有單獨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談過話，這件事我自己不能作主，就去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說：“你可以和他談，但時間不要太長了。”黃炎培主要和我談了章乃器的一些情況，對章乃器很有意見。談話以後我向毛主席作了匯報。⁷⁰

據黃炎培1957年6月5日的日記記載：

下午四時半周恩來總理來談：

鳴放中央結束期

對鳴放的看法 我答應續向基層展開

毛主席繼任問題

世界大勢

夜九時半(我已入睡)毛主席邀談，共陳叔通三人在頭年堂談到十二時二十分退。

鳴放中發見種種，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

章伯鈞反動語

他和羅隆基勾結了 民盟 毛主席希望我去，答走不進

……

我們延安的談話，更要不忘平生之言，惟君子能之。⁷¹

6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5頁。

70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48頁。

71 《黃炎培日記》(未刊)，1957年6月5日。

他所記載的周恩來、毛澤東談話要點中，“毛主席繼任問題”當指不久前黃與陳叔通聯名上書，懇請由毛繼續擔任國家主席；而“民盟 毛主席希望我去”，顯然是毛澤東改組民盟領導層的一着棋。黃曾是民盟發起人之一，後又於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他知道去了不會受歡迎，才“答走不進”；至於“我們延安的談話，更要不忘平生之言，惟君子能之”，當是1945年7月兩人作著名的“窯洞對”時某些未披露的約定。毛當時自稱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路——民主，但此刻的談話，卻仍在受“周期律”的支配。

這場密談給所謂的“章羅同盟”以及章乃器的政治前途定下了調子。毛的旨意在民主人士的小圈子內迅速傳播並得到呼應。次日，在民盟的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安排下，章伯鈞與曾昭掄、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吳景超、陶大鏞六位教授座談，史良、閔剛侯在座。與會的教授大多認為形勢嚴重，章伯鈞提出：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出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要幫助黨。⁷²

上述內容不是原始的會議記錄，而是閔剛侯事在後7月4日《人民日報》上的揭發。其實當晚史良即向周恩來作了匯報，並被毛澤東作為民主黨派插手學潮、向中共奪權的證據。

1957年6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點明：“各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較大，大約有百分之十以上，霸佔許多領導職位。”⁷³毛澤東將打擊重點放在成員以高級知識分子為主的民主同盟，並在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

72 閔剛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1957年7月4日。

73 毛澤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1957年6月1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503頁

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中，羅織出“章羅同盟”這個名詞，以影射民主同盟：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黨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護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⁷⁴

當時選擇民主人士中的重點打擊對象，也有一定的選擇性。以被毛澤東稱為“右派的老祖宗”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為例，情況有所不同而又有所相同：章伯鈞注重黨派工作，大部分時間在民盟、農工主事，很少到交通部上班。羅隆基對政治興趣濃厚，但在民盟內是非主流派，盟務插不上手，對在森林工業部部長的工作一直很消極。章乃器屬於專業人士，與章伯鈞、羅隆基工作旨趣不同，嫌民建內部是非太多，多次表示要退出，幾乎每天都在糧食部上班。

這三位“大右派”的共同特點，是年富力强有主見。章伯鈞、羅隆基在民盟分屬左、右兩翼，關係緊張，但都屬於少壯派，平時好發表政見，毛澤東便製造出“章羅同盟”，一釜烹之。章乃器在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經常與中共“唱對台戲”，在民建、工商聯內則與黃炎培、陳叔通長期不和。毛澤東便親自深夜召見兩老面授機宜，利用矛盾將章乃器扳倒。

年老的即便有一些“出綫”言論，只要有特殊人事關係或及時轉向，則可以保護過關。如黃炎培一直被毛澤東視為“右派”，整風中發表《幫助共產黨種牛痘》，被李維漢保下；許德珩在九三學社被鬥爭，但痛切檢討，獲保過關。“戴帽”也與進言方式有關，

74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5頁。

例如無黨派人士張奚若，曾在座談會上不點名地公開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言辭雖然激烈，令毛澤東耿耿於懷，但沒有劃“右派”；而民革中常委陳銘樞以私人書信向毛澤東進諫，直接批評他“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的”，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難周”；兩人話雖類似，陳卻被頒賞了“右派”頂戴。

大多數遭受批判的“右派”被迫認罪，但個別民主黨派人士則拒絕誣服。例如羅隆基堅決否認“章羅聯盟”的存在，並因此與認罪的章伯鈞發生爭執；章乃器宣稱自己“心安理得，輕鬆愉快”，“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別人給我戴右派的帽子”，並在光明日報社的會議上為章伯鈞、儲安平辯護，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指責周恩來有負公誼，在檢討中重提反對“個人崇拜”；周恩來曾召見龍雲，要他承認與陳銘樞結成了“龍陳聯盟”。如其應允，則保證生活待遇一切不變，被龍雲斷然拒絕。對此，毛澤東說：

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們人數很少，擺到那裏，擺他幾十年，聽他怎麼辦。⁷⁵

一些拒不認罪的“右派”，在運動後期被定為“極右分子”加重處理，如民建的章乃器和民盟的彭文應等。

9. 民主黨派領導層的改組和對“右派”的處置

在“反右”狂潮中，一些被保下來或屬於“左派”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從維護民主黨派自身地位出發，也對過火的鬥爭表達了不滿和擔心。據李維漢回憶：

75 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89、491頁。

黃炎培在六月十五日表示不要樹敵過多，要把有可能拉過來的人拉過來，而不要把這樣的人推到反黨這一派那裏去。陳叔通在六月中旬說：不能因對黨提了意見就作為右派。黨的某些領導人沒有掌握好這一點，現在問題很嚴重。邵力子說，現在有許多問題處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難，失人心很易，表示對民革中央的反右派鬥爭要來個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贊成把揭發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報上，擔心這樣做運動搞得很大。六月下旬，李濟深表示他要在人大大會上發言提出不要驕傲自滿，困難還很多，還要努力。⁷⁶

隨着“反右”運動的深入發展，對“右派”的處理問題也開始提到日程上來。7月7日下午三時至晚九時，由周恩來主持在政協禮堂召開了一次民主黨派負責人會議，就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黃紹竑、陳銘樞、龍雲等的處理問題進行磋商，並討論了蘇聯撤消莫洛托夫、馬林可夫職務的案例，會上曾有人提出將這些人及學生中的“右派領袖”全部判刑勞改。

為貫徹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於7月11日批發了《中央統戰部關於劃分左、中、右的標準的建議》，先將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劃分大、中、小，再細分左、中、右；除左派外，中派區分為“中左”、“中中”、“中右”，右派中再劃分出“極右”，可謂不厭苛細。同日中共中央還批發《中央統戰部關於幫助民主黨派整風的意見》，這個文件評估說：“尤其是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九三學社的許多領導機關，是右派分子佔優勢，或者雖然不是右派分子佔優勢，卻因為我們工作上的缺點和其他原因而被右派分子所控制。”提出要“改造組織，使左派和中左取得領導優勢，真正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和監督。”

9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統戰部關於幫助各民主黨派貫徹反右派鬥爭的意見》進一步上綱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

7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8-839頁。

以後，各民主黨派內部逐步形成了一條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該文件將鬥爭策略繼續細化，提出“要在全部領導人員、機關幹部和一般成員中廣泛地發掘右派分子。應當趁着目前反擊右派的浩大聲勢，擴大戰場，把右派分子盡可能發掘出來，加以批判，而不要被少數死硬分子纏住我們的手腳。等於這些死硬分子，要採取伐大樹先刨根的辦法。在已經把他們搞得相當臭了的時候，可暫時放在一邊，先清掃他們的爪牙和據點，搜集了彈藥，再對他們進行戰鬥。”這樣的口脛，顯然不再像是對待聯合政府中的盟友。

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確定了劃分“右派”的六條標準。在當時“寧左勿右”的形勢下，各地層層加碼，很快突破了政策界限。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五部門1981年的報告，有的地區、單位打擊面佔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⁷⁷

同年12月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處理意見，絕大部分是撤職或降低職務。劉少奇在1957年12月13日接見部分與會人員時，針對當時普遍掌握政策過“左”的現象說：

當前黨的統一戰綫，“左”傾的危險是主要的還是右傾的危險是主要的？恐怕還是“左”傾的錯誤更容易犯。現在“左”一點大家都贊成，說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對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現得很“左”，黃炎培也不贊成留章乃器，似乎黃炎培卻成了“左”派……現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

他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很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習慣、世界觀，這些很難改，有些人，如史良，立場是比較堅定

77 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 公安部、民政部《關於處理反右派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報告》(1981年7月28日)。

的，也經過考驗，在右派大鬧時不同右派一道，但她的生活方式、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劉在談話中還解釋了“長期共存”和對“右派”的區別對待問題：

長期共存不變，但對右派就不能說長期共存了，至少是疑問，是否長期共存，還要看；有些則已肯定不能長期共存，如被開除、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的一部分右派就不能長期共存了。全國右派×萬多，開除、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的是多數，安排的是少數。右派中馬上不能長期共存的是多數，黨員中的右派一律開除，黨內右派不能長期共存。還有一些右派還要安排，還留在統一戰線內部，安排了以後還有看以後如何……

右派是反對派為什麼還要安在統一戰線內？有些右派是要安排的，安排的是大小頭面人物，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安排他們是表示我們如何對待這個階級。一不坐班房、二不勞改，有工作有飯吃，還有點政治地位，這主要不是為了幾個右派，主要是使中間派、他們的階級放心，當然也是為了分化右派。安排也要有條件，至少反動的話不再公開的講，只有在房間尿桶角落裏去講。龍雲在常委會上講就被碰了回去，梁漱溟公開也講好話了。以後如果再發現右派言論，再鬥就是了。安排也是有條件的，一方面安排，一方面要有所表示，要低頭認罪，不表示的還可等待一下。

劉提出：“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是頭面人物，要安排。”⁷⁸對這三人處理的底案是：撤消國務院部長和人大職務，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章伯鈞還保留政協常委。

劉少奇談話的前一天，即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民主黨派改組各級領導的意見》，提出：“現在，各民主黨派不只是

78 劉少奇：《關於統一戰線政策方針的若干問題的談話紀要》，人民出版社資料室：《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45.8—1957.12），1967年版，第695、698—701頁。

要進一步清算右派的政治路綫，還必須清除他們在各級領導機構中的政治影響，剝奪他們的領導權，建立和鞏固以左派為核心的實際領導，實行各級領導機構的改組”。

1958年1月，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或代表會議，按照中共的要求制定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處理黨派內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開始對本黨派中央機構和地方組織中的“右派分子”作出組織處分。

1月31日，毛澤東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撤消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的部長職務。同年2月，一屆人大五次會議召開，章乃器等54人失去了出席會議的代表資格，會議罷免了黃紹竑、龍雲、陳銘樞的人大常委職務，同時罷免了“右派分子”在國防委員會和其他人大專門委員會中的職務。這些人在民主黨派中的領導職務也被撤消。

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統計，被劃“右派分子”者約佔各民主黨派成員總數的百分之十；在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一級的領導人中，約共佔百分之二十強。⁷⁹其中以民盟受創最重，據《1957年的春天》一書披露：“右派”人數約佔全國盟員總數的7%，中央委員的29%，候補中央委員的43%，中央常務委員的36%以上，被劃為“右派”；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廣東、江蘇、陝西等省市及武漢、重慶、濟南、青島、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的地方組織，據稱“被右派集團篡奪了全部領導實權”而遭整肅。⁸⁰

民主黨派中“右派分子”的組織處理方式是：對1956年“三大改造”高潮以後吸收的成員中的“右派”，一般均採取清洗出黨的處理方式。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1959年1月的統計，“各民主黨派共清洗了約七千餘人”。⁸¹而對1956年以前的民主黨派原有成員，

79 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派處：《民主黨派的歷史道路》（草稿），1959年。

80 遲夢洲編：《1957年的春天》，學習雜誌社1957年版，第74頁。

81 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派處：《民主黨派的歷史道路》（草稿），1959年。

則一般採取黨派內部處理：撤消領導職務，給予紀律處分，並繼續監督改造，只有極少數人保留在民主黨派中央領導機構中。

據李維漢披露：1958年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會同中宣部、中組部等有關部門選擇了比較知名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為標兵，提出了《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報中央轉發各地參考。其中絕大多數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或實行監督勞動，只有二人免受處分。⁸² 同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根據情節和認罪態度，將薪給人員中的“右派分子”分為六類：(1)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或自謀生活；(2)撤消原有職務、監督勞動，或自謀生活；(3)撤消原有職務、留用察看並降低待遇，或自謀生活；(4)撤消原有職務，另外分配待遇較低的職務；(5)降職降薪，撤消一部分或大部分兼職(6)免於處分。

這個文件還強調各單位留下一部分、學生中留下大部分“右派分子”作為反面教員的必要性，同時指示：“右派分子”中有“現行反革命活動”或犯有刑事罪的，“都應當按現行反革命分子或者刑事犯罪分子依法處理，不按右派分子處理”。⁸³

被劃為“右派”的民主黨派成員、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絕大多數遭到撤職、降級、降薪、勞教等處理，全國“右派”半數以上失去公職，部分學生在運動後期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勞改。

10. 民主黨派淪為改造對象

在對“右派分子”作出組織處理後，中共中央指示“對他們應該有計劃地進行教育工作，這不單能夠更進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也會更好地爭取中間分子”。對“中央一級民主人士”中的“右派

⁸²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8頁。

⁸³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1958年1月30日。

分子”，中共中央統戰部曾佈置各民主黨派及專人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方式上，可以擬定名單分工個別交談；可以召開小型會議和大型會議；或採取其他方式”⁸⁴。中共中央統戰部還安排這些人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但個別“右派”如章乃器、譚惕吾則拒絕參加。

按照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部署，各民主黨派還通過了《關於在各民主黨派內部進一步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以徹底清算“右派路線”的影響，這些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友黨”也變成了“整風”對象。

這個伴隨“大躍進”高潮啟動的後續運動，被稱為“一般整風”，實際上是“反右”的繼續和深入，很多人不敢發言，怕成為“右派”。於是中共公開宣佈“一般整風”中，“對於被揭發出來曾經有過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除情節特別嚴重、態度很惡劣、因而引起多數人公憤的分子，應當帶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對待以外，其他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對待，但應當進行嚴肅的批判”，號召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向人民講真話，把心交給人民”，⁸⁵掀起了一場“交心運動”。

中共中央統戰部曾如是記述“交心運動”：

各民主黨派在交心運動中，貼了大量的中字報，通過自我揭發和相互揭發，深刻地揭露了中間派同社會主義相矛盾的陰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間派不符合六條政治標準的各種錯誤思想和言行。各民主黨派在一般整風中，又對成員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種問題，作了分類排隊，進行“梳辮子”，大辯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幫助成員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根本問題上，進一步劃清界限，提高認識。總起來說，交心運動是民主黨派成員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的一次總暴露，當然，從他們交

84 《中央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進行工作的意見》，1958年3月7日。

85 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派處：《民主黨派的歷史道路》（草稿），1959年。

出的問題看，表明他們中許多人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是基本上沒有拋棄資產階級立場，這正是他們在右派進攻中向右搖擺、同情、附和右派反動言論的階級根源。⁸⁶

在人人過關的“交心運動”中，又有一批人被補劃為“右派分子”，或內定為“中右分子”控制使用。

各民主黨派在開展“交心運動”的同時，又在其成員中掀起一個制定“自我改組規劃”的熱潮。人們紛紛表示決心繼續改造，向“又紅又專”的目標前進。1958年3月16日，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通過了《自我改造公約》，並舉行萬人大游行，以表示改造和效忠的決心。參加大會和游行的有：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主席沈鈞儒、民建主委黃炎培、致公黨主席陳其尤等。這一表態形式被迅速推廣到全國，各省市都舉行了類似的集會。

如果說“整風——反右”在運作形式上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那麼，“交心運動”實際上是“觸及人們靈魂”的預演。從“反右”到“交心運動”，徹底蕩盡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真話資源，最終形成了中國社會特有的“表態文化”。

“反右”過後對民主黨派的評價，與此前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1956年3月起草的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決議，“各民主黨派已經基本上成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團體”⁸⁷，但在1958年7月18日該部提出的《改造民主黨派五年工作綱要》(修正稿)中，卻將民主黨派定位於“半反對派”：

各民主黨派反映着它們的階級基礎的兩面性，同我黨存在着階級矛盾和兩條路綫的鬥爭，對於我黨和政府說來，基本上是半反對

86 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派處：《民主黨派的歷史道路》(草稿)，1959年。

87 《1956年到1962年統一戰綫工作的方針》(1956年3月3日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決議)。

派。但是，除了右派分子之外，這種矛盾一般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⁸⁸

《綱要》將“繼續深入政治路綫和思想戰綫上的新革命，推動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加緊進行對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為實現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服務”列為今後的任務，並認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也是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這場階級鬥爭中同我們較量的主要對手”。

這個文件認為：“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經日漸削弱”，“作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它們在這一方面對我黨的輔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加強了”。文件制定了具體的“組織整頓”步驟，以實現“壯大左派、團結中間，孤立右派”的目標。⁸⁹從1950年代初的“以進步為骨幹”、“團結中間分子，爭取右翼分子”，到此時的“壯大左派、團結中間，孤立右派”，反映出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的改變。

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在“反右”後迅速跌落，只是作為“政治花瓶”繼續存在，留任和新任的民主黨派領導人表現得十分馴服。1959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部長名單中，黨外人士比例由上屆的37%降至22.8%。《光明日報》、《文匯報》等民主黨派報紙在“反右”以後相繼被收編，某些專題新聞的審批權由黨中央專門機構行使。

1959年是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作為一種恩典，中共於9月14日特赦了一批在押的國民黨及偽滿洲國“戰犯”。對於兩年前的“反右”，中共高層內部也承認打擊面過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於1959年9月19日下發《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開始分批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自1959年至1964年，前後共“摘帽”五批。

88 中共中央統戰部：《改造民主黨派五年工作綱要》（修正稿），1958年7月18日。

89 同上。

11. 走向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工業化，是建設現代化國家必備的兩隻車輪。致力推行工業化，抵制實行民主化，這就無法實現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化。以1957“反右”為分水嶺，開始了一段跛行的歷史：共和國的民主建國理想和聯合政府共識被摒棄，走向一黨專政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

毛澤東通過“反右”整肅民主黨派的同時，不少中共黨員也在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黨外民主的消滅，令黨內民主隨之失聲。毛澤東乘勝追擊，將“反右”轉為黨內“反右傾”，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了清算，並公開宣揚個人崇拜。他重新掌握經濟工作的主導權後，於1958年發動“大躍進”並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災難。

“反右”導致了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政治理論重新登台，在1957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宣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⁹⁰這就推翻了中共“八大”確認的“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斷。他在1958年春又提出國內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的新論點，將“右派”和地、富、反、壞列為第一個剝削階級，將已交出生產資料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列為第二個剝削階級。重提階級鬥爭理論使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日益向左傾斜。

“反右”也導致了國家法制建設的倒退，中共中央於1958年6月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規定“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⁹¹

90 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頁。

91 轉引自趙向陽：《艱難的跋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頁。

在公開宣佈“黨政不分”和政府機構向黨負責的同時，法院和司法部門也被明確規定，“全部審判活動，都必須堅決服從黨委的領導和監督黨委有權過問一切案件……任何借‘審判獨立’，抗拒黨委對具體案件審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⁹²劉少奇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毛澤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的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⁹³刑法、民法、訴訟法的制定工作因此停止了。到1959年，國家監察部、司法部同時被取消。監察部的職能由中共中央監委行使，律師制度也告消亡。

“反右”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並助長了一種貶低知識的社會價值取向，毛澤東公開宣揚“知識分子最無知識”的蒙昧主義。大批“翹尾巴”的知識分子被降職降薪，派去從事體力勞動。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被認為是不可靠的，腦力勞動成為危險的職業，到後來竟然推演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謬結論。幹部的選拔日益注重階級出身的標籤，而忽視知識才具的考核，形成一種淘汰精英的人事機制。對知識的社會價值的貶損還導致了知識分子經濟地位的下降，使之日漸淪為社會的賤民。

“反右”令“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科學與民主”的精神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打斷了民族的脊梁，使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在強權面前日益萎瑣。從此，個人專斷代替了集體領導，外行指揮代替了科學決策，群眾運動式的冒進蠻幹代替了穩健有序的建設。在這種氛圍下，即使是計劃經濟下的工業化，也不可能正常進行。

92 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頁。

93 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內有劉少奇的插話），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109頁。

12. “右派”對“大躍進”的批評

毛澤東通過“反右”消滅了黨外民主，隨後發動“大躍進”，造成巨大的經濟災難。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又發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使中共的黨內民主遭受重大挫折。在“大躍進”的錯誤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右派”有許多私下的批評。據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披露：

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對去年大躍進和當前市場供應緊張情況憂心忡忡，持有批評性的看法。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性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說，19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於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⁹⁴

對此，毛澤東於在廬山會議上反唇相譏：

張奚若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麼不好呢？去年1900個項目，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

94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要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左中右，總有所偏，只能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沒有一點志氣，還是不行的。還是要偏聽偏信，要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而不能偏聽偏信資產階級。再過10年到15年趕上了英國，那時陳銘樞、張奚若這些人就沒有話講了。這些人希望他們長壽，不然，死了後，還會到閻王那裏去告我們的狀。⁹⁵

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也將他與民主黨派中的“右派”及明朝的海瑞相提並論：

我跟你說過，你是個民主人士，而且是個不甚好的民主人士，比程潛差一點，與章乃器也許近似，也難說。現在聽說海瑞在你們裏頭。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中的大官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着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說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只聽一方面的。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⁹⁶

在1960年代初的經濟困難時期，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有短暫的鬆動，對政協、民主黨派活動提倡“神仙會”的方式，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民主黨派人士中出現了公開的批評。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會”前後，章乃器在政協座談會上多次批評不按經濟規律辦事、

95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57-58頁。

9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309頁。

“大躍進”頭腦發熱、經濟發展失調、國家經濟陷入嚴重困難、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問題。他在發言中指出：

國家三年經濟困難的發生，非一日之寒。我看了最近一篇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很有感慨！當然，這篇文章的內容是總結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的。但我以為，作為執政黨和本屆政府，如果真正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找出發生錯誤、造成後果的原因，你《人民日報》作為黨報，僅僅寫一篇文章是不行的！你應該寫十幾篇、幾十篇這樣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後果搞明白，真正找出發生問題方方面面的癥結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氣順，今後才不會再誤入歧途，誤國禍民！⁹⁷

隨着1962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重提階級鬥爭，政治上的寬鬆成為曇花一現。章乃器再度遭到批判，被指“繼續堅持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立場”，“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實屬屢教不改、頑固不化”，於1963年被民建開除會籍，並撤消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以這一事件為標誌，民主黨派的批評就此沉寂。

13. “文革”衝擊下的民主黨派

“反右”整肅了民主黨派，不僅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徒托空言，也使社會矛盾集中到中共自身，政治鬥爭的重點逐漸轉移到了黨內，資產階級已成為改造、專政的對象，僅存政治宣傳上的假想敵價值。1959年的“廬山會議”重創黨內民主後，歷經“七千人大會”到“四清”，權力鬥爭愈演愈烈。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名義進行的“階級鬥爭”，毫無例外地以揪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為目標。自相殘殺的黨禍，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性內亂。

97 汪東林：《1963年章乃器被撤消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北京政協》1998年第7期。

從運作手法上看，“文革”與“反右”的共同特點，是毛澤東通過“大民主”，重新樹立了個人權威。毛認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認同民主是現代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生活方式。正常的遊戲規則一旦破壞，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就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反右”在某種意義上是“文革”的預演，只不過後者的破壞規模和烈度更加廣泛和嚴重。

挑動群眾鬥群眾、幹部整幹部、群眾鬥幹部、幹部整群眾，是毛澤東的慣用權謀。“反右”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包括部分黨內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而“文革”的打擊對象則是黨內“當權派”。“反右”的受益者後來也往往成為“文革”的受害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8月23、24日，一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自25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陸續貼出“通告”，表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

隨着紅衛兵運動的狂潮從北京向全國各地席捲，民主黨派人士橫遭抄家、批鬥、毆打、侮辱，民主黨派瀕臨滅頂之災。據章乃器自述：

八月二十五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虐我。門是開着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撓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裏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塗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⁹⁸

98 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華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619頁。

1966年8月30日，無黨派人士章士釗因遭到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凌辱上書毛澤東，毛澤東批示給周恩來“應當予以保護”，周擬定的“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中列出12位著名人士，包括何香凝、程潛、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民革)、沙千里(民建)，以及無黨派人士郭沫若、宋慶齡、章士釗、傅作義、張奚若，還有去年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這個名單的功能顯然十分有限，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未得到保護。

9月間，周恩來曾試圖通過中央文革小組和國務院的協調，制定運動中對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工商聯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但成效不大。10月3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禮堂對來京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講話中，批評了紅衛兵砸南京孫中山銅像和給宋慶齡貼大字報等錯誤行動，談到有人提出要關政協和民主黨派的門，不要政協，不要民主黨派時，周恩來說：“關一個時期是可以的，房子你們佔一個時期也可以，但不能永遠這樣，不能把東西搞壞。”並明確說“政協還是要的”，“毛主席還是政協名譽主席，我還是主席哪！”但仍未對民主黨派的存廢問題作出明確表態。10月24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的匯報時曾表態說：“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向紅衛兵講清楚。”⁹⁹但中共高層當時忙於權力鬥爭，上述毛、周有關民主黨派的指示和表態，均未有下文。

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在長沙與湖南省軍政領導人卜占亞、華國鋒談話時，曾談及民主黨派存廢問題，他說：“你們對民主黨派的問題要研究研究，看還要不要？”“民主黨派還要存在。有的地方說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對民主黨派來說，他們沒有搞翻案，他們也沒有發指示。作為民主黨派來說，還是可以存在的。”還說：“應該把民主黨派的牌子都掛起來。”“把民主黨派搞掉了，有什麼好處呢？一個‘拖’字解決不了問題，存在的問

99 轉引自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黨派》，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1998年十月號。

題在他們掛起牌子以後，可以再了解、再調查、再處理嘛。”¹⁰⁰

不久發生轟動全國的林彪事件，中共的對內政策出現鬆動。1971年9月，周恩來指示讓下放到全國人大、政協機關“五七幹校”勞動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返回北京；年底中共中央在京召開上層愛國人士座談會，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揭批林彪、陳伯達的文件及林彪事件後的若干重要措施。會議期間，周恩來詢問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體和生活情況，肯定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國共產黨的“評友”，但是並未提及民主黨派恢復組織活動的事。直到“文革”結束，報刊的報道對民主黨派人士皆以“愛國人士”相稱，基本上不出現“民主黨派”字樣。

民主黨派人士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情況，本文無法盡述，茲列舉幾個不完全的名單。1968年8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等提出了《關於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其中被列為有各種嚴重問題或嫌疑的民主黨派人士有：張治中、梅龔彬、王昆侖、唐生智、陳劭先、朱蘊山、朱學範、劉斐、趙九章(民革)；高崇民、胡愈之、史良、梁思成、劉清揚、楚圖南、薩空了、吳鴻賓(民盟)；胡厥文、胡子昂、孫起孟、孫曉村、鞏天民、寸樹聲(民建)；車向忱(民進)；陳其尤(致公黨)；茅以升(九三學社)等。

1980年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起訴書》中，列舉了遭到迫害的民主黨派領導人：鄧寶珊(民革)、高崇民、吳晗(民盟)、孫起孟(民建)、車向忱(民進)、周谷城(農工)、潘菽(九三學社)。被迫害致死的有：黃紹竑、梅龔彬、楚溪春(民革)、高崇民、劉清揚、潘光旦、劉王立明(民盟)、劉念義、王性堯、唐巽澤(民建)、許崇清、李平心、陳麟瑞(民進)、鄭天保(致公黨)、王家楫、劉錫瑛、張璽(九三學社)；王天強(台盟)等。

這些遭受迫害或迫害致死的人士名單中，尚不包括被劃為“右

100 毛澤東：《在長沙與華國鋒、卜占亞、汪東興的談話》(摘要)，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文革指示談話匯編》。

派”的著名民主黨派人士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黃琪翔、曾昭掄、潘光旦、林漢達等很多人，以及大量基層幹部和一般成員。

14. 民主黨派人士在“文革”中上書言事

“文革”中，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憂心國事，曾以不同方式上書言事。習慣於做調人的無黨派人士章士釗，曾於1967年寫信給劉少奇，勸其“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毛澤東)之門，長跽謝罪”，“相與化豺狼於玉帛，易戟指為交心”。¹⁰¹但毛澤東在看到上書後(章另有致毛澤東的信函)，於3月10日回覆說：“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¹⁰²

章乃器在1971年3月10日曾有致周恩來的萬言書信，指出多年來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曲解，給國家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協商制度造成了破壞，導致了嚴重的惡果。他批評“血統論”和“唯成份論”是“在專政的名義下掩蓋着不利於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圖”；同時對國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評，要求“適當放寬新聞封鎖和縮小保密範圍”；又舉巴黎公社頒佈的法令為例，說明革命專政不應與暴力割等號；還要求保障“專政對象”的人權，批評信訪部門拒絕這些人上訪的錯誤。他指出民主黨派中政治學習“完全陷於表態的導演和說話的技巧”，並對政治高壓下“虛偽竟成為風氣”的社會現象發出譴責，對“文革”中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以及剝奪無罪者自由的勞動教養制度提出嚴正指控：

我們都有為自由而鬥爭的經歷，應該記得不能無故剝奪別人的自由的教訓。“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在民主革命中曾喚起那麼多的先烈拋頭顱灑熱血，這難道應該忘記嗎？現在有些人對於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認為是自由主義，從而又把無端

101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香港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5頁。

102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第136頁。

限制乃至剝奪別人的自由作為反對自由主義的措施，無疑是十分錯誤的，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¹⁰³

1972年10月，民盟中央副主委胡愈之、民進中央副主委楊東莼、民盟中央副主委楚圖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部長薩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民盟中央常委沈茲九(胡愈之夫人)等，通過民盟中央委員、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員周世釗商議，向毛澤東上書言事。胡愈之將要談的問題歸納為廣開言路、教育問題、青年問題三個方面，避開敏感的外交、文藝問題，並確定由胡愈之、周世釗、楊東莼分別進行準備。周世釗通過王季範之女、當時在毛澤東身邊擔任翻譯的王海蓉，向毛澤東表示“晉言”的願望。

10月2日晚，周世釗在王海蓉陪同下覲見毛澤東，當面呈交了他於8月5日所寫的長信。信中談了八個方面的問題：嚴懲林彪集團中罪行特別嚴重的頭目；落實幹部政策；解放知識分子；總結解放軍支左的經驗教訓；青年教育問題(包括恢復共青團、少先隊)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嚴重後果；恢復尖端科學研究，除恢復理工科大學外還要恢復文科大學；開放書禁，改變青年工人、農民和學生除政治理論外沒有其他書可讀的狀況；設立受理群眾申訴的機關，健全法制。周世釗向毛澤東反映了對當時形勢的一些看法，長談了三個小時，並轉達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見面晉言的願望。毛澤東指定汪東興去聽取意見。

10月3日下午至10月5日下午，汪東興聽取了這幾位民主人士的意見(其間華國鋒也來聽過)。胡愈之着重談發揚民主、廣開言路的問題；周世釗着重談教育問題；楊東莼着重談青年問題。胡愈之在談話中明確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下恢復民主黨派的活動，即使是恢復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動也好，並提出恢復由民主黨派辦的報紙。¹⁰⁴

103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第231頁。

104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黨派》。

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的身份比較特殊，在民主黨派中均屬“左派”。根據已知材料，胡愈之、薩空了、李文宜、沈茲九是民盟中的中共秘密黨員，楊東莼是中共早期黨員，楚圖南早年曾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周世釗是新民學會會員，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時與毛澤東同學。據楚圖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記述：“據說這些問題都被詳細記錄下來，並上報了，但卻無結果，並且得到相反的反應。”¹⁰⁵

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政後，中共曾宣佈特赦全部在押戰犯，章乃器致函毛澤東，要求解決他的政治問題。經毛澤東、周恩來批示，由陳雲等出面約談，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中共高層當時曾準備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但由於不久即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後來又發生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等重大事件，此案被擱置了三年。

三、今生：尷尬的花瓶

1. “右派”的“改正”與“維持原案”

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反右”後嚴重下降，成為“政治花瓶”。“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動長達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恢復活動。

由於多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特別是“文革”中有相當數量的中共幹部、黨外人士、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遭到打擊迫害。中共痛定思痛，出於緩和國內矛盾的需要，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開始對“文革”、“反右”和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加以清理。

中共中央於1978年4月5日下發《〈關於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的通知》(中發[1978]11號)，宣佈摘掉全部“右派分

105 楚圖南：《與人照肝膽，見義輕風浪——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1986年1月24日。

子”的“帽子”，但這些人遭受的冤屈並未得到徹底平反。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門《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的實施方案》（中發〔1978〕55號），提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我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劃錯了的，儘管事隔多年，也應予以改正。”¹⁰⁶

經過反復斟酌，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下發《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發〔1980〕60號）。在復查的二十七人中，確定二十二人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他們是：章乃器、陳銘樞、黃紹竑、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劉王立明、沈志遠、彭一湖、畢鳴歧、黃琪翔、張雲川、謝雪紅、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潘大逵。其中健在的，僅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潘大逵六人。章乃器原定不予“改正”，後因家屬的申訴和中共高層的平衡，列入“改正”名單並修改了文件。¹⁰⁷

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他堅稱當時“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¹⁰⁸

根據這個定調，60號文件在承認“反右派鬥爭確實擴大化了”的同時，堅持認定“1957年確有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確有極

106 《中共中央〈關於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78年4月5日。

107 該文件下發時有兩處修改痕迹：一是將“改正”人數二十二人寫作二十一人，二是有“在復查查伯鈞、羅隆基的右派問題的過程中，民盟、民建的一些負責人曾提出對他們二人也應予改正”的文句。章伯鈞、羅隆基二人與民建沒有組織關係，兩處錯誤當是刪除對民建的章乃器“維持原案”內容時漏刪的。

108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7頁。

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猖狂進攻，對這種思潮進行批判，對這種進攻進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報告推翻了毛澤東在1957年羅織的“章羅同盟”，但出於政治需要，對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五人，仍維持“右派”原案(其中前四人已逝世)，這五人全部屬於民盟。文件在談到“維持原案”的依據時說：

章伯鈞1956年就惡毒攻擊我們國家是“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統治着五億農民，非造反不可。”“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他說：“有在朝黨和在野黨，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要“輪流做莊”。1957年，他更露骨地說，“共產黨以前扶植各民主黨派，是‘周公輔成王’，現在成王長大成人了，周公要還政”，不然，“恩人就要變做仇人”。六月六日，他在以民盟中央名義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問題也大”，“形勢十分嚴重”，“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難辦了”。羅隆基誣毀國內是“一團糟”，他叫嚷要為反革命“平反”，煽動社會上的反動分子站起來“由各方面造成輿論”。儲安平把我們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有些右派分子把無產階級專政誣毀為產生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有人公開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叫囂“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制度”，甚至說要“殺人”，殺氣騰騰。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表明，他們的企圖就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¹⁰⁹

章伯鈞之女章詒和回憶說：在此文件下達的前一天，中央統戰部曾把章伯鈞夫人李健生找去談話(章詒和陪同)。談話大意是：

109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1980年6月11日。

“既然中央給反右定性為擴大化，那麼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頭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頭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鈞先生。”又說：“當年給章先生劃右的材料都不確實，從政治設計院到反對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輪流坐莊’則是程濟批判右派時說的，也被按到章伯鈞先生頭上。現在我們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孫大光的揭發材料。”說罷，問我母親有何感想。母親說：“對此決定，我只能服從，而不能贊成。”有關領導說：“服從就好。以後我們對您及章家會有所照顧的。”¹¹⁰

這裏提到的章伯鈞定性材料，是根據時任交通部部長助理的孫大光(中共黨員)1957年7月9日在《人民日報》上的揭發：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提出後，孫到章伯鈞的辦公室去找他，在談完工作上的問題之後，又談到黨的方針，當時章伯鈞很興奮地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早就有這個意見，我就是不講。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原注：那個時候全國是九百萬黨員)，統治着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當時，孫要他解釋一下，所謂一個上帝是指什麼，清教徒又指的是什麼？在孫的追問下他解釋說，上帝就是馬列主義，清教徒就是黨員。

這個材料不是章在1957年的言論，且系兩人私談無人作證，若據以定性，除非是承認動用過監聽手段，但也顯得不够光明。文件中列舉的其他材料，有的是“整風”以前的私下談話，或是內部會議上的發言，與“猖狂進攻”相去甚遠，以此定性維持“右派”原案，顯然難以服人。至於鄧小平談話及60號文件中所謂“右派”要“殺人”、“殺氣騰騰”的描述，實源於當時官方媒體關於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歪曲報道，後經胡耀邦指示中組部復查，葛佩琦的罪案已被徹底推翻。

對於被“改正”的人，60號文件在定性時也有所保留：

110 章詒和·《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今日名流》1997年第五期。

屬於改正的人大體上有三種情況：(1)一部分人出於善意，提出的許多批評意見，現在看來是利於改進工作的。把他們劃為右派，是完全搞錯了，當然必須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重大問題上，發表了一些錯誤言論，但在根本立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他們劃為右派也是錯誤的，也應該改正。(3)還有一些人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但是考慮到他們同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節上有所不同，也考慮到他們後來確有轉變，在這次復查中，也給他們改正過來。因此，成當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但其中有些人是屬於可改正可不改正的，這次本着從寬的精神予以改正。

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上，對錯劃的“右派”都只講“改正”，以區別於對其他冤假、錯、案的“平反”，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堅持“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文革”中被扣發工資的幹部，工資都是全額補發的，而根據55號文件的規定：“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的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但不補發工資。”這也是對“右派”實行區別對待的一種體現。

據負責“改正”工作的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五部門統計：當時有二十一萬人被開除公職；降級留用的，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加重了處理。到1978年，原劃右派中除亡故的五萬五千餘人外，只有十六萬人有工作。據不完全統計，有三十餘萬人需要妥善安置。截至1980年底，全國共改正了五十四萬人，佔原劃右派總數五十五萬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八的人屬於可改正可不改正本着從寬精神予以改正的。對失去公職的二十七萬人，恢復了公職，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對原來工作安排不當的作了調整。另外，對被劃為“中右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三十一萬五千餘人以及受到株連的親屬，也基本落實了政策。¹¹¹

111 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 公安部、民政部《關於處理反右派鬥爭遺留問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也證實：“已改正的五十四萬餘人（其中有些是從寬處理的），維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還在陸續甄別。”¹¹²

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個官方數字，約佔當時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總數（五百萬人）的11%。但這個數據一直收到質疑，如將補劃的“右派”及內定的“中右”、“反社會主義分子”等計算在內，受到迫害的人數遠遠大於此數，而且還不包括他們的親屬。

2. 重燃的政治熱情與“六四”事件後的轉向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關節點上，諸如1945-1946年的國共和談、1957年的中共整風、1989年“六四事件”中，民主黨派曾試圖扮演調停緩衝的角色，但並不成功，甚至不受歡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的治國方略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工作為中心”。1980年代初，隨着國家的改革開放，民主黨派的政治熱情重新煥發。一些資深的民主黨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上，不僅提出過獨立見解，甚至能夠堅持己見。

例如在三峽大壩上馬的問題上，由於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協及各種場合的強烈反對，曾擱置數年，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三峽工程議案才於1992年被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以1767票通過（反對177票，棄權664票），贊成票數之少，在人大歷史上是空前的。

在內部人事上，也出現了對中共干預的抵制。民主黨派內部曾有動議，要求具有中共身份的“交叉黨員”退出，或不得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民盟的一批中委，曾試圖在換屆時通過選舉由千家駒取代費孝通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經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出面彈壓，費孝通才保住了主席職位。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學潮，《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後，形勢開始失控。各民主黨派機關成員曾上街游

題的工作總結報告》（1981年7月28日）。

112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40頁。

行，支持學生的民主訴求。按照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指示，統戰部長閻明復找到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授意他召集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開會，試圖進行調停。同年5月15日，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民進中央主席雷潔瓊等四個民主黨派領導人共同致函趙紫陽，表明“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主黨派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曾公開發表文章和談話，表達對學運的支持。

5月19日宣佈北京戒嚴前夕，全國人大常委葉篤正、馮之浚、江平、許嘉璐、吳大琨、陳舜禮、林蘭英、楊紀珂、胡代光、陶大鏞、彭清源、楚莊十二人呼籲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會議。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再次呼籲召開民主黨派會議。

民主黨派人士的這些言行，除了內心的同情外，也是為了配合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趙紫陽理性解決學潮的願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類舉動已經超越了32年前民盟領導人章伯鈞試圖幫助中共平息學潮的“六教授會議”。

“六四”槍聲響起之後，民主黨派隨之失聲。不久迅速轉向，紛紛發表聲明支持“平暴”，並慰問戒嚴部隊。個別持反對態度的人士（如千家駒）則遠走海外，民主黨派一度高漲的問政熱情歸於沉寂。

3. 無所事事的“參政黨”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發[1989]14號），將中國的政黨制度定位在“多黨合作”。14號文件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根本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或兩黨制，也有別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制。”“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事

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這份文件不僅明確了民主黨派的身份，而且框定了民主黨派的活動範圍，規定了“參政黨”應的事情和需要遵守的原則，有些規定還相當細節化。

“參政黨”這個名詞，是前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的獨創。從1949年的聯合政府中的同盟者，到四十年後的“參政黨”地位，民主黨派的地位被重新明確界定。從此以後，民主黨派與中共的關係，徹底告別了“聯合政府”這個早已不存在的歷史概念，進入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時代。民主黨派人士在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談到：

“以前我們出國，別人問我民建是什麼黨，我說是執政黨，”原民建中央委員錢樞濤對記者說，“因為我們也參加政權，但是畢竟不是很準確。直到中共‘14號文件’出台，我們的身份才明確了。”

“8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一位領導人還把九三學社定位為‘學術性的政治團體，政治性的學術團體’，”九三學社原中央常委劉榮漢對《鳳凰周刊》說，“當時大家覺得這個說法挺有哲學意味的，但是後來一想，自己還沒有把自己當成是一個政黨麼。”

定位於“參政黨”的民主黨派，除了基本的組織活動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舉辦各種調研，在此基礎上形成提案、議案，體現“參政議政”的存在。雖然民主黨派的工作沿襲了1950年代劃定的“重點分工”範圍，而各黨派的調研、參政及提案內容，卻未因這種劃分而顯示出明顯差別，顯得籠統而雜亂。由於信息不公開，民主黨派的調研資訊明顯不足，提交的議案也不專業，不易引起政府決策機構的重視，最終流於形式。

原九三學社秘書長劉榮漢說：“我們的調研沒有專門研究機構進行的調研質量高。儘管我們也由專門委員會來做，但是專門委員會不專業，這是個大問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的中共智囊機構相比，我們無論是在掌握的資料或者專業水平，顯然是沒有辦

法和他們相比的。”

人大、政協被視為安排民主黨派人士“參政議政”的主要場所。在渴望被社會承認的民營企業家圈子裏流傳着這樣的暗盤：加入民主黨派，支付相當價位的活動費用，便可坐上相應級別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交椅。由於流品不一，歷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都會出現一些無聊提案，如2007年的提案中有：將三八婦女節改名“女人節”，八一建軍節更名“男人節”，將孟母生子日定為“中華母親節”，確認“漢服”為“國服”、泰山為“國山”、牡丹為“國花”，“建議中國球員以後不吃豬肉吃牛肉”，等等。這類提案雖不盡為民主黨派人士提出，或僅屬附議，亦可窺見“兩會”議政水平之一斑。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統戰部門官員對《鳳凰周刊》說，“過去民主黨派吸納了很多高級知識分子，雖然‘諫言獻策’屬於比較淺層的政治參與，但是在政府決策水平不高、公共行政能力不強的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現在，執政黨和政府的專業水平越來越高，而且吸納了更多的高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諫言獻策’顯得更加空泛，這種現象使得民主黨派無法展現自身價值，甚至被邊緣化。”¹¹³

對擔任政府實職的民主黨派人士而言，多數被安排副職，且須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批准。1989年起擔任兩屆農業部副部長的九三學社原副主席洪紱曾說，擔任正職的幹部，對政策理論水平要求很高，做業務出身的黨外幹部缺少相應的“台階”。¹¹⁴

4. 政治地位的邊緣化

進入21世紀以後，隨着經濟增長引發的政權腐敗，民主黨派創建時的民主憲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機關化、邊緣化的現象十分突出，政黨特徵模糊不清。民主黨派在監督方面無所作為，甚至

113 歐陽斌：《轉型時刻的民主黨派》，《鳳凰周刊》2006年第19期。

114 同上。

其自身也難以抵禦腐敗。民主黨派的邊緣化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無獨立政治主張：按照國際流行的政黨概念，政黨應有獨立的政治綱領、組織體系、經費來源、群眾基礎等，這些都不適用於“中國特色”政黨制度下的民主黨派。在中國大陸的主流話語中，“黨”這個名詞早已成為中共的簡稱，中共也習慣於以此自稱，民主黨派則認同這一點，從未以“黨”自命。除了參政水平低下以外，民主黨派的政黨特徵也逐漸消失，成為政權的一部分。目前的民主黨派有的仍以《共同綱領》為政綱，有的雖有政綱卻與《共同綱領》大同小異。在執政黨宣佈自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民主黨派習慣於宣稱自己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二、入黨動機功利化：隨着老一代的領導人先後辭世，民主黨派開始換代並迅速完成領導層的更替。新發展的黨員對本黨的歷史傳統和理念十分隔膜，更多的是功利上的企望與訴求。知名人士加入民主黨派，如同坐上“直升飛機”，可迅速進入政治高層，相比於執政黨內的升遷要快得多。這令很多注重政治身份而不在意實權的人看到了一條終南捷徑。

三、組織發展受限：目前各民主黨派總共僅有65萬黨員，相比與中共7000萬黨員的規模，顯然少得可憐。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仍受1950年代中共劃定的重點分工規範，一些重要的部門和領域，至今仍是民主黨派的發展禁區，例如中國新聞社2006年12月15日報道：解放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張貢獻少將稱，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根本政治原則，不允許其他黨派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進行活動。

四、副職晉升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被安排到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的職位上，與1954年以來的狀況並無區別，其他人物只能安排副省部級以下的實職，與建國時的陣營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遠不及“文革”以前的境況。而一般的政治安排，主要是在一些

政治組織或者群眾團體中任職，如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或被聘任為政府參事、文史館館員等。民主黨派人士的從政軌迹，會遵循“副職晉升”的規律，即從下一級副職晉升任上一級副職。根據1983年重申的人事政策，在重點分工範圍的70%之外，允許有30%的交叉空間。重點分工領域基本上是對民主人士實職安排的重點範圍。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政協中計算中共與非中共委員比例時，“交叉黨員”按民主黨派成員對待；而在擔任各級領導實職時，則不作為“非中共人士”安排。

五、幹部培訓制：民主黨派幹部的提拔，需要通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培訓。該校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擔任黨組書記，被稱為民主黨派的“中央黨校”，仿照中共中央黨校的模式培訓黨外幹部。“培訓班”一般為三個月，一個月學習基本理論，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其餘兩個月學習“重點特色課”，包括“三論兩史兩觀”，即統戰理論、中外政黨制度理論和參政黨建設理論，多黨合作史和民主黨派史，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宗教觀。目前中共中央黨校兼具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庫的職能，而社會主義學院只是一個幹部晉升的台階。

六、“交叉黨員”掌權：雖然中共宣稱其黨員不加入民主黨派，但各民主黨派內部，仍存在一定數量不公開或半公開的中共黨員(習慣上被稱為“交叉黨員”)。但目前掌握實權的領導人，基本上是這類人物。根據已公開的資料，原民盟中央主席丁石蓀、原台盟中央主席張克輝為中共黨員，現任致公黨中央主席羅豪才、現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啓德也是中共黨員，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是民建成員也是中共黨員。原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於1979年加入中共；原全國工商聯主席、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在1985年秘密加入中共，到他逝世時才予以公開。另據民主促進會舊網站簡介中披露，內部有4.8%的“交叉黨員”。“交叉黨員”的存在及其實權地位，從組織上確保了民主黨派與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七、人事、經濟機關化：如前所述，自1950年代起，民主黨派

機構從人事、經費上開始機關化。各民主黨派的辦公場地和日常辦公經費，全部由國庫支出而無需自籌。目前，各民主黨派至少被准許擁有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以作為本黨派財源上的補充。2005年頒佈的新《公務員法》將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人員正式納入公務員隊伍。經濟上的依賴性，決定了“參政黨”與“執政黨”利益上的一致性。

八、監督無力：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提出，民主黨派與中共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現狀則是：因為利害一致，民主黨派與中共在做到了“長期共存”和“榮辱與共”；因為地位不同，在“互相監督”和“肝膽相照”上難以到位。甚至有人調侃說：“長期共存，榮幸榮幸！互相監督，豈敢豈敢！肝膽相照，謝黨隆恩！榮辱與共，擔當不起！”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決定了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無力對執政黨實行有效的監督，甚至連新聞媒體的監督都不如，批評的自由度更遠不及新興的互聯網絡。

5. 民主黨派有沒有未來？

自“反右”歷經“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間，公權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監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起飛，也造成中國大陸的貪腐橫行，以致毛澤東反特權反腐敗的平等說教，如今仍被某些人懷念，但特權腐敗現象的泛濫，正是消滅了民主監督的惡果。由於毛澤東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維持，“反右”這一摧毀民族精神、斫喪民族元氣的歷史罪案，至今未得到應有的清算。

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和分化，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精英們除了傳統的“學而優則仕”或從商致富外別無選擇，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無從伸張。自從2004年起始，中國社會質疑改革的聲浪逐漸高漲，民眾對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貪污腐敗等現象日益憤懣。近年理論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探討，引發了幾場轟動社會的全民辯論。與此同時，前蘇聯及東歐的一些國家接連

在發生“顏色革命”。

面對民間日益高漲的民主憲政訴求，中共在堅持“一黨執政”的同時，不得不繼續獨自承擔改革的全部壓力。新任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接任之初，對民主黨派元老的優禮有加，不斷釋放出提升民主黨派統戰價值的信號，試圖重新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

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先後出台三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文件提出民主黨派人士“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積極推進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規定在換屆時，政協委員不少於60%，政協常委不少於65%，政協副主席不少於50%；明確了把黨派專項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研究解決黨派機關人員編制等。

2006年11月出台的《關於鞏固和擴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還提出“要照顧同盟者利益”。九三學社中央顧問洪綬曾認為：照顧黨外幹部也符合執政黨的利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健全，有利於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¹¹⁵

2007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表決，任命原同濟大學校長，致公黨副主席萬綱為科技部部長。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主席令，公佈了這一決定。萬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首位來自民主黨派的部長。有報道稱，這也是自1972年傅作義卸任水電部長職務後，三十五年來首位民主黨派人士部長。

這位新部長有無“交叉黨員”的背景，目前不得而知，但這一任命確實具有詮釋“照顧同盟者利益”的象徵意義，它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參政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利益共同體”關係，但在原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起決定作用者仍是中共中央派駐各部的黨組。一位民主黨派人士在接受《鳳凰周刊》訪問時說：“如果能夠更好的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中國社會的轉型成本將會大大降

115 蘇永通：《黨外人士從政觀察》，《南方周末》2007年1月18日。

低。”¹¹⁶ 這種認識或許為時已晚，按照“黨文化”改造了半個多世紀的民主黨派，其政黨特徵已喪失殆盡，習慣於伴食附庸地位。

中共高層在堅持“一黨執政”的大前提下，試圖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能否使國家走上憲政之路，歷經長期改造的民主黨派前途如何，至今仍屬未定之數。

結 語

以1957年“反右運動”為分水嶺，毛澤東重新樹立了個人權威，走向個人獨裁；中共推倒了聯合政府共識，走向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則從聯合政府的盟友，淪為被改造的對象。就中共而言，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時也是失敗的。同盟者在被成功地馴化為僕從之後，當執政者出現決策錯誤時，僕從是無力履行監督功能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並仍在繼續證明。

民主黨派曾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中間勢力”而存在，擁有對左右兩翼的獨立批評權，並在國內的衝突中起到調停和緩衝的作用。當1957年和1989年國內出現政治風波的時候，民主黨派曾試圖扮演調人的角色，但是兩度碰壁。從淪為“改造對象”到定位於“參政黨”，民主黨派的政治活力已消失殆盡。中共自1950年代起推行的社會一體化政策，造成了中間政治勢力的衰敗，政治體制自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剛性，一直延續至今。目前仍處於社會轉型中的中國，作為唯一執政黨的中共，不得不獨自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承受來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抨擊；而被定位於“參政黨”的民主黨派，發揮不了任何緩衝作用。

民主黨派創立時的理想是反對一黨專政，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今日中國之民主黨派，距離這個理想已十分遙遠。當商品經濟的復興喚醒了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參與到公民維權行動中時，其中並無民主黨派的身影；當理論界熱烈探討政

116 歐陽斌：《轉型時刻的民主黨派》。

治體制改革、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時，人們幾乎聽不到民主黨派的聲音。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五十年過去，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所面臨的意識形態僵化、腐敗低效和官官相護等現象，與1957年群眾所批評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一脈相承，並正在危及中共的執政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個人和中共既是“反右”的受益者，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成為其自身歷史行為的長期受害者。

知識分子黨派與農民會黨的結盟，其結果是前者被後者改造。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有“黨文化”而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黨”實際上趨同於“政權”。如果民主黨派應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須反省自身執政歷史的則是中共。

西方民主理念和馬克思主義都是外來政治文化，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卻毫無例外地被同化為“中國特色”的“會黨文化”（或曰“黨文化”），“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的積弊，連海峽對岸的台灣都無從幸免。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不僅需要反省百年來的政治文化，更須反省中國人的“國民性”。

2007年8月6日 定稿

“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

1957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紀實

徐慶全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作為重災區的文學藝術界，從1957年6月6日開始至9月4日，召開了25次黨組擴大會議，對文藝界的右派進行了口誅筆伐的大批判。這25次會議，使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羅烽、白朗、艾青等成為文藝界著名的大右派。會後，中宣部副部長、文藝界的巨頭周揚，以《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為題作了總結。此文後經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毛澤東修改，以《文藝戰線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在文藝界、中國知識界乃至世界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研究文藝界的反右派運動，1957年的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是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雖然文藝界人士在回憶中或後人在研究時對此偶有涉及，但完整地描述仍付之闕如。本文根據這25次黨組擴大會議所留下的發言材料，結合有關人士的回憶與研究成果，力求完整地構勒出這次會議情況。

一、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黨組擴大會議留下的一份厚厚的資料集，名之為《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會議是對所謂丁玲和陳企霞反黨集團所發動的批判。被揭露出的“反黨集團”的成員有：馮雪峰——“丁陳集團參加者”¹，李

1 《丁陳集團參加者 胡風思想同路人 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人民日

又然——“效忠丁陳集團”²，艾青——“丁玲的夥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豐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³，“文藝界各個反黨集團的聯絡人”⁴，羅烽、白朗夫婦——“勾結丁玲共謀反黨”⁵，“串通丁陳向黨進攻”⁶，陳明——既是“幫兇謀士”又是“骨幹將領”⁷。

現將這些人何以會捲入這個“反黨集團”的歷史脈絡，簡單地交代如下。

1. 丁玲、陳企霞

這個“反黨集團”的主犯：丁玲和陳企霞，早在1955年就被戴上了這樣的帽子，只不過是“反黨小集團”而已。

丁玲(1904—1986)，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即擔任過中共左翼文藝的領導人，並發表了《沙菲女士日記》等作品，成為國內外著名的作家。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逮捕，被軟禁三年後，在中共黨組織的幫助下，丁玲逃到陝北，因其身份深受毛澤東的信賴。1949年後，一度擔任中國文協(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副主席、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報》主編、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等職。她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了在那個年代被視為最高榮譽的“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

另一名頭目陳企霞(1913—1988)，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

報》1957年8月27日。

- 2 《效忠丁陳集團 鼓勵右派進攻 宣揚托派理論 李又然是反黨丑類的幫兇》，《人民日報》1957年9月4日。
- 3 《效忠丁陳集團 鼓勵右派進攻 宣揚托派理論 李又然是反黨丑類的幫兇》，《人民日報》1957年9月4日。
- 4 《李季、阮章競同志聯合發言(8月23日第22次會議)》，《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頁173。
- 5 《羅立韻同志的發言(8月23日第22次會議)》，《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頁166。
- 6 《效忠丁陳集團 鼓勵右派進攻 宣揚托派理論 李又然是反黨丑類的幫兇》，《人民日報》1957年9月4日。
- 7 《汪洋同志的發言(9月3日第24次會議上)》，《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頁205。

是“左聯”的一名老戰士，曾兩次被國民黨逮捕。四十年代到延安後，先後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委員會宣傳部及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工作。1945年擔任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主任。1949年後任中國文協副秘書長、《文藝報》主編。

所謂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冤案，發生在1955年肅反期間。其引線是，1954年發生的“批判《紅樓夢研究》”事件，使得《文藝報》遭到整肅，在該報擔任主編的馮雪峰、陳企霞以及曾任該報主編的丁玲，一同被牽連進去，陳企霞為此向中央寫匿名信表達對這種整肅的不滿；到1955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引發的肅反運動，開始了又一場對識分子更大規模的整肅運動。在此期間，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和黨總支書記阮章競，根據康濯對丁玲的揭發材料，聯名的報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請求對丁玲進行批判。陸定一署名報告中央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了擴大會議，開展了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鬥爭會議：

會議從1955年8月3日起至9月6日止，共舉行了十六次。參加會議的共約七十人，除作協黨組成員外，還有作協各部門黨員負責同志，部分黨員作家，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戲劇家協會、音樂協會和美術協會等單位有關的同志。在會上發言的有五十七人。⁸

16次擴大會議後，中國作家協會寫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發了這個報告。⁹

報告認為，丁玲和陳企霞接結成了“反黨小集團”，而且這個“反黨小集團”的“罪名”居然有四條之多：一、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面派的手法，挑撥離

8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

9 參見徐慶全：《“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冤案形成始末》，載《湘潮》（長沙）第1—2期（2005）。

間，破壞黨的團結。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報告在列舉了四項罪名後，說道：

從以上情況看出，這個反黨小集團是一貫抗拒黨的領導和監督的，他們把自己領導的單位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只許黨讚揚他們的成績，不許黨批評他們的缺點；他們拒絕執行黨的文藝方針，企圖按照他們的要求來改造黨的文藝工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到處拉拉扯扯，散佈流言，挑撥是非，進行卑鄙的兩面派活動。所有這些，都證明丁玲和她的小集團成員的關係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基於創作或工作需要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是允許的)，而是一種以實現個人野心為目的的毫無原則的反黨的結合。

這次揭發批判中，鑒於肅反的大環境，丁玲在上海被捕的一段歷史也被牽連出來，被予以嚴格審查。¹⁰

轉過年的1956年，從春天開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良好氣氛，及至1957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發出“開門整風”的號召，使歷經反胡風、肅反後的知識分子如同在冰天雪地覆蓋下渴望出土的小草，感到了凍土的鬆動。在這種氣氛下，丁玲和陳企霞向中宣部提出了申訴。中宣部成立了由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宣部肅反“五人小組”組長張際春負責的審查小組，經過查實，認為“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不能成立，重新審定，改寫結論。

在1957年的整風鳴放熱潮中，4月24日，中宣部、中國作協完成了丁玲的結論。這個結論雖然沒有公佈，也沒有同丁玲本人見面，但長時間的調查，則基本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形成了這樣的印象：1955年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中，且不說其鬥爭的方式顯然有可檢討之處，就為二人的定性來看，至少不是完全正確的，否則何須再調查修改？

因為有了這樣的看法，在整風鳴放的大環境中，這一問題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人們紛紛為此事實問當年這場批判的主持者

10 參見徐慶全：《丁玲歷史問題結論的一波三折》，《百年潮》第7期(2000)。

之際，丁玲、陳企霞也沉浸在“翻身有日”的興奮之中。在這飄飄然的興奮中，丁玲、陳企霞等人也開始了串聯，意欲借這個機會，徹底改變1955年被批判的結論，給作協黨組以致命一擊。

2. 馮雪峰

馮雪峰(1903-1976)，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結識了魯迅，編輯出版《萌芽》月刊，並與魯迅共同編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1929年參加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編輯出版《前哨》雜誌。1933年底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934年參加長征。1936年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

1937年脫黨回鄉，創作反映長征的長篇小說《盧代之死》。1941年被捕，囚於上饒集中營。在獄中寫了幾十首新詩，後結集為《真實之歌》。1942年被營救出獄。1943年到重慶，在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發表了許多雜文及文藝理論文章。1946年回上海後創作了許多寓言。

1950年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著作編刊社社長兼總編。1951年調北京，先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

在馮雪峰主持上海文化工作時，曾與周揚結怨，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揚、夏衍等黨員，而去找魯迅，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論爭。對這件事周揚一直心存芥蒂，認為魯迅受雪峰的影響，對他們有誤解，以後在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點出“四條漢子”(田漢、夏衍、陽翰笙、周揚)的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十分尷尬。

1949年以後，周揚先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後又任中宣部副部長。二人雖同屬文化界，但當年“兩個口號”爭論的陰影，

一直在他們之間遊蕩，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處於對立狀態。

1954年，因《紅樓夢》研究問題和“胡風事件”，馮雪峰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判，被撤職。1955年，“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發軔時，馮雪峰也被牽連進去。在陸定一署名向中央寫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對馮雪峰進行批判：

在文藝界負責的黨員幹部中，馮雪峰同志也有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這表現在他長期對黨不滿，驕傲自大，和黨關係極不正常。近年來，特別是在學習四中全會文件和檢查《文藝報》的錯誤後，馮雪峰同志是有進步的，他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已較前有所克服。但他的文藝思想中，則一直存在着許多唯心主義的觀點，許多地方跟胡風思想相同，而馮雪峰同志在讀者中是有一定影響的，又是文藝方面的領導同志之一。因此，對他的文藝思想作一次檢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現已責成一些同志對馮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評丁玲同志思想作風之後，即進一步開展對馮雪峰同志的文藝思想的批判。¹¹

按照中宣部的這一報告，在對丁玲、陳企霞進行思想作風的批判後，還要對馮雪峰的“文藝思想”進行批判。但是，這一安排似乎沒有進行——流覽一下當時的報紙，我還沒有發現有專門批判馮雪峰“文藝思想”的文章。馮雪峰能躲過這一劫難，其原因大致有兩點：一是為揭批胡風而引發的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及隨後進行的肅反甄別所沖淡；一是對丁玲和陳企霞的批判到12月底才結束，而此時中央正在醞釀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讓許多知識分子懷念的1956年的“早春時節”已經出現徵兆了，預想的對馮雪峰的批判也就被人淡忘了。

但是，躲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在短暫的“早春時節”後出現的1957年反右運動中，馮雪峰就在劫難逃了。周揚與馮雪峰的三十

11 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01。

年代的那場公案，也因之成為馮雪峰被批判的重要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一直處於隔膜狀態的周揚與馮雪峰，也開始直面交鋒了。¹²

3. 李又然

在1955年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定性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中，李又然是第三位成員。說起來，李又然被扯進“小集團”有些滑稽。

李又然(1906—1984)，1926年秋在上海南洋高商英文專修班讀書，後入上海群治大學法律系學習。1928年赴法國留學，就讀於巴黎大學，參加法國共產黨，屬中國支部，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李又然在法國求學的巴黎大學文科哲學系，是由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執教的。李又然對羅曼·羅蘭十分仰慕，常讀他的作品，並得到過他的幫助，於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作羅曼·則蘭。同時，李又然還為中共在巴黎和柏林出版的機關刊物《赤光》秘密撰稿。回國後積極參加革命的文化活動，從事世界語運動，以犀利的筆觸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社會，從此登上文壇。李又然在法國與艾青相識，在艾青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他將艾青從獄中寄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發表在《春光》雜誌上。

1932年，李又然回國，經羅曼·羅蘭介紹擔任宋慶齡的秘書。1935年，經江豐介紹，加入中共領導的“反帝大同盟”。翌年11月，“七君子”事件發生，他冒着生命危險積極營救，遭到特務的毆打，致使右耳永久性失聰。

1938年，李又然幾經輾轉到了延安。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編譯處編譯，後兼任延安女子大學、延安大學教員，與毛澤東有過幾次接觸。在毛澤東和陳雲的直接關懷下，於1941年1月重新入黨(介紹人為丁玲、江豐)。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6年2月後，經組織分配赴東北解放區從事教學和文藝的領導工作，歷任合江省立聯

12 參見徐慶全：《周揚與馮雪峰》(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合中學副校長、哈爾濱大學文藝學院院長及吉林省吉北聯中校長等職。

新中國成立前夕，李又然主持籌建吉林省文聯，先後擔任《文藝》週刊、《文藝月刊》主編，《長流文庫》叢書編委。1949年，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國際家書》。1955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偉大的安慰者》。他的散文感情充沛、慷慨激昂，又富於哲理，如《吉普車》，膾炙人口，傳誦一時。

用中共的話語體系來表述，李又然是屬於“自由主義”比較嚴重的人。他與陳企霞一樣，個性較強，得罪人比較多。在延安時期，陳企霞和李又然是同鄉，自然多了幾份親近。陳企霞到了玲手下編《解放日報》副刊還是得益於李又然的介紹。按照周揚對延安所謂“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派的劃分，與丁玲、陳企霞關係不錯的李又然是屬於後一派。在丁玲“我們需要雜文”的號召下，李又然也寫出了《鞭屍》等文章予以回應。他與王實味、蕭軍走得也很近。在延安對王實味進行批判時，他同情王實味，因而動員蕭軍為王實味辯護。¹³自然，在延安整風中，李又然也受到了嚴厲的審查。

李又然到東北後，與蕭軍繼續保持着友好的往來。1948年到東北時，李又然到瀋陽見胡風，其後，與胡風及後來被定為“胡風分子”的魯藜等人關係密切。¹⁴1949年後，李又然一度在中央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從事翻譯工作。丁玲成立文學研究所後，將他調到文研所擔任教員。

1955年肅反時，李又然以“托派嫌疑”、“胡風分子嫌疑”在文學講習所被批判。李又然並不屈服。批判會開了幾次以後，很快就牽連到他在所裏的兩位好友：瑪金和蔡其矯。於是乎，“李又然為首的反黨小集團”的帽子就被戴上了。

13 《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42—143。

14 《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44。

李又然的叫板，自然要激起“眾怒”。這樣，他同陳企霞一樣，被作協“五人小組”隔離審查。

被隔離審查的李又然做夢也想不到，他被作協黨組正在召開的揭發批判丁玲、陳企霞的與會者，歸到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裏面了。

本來，文講所把李又然和瑪金、蔡其矯聯繫在一起定性為“李又然反黨小集團”，其根據是，李又然反黨、反領導的具體表現是“反對丁玲和田間(因為丁和田都是負責人)”。結果事情就變得有些滑稽了：這廂文講所批判李又然反黨、反領導的事實是反對丁玲和田間，那廂作協黨組擴大會上卻認定“李又然和丁玲是一夥的”。搞得公木都哭笑不得，只好向“五人小組”成員阮章競提意見，並和阮、劉個別談話。劉、阮只好以“中央都批示了，我們能不傳達嗎？L(指陸定一——引者)部長都在會上講了話，將來如果不對，恢復名譽好了”來應對。¹⁵

因此，在肅反進入甄別階段後，文學講習所黨支部多次向他解釋：在肅反運動中，提出和審查他，與丁陳小集團並無聯繫。李又然也認可這一點，在甄別後的肅反結論上簽了字。但到了整風鳴放期間，他又提出申訴，推翻這個結論。李又然這種表現，是接受了陳企霞的主意。

早在李又然被解除隔離審查後，陳企霞托艾青告訴李又然：“有一萬個人說李又然是反革命，我陳企霞也不相信！”在困境中的李又然當然大為感動。他對艾青說：“我一輩子只受了三個的教育：第一個是馬克思，第二個是羅曼·羅蘭，第三個是陳企霞。”帶着這份感激的心情，李又然去看陳企霞。在整風鳴放中，陳、李當然要共同商討如何推掉壓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因此，1957年1月，李又然給組織上寫信申訴，得到了“要修改處分”的結果。

作協“五人小組”把李又然的肅反結論一改再改，最後修改到

15 張菱：《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頁256。

這樣的程度：(1)摘掉了一切政治帽子。對原結論中所認定的李的“錯誤言行及反黨活動”一字不提；(2)在結論中明文寫道：“五人小組認為對李的隔離考慮不周，解除隔離，並進行了道歉。”(3)處分：由原來的開除黨籍，降為留黨察看；再改為交支部處理；最後改為只輕輕地說了這麼一句：“關於在運動中所揭露出來的他的思想作風上的錯誤，李又然自己應進一步檢查，並引以為教訓。”對此，李又然仍然認為，基本精神不對頭，拒絕在結論上簽字。

在與陳企霞商討後，李又然又死死認定，他就是丁陳小集團的一員。何以如此？一是中宣部給中央的給“丁陳反黨小集團”定案的報告中，的確將李又然列入。在李又然看來，這就是事實。二是將自己的問題與丁陳聯繫在一起，比較好解決問題。在整風鳴放中，丁陳的問題是最突出的問題，解決了丁陳的問題，李的問題自然也會隨之解決。三是陳企霞、丁玲也願意和李又然捆綁在一起。陳企霞和陳明公開說過：“他們要把我們(丁、陳、李)分開解決，現在不能讓他們分開。”聯合在一起向組織提要求，總比不聯合力度要大。因此，李又然就在文學講習所的支部大會上鄭重聲明：“我的問題與丁陳問題是一回事，要一道解決。請把這個意見正式反映給黨組。”

這樣，丁玲、陳企霞、李又然就聯合起來了。三人商討——用後來批判者的話說是“密謀”——了鬥爭策略。

首先，對1955年對其揭發的一些人進行“策反”。如李又然負責戈陽，陳企霞動員菡子，丁玲、陳明動員康濯。

其次，在一些鳴放整風會議上，對於在1955年的會議上揭發和批判過自己的人，三人的共同策略是不“算賬”，而把清算的矛頭對準周揚和劉白羽。比如，1955年對李又然的批判中，周立波和白朗曾經對李進行過比較尖銳的批判，李本來很有意見，但三人商量後決定：“先放在一邊，將來再算賬”。在這方面，李又然後來被揭露出的言論比較多一些。

李又然是詩人氣質相當典型的人，因而在文學講習所或作協召開的一些動員鳴放的會議上，說話非常隨便。他多次公開宣稱：“我是一個小人物，可是大事件落在我的頭上，我就變成一個大人物了”。這種盲目的樂觀，使他的一些行為很滑稽，並給人留下“瘋瘋癲癲，糊糊塗塗”的印象。比如，在中直黨委選舉黨代表的會議上，李又然宣稱，他得的票數一定比劉白羽多。在連候選人也沒有當上的情況下，他又公開提出陳企霞和丁玲作為候選人。再比如，作協黨組召開給中宣部部長提意見的會議，李又然自然不回到邀請，但他自動趕來參加並發言。在將“小人物”、“大人物”的話重復一遍後說：“在這個會議上，我要不發言，會場就顯得冷落；我要不點頭，問題就不能解決。周揚同志要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須要我批准，否則過不去！”這樣一些行為除了快意思仇之外，於事無補。

第三，丁玲提出：若是自己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將在原定1957年10召開的第三次文代會(第三次文代會延期到1960年才召開)上宣佈退出作協。陳企霞和李又然當然都擁護。陳企霞對柳溪說了此事後並補充說：“批判丁陳集團，好大的集團呢，光我的學生，受到審查的就有二百人。”強調丁玲此舉將要引起的震動。李又然也公開對人說：“搞不好，我要退出文學界。有我這種想法的，絕不只我一個人”，並將丁玲的意圖廣為宣傳。¹⁶

4. 艾青

艾青(1910-1996)在延安時期，曾經與丁玲走得比較近。但解放以後，艾青與丁玲的關係實際上已比較疏遠。艾青對丁玲獲斯大林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頗有微辭，私下還有嘲

16 以上所述，是根據在黨組擴大會議上方紀(7月30日第7次會議上)和公木(8月23日第20次會議上)的發言綜合而成的。參見《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6—13、141—155。

笑，曾模仿丁的聲調朗誦其中的某些章節，然後大笑不止。然而，在1955年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中，艾青對這種完全不容對方辯駁的批判方式非常不滿，不免有些為丁、陳“打抱不平”的表現。有一段時間，艾青與李又然、朱丹往來較多，常在一起喝酒，這幾位都是學美術出身，不免有點藝術家放浪不羈的氣質，酒一喝多，話題自然扯到文藝界，因此有了“作協有兩幫人，一幫總是被整的，一幫總是整人的”的說法，後者是暗指周揚等人，在作協圈子裏，這是人所盡知的。另有一次，中國作協支部開會批判丁玲，周立波發言時口氣盛氣凌人，而且無限上綱，令在座的人悚然。艾青忍不住說，你周立波不要永遠像一個共青團員的樣子，一貫正確，比誰都革命。把周立波噙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與此同時，借助於“雙百方針”和整風鳴放的熱潮，艾青借助於文章，發洩對文藝界的某些領導飛揚跋扈的不滿。在《畫鳥的獵人》一文裏，他借獵人與假獵人之間的對話，尖刻地譏諷了文藝界某些以“整人”為業的人，打飛行中的鳥不成，就打紙上的鳥，還嫌不過癮，乾脆把紙掛在樹上，隨便打一槍，然後在中槍處畫一隻鳥。在他看來，整人變成了一個行當，一種職業，“人必須有一技之長，在許多職業裏面，我選中的是打獵。”所指再明顯不過。接着，又做《偶像的話》。與前文相比，後者筆鋒愈加犀利。人們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懼之，倒是偶像自己說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話來：“眾生啊，你們做的是多麼可笑的事！你們以自己的模型創造了我，把我加以擴大，想從我身上發生一種威力，藉以鎮壓你們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卻害怕你們。我敢相信：你們之所以要創造我，完全是因為你們缺乏自信—請看吧，我比之你們能多些什麼呢？而我卻沒有你們自己所具備的。你們假如要大膽些，把我搗碎了，從我的胸廓裏流不出一滴血的。當然，我也知道，你們之創造我是你們嘗試着要我成為一個同謀者，讓我和你們一起，能欺騙更軟弱的那些人。”《養花人的夢》是應和“雙百”方針所做，文字風格上多少有些魯迅散文詩《野草》影響的痕跡，只是有點晦澀，

卻沒有太多的沉痛罷了。末尾倒不乏尖刺，諸如：“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開放正是她們的權力。”又如，“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沒有比較，就會使許多概念都模糊起來”等等。另一篇《蟬的歌》，語多涉及人格的異化，“蟬”整天唱着“同一的曲子”，居然毫無察覺。艾青的“牢騷”除了可以得一時之快，改變不了任何現狀¹⁷，倒是給後來的批判者提供了“炮彈”。

5. 羅烽、白朗

在1955年“丁陳反黨小集團”被定案的同時，羅烽白朗這一對夫婦和舒群也被定性為“舒、羅、白反黨小集團”。

羅烽(1909—1991)，1929年加入中共，任北滿第一個產業支部——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宣委，支部書記。後任中共北滿處委候補委員。創辦《文藝》、《夜哨》週刊。1934年因叛徒出賣被日本人逮捕。雖經殘酷刑訊，堅守不屈。1935年獲得釋放。同年在上海加入左聯。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第一屆主席、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文委委員、東北文藝家協會代主任、中共旅大特區委員會文委書記。建國後，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兼秘書長，東北文聯、中國作協東北分會第一副主席，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中國作協顧問。著有短篇小說集《呼蘭河邊》，中篇小說集《糧食》，劇本《台兒莊》、《總動員》。

白朗(1912—1994)，1929年與羅烽結婚，1931年加入反日大同盟。1935年至1937年在上海從事進步文藝創作。1941年奔赴延安，後任《解放日報》文藝編輯。1945年加入中共。1946年被選為哈爾濱市臨時參議員，並任《東北日報》副刊部部長，東北文藝協會出版部副部長和《東北文藝》副主編。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

17 程光燁：《艾青在1956年前後》，載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8—10。

代表大會代表。

羅、白夫婦本來在東北工作，羅烽並擔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兼秘書長、東北文聯第一副主席等職務。1953年調入中國作家協會。當年，羅烽應邀到瀋陽參加“建國三年來東北文藝工作總結”時，因與時任東北文化部部長的劉芝明在有關執行文藝方針、政策方面意見不同，發生激烈爭執。這本是工作中的正常爭論，但到1955年秋天，卻被“秋後算賬”，被打成“舒、羅、白反黨小集團”。

舒、羅、白三人都不同意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一直在申訴。1956年，舒群經周揚首肯，問題獲得解決並調到外地工作，而羅、白二人對被掛起來遲遲不做結論的局面表示不滿，繼續申訴。其結論也一改再改，先是由“舒、羅、白反黨小集團”改為“舒、羅、白三同志小集團問題”，後改為“舒、羅、白對黨的關係問題”。

結論一步步改輕，羅烽和白朗夫婦的日子也明顯地好過了。1956年冬，中國作家協會成立“作家支部”，羅烽被任命為支部書記。丁玲和陳企霞也歸到這個支部管理。在丁玲、陳企霞向中宣部申訴的過程中，第一個打交道的就是羅烽。羅烽從組織角度與丁玲作了幾次談話。

而白朗呢，雖然有四十年代與丁玲一起在延安工作的經歷，此時就是一個專職作家，丁玲、陳企霞的申訴本與其無關，但她卻在無意中替丁玲、陳企霞作了一件“通天”的事情：1956年夏天，白朗在北戴河寫《何香凝傳》，適逢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在。在一次閒聊中，鄧穎超問起1955年“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事，白朗如實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對丁、陳的鬥爭過火了，她不同意對於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就是反黨的批判。鄧穎超說：“上面要什麼，下邊就給什麼。”此舉後來被認為替丁玲和陳企霞“通天”。¹⁸

18 參見玉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黎辛：《再說個“不應該發生的故事”——關於“舒群、羅烽、白朗反黨性質小集團”》，載胡平、曉山編：

二、關於黨組擴大會議召開的背景

在當年黨組擴大會議上受到批判，後來也成為右派的丁玲的丈夫陳明，在回憶中談到這次會議的背景時說：

1956年，丁玲向上級申訴，得到中宣部黨委會的受理。1957年春天，毛主席“到處遊說”，遊說的內容是整風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指出整風主要是批評：一是主觀主義，一是官僚主義，還有一個是宗派主義。這就是1957年作協黨組第二次擴大會議的背景。在這次會議上，周揚等承認1955年批丁玲是錯誤的。如果作協黨組真的能執行中央關於整風的指示。或能多少糾正自己造成的錯誤，減輕對黨和對同志的危害。但他們翻手為雲，複手為雨，趁“反右”之機，把丁玲的申訴誣為“翻案”，是“向黨進攻”。¹⁹

當年擔任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在黨組擴大會議上以中宣部領導身份發言的李之璉回憶說：

1957年5月，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每個機關、單位人們對建國幾年來的各種工作，根據整風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對哪個人、哪件事，作的結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實際，同黨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關係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們的思想中進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風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缺點和錯誤，特別是希望領導帶頭作表率。自然大家都會想到，在本機關最突出和影響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在中國作家協會，就不能不把對“丁、陳反黨小集切”的批判和處理提到整風的首要議程。這也不是由哪個個人的意志所能決定的。

……

1957年6月，作協黨組大多數同志意識到，根據整風精神和作協

《名人與冤案——中國文壇檔案實錄(二)》(北京：群眾出版社，1998)，頁479—520。

19 《是誰整丁玲？——陳明訪談》，邢小群：《往事回聲》(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190—191。

機關群眾的要求，如果不首先處理好“丁、陳反黨小集團”的問題，機關的整風便不好開展。於是，在6月6日再次召開黨組擴大會，討論“丁、陳問題”的處理。周揚和黨組幾個領導人首先講話，都主動表示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是不應該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並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幾位領導人發言以後，出席會議的同志發言踴躍，一致認為，1955年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應該撤消，應該消除這一批判所造成的後果，肅清影響並進一步總結教訓，避免今後重犯。有些同志情緒激動，不免說了些很刺耳的話。丁玲本人也提出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從被“隔離”釋放後即認為這是“政治迫害”，這時自然講話就更尖銳。領導者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無法解答，但又不願接受大家的批評。會議因此出現僵局，宣佈暫時休會。

……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休會期間，整風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原來是發動群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糾正錯誤的整風運動，突然變成了黨向對黨提出尖銳批評意見的人進行反擊的“反右運動”。本來，從整個社會來說，有人想趁黨整風之機，借提意見為名，企圖否定黨的領導，這確實有的；對這種情況給以反駁，完全應該。但從黨內來說，也有人想借此機會，對曾經有過不同意見的人，置於敵對地位，予以打擊，這就同黨的政策相違背了。這樣做顯然是錯的。

而作協黨組在重新研究、討論丁玲反黨問題的黨組擴大會如何繼續時，正是由於對領導批評的意見很多，會開不下去，尋找出路而不得的時候。“反右”鬥爭的開展就提供了一個機會，於是藉以進一步批判丁玲等向黨的新“進攻”似乎就有了根據。²⁰

20 李之璉：《不該發生的故事——回憶一九五五——1957年處理丁玲等問題的經過》，載胡平、曉山編：《名人與冤案——中國文壇檔案實錄(二)》(北京：群眾出版社，1998)，頁74—75。

陳明的回憶，主要是兩條：其一是說，6月6日周揚等人向丁玲道歉，是執行毛主席“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指示的結果；其二是說，後來整丁玲，是借反右之機。李之璉的回憶則更明確地說，周揚等人是抓住了“休會期間，整風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機。

在我看來，6月6日周揚等人向丁玲道歉的舉動，說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是對的，但絕不是執行的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指示，而是執行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換句話說，周揚等人向丁玲道歉，不是真的，而是毛澤東“陽謀”部署的具體體現。因此，後來復會時把丁玲打成右派，也不是像李之璉所說的，是在休會期間整風形勢發生了變化所致，而是在6月6日的會之前，形勢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1957年中央決定反右時，對右派實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陽謀”，是有着周密準備的。據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一文所說，它實施於“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以可證的正式文件看，就是作於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黨內高層已經基本上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²¹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一連發了三個文件，不公開即秘密的動員正在進行。中央書記處為準備反擊右派的最後一次會議，也在這個月月底結束。

具體到作協而言，當時只是幾個高層領導才在5月18日或19日了解到《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文件精神。這些獲准知道新精神的人，當知道政策的突然轉變和政治風向的突然轉變，還是感到十分震驚。當年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的涂光群回憶說：

據我的記憶，作協黨內一部分人知道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後，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際，或稍後幾天。因為這時曾對

21 據《毛澤東選集》第5卷，此文作於5月15日；而據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報評論員”的名義，似乎準備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但很快又改為擬發黨刊，而最後以文件形式發給“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黨委的時間，是在6月12日。

黨內少數積極分子進行傳達。我不僅聽了傳達，還受到作協一位領導同志個別關照。所以我成了幸運兒。儘管我響應黨的號召，對文藝界整風領導人提意見不落人後，並且發了些帶“刺”的雜文，但我已列在保護的範圍，往後只要謹慎行事，不會當“右派”了，這是後話了。而最明顯的信號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見共青團代表時講的一句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作協的排頭刊物《文藝報》，遲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開始變調，轉向反右。也就是說，從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協仍照樣進行整風、鳴放，但這時候的做法，不能不帶上“陽謀”的味道了，這就是服從上邊整體的部署，讓更多的“魚”浮上來。²²

當年在《文藝學習》編輯部工作的黃秋耘，在回憶往事時，談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知道這個文件精神是在5月18日晚上，可與涂光群的回憶相印證：

我記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裏聊天，順便向他請示一下有關《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因為韋君宜當時下鄉去了，《文藝學習》的編務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幾乎無話不談，雖然在職務上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但我對他完全沒有下級對上級那種拘謹，他對我也完全沒有上級對下級那種嚴肅。那天晚上，他興高采烈、眉飛色舞地對我暢談他在浙江視察時的種種見聞(他當時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開過幾次文化界人士座談會，鼓勵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動亂期間，他這些行動都被說成是“煽風點火”了。)對於《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他強調要“放”，大膽地“放”。他認為，《文藝學習》組織對《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討論，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了這篇作品，還替這篇作品辯護了幾句，說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義，王蒙反對官僚主義並沒有

22 涂光群：《中國三代作家紀實》(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頁338。

錯。當然，小說是有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但沒有政治性的錯誤。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藝作品說話，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我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沈，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9點20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我知道他馬上要出去，就連忙告辭了。

回憶了這一段往事之後，黃秋耘感慨說：“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許多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許誰也不會知道，風雲突變，馬上就要發動一場雷霆萬鈞的反右派鬥爭。”²³

後來被劃為右派的部隊作家徐光耀，在回憶中說道，在鳴放時，一些“引蛇出洞”的徵兆已經出現，當時作協張光年、侯金鏡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許世故一點，我也許能避過這次失足。因為已有徵兆，足夠使人警惕。是侯金鏡又一次來到了大耳胡同，在談及《文藝報》的內部情況時，他感情複雜地說：“這一回，唐因、唐達成、侯敏澤幾個，恐怕要吃虧。他們說了不少‘出界’的話，至今勢頭挺盛。這麼下去，會栽跟頭的。”我聽了不免著急，問他：“為什麼不提個醒兒，幫他們一把？”侯說，“不行啊，你一說，他們會在會上揭你，說你破壞‘鳴放’。”接着他又說，本來他也想說說的，可張光年不讓，至此，侯把拳頭往腰後一

23 黃秋耘：《風雨年華》（增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頁175—176。

掖，說，“張光年要保持我這個‘拳頭’，到時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時太自信，太癡呆了，連這麼明顯的“引蛇出洞”警鐘，也未放在心上。²⁴

首先給作協總支和中宣部機關黨委寫信為丁玲鳴冤叫屈的徐剛，也從當中看出了這期間的變化。徐剛在回答採訪者邢小群“是不是因為丁、陳在甄別時的態度，使他們又被打成右派”的問題時，他冷靜地分析說：

也不完全是。似乎事前已經設定好了……在這期間，我看了一些黨的文件，如《事情正在起變化》等。這些文件沒有署名毛澤東，也不用中共中央文件的規格。我還注意看了報紙上的社論和文章，這些文件、文章，起到使我完全鎮定的作用，也起到使我震動的作用。我曾想，作家協會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件有關。在時間上，中央文件是在5月14日（這裏的日期有誤——引者）下達的，黨組擴大會是6月6日至8日召開的，丁玲發言後馬上休會。這是不是有蹊蹺？²⁵

以上幾個當事人的回憶表明，5月18日周揚知道這個文件精神後，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協領導人小範圍傳達，開始按照文件精神佈置反右了。用徐剛的話說就是：“作家協會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件有關”。就整個文藝界而言，從5月下旬直到6月6日開會之前，作協黨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緊緊圍繞着“引蛇出洞”的意圖進行的。這也就是涂光群所言的：“不能不帶上‘陽謀’的味道了”。

結合上述幾位當事人的回憶，分析當時的形勢，很顯然，6月6日周揚向丁、陳道歉的舉動，已經不是陳明所說的那個“背景”了。

24 徐光耀：《昨夜西風凋碧樹——憶一段頭朝下腳朝上的歷史》，載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175。

25 《徐剛訪談——從文學研究所到文學講習所》，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130。

下面我們根據郭小川1957年的日記，²⁶ 列出在6月6日黨組擴大會議召開以前這一段時間內，在丁玲、陳企霞的問題上作協黨組的作為，從事實上加以證明。

5月22日：

十時到荃麟處談丁玲問題。共同的意見是先不改，交給大家討論。

這一舉動表明，1月到4月底多少人付出心血的關於丁、陳問題的“不以反黨小集團論處”的結論，到此為止了。4月24日就寫好的結論，為何偏偏在這時候交給大家討論？此舉是頗耐人尋味的。合理的解釋是，利用人們對丁、陳問題的意見，引導“放”的局面。

5月24日：

周揚處來電話，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時到陸部長處，我們先在白羽處談了一下昨天政治局會議的內容。十時到中南海，陸定一和張際春兩位部長談了很久的丁、陳問題。

張際春是負責調查丁玲歷史問題和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專門小組組長，正是在他的主持下，通過查實得出丁、陳“反黨小集團不能成立”的結論。陸定一此時與張際春“談了很久的丁、陳問題”，目的是什麼，郭小川沒有記載。值得注意的是，郭小川提到了“昨天的政治局會議”。5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主要議程是聽取鄧小平關於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周恩來、朱德、陳雲、陸定一、康生等也通報了一些情況。最後，劉少奇講話。他說：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這次會議，應該是部署反右派的會議。在這次會上顯然談到了對丁玲、陳企霞的處理問題，否則就不會有24日陸定一約張際春就丁、陳問題交換意見之舉——顯然，兩位領導是在這

26 郭曉惠編：《郭小川全集》第9卷（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00—118。

個問題上統一思想。

5月25日：

九時開碰頭會。討論了機關的整風運動，決定從三個方面動手“放”起來，即黨內、黨外、機關，下禮拜起堅決地動作起來。中午，睡至二時半，到遲了。我二時四十五分到，會已經開起來，今天是黨組擴大會，討論機關整風和丁、陳問題。

作協從三個方面“放”起來，說明“引蛇出洞”開始部署了。而下午召開的整風和丁、陳問題的會議，大約是第一次討論這一問題的黨組擴大會，引起了一片對當年會議主持者的責難。

5月28日：

二時開黨外作家會議……看來，蕭幹真是右派，和我們有不可解的成見。

這裏，郭小川日記當中首次出現了“右派”一詞。據朱正考證，“右派分子”這名目並不是一開始就定下來的。5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中說的是“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右傾”，還不過是一種政治傾向，還不算特別嚴重；5月16日發出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說的是“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5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中說的是“現在的情況是，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倡狂”，兩個指示用的都是“右翼分子”，這個用語就已經是着眼於政治上的歸宿，已經很接近於最後的定名“右派分子”了。“右派分子”這個最後確定的標準稱呼，是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定下來的。從這個用詞變化來推斷，《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最後定稿必在5月20日的指示之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此文題目下面所注出的5月15日，當時寫出第一稿的日期，寫完之後又經過了修改。如果說此文在5月15日就已寫定成為現在人們見到的這樣，那麼5月16日、20日

的指示就不會再採用“右翼分子”這個後來沒有再用的稱呼了。²⁷

前面說過，《事情正在起變化》是在6月12日才以黨內文件下發的。在下發之前的修改是肯定的，這也說明朱正的推斷是正確的。郭小川這一級別的幹部，6月17日在陸定一部長處才看到這個文件。當然，在5月下旬，他已經知道了這個文件的精神。此後，6月20日、21日，郭小川又兩次看了這個文件。這一舉動表明，當時是把這個文件作為反右的指導性文件的。可是，為什麼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郭小川會寫出“右派”一詞？這大約是從中央書記處為在此前召開的反擊右派會議得來的精神。中央書記處最後一次會議，剛在5月25日結束。

5月30日

先是請黃其雲來匯報各單位的整風情況，《文藝報》已“放”出，作家支部昨天向部長提了很多尖銳的意見。

郭小川日記中用“放”這個字眼，殊可注意。

6月1日：

十一時，到《新觀察》參加他們的整風會……看來，顧慮已經不多，算基本上放開了。回來，見中宣部出了大字報。

——“引蛇出洞”的部署基本上成功了！

6月4日：

八時半開始領導小組會議……會議討論了最近的整風情況，覺得已經放了，但還未到高潮，還準備繼續放，同時就保護積極分子問題商量了一番。

或許，從5月25日討論整風和丁、陳問題的黨組擴大會開始，一些人已經就在整風中最突出的問題(丁、陳問題等)開始“放”了，在這些人中，有些被認為是應該保護的“積極分子”也不明就裏地說了一些“右派言論”，所以，在6月4日召開的整風領導小組(此時或許應該叫反右領導小組了吧?)會上，專門“就保護積極分

27 朱正：《1957年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88-89。

子問題商量一番”。就這個問題進行“商量”，其目的就是像前引的徐光耀回憶中所說的，要保持好反擊時的“拳頭”。

在做好了這一系列的準備後，於是——

6月6日：

下午二時半，開討論丁、陳問題的黨組擴大會議，會上邵、劉、週三人先講了話，然後是一些人談感想，然後是一片對周劉的攻擊聲。陳又亂罵人是做假報告。他說：“你們是高級幹部，你們了做了假報告！”會議十分緊張，空氣逼人，簡直弄得我頭都發漲。

……

十一時多回來，今天會議的餘波仍在腦際顫抖。這實在是痛苦的，但要生活就得鬥爭，不鬥爭就沒法生活。對於丁、陳，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種厭惡之感。無論怎樣，我是不會同情他們的。

這樣的場面儘管使周揚等人比較尷尬，讓郭小川感到“痛苦”，但是，提出尖銳批評意見的與會者根本不會想到，他們已作為“魚”被釣上來了。周揚在7月25日復會的講話也證明了這一點：

前年對丁、陳的鬥爭，包括黨組擴大會，給中央的報告和向全國傳達，我認為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前三次會議上肯定前年會議的同志沒有發言，發言的同志大體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說鬥爭完全錯了，有的說基本錯了，有的說要追查責任，仿佛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²⁸

周揚的“前三次會議上肯定前年會議的同志沒有發言，發言的同志大體上都是否定的”的話，已經明確說明“引蛇出洞”的策略：肯定前年會議的人不發言，營造一種“引蛇出洞”的聲勢，專門讓那些對前年會議有意見的人“放”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6月7日，黨組擴大會議召開第二次會議，還是郭小川的記載：

28 《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2。

緊張的鬥爭中時間如此寶貴，但也有一些浪費，梅朵又來談了好久，他似乎在摸我們對周揚同志的底，是鬥倒呢？還是讓他改正錯誤？我直率地說出我的看法，大致是：1. 一切都不應離開時間、地點、條件來看問題；2. 他絕無意去打倒，過火的鬥爭也是哄起來的。

……

下午，開討論丁、陳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有陳企霞、唐達成、唐因、韋君宜、黃秋耘、李又然、張松如發言，指責去[前]年的會議是根本錯誤的。

晚飯後，又開支部大會，會議開得很有意思……蕭三看了大字報後主張向大問題大頭子引導。我覺得他是不考慮問題後果的。

“不考慮問題後果的”一語殊可注意——郭小川已經知道這樣作的後果是什麼了。

梅朵是《文匯報》的記者，《文匯報》是一張黨外的報紙。關於這張報紙在反右中的命運，毛澤東那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已經說明了問題。在反右初期的5月下旬到6月初，在北京的記者姚芳藻、浦熙修、梅朵等人非常活躍，發表了許多報導。

6月6日的會議結束後，不知就裏的陳企霞覺得局面打開了，很興奮地通過柳溪通知《文匯報》，去採訪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去採訪丁玲。姚芳藻立即給郭小川打電話，並說要以“丁玲、馮雪峰為什麼這幾年沉默了”為題寫文章。郭小川當即就拒絕了要求，但是，這天梅朵還是來找郭小川。大約陳企霞把昨天會議上周揚等人的退讓看成了周揚失勢的兆頭，因而才會有梅朵對周揚“是鬥倒呢？還是讓他改正錯誤？”的發問，才有浦熙修向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拐彎抹角探聽，是否要把周揚搞垮？”²⁹

在郭小川這裏遇到了阻礙，大約也是在這一天，浦熙修、姚芳藻到丁玲家去採訪。陳企霞在讓柳溪轉告《文匯報》讓他們採訪

29 陳為人：《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美國：溪流出版社，2005），頁49。

丁玲的想法時就說，丁玲除了會說去問邵荃麟，其他的什麼都不會說。實際情況果然如此。³⁰

這一次未成的採訪，在7月25日的復會上，被揭發批判為丁玲串通《文匯報》的黨外右派分子向黨組施加壓力，與社會上的右派裏應外合向黨進攻。8月13日的《人民日報》還特意以姚芳藻所擬定的而未完成的採訪題目《“丁玲、馮雪峰為什麼這幾年沉默了？”》作了一篇文章，當然作者認為他們沉默的原因是“窺測方向，等待時機”，向黨進攻。

6月8日：

願望實現了。今天的報紙上，第一次大規模打擊了整風中的右派分子，《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了……十時半，到白羽處，陸部長找白羽談了話，陸說要有韌性的戰鬥，人家越叫你下去，越就不下去！他認為周揚沒有宗派主義，人們不太注意這是一場戰鬥，文藝方向的鬥爭，他認為，丁、陳鬥爭要繼續，不要怕亂。

一句“願望實現了”的話，顯然表達了一種壓抑許久的心態，這種心態就是為了“引蛇出洞”而“硬着頭皮頂着”的委屈感。而陸定一找劉白羽的談話很直白，就是兩個字：“鬥爭”。

6月9日：

十一時半到家，心中有些不快，禮拜天誠然過得很好，但明天又要進入激烈的鬥爭，這中間，在心的深處是不能沒有矛盾的。一個人天天在批評的壓力下生活，無論如何是不好受的，所以一想到這就有些不愉快，人真是多麼複雜呵！

儘管“願望實現了”，但是按照反右的部署，聽到別人的批評還要“硬着頭皮頂着”，自然要使郭小川“有些不愉快”了。這說明，作協還在繼續宣導“放”。

6月11日：

30 蔣祖林：《回憶母親丁玲——1957年前後》，載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43。

開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決定繼續大鳴大放，但可以爭論。作協在運動高潮從5月27日開始，到今天已整整二周，現在是餘波了，還可以抓緊時間，把平常不大容易說出的意見說出來。

這裏，郭小川清楚地點出作協開始實行“引蛇出洞”策略的時間：5月27日！與前引涂光群的回憶相一致。在實行這一策略後到6月6日周揚、劉白羽等人給丁、陳道歉，當然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引“放”，“引蛇出洞”——這也反證出6月6日周揚、劉白羽給丁、陳道歉的舉動是這種引導的具體體現。儘管已經有了兩周的時間，但是作協領導人顯然認為還不夠，還要“放”。

6月12日：

八時半，開黨組會議，討論中央的幾個電報，對反擊右傾分子問題，交換了意見，作協還應當大鳴大放，但也可以爭鳴。對作協機關的估計，我以為中間狀態的人佔很大數量。

對照《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所談到的爭取中間派的問題可知，作協黨組討論的中央的“幾個電報”，其中之一就是《事情正在起變化》。

6月13日，第三次會議召開：

下午開黨組擴大會議。丁玲發言，態度尚平和，但內容十分尖銳，極力想爭取康濯“起義”，追究責任，想找出一個陰謀來……會開過後，周揚、荃麟和白羽一起到我房子內，談了一下明天的會議。白羽似乎又很激動。看來，會議是到了攤牌的時候了。

這次會議，郭小川用“攤牌”一詞表明，不用再等復會，丁、陳成為右派已經沒有異議了。

事實上，在這天會議上，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的發言中，已經增加了“反右派”的內容。他明確地說：最近整風深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反右派言論，因此整風也是一場嚴重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下面，黨內團結更有着重要意義，討論團結問題，必然會涉及到黨組的領導問題。

可是，邵荃麟的講話，並沒有引起丁玲等與會者的警示。嚴辰、丁玲、康濯等人還在可悲地、也是真誠地對黨組提出意見。丁玲在“內容十分尖銳”的發言中說：

林默涵在1955年擴大會上說，“檢查《文藝報》是中宣部早想進行的”，“《文藝報》的獨立王國是我們早就感覺到的，並不是胡風說了，我們才這樣想的”。這話就是說，獨立王國不是檢查出來的，是老早就感覺到的。我是黨組成員之一，馮雪峰是《文藝報》的負責人，也是黨組成員，我很想知道那時究竟是幾個人和什麼人，對這些感覺進行過分析，進行過調查？為什麼不拿到黨組會上來討論？我同雪峰都是老同志了，為什麼要背着我們？劉白羽說是黨員提供了丁玲與黨的關係的材料，我要問，哪些黨員？什麼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麼情況下提供的？我提議把康濯寫的關於我的材料在會上公佈。康濯提供的材料，你們調查沒有？劉白羽說鬥爭我，經過部長辦公會議批准，我要問：部長辦公會議的性質？是口頭申請，口頭批准的，請拿出會議記錄來。是書面申請，書面批准的，請拿出材料來。部長辦公會議上的決定是不是可以說是中央的決定？這一行動，你們把作協支部、總支、宣傳部黨委會放在什麼地位？

丁玲發言中質問“部長辦公會議”那一段，是陳明加進去的。丁玲的發言提到了康濯的揭發，康濯不願劉白羽的勸阻，對1955年他寫揭發材料的事情作了解釋。³¹丁玲的發言，在復會後7月31日黨組擴大會議上被劉白羽稱之為“達到了反黨高潮”。³²

這次會議結束後，黨組擴大會議宣佈休會。

6月13日這一天，丁玲、陳明仍然被一種飄飄然的情緒所控制，絲毫沒有感覺到危險的到來，因而也就不會注意邵荃麟講話的警示作用。對照上面所陳述的大背景，丁、陳的這種興奮就不免帶

31 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182—183。

32 《劉白羽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26。

有悲劇色彩了，他們只是因為處於歷史漩渦中毫無覺察而已。

可是，時至今天，陳明和李之璉仍然持前述的觀點，就不能不讓人感到奇怪了。

持會議的休會是因為丁玲、陳企霞的的質問造成的這一說法的人，似乎忘記了一個事實：既然像他們所說的，丁、陳問題是整風中必須要解決的，休會能解決問題嗎？所以，與其說休會是因為如此倒不如說是中宣部和作協的統一佈置更讓人能看透此後事情發展的脈絡。休會的目的，一是繼續發動群眾，大鳴大放，釣更多的“魚”；二是像張光年對侯金鏡所言，保持“拳頭”進行反擊。

關於第一點，當年統戰部的做法可資例證。據李維漢的回憶，中共中央統戰部邀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連續開了幾天座談會。5月16日他宣佈要休會幾天，到21日恢復開會。為什麼要休會四天呢？主要是毛澤東開始準備反右派。既然意圖已經改變，中央統戰部必須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動。座談會顯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進行，必須調整為“引蛇出洞”的部署。這就是休會4天的真正原因。復會後，經過休會期間的發動，一些所謂的右派言論也放出來了。³³

作協的休會，與統戰部目的是一致的。既然從中宣部領導到作協的領導，大致都像郭小川一樣，“把丁、陳看成黨內右派”了。意見統一了，到7月25日復會這段時間，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盡量發動群眾，揭發丁、陳的所謂右派罪行了。

三、黨組擴大會議休會後的部署

下面我們梳理一下作協在休會後對丁玲、陳企霞批判的部署。³⁴

33 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33—835。諸如此類的做法，在當時的各個部門幾乎都如此。

34 下面所列出的日程，參考了郭小川及鄭振鐸的記載。參見郭曉惠編：《郭小川全集》第9卷(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44—173；陳福康整理：《鄭振鐸日記全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頁539—543。

6月14日：

三時，到白羽處，上午他同邵荃麟一起見了陸定一同志，定一同志堅持地認為丁、陳是歪風的代表，主張展開一個鬥爭，堅決把文藝界整頓一下。五時，荃麟走了，因為丁玲找他，白羽又同我談了好一陣荃麟的缺點，他似乎認為荃麟有些折衷，態度不鮮明，說到這時，我也由此感覺。

……

今天很興奮，對丁、陳問題的處理有個眉目了，我一定要迎接這場暴風雨。我把丁、陳看成黨內右派。我一定要準備意見去迎擊他們。

到此時，原來參與處理丁、陳問題的專門小組，不但已經不會再起任何作用了，而且還要受到批評，有郭小川的日記為證：

6月16日：

得通知，四時到周揚同志處開會，定一、際春、之璉、崔毅、張海等同志都到了。周揚同志先講了他的發言內容，言下甚為激動；後來定一同志談到，看人要看關鍵，現在黨內有股右的潮流，顯得十分猖獗，我們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出來，然後加以克服。他認為丁玲、陳企霞對黨是不忠誠的，而陳企霞如果最後還堅持他的錯誤，就應當堅決把他開除。

我也很激動地發了言，我覺得中宣部應當考慮一下，如果是右了，就應當下決心糾正。

陸、周、劉都批評了李之璉和黨委，他們那裏開始了一股右的潮流，影響了很多人。

在反右後的“補課”中，李之璉、張海等人也遭到了厄運，這次會議大約是要清算他們“右”的開端。當然，這是後話。想必這次會議給李之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他對此前的事情又記憶不深，所以在回憶中對郭小川日記中所記載的情況一無所知，才得出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之所以休會，是因為周揚等人被丁、陳質問，會議無法開下去，而在休會期間，周揚等人利用“整風形勢急轉直

下”的時機，把丁、陳打為右派的結論。這一結論，與丁玲身邊的人以及多數丁玲的研究者相一致。

還需要說明的是，當年作協反右的部署是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的。這從郭小川日記中也能看得出來。

7月3日：

周揚傳達了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見，他認為現在對右派勇氣不夠，方法不夠。時間要延長，鬥爭要堅決展開。要各單位排排隊，做出計劃來。

7月5日：

今天的擴大的黨組會……荃麟傳達了昨天小平同志的報告。

7月13日：

八時到大樓……白羽簡單地說了一下昨晚鄧小平同志召集的會議上的情形，小平同志非常強調地說理、駁倒右派，鬥爭要狠。

7月16日：

八時半，開整風領導小組會議……這個會議是先匯報情況，然後由荃麟傳達小平的報告。

據黎之回憶：鄧小平對文藝界的情況非常關心，他及時地向《文藝報》打招呼，讓《文藝報》主動檢討，“自己把小辮子揪出來”。周揚傳達鄧小平的指示後，《文藝報》於6月24日到7月8日召開了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進行自我批評。總編輯張光年的《我們的自我批評》發表後，毛澤東說：檢討了就好。這使周揚等人鬆了一口氣。

另外，周恩來總理也關心着文藝界的情況。在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周恩來同康生約見了部分文藝界代表座談，讓大家對反右有思想準備，要把講了錯話和右派言論區別開來。他當時特別提到了吳祖光，說他雖然講了一些錯話，但還不能說是右派言論（但是，即使有周恩來的保護，吳祖光後來還是右派）。他提醒大家要積極參加，正確對待這次運動。³⁵

35 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07—108。

7月14日，周恩來還專門召集文藝界人士作了一次談話。郭小川日記有記載。丁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不過，這次會議也讓她從周恩來的眼神中感覺“異樣”。她回憶說：

那天會議，我坐在郭沫若後面。周總理走進會議室時，我們都站了起來，周總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這時，我覺察到總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絲意外的神情，但一閃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手。當時，我沒有對我的這個細微的感覺加以仔細思量。在反右派鬥爭，一場批判、鬥爭我的風暴過去之後，回想起周總理那感到意外，卻一閃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許他那時已知道中宣部決定進一步開展對我的鬥爭，沒想到我還會出現在這個座談會上吧！³⁶

丁玲說，周恩來總理是因為知道“中宣部決定進一步開展對”她的“鬥爭”才有異樣的目光，對照前面所述，這裏的“中宣部”應該改為“中央”才符合當時的歷史狀況。周總理的目光表明，他已經知道了丁玲肯定是逃不過的。可歎的是，丁玲至此才明白“引蛇出洞”的“陽謀”。

7月16日，作協整風領導小組在周揚家裏開了一個小會，確定了三項工作的日程：一是對在整風時期敲響電影大討論“鑼鼓”的鐘惦棠，決定在電影界批評、揭發——沒過多久，鐘就成為右派了；二是將首先指斥丁玲、陳企霞為作協反黨暗流的戈陽列為批判物件，在其所在單位《新觀察》編輯部進行——當然，沒過多久，她也是右派了；三是丁、陳問題按原計劃進行，時間在下周集中搞。

為了充分做好搞揭批丁玲、陳企霞的準備工作，當時的安排大致還是首先從陳企霞身上找到突破口，然後再向丁玲發起攻擊。為此，7月21日，作協整風領導小組在周揚家裏碰頭，商量了丁、陳問題。至於如何打開局面，考慮到陳企霞的堅強，決定迂回作戰，

36 蔣祖林：《回憶母親丁玲——1957年前後》，載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44。

先找與陳企霞關係密切的柳溪，讓她出來揭發。如果這一步進行得順利，第二步就把陳企霞的問題公諸於眾。開大會的時間定在本周的四、五、六，也就是7月25日開始。

要使計劃如期實現，柳溪就成為關鍵性的人物了。

柳溪是清朝大名鼎鼎的《四庫全書》主編、《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紀曉嵐的第六代孫女，當時才三十出頭，也是小有名氣的作家。1955年肅反中，因她在四十年代初，參加黨的城市地下工作為有一個公開身份便於掩護，在敵偽一家刊物謀得一個助理編輯的職務，並發表過作品，就成為被肅的對象。在被肅期間，她以化名給《人民文學》投稿，被編輯慧眼識珠，這就是被稱之為“干預生活”的小說《爬上旗杆的人》，頗得好評。肅反後，柳溪離開原來的工作單位電影局回到出生地天津。

1946年，在華北聯大期間，陳企霞就與柳溪相識並發展成為超越一般朋友關係的另一種關係。在現今這個講求人權與隱私權的社會裏，雖然人們並不提倡類似這種“婚外情”的關係，但是畢竟不會去揭這種隱私，更不屑於用這種隱私來作為突破口。但是，在那個年代裏，個人的所有隱私是不能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柳溪肅反期間被整肅時，在交代自己的問題時，檢舉了陳企霞的若干問題：一、陳企霞與托派的關係；二、陳企霞想用手槍自殺的事；三、陳企霞利用職權幫柳溪看自己檔案材料的問題；四、兩人之間的感情關係。以柳溪與陳企霞這種關係，她的檢舉，對正在接受批判的陳企霞來說，無疑雪上加霜。陳企霞對柳溪的行為自然惱怒。

從1956年的肅反甄別階段到1957年的整風鳴放階段，陳企霞又與柳溪聯繫，希望她能翻供，並具體地給她提出翻供的辦法：先由陳企霞寫一封信給柳溪，質問她為什麼在肅反中捏造她的材料；然後由柳溪回信推翻肅反中交代的陳企霞的上述問題，並向他表示道歉。陳企霞再將柳溪的信上交作協黨組，為自己翻案提供依據，以此推掉強加在身上的莫須有的罪名。

1956年10月14日，陳企霞給柳溪寫了掛號信，三天後，柳溪致

信陳企霞，按照預定計劃，推翻了上述問題。收到信後，陳企霞到西單高記鮮花店購買兩盆菊花，讓花店送給柳溪，並附上一張便條：“送上鮮花兩盆，敬祝健康！”，以示收到了來信。隨後，陳企霞將這封信交給了作協黨支部書記、肅反“五人小組”成員阮章競。

整風鳴放開始後，陳企霞阻止柳溪回到天津，要她“寫點雜文，配合運動”。柳溪與陳企霞進行商量後，寫出了《搖身一變》和《要有這樣一條法律》兩篇雜文，發表在《北京文藝》1957年6月號上。文章用曲筆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翻案。柳溪的這兩篇雜文本來要給《文匯報》發表，但該報駐北京記者站的著名記者梅朵看後，覺得“太露骨”，因而不敢發表。同時，應《文藝報》之約，柳溪又寫了一篇文章。《文藝報》認為文章很好，表示“全編輯要為支援你這篇文章而奮鬥”。柳溪則說：“為我鬥爭是小事，你們主編(指陳企霞)受了那麼大的冤枉，為什麼不為他鬥爭？”《文藝報》編輯部便很快派人去看望陳企霞。

7月1日，柳溪回天津時，陳企霞到車站去送她。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吹響了反右派號角。這時候，柳溪和陳企霞都明白，“事情已經起變化”了。兩人只好訂立攻守同盟：柳溪如果不得不揭發陳的話，只能說到“送二盆花為止”，並且約定秘密通訊的辦法。

柳溪回到天津分會不久，天津如火如荼的反右派運動就展開了，柳溪再一次被揭發批判。在被責令交代與陳企霞有關的問題時，柳溪堅守與陳企霞的攻守同盟，只說到“送二盆花為止”。在高壓批判下的柳溪，兩次給陳企霞打電話，商討對策。第一次，陳企霞勸她“冷靜”；第二次，陳企霞也有些怕了，說“我不要聽到你的聲音！”。為了穩住柳溪，陳企霞按照事先約好的在雜誌的夾縫中寫幾個字的辦法，給柳溪寫過兩次信。在第二封信中，陳企霞寫道：“在電話裏聽你口氣很急，為什麼？天氣熱，要冷靜。以後你就會知道，冷靜對於一個人的好處有多麼大！”柳溪新出版的

《新港》的一篇小說題頭下給陳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收到後隨便寄一本小冊子來，不要寫字，以便安心！”³⁷

柳溪沒有等到陳企霞的小冊子寄來，卻等來了劉白羽。

7月22日，劉白羽到了天津。天津作協負責人方紀當然要盡力配合。為了方便和保密，方紀將審問柳溪的地點選在天津重慶道55號天津中蘇友協所在地。在其後的兩天時間裏，劉白羽和方紀開始從柳溪身上“搞材料”了。

雖然我們不知道當時劉、方二人是怎樣來做柳溪的工作的，但可以想見的是，讓柳溪說出自己與陳企霞的關係該有多難。所以，儘管連夜審問了兩天，柳溪“堅決不講與陳企霞的關係”。24日，劉白羽返回北京，把任務留給了方紀。

方紀無法完成這個任務，就找到了天津市委第一副書記王亢之——對柳溪頗有“知遇之恩”的老領導——來做柳溪的工作。柳溪被“高度的黨性說服了”，被老領導“熱烈的友情融化了”，“交待了和陳企霞真實的來往，真實的情感，和真實的故事……”³⁸

25日早晨，在北京的劉白羽得到消息後，馬上通知郭小川安排車票，當天晚上就趕往天津。下午三點多，劉白羽到天津後馬上見柳溪。26日晚上，去天津搞材料的劉白羽滿載而歸。

四、復會後的黨組擴大會議

北京方面在為復會作着準備。24日，在滂沱的大雨中，作協整風領導小組的幾位成員邵荃麟、林默涵、郭小川等人在下午5點齊聚周揚辦公室，研究明天揭批丁玲、陳企霞黨組擴大會議的開法。

為了給明天的大會做準備，郭小川在晚上就動員人們貼陳企霞

37 參見《方紀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3。

38 柳溪：《往事如煙》（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頁218—220。

的大字報。但是，或許動員太晚，本來想在夜間就貼出來的大字報到第二天早晨似乎也沒有動靜。

25日上午，郭小川找丁甯、羅立韻，動員他們在下午的會上發言。另一些被要求發言的人邢野、田間、張光年等人大約也早已做好準備了。

25日，黨組擴大會議在下午兩點多開始。周揚首先講話。他在開場白中說道：

前年作家協會批判了丁玲、陳企霞同志的會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開的，這次會議的結果，我們向中央作了報告，並向全國的主要文藝幹部作了傳達。中宣部為了妥當地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問題，又成立了以張際春同志為首的專案小組。經過兩年時間，作了很多的材料查對工作，和反復的研究。整風中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提出意見，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於是丁、陳問題不單成了作協整風的中心問題，也成了中宣部整風的中心問題之一了。上次我說明我是以當事人的身份來參加會議的，現在我是以兩種身份參加，一、前年會議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黨的會上是要講真理的，希望不因此影響同志們的發言，有什麼就講什麼。前年的會是在肅反運動中開的，現在的會又碰上反右派鬥爭，這說明我們黨內鬥爭往往是與整個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分不開的，兩者不可能不互相影響，黨外鬥爭常常反映到黨內來。現在反右鬥爭的火力很大。但還是要求同志們發言實事求是。有同志說，前年的會有偏差是由於一些人利害之心勝過是非之心。我們要有是非之心；要弄清是非首先要弄清大是大非，然後也要弄清小是小非。而所謂是非、利害，都是要站在黨的階級的立場上來辨別的，而不是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不要因為反右派鬥爭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膽地講，要求大家不要顧慮。有人喜歡講“良心”，那麼大家講話就不要違背“良心”。現在全國正在展開關於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辯論，我們也要經過大辯論，把文藝界的是非鬧清楚。過去的缺點就是辯

論得不夠。現在社會主義這一關擺在我們面前，每一個人都要過，希望在座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能過去。李又然同志說他要幫助我過這一關，我謝謝他，希望他也能好好過去。上次蕭三同志說怕給中宣部的部長們提意見，這不是一個老黨員應說的話，後來他說是開玩笑。這個玩笑開得也不好。思想鬥爭總是緊張的，因為鬥爭不是你有錯誤，就是我有錯誤，或者雙方都有錯誤。談到錯誤總是緊張的。我們只要相信真理，就可以減少一些緊張。上次會開了三次開不下去了，有人將了軍，提出質問。好像前年的會有陰謀，要追究責任。因此我不能不講話了。

儘管這個開場白中，周揚仍然說要通過“辯論”搞清“是非”或“利害”關係，但是，這只是官樣的文章而已。且不說在反右派的大環境下，但說周揚的“代表中宣部”的身份和作協為這次復會所作的一系列準備工作，這次會議也不可能還有什麼辯論，只是對丁玲、陳企霞揭發批判而已。

接下來，周揚聯繫當前的反右鬥爭，從兩個方面對1955年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作了總結：

一、……前年的會是思想鬥爭，也是政治鬥爭。與肅反也有交叉的地方。我們給中央的報告，是根據會議的真實情形寫的。會議請示了中央，會後給了中央報告，這完全是合法的。至於為什麼要發動那個鬥爭，白羽已經講了，會前給中央的匯報也是那樣講的，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同志們應該相信黨，相信中央。丁玲同志問中宣部的部長辦公會議是否代表中央，要公佈給中央的匯報等等，這是對黨中央表示不信任，這是向黨挑戰，黨不能接受這種無理的要求。當然如果有意見可以向中央監委提出，查一查去年到底捏造了什麼事實，但在下面散佈這種不信任黨中央的言論是不應該的。有人說前年鬥爭丁、陳的會議是違犯黨章，我懷疑講這種話的同志，懂不懂黨章。我懷疑他根本沒有看過黨章。前年的會議恰恰是保衛黨的團結和統一，和危害黨的利益的現象作鬥爭的會議，因此是必要的、合法的，符合黨章的。不鬥倒

是真正違犯黨章的。現在鬥爭還沒有結束。講前年會議錯了的同志也有各種不同的情形。有些同志是由於只看到鬥爭中的缺點和某些過火的一面，對於這些我們承認錯誤。他們看不到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不經過鬥爭不能得到真正的團結。再就是有些同志與丁、陳的錯誤思想上有共鳴。自蘇共二十次黨代會以後，特別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後，在國際國內形勢影響下，黨內自由主義、修正主義和右傾情緒有相當滋長。另一方面也有教條主義，也必須反對。中央提出反修正主義，並不是不反對教條主義。但有些同志沒有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所以，對於反修正主義就不感興趣，而把正確的東西也當作教條主義加以反對了。通過這次會議應該把這些大是大非弄清楚。丁玲的錯誤不是一般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而是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把自己放在黨之上，向黨鬧獨立性。她和陳企霞之間的關係是不正常的，是反黨情緒的結合。加之丁玲同志不是一個普通黨員，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作家，是一個有影響的黨員作家，是作協的副主席，曾做過“人民文學”、《文藝報》的主編，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是黨的文學事業的領導同志之一。可以說黨曾經把在文學方面的重要責任都交給了丁玲同志。但丁玲同志卻把個人放在黨之上，完全辜負了黨的信託。前年會上，丁玲同志承認了錯誤，說黨挽救了她，但是後來她又不承認了，說是在壓力下講的。丁玲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鬥爭不行，對丁玲同志自己也沒有好處。當然，思想鬥爭總是很痛苦的，但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長期以來，在作協，原則空氣和思想鬥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劉白羽同志到作協看到這種現象，敢於起來鬥爭這是他的一大功勞。儘管他的作風也有缺點有毛病，但敢於和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總是好的。黨的文藝隊伍中，只應當有無產階級的作風，不應當有資產階級的作風。

二、前年的鬥爭會有錯誤的地方，應由我負主要責任。既然是鬥爭，就難免有過火的地方；但過火總是不好的。我們在鬥爭中常

常容易有片面性，急躁，不夠實事求是。丁、陳反黨小集團這個結論是否下得重了一點，同志們還可以討論；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陳企霞的關係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文藝報》這個獨立王國，要沒有丁玲同志支持，單只有陳企霞，是搞不起來的。對陳企霞、李又然的隔離是做錯了。李又然同志的思想是腐朽透頂的、發了臭的資產階級思想，這是和黨的思想決不能相容的，我是沒有辦法和他共鳴的。但前年對他的隔離是錯了，白羽已向他道歉，我也願向他道歉。對陳企霞的隔離雖然有較多的根據，但還是錯了，我們也都承認了錯誤。會上鬥爭丁玲同志有些話可能講得過火一點，但總的來說，還是講理的，有保護的，給中央的報告，其中基本情況還是對的，只是某些事實沒有查對，不夠確切，某些判斷不夠適當。如說文學講習所是獨立王國就不一定適當，因它不像《文藝報》那樣抗拒黨的領導。但丁玲同志確把這個單位當作擴大個人影響培植私人勢力的地盤。就是獨立王國(如文藝報)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成績，那些成績丁、陳也有份的。我和丁玲個人不那麼融洽，有無宗派情緒，可以檢查。解放後我覺得丁玲同志進步了，識大體，對創作了解多，有些見解。丁玲同志的缺點，我也是看到的。如五一年文藝整風時她顯得自己了不起，取消文研所她那麼不滿意，第二次文代會時她不願聽一句批評文藝報的話，等等。我看到這些沒有批評，一則是當時覺得這些事情並不嚴重，而更主要的是怕傷害團結，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四中全會以後。滿足於表面上的團結，只講團結不講鬥爭，顯然是不對的。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被丁玲進步的假像所蒙蔽，但也反映了我政治上的軟弱性。直到前年反胡風鬥爭以後，有同志提了關於丁玲的材料，我才感到丁玲問題的嚴重了，這才在中央的指示和領導之下，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的鬥爭。這個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但鬥起來就沒有充分注意到團結的一面，對會上揭露的材料沒有及時地加以查對研究，沒有及時地做好善後的工作。從這次可以接受兩點教訓，一是事實要力求準確，一是鬥爭

要尖銳徹底。攻一個同志，逼他，就是使他進步的一個好方法。我平日對同志們政治上要求不夠嚴格，這是我的缺點。但我對任何同志決沒有打擊之心的。

有了結論就要有分析。接下來，周揚從“幾個重要歷史關鍵來”分析了丁玲的錯誤。他說：

丁玲同志質問我說，為什麼前年會一開始便提出對黨忠誠的問題，好像我暗示大家有什麼問題似的。那麼忠誠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我看對丁玲來說，是關鍵問題。丁玲在幾個關鍵問題上對黨是不忠誠的。黨員就要在重要關鍵上，在風浪中考驗對黨是否忠誠。丁玲同志在三個時期都沒有經得起黨的考驗：第一是在南京，這是一個最嚴重的考驗，在白色恐怖下，很多同志犧牲了。就在逮捕丁玲同志時，便有一個和她一塊被捕的應修人同志，跳樓犧牲了。抓丁玲同志的就是她自己的丈夫馮達。丁玲被捕後開始有過鬥爭，但她卻始終和她那叛徒丈夫同居，而且在敵人面前自首變節。後來馮達參加中統，在大特務徐恩曾手下做事，特務機關每月拿相當高的乾薪給丁玲。後來丁玲離開南京又很自由，而特務機關不但不追究，還繼續信任馮達。我想每個黨員都有權向丁玲提出疑問。丁玲同志1936年到延安，一直到1943年，她這段歷史向黨隱瞞了七年。特別是有人提出這一問題，中央組織部來審查的時候，丁玲仍然沒有講，一直到43年延安整風審幹的時候才開始講了這個問題，其中還講了一些假的東西，這是丁玲對黨第一次大不忠。第二次考驗是在延安。1942年是革命最困難的年頭，那時胡宗南包圍延安，希特勒進逼莫斯科。而丁玲、陳企霞卻經手刊登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自己還發表了《三八節有感》，與蕭軍搞得那麼好，國民黨正好把“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和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等三篇文章加以介紹推薦，印成專冊，作為反共的宣傳材料。西安特務機關還把《三八節有感》編成戲上演。一個黨員寫了反黨的文章被敵人當作文件印發，這能說是對黨忠誠嗎？第三次考驗是在北京。

全國解放了，丁玲同志身負文藝界領導的責任，作品得到了斯大林獎金，是最順利的時候，應該沒有什麼不滿了吧。但這時候丁玲驕傲自滿起來，把個人放在黨之上，和陳企霞又結合在一起，把《文藝報》當作了他們的獨立王國。51年文藝界整風動員會上丁玲說了些什麼話？她說《文藝報》是他們幾個人辦的，領導上從沒有過問，實際就是說黨和文聯的領導糟糕的不行。她的作品中也常常表現出她的個人突出。好些讀者問為什麼丁玲寫文章總離不開一個“我”，把個人突出得那麼厲害？對他們的工作只能講好話，不能有一句批評。《文藝報》可以任意批評人，但人家卻不能批評《文藝報》。因此一到檢查《文藝報》，他們就惱羞成怒了。陳企霞宣傳“士為知己者死”。試問，右派分子“知己”，你也為他死嗎？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思想絕對不相容的，丁玲說她沒有說過“一本書主義”。當然，誰也不會說自己是一本書主義，修正主義者從來也沒有說過自己是修正主義，問題是思想實質。說：“寫出一本作品誰也不能打倒你”，這個“誰”是指的什麼人？這不是一本書主義又是什麼？他們總是對黨內外作家採取宗派排斥態度然後反過來把這個宗派牌子給別人掛上。他們總是喜歡在背後議論東家長，西家短；總覺得有誰誰誰壓在他們頭上；又說把誰誰誰捧得太高了，看不起黨外作家，總之，一切人都不在眼下。丁玲那種驕傲氣味，完全不像個黨員。你是一個黨員，代表黨來工作，黨外作家擁護我們的黨和政府，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愛護他們。丁玲同志在解放後這個階段，固然做了一些工作，但由於她驕傲自滿，把個人放在黨之上，損害了團結，也給工作造成了損失。這三個階段丁玲同志都沒有經得住考驗，對黨不起。丁玲同志對前年的鬥爭，完全採取翻案的態度。希望同志們討論，看丁玲的錯誤是不是該批評，前年的會到底錯了沒有？

最後，周揚號召與會者：

我們一定要團結，但團結不能沒有鬥爭，不能沒有是非，團結必

須要有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在黨內說就是黨的原則，要根據黨章辦事。那種資產階級的“良心”“公正”等等的濫調，我們不要聽，最好不要在這裏講。我們必須實事求是，辨明是非，堅持原則，加強團結。在黨內我們要按黨的原則辦事。要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講話，否則就沒有共同的語言。³⁹

周揚的講話，已經為清算丁玲的問題定下了調子，剩下來的事情就是讓與會者加以發揮了。

這一天的會議上，前後發言的有邢野、張光年、田間等人。與休會前的會議連在一起，這是討論丁、陳問題的第四次黨組擴大會議。

26日，周揚給郭小川打電話，詢問昨天會議的反映情況，並談及了陳企霞與柳溪關係的一些材料。晚上9點，林默涵和郭小川一起到邵荃麟處，傳達了中央書記處對文藝界反右派運動搞得太慢的批評意見。

這一天，明瞭批判陣勢的陳企霞，才想起給按柳溪的要求寄出一本小冊子。27日下午五時半，這本小冊子到了天津，轉到了方紀的手上。但這時，按照柳溪自己的說法：她已經跟陳企霞永遠告別了。⁴⁰

27日上午八點半，黨組擴大會議開始。首先發言的是楊犁，其後為張松如、周立波，最後，在整風中否認了對丁玲指控的康濯，又作了對丁玲、陳企霞揭發的長篇發言。

這是第五次會議。

會議結束後，劉白羽與郭小川等人談了天津之行的收穫。為此，他們確定，在下星期二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議上，讓方紀先來講講經過，其後再讓柳溪到會上揭發。

下午兩點半，會議接着進行，黃其雲、戈陽、沙汀等人又作了

39 《周揚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5。

40 《方紀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3。

發言。這是第六次會議。

根據這兩天會議的情況，作協黨組決定擴大會議的參加者，郭小川在開會的期間，匆匆忙忙地擬定了“新的名單”。

大約這一天，王亢之、方紀、王林帶着柳溪來到北京，“住到武王侯胡同天津駐京辦事處一個幽靜的四合院裏”，由方紀“啟發”柳溪寫發言稿。周揚還專門接見了柳溪，並對王亢之等人說，柳溪算是起義，不要劃為右派，也不必開除黨籍，留黨察看即可。⁴¹周揚此舉，說明他對復會後打開陳企霞這個突破口有多重視。

28日，上午，劉白羽和林默涵商定了郭小川的名單後，交給張僖發出通知。晚上八點，他們又到周揚處，商量、安排明天和後天的會議。商量的結果是：“還是決定先由方紀發言，打爛他們的發言。”

29日，上午九點，作協黨組“把準備新參加會議的人和原來參加會議的左中派聯合開會”，由周揚介紹文藝界反右鬥爭的情況。實際上，這是為後來的會所做的一次動員。下午兩點，郭小川、康濯、陳笑雨、侯金鏡、俞林、胡海珠、黃其雲、陳白塵、張光年、周立波等人，一起讀了一遍柳溪交代的關於與陳企霞關係的材料，議論一下，為明天的會議作準備。

30日，上午，正在寫發言稿的郭小川被林默涵打斷。林說接到周揚的電話，一連串地提了幾個問題，諸如上次會議的反映如何，下次會議發言的準備情況，方紀的發言準備得如何。為此，林默涵和郭小川又一起來到了辦公室，商討這些事情。十一點，方紀來，向郭、林等人談了自己的發言準備。

下午兩點，第七次黨組擴大會議開始。首先就由準備已久的方紀發言。方紀根據柳溪的揭發，第一揭發了陳企霞在肅反中的表現，第二譴責了陳與柳的不正常的感情關係。這個經過精心挖掘出來的材料，自然給陳企霞以極大的震驚。

41 柳溪：《往事如煙》（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頁221—222。

親歷此次會議的唐達成的回憶說：“那一刻，我看陳企霞，他下意識地站了起來，一截木頭似的杵在哪裏。他大概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是仍然坐着還是已經站了起來，一支筆仍然捏在手裏，眼珠子卻不知茫然地望着什麼。”⁴²儘管震驚，但陳企霞並沒有完全垮掉。當一些人並站起來叫陳企霞交代問題時，陳企霞“初則不動，次則說沒有準備，再則說‘柳溪的話向來靠不住’”。迫不得已發言時，陳企霞仍堅持認為，前年的肅反把自己搞錯了。他承認與柳溪有過來往，但那不是秘密策劃。用郭小川的話說，陳企霞對“某些無可抵賴的事實，他承認了”，但對於“所有重要情節，他還是要‘賴’，會上態度蠻橫，堅決不肯吐露”。陳企霞的強硬態度當然引起了與會者的憤怒。

方紀發言後，《文匯報》的姚芳藻發言，把陳企霞通過柳溪找《文匯報》記者採訪作協黨組擴大會和丁玲的事情抖落了一番。

接受批判的丁玲，在最後作了“為自己辯解”的“冗長的發言”。丁玲的發言內容，從第二天張天翼、艾蕪、沙汀的聯合發言中對其的批判中可以看出：

對丁玲發言的意見：丁玲的態度看起來好像比陳企霞好，她承認1955年的黨組擴大會開的對。她承認前三次黨組擴大會是一邊倒，都說前年的會錯了，而她利用了這一形勢向黨進攻。她表示接受第四次黨組擴大會上同志們提的意見，特別是周揚同志的意見，也決心接受大家的幫助，要同志們揭露她的錯誤，說是決心改正。這表示得很好，我們聽了高興。但往下聽，我們就失望了。她說得太空洞了，不得要領，問題的本質沒有接觸到，並且還給人一種印象：她害怕，她是膽小鬼。她怕的是什麼？怕的是黨整她，這使人聽起來好像她在受黨的迫害，她有無限委屈。其次，她詳盡地敘述交待了和朋友們的關係，但她談的都是生活瑣事，至於如何串通和煽動旁人反黨的問題則未談……。⁴³

42 陳為人：《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美國溪流出版社，2005），頁52。

43 《張天翼、艾蕪、沙汀同志的聯合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頁29—30。

在當時的氣氛下，丁玲無論如何檢討，想必都不會令人滿意的。

會議結束後，為了動員發言，黨組決定要郭小川去動員戈陽、田間。周揚為此親自出馬，與郭小川一起去找田間。

7月31日下午，第八次會議召開。首先是張天翼、艾蕪、沙汀聯合發言。發言中，三人首先對昨天陳企霞和丁玲的發言一一批駁，然後是按照周揚在第四次會議上給丁玲的定調——一、南京時期，二、延安時期，三、北京時期——批判丁玲。

隨後陳企霞發言，“他說他已到了生死關頭，再不抵賴了”。陳企霞何以要轉變態度，下面再說。

陳企霞發言後，劉白羽作了長篇的的發言。

五、劉白羽的發言

翻看《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的發言記錄可以發現，對於這次大批判的領導者來說，何時發言是有一定的安排的。復會第一天是劉白羽、周揚發言，在其後，會議每進行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位領導者作長篇發言。這次會議是劉白羽；第十二次會議上是林默涵；第十六次會議上是邵荃麟；第十九次會議上是郭小川。這樣安排的原因，大致是繼續動員與會者加入到批判隊伍，控制會議的批判方向。

這天，劉白羽在發言中，首先把對丁玲、陳企霞開展的鬥爭提高到保衛黨的原則的高度來認識。他說：

我們向丁玲、陳企霞展開的鬥爭是原則性的鬥爭，還是無原則的糾紛？本來這問題是用不到說的了，因為這是一場嚴肅的保衛黨的鬥爭。可是，現在客觀上存在有這樣一種意見，特別是以丁、陳為主，他們有意地把黨的一場原則的鬥爭拉到無原則的糾紛中去。他們把這場鬥爭說成是“欺上瞞下”“違法亂紀”，散播許多流言蜚語，製造一種神秘氣氛。我在這裏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昨

天丁玲的發言，就其整個精神看來，她還是打着她那“這是無原則糾紛”的盾牌在向黨繼續進攻。既然如此，這就更有必要採取辯論的方式來把問題講講清楚，以保衛在這一場鬥爭中的黨的原則。

接下來，劉白羽左右開弓，先批陳企霞，後批丁玲。也許由於周揚在講話中沒有說到陳企霞，所以，劉白羽首先是對陳企霞進行批判：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我們和陳企霞的鬥爭是不是原則性的鬥爭吧：

(一)陳企霞到《文藝報》，是被黨派到《文藝報》去工作的，但是當他掌握了《文藝報》，後來就發展到黨絕對不能碰《文藝報》的程度，甚至有人要批評粗暴批評的問題都不行。習仲勳同志在53年一次電影界的會上批評了粗暴批評，陳企霞立刻說“作為一個宣傳部部長，講這樣的話不合時宜”。二次文代大會前，周揚同志根據中宣部一次會議的精神起草一個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對《文藝報》的粗暴批評提出批評。在討論這個草稿的時候，陳表示強烈的不滿，他絕對地不允許黨批評《文藝報》。第二次文代會不管陳企霞們的阻撓和反對，終於體現了黨的鼓勵創作，保護新生力量，團結廣大作家，反對粗暴批評的方針。歷史已充分證明這個方針是正確的。而陳企霞在中央提出這一方針後卻消極了，他對《文藝報》的工作採取了惡劣的怠工的態度。不久以後，《文藝報》上卻發表了李琮批評李准的文章，這就更進一步直接地違反了這一方針。當時黨組收到了於黑丁同志不同意這種粗暴批評的來信，便採取了合乎原則的態度，向這種現象展開了鬥爭。陳企霞在黨組會上就大吵大鬧拍起桌子來。黨組做了決定，責成馮雪峰和他寫信給於黑丁同志表示態度，馮雪峰同意了，陳企霞卻拒絕簽名，而且罵馮是向人家“投降”、“磕頭”。這封信還是發出去了，陳企霞卻有意地把一些同意李琮文章的讀者來信在《文藝報》的“內部通報”上發表出來以與黨組

的決定對抗。陳企霞就是這樣把《文藝報》當成自己的地盤做了很多反對黨的事，我想再舉下面這一件事也可看出他的反黨態度。黨為了工作的需要曾經考慮在作協內部調動一下陳企霞的工作。一個黨員服從黨的分配，這應當是自己的光榮的任務，而陳說這是“調虎離山”。十分顯然，陳是把自己視為“虎”而把《文藝報》視為“山”了。請問我們在這些問題上和一個黨員進行鬥爭是不是應該的？這到底是原則性的鬥爭還是無原則的糾紛呢？

(二)陳企霞對黨蠻橫謾罵，誣毀黨的紀律，使很多同志早已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了。他在黨的會議上常常拍桌吵鬧，無禮謾罵，如有一次選支部委員，有人提了他作候選人，陳竟然在會上喊叫“選了我也不幹”。又如他隨作家代表團訪蘇時，他和一個團員同志吵的很厲害，使得一個蘇聯老同志都提出了抗議。回國後黨支部對他進行批評，他又大聲吼叫：“有良心的黨員站起來！”吵得會議無法進行下去，這不是違反黨紀是什麼呢？這不是根本拒絕黨對於他的批評是什麼呢？這不是說明他早已就是一個反黨的“英雄”了嗎？但是陳企霞對自己對黨的蠻橫謾罵是很得意的，他在黨的會議上亂吵亂罵之後，還跑到《文藝報》編輯部去宣揚他的“勝利”，並且他經常在編輯部青年人面前宣傳傲骨、抗上的思想，還提倡“士為知己者死”，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一天了，到中央檢查《文藝報》時就更露骨了。當時文聯在開會，中宣部，作協黨支部也都在開會。一次在中宣部的會議開會前，他曾和雪峰到丁玲家去，說“你們這些老同志再不站出來，我們就沒有活路了”鼓勵他們向黨反攻。果然那一天會上就出現了馮雪峰、陳企霞進行了反攻的局面。當時在文聯的會上陳曾做了兩次檢討，他在去年寫的材料中說出真心話，說那是“敷衍了事的檢討”，說其他檢討也是“應付式的檢討”。而且陳在背後煽動說：檢查《文藝報》是“吳三桂借兵”是“殺雞給猴看”。後來中央發動了反胡風思想的鬥爭，他說這個鬥爭是中央要保護周

揚。他連一個字也不寫，也不參加鬥爭，反而暗地裏寫信給別人說“這是大自由主義整小自由主義”。這時他從在黨內對黨進行謾罵，實質上已經發展到進行反黨活動地步了，我們對陳的這種現象進行鬥爭難道能說是無原則的鬥爭嗎？

(三)丁、陳結合損害黨的團結，發展到反黨地步。陳企霞說丁玲是“文藝界的旗子”，丁玲也曾在一個材料中承認她對陳有無原則的信賴、縱容、包庇。在這裏，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了。當黨決定丁玲任《文藝報》主編，陳企霞、蕭殷任副主編時，陳大發脾氣說“主編就主編，什麼副主編！”後來丁玲就不惜犧牲黨的組織決定來遷就他，《文藝報》印出來果然就是三個主編。同時他們在《文藝報》編輯部講了許多無原則的向黨鬧獨立性的話。他們總說黨是不支持《文藝報》，要取消《文藝報》的。可是我們要問：黨不支持《文藝報》為什麼要委派丁、陳去編《文藝報》呢？等到《文藝報》受到黨的批評期間，陳就說《文藝報》是“涸轍之鮒”，大家要“相濡以沫”，這樣就把編輯部人員拉離開黨，從思想上，一步一步，牢牢地放在他們個人影響之下了。所以在這次整風期間、在大鳴大放中，《文藝報》一些年青同志暴露出來那樣反黨的情緒是不奇怪的。不僅這樣，而且丁、陳在黨內還進行無原則的互相支持的。當時中宣部曾考慮把文學講習所改變成為一個輔導青年寫作的機構，今天回顧起，應當說這是一個非常合乎實際的好的建議，但這件事引起丁的很大不滿，於是與講習所無關的陳企霞也在一次黨組會議上討論這問題的大吵大鬧，以致使會議無法進行下去，這又是為什麼呢？而丁玲在檢查《文藝報》的過程中對陳的錯誤也是支援的，丁去年交待的檢查材料上也不得不承認：她當時在黨的會議上的發言是“對他的錯誤的支援”。我們要問：在黨的生活中為什麼要有這樣一種私人的支持呢？我們知道，黨是民主的，允許黨員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絕不允許這樣違反黨的原則的互相包庇和支持的。受了批評之後，陳還拉攏編輯部人員說：“我已經被遺忘

了，我的墳上已長滿了青草”。把同志們的批評，說成對他“糟踏了一頓”，對黨派去接替他的工作的新編委施以攻擊。甚至對柳溪說：“我有一隻手槍，還有七粒子彈，剩最後一粒打死我自己。”充分暴露了他對黨的深仇大恨。陳企霞與丁玲之間是這樣的，但對其他同志的態度卻是很難讓人容忍的，陳常常謾罵某些黨員作家“精神狀態低下”，某些黨員作家是“膿包”，某些黨員作家是“向上爬”，事實上，這一些污罵的語言，早已是我們在黨的會議上經常聽慣的陳企霞的語言了。如果我們和這種現象做鬥爭能說是無原則的嗎？我們能忍耐嗎？我們應該忍耐嗎？老實說，過去對陳企霞對黨的謾罵，我們的忍耐不是太少而實在是太多了。

(四)陳企霞在道理品質方面也是極端墮落的。今天陳承認了他和柳溪的男女關係問題，但陳何嘗只在柳溪問題上是這樣，陳和另一個女同志周延的男女關係問題上，早已就表現出陳的道德墮落了……

至於劉白羽對丁玲的批判，基本上是以周揚在7月25日會上的定調，只不過隨着批判的深入，上綱上線更高而已。他在發言中說：

下面我想談一下丁玲的問題：來看一看我們和丁玲所進行的鬥爭是不是象她所散播的那樣“欺上瞞下”“違反亂紀”？我們是和丁玲做過鬥爭的，我們從來不想隱晦這一點。因為作為共產黨員，對不正確現象做鬥爭是他的神聖的職責。我認為丁玲與黨之間缺乏最主要的東西，便是一個黨員對黨的起碼的忠誠。而丁玲在第三次黨組擴大會議上公然反對別人說忠誠二字，請聽！她說那是一些“空洞的恐嚇的話，什麼‘只要忠誠’”等等。我們不免要問問丁玲！你為什麼這樣怕人家說忠誠呢？對這問題，我們肯定的一定要談，今天談，將來也要談，沒有對黨忠誠這一條，一個共產黨員憑你怎樣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行，這是考驗一個黨員的準則。

(一)先談談丁玲在南京的一段歷史問題：丁在1933年5月在上海，由於丈夫馮達的叛變被捕，當時在場的有我們黨江蘇省委員宣傳部長應修人同志，他在搏鬥中跳樓犧牲了，應修人是我們從心裏敬佩的同志，當場的還有潘梓年同志，後來他被關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鬥爭一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他是光明磊落的走出監獄的，是一個好同志。但丁玲背叛了黨，丁是在大叛徒、特務頭子顧順章家裏屈服的，她向敵特寫了書面的東西。那以後他就接受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津貼。馮達把叛變出賣的實情告訴丁，以後馮天天到南京道署街CC特務機關“辦公”，但丁還繼續和他同居。對這些背叛黨的可恥的行為，丁玲向黨隱瞞了七年之久。中央負責同志曾兩次審查她歷史，她卻狡賴不談。一直到1943年延安審幹時實在無法掩蓋的情勢下才交代了這件事，但同時她也編制了、偽造了許多使黨無法分辨清楚的東西，因此黨無法給她做出歷史結論。請問在這種情況下，黨提出丁的歷史問題來進行審查，是原則問題還是無原則糾紛呢？

(二)我們再來看一看，作為一個黨員作家的丁玲，在黨處於最困難的時候，她的表現又怎麼樣呢？在這裏所指的是1941—1942，革命遭遇到嚴重困難的那個關頭。當時，國民黨封鎖陝甘寧邊區，使得我們沒糧食吃，我們還都記得，是毛主席號召我們進行勞動生產，很多同志引以為驕傲的，是用自己的雙手養活了自己，大家穿着補綻落補綻的衣服，和黨緊緊站在一起渡過困難。這時正是日寇在敵後進行瘋狂掃蕩的時候，在國際上正是希特勒包圍斯大林格勒的時候，無論在國內、國際都是革命最困難的時候，這不是黨考驗每個黨員的時候嗎？但是丁玲正在這時候寫了《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立刻受到了國民黨的喝采。丁玲卻一直到現在還為她的《三八節有感》辯護，去年12月，她寫的“辨正材料”中寫道：“《三八節有感》至今我不能認為是反黨的”，那麼，我們就用事實來說明吧！這裏我們可以看看國特機關編的這一本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很有意思，

這小冊子是從阿壘那裏得到的，可見，反革命分子是如何把它作為反黨的“寶鑒”而珍藏着的。現在讓我們講一講這本特務機關小冊子中的幾段吧！

“……因此延安在黑暗中響遍了苦悶的呼聲，日復一日，這呼聲從壁報上表現到刊物上，從刊物上表現到中共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言人的這一片苦悶的呼聲從廣大的青年轉到無數的黨員，從黨員到幹部，從幹部到文化運動領導者，一直騷動到中共的中央研究院。同時這一片苦悶的呼聲，由秘密的轉向公開的，由失望的轉向憤恨的，甚至將號召的轉向實際鬥爭的。今年春天，在延安這呼聲達到了頂點。”

“……三月九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三八節有感》，這一篇文章告訴我們陝北的婦女們苦悶生活的全貌，丁玲是共產黨員，是中共婦女和文運的權威，她的話當然是可靠的。”

“……這段文字(指《三八節有感》)說透了陝北婦女地位的不平等和遭遇的歧異，這段文字揭露了陝北紙醉金迷，阿諛和憤恨的交流。”

我不想在這兒多讀了。同志們！這不是像白紙黑字那樣清楚的事情嗎？《三八節有感》被誰反對？被誰歡迎？它不是在革命與黨最困難時，從堡壘內部發出的反黨的冷箭是什麼？如果，我們在這問題上和丁玲展開思想鬥爭是無原則的還是原則性的鬥爭，這不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嗎？

(三)我們再來看一看勝利以後，丁玲怎樣了？我和丁玲過去在一起工作過，也和她鬥爭過，但，作為一個黨員，我們任何人都對她抱着期望的。不過，在勝利以後，不少同志感到丁玲的驕傲自滿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我們惋惜，但無法挽救。因為對丁玲說一點不順耳的話也是十分困難的。她寫了“記游桃花坪”，問我對這篇文章的意見，我宛轉地說不如“糧秣主任”，可是她馬上說誰誰說比那篇還好。這使人還怎麼說下去呢？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的驕傲自大，使得丁玲把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原則、標準早已

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她公然可以說出：“幾年來是靠蘇聯吃飯。”為什麼要講這樣的話？講這樣的話，把自己與國家、與人民、與黨的關係置於何地？她不知道她之得到斯大林獎金，不是黨與人民所給予的嗎？可是，從實際上看，丁玲發展到這種地步並非偶然的；就在我前面已講過的她給陳企霞的信中，就早已透露出她的不可一世的思想，信中說：“‘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你所喜歡的作品，‘時代青年’的同志說這篇作品不易懂，我只笑了笑，讓郭沫若去領導讀者吧。”請聽！丁玲狂妄到了什麼地步，丁對茅盾、老舍、巴金先生也常常是不尊重的。她對黨內的作家又採取什麼態度呢？我不多講，只講丁玲說：“總是把趙樹理壓在我的頭上。”這件事就夠了。其實趙樹理又在什麼時候壓在丁玲頭上了呢？但丁玲的個人野心是無限的，她對別人的嫉妒、排斥、而想把一切榮譽、地位只屬於自己“唯我獨尊”。當我們在這莊嚴的會議上批判一個黨員來揭露這些事實時，我們的心裏是難過的。因此我必須在這裏說明：她的意思是絕對不能代表我們任何一個黨員作家的。黨教導我們，我們是尊重五四以來革命文學的先驅者的；我們也尊重我們的同代的作家，同樣也尊重比我們年青的而走在我們一起的同志的。丁玲這種腐朽的思想，只能引起我們的憤慨。

丁玲把她和黨的關係的位置擺的是很不恰當了。這種狀況，在一個時候內也許還可以掩蓋，但是絕對不能長久掩蓋下去。丁玲在《文藝報》創辦時，竟然狂妄地說《文藝報》的方針是他們幾個人定的，不是文聯定的，也不是黨定的。那麼你是誰？你不是黨員，你不是黨委派到《文藝報》去的嗎？可是她們從來就是這樣把事情說成是她們幾個人，而貪天之功的。

丁玲對黨的不滿是嚴重的，丁玲對黨的領導，對黨的具體領導人的攻擊那可以說是不勝枚舉的。但，我必須說明一點：丁口頭上所說對某一個具體領導人有意見，這實際上只是她們造成的一種煙幕。正是在這煙幕掩蓋下她達到她放手向黨進攻的目的。我最

不滿意的是：丁玲對黨具體領導人的攻擊，採取了兩面的手法，她在公開的會議上說對某某同志沒有意見，但背後卻盡情地攻擊這個同志，他[她]是十幾年如一日，隨時隨地，煽動散播反對周揚同志不遺餘力的。可是，根據現在已揭穿的材料，她何常只反對周揚同志，她幾乎反對遍黨委託在文學方面作工作的每一個人，她這樣反對的結果，就是黨絕對不能領導文學。試問，把黨委託工作的具體的人都反對掉，那還談得上什麼黨領導文學的原則呢？在這一點上，丁玲和一些右派分子，所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黨不能領導學校是完全一樣的。解放後，我們一度給丁玲虛偽假像所迷惑，認為丁在勝利後有進步。黨委託她做很多工作：當時她是文協的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文藝報》主編，宣傳部文藝處長，文學講習所所長，黨對他的信任是應該的，黨幾乎把文藝界的領導責任都交給了她，而希望她好好努力把工作做好。但是事實上，在那段時間，她並沒有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點，反而滋長着嚴重的個人野心。從我個人接觸中，特別到了四中全會後的學習會議上，我確實地看出了她的兩面手法，在那次會議上，我們是抱着團結之心的，我們曾以批評自我批評方法要求文學方面黨的領導核心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可是丁在那次會上輕描淡寫，沒做深刻的檢討，也並沒說出她經常背後攻擊的那些問題，為什麼？事實上，她就是不放棄這種對黨領導的攻擊，這樣做必然就會發展到更露骨地反對黨的地步。在檢查《文藝報》時期，她就發展到了這一地步。丁最近常常喜歡說：我從那個時候就不負責工作了，好像這樣一來就什麼事都與她無關似的了，她也就不會有什麼反黨了。其實是不是這樣呢？不，我想一個共產黨員不能這樣認識問題，任何時期我們都不能和黨內鬥爭、黨的生活孤立地分隔開的，同時，丁玲也並不是這樣真正不活動的，所謂“無關”，只不過又是一種煙幕而已。在檢查《文藝報》時，她在中宣部會議上佯做檢討，可是背後卻說中央檢查是《文藝報》倒楣，那麼，我們不是可以問：你認為《文藝報》

倒楣這話為什麼不公開的宣傳部會議上講，而要背後講。不但在北京講，而且到杭州還講了“整陳企霞就是整我”呢？丁明明知道檢查《文藝報》是中央領導的，丁這態度，不是從骨子裏反對黨是什麼呢？這又如何能解釋成為只是對黨的某一個領導人的意見呢？不能。

總之，我認為丁玲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對黨不忠誠。我們看一個人，要是歷史的、全面的，丁玲在幾個重大關鍵上，都是不忠誠老實的。我們對她這一系列反黨事實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進行鬥爭麼？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說這是原則性的鬥爭，這是保衛黨的原則，保衛革命的利益，保衛黨的統一和團結的鬥爭，我們絕不允許有人進行混淆大是大非的陰謀活動。我們還應該肯定說明，從1955年到今天的鬥爭，都是黨領導着進行的，正因為如此，我感到參加這個鬥爭以來受到了極大的教育，黨的一貫的階級路線是非常明確的，今天回顧起來這一點就更加明確，黨的神聖的原則，是絕不允許任何人損傷和破壞的。我們保衛黨的原則，必須象保衛自己的眼珠、保衛自己的生命一樣的。丁玲在大鳴大放期間，向黨進攻時，曾迷惑人們的視聽，喊叫什麼要都攤開來，丁玲質問我們，就好像我們還有什麼秘密沒有攤開來。丁玲要追查我們就好像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追查的。現在我們就攤開來了這些東西。我們要問一問：對這一切不鬥爭行不行？我們鬥爭是不是合乎原則？我們必須堅持：文藝界無論如何不能同反對黨的領導的現象妥協，若不做鬥爭就等於幫助這種現象，就等於削弱黨對文藝界的領導，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針對肅反甄別、整風鳴放期間，丁玲、陳企霞等人對“五人小組”的攻擊，劉白羽檢討自己的工作，再有針對性地對丁陳予以反駁：

丁玲昨天的發言比前有了“轉變”，前三次黨組會地向黨做了進攻，特別是第三次黨組會議上她的發言就是這個反黨集團向黨進攻的最高潮。昨天她終於抽象地承認了她是向黨進攻了。但她

的“轉變”究竟是什麼？她的全篇發言，就是使人感到她是受了委屈，黨的生活是沒自由，是陰森可怕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問：這是不是又一種形式的進攻呢？事實上是給人這樣印象的，她想用“委屈”眼淚，騙取同情，而來更陰險的進攻。不過，我們要嚴正地告訴她：我們這個會一定要按照黨的原則，一定要堅決地鬥爭，不一定要徹底地鬥爭，否則是不能爭取一個新的基礎來達到團結的。

(一)我想先談談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問題，我想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掩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肅反、黨內政治思想鬥爭是黨領導的，但作為具體執行黨的政策的人，我們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作為五人小組、黨組負責人我應當對缺點和錯誤負主要責任。

我檢查我的缺點，主要是“左”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期間我有偏激過火的地方，這表現在初期排隊的面較寬，以後二次三次排隊逐漸做了糾正，但時間比較遲了些，因而也就鬥錯了一些同志，鬥重了一些同志。我個人對這些鬥爭、鬥錯的同志都負着責任，都應當向他們陪禮道歉，特別對李又然的隔離，我曾經在肅反總結會議上道過歉，也曾兩次到他家去道過歉，但今天我還向李又然道歉。當然李又然有着許多違犯黨的原則的錯誤，我不能因此放棄鬥爭，可是對於李又然由於肅反而引起的感情上的委屈情緒，我並不過份責備，如果李能站穩立場掌握原則，在這次會上我們展開批評，話儘管尖銳，我們是不會有反感的。另外，也有一些善後處理不完善的。比如對廠民同志的鬥爭，就是這樣的。當時是有材料的，缺點是後來沒有把審查結果在同樣規模的會議上加以宣佈。那麼，今天我就代表五人小組在這個會上宣佈廠民同志政治歷史上，經我們審查清楚沒有問題。但不管怎樣說，由於我個人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在肅反運動總結之前，我和一部分被鬥錯或鬥重的同志談話，我聽了同志們一些心裏話，其中包括在各種會議上對我們的批評，我覺得

都是好的，對我們是有益的幫助，有力的針砭。我感謝許多同志式的批評，我認識了由於自己錯誤而給予同志們的內心不易磨滅的損失，我在現在以致將來，對這些同志都是永懷着歉意的。在黨內對丁、陳進行的政治思想鬥爭方面，我們也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譬如對匿名信的追查。當然查清這封匿名信是對的，因為正在黨對胡風反革命鬥爭最尖銳的時候，有這樣一封匿名信寄給少奇同志，信中說寫信的人是作家協會的，而且很顯然是來自黨內的，這封信對中央檢查《文藝報》的問題翻了案，並對黨進行了攻擊，（現在，陳企霞在第十次擴大會議上已交代這些匿名信果然是他寫的，是他反黨的陰謀的一部分）我的偏差是在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以後，肅反進入高潮，群情激奮的，對這個追查匿名信問題的掌握如果更恰當、更慎重些，對鬥爭會更有好處。還有，就是當時對有些材料的查對復審不夠，材料中有誇大的地方，這都表明我們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的。

但同時我也有右的缺點，特別是表現在鬥爭的後一時期，肅反總結時期，對一些反對肅反運動的謔言沒有進行堅決的鬥爭。陳企霞在總結會議上說：作家協會的肅反是無反亂肅，收穫是燒了房子剩下了木炭。別人給他提了意見，他說我要更正：剩下的還不是大木炭而是小木炭。陳在肅反總結會議上，誣毀黨的肅反運動的態度是極端惡劣的，而我在這問題上表現了軟弱，我只注目作協應當爭取得到一個總結，這樣是對大家有益的，是對工作有益的，而陳這個人從中破壞，阻撓，一時無論如何是說不清的，因此我主張忍耐，而沒有立即對他堅決進行鬥爭。這說明我沒有敏銳的意識到這就是他更倡狂反黨進攻的信號，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和李又然已經密謀計議的重要的反黨活動，事實上，他的發言成為公開反黨的號召，由於他的號召、挑戰，由於我們沒及時揭穿，由於波、匈事件的影響，由於黨的工作者中間的某些右傾思想，還由於文學界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又抬頭氾濫，就影響了一些心懷不滿的分子向黨進攻。因此有些人在這空氣下便別有用

心地進行翻案，連自己的錯誤一點不談，就是一味地向黨進攻。我現在認識清楚了這問題，我今後要堅決改變這右的態度，堅決鬥爭，凡要這樣做的，就把一切攤開，弄清大是大非。對某些同志採取寬大、容忍，為了爭取團結，本來是應該，但反黨分子、不滿分子，卻利用這一點，反而向黨進行了攻擊，這是一條應當記取的深刻的教訓。我們要指出，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理由誣蔑我們的肅反運動的。作協在肅反運動中審查出三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後來，在審幹階段又查出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現在我們問陳企霞：四個歷史反革命分子，這為什麼是小木炭呢？

所以有以上所說的“左”的和右的錯誤，主要是由於我有着主觀片面的思想作風，常常抽象的掌握原則，而缺乏細緻的實際的工作，與群眾聯繫不夠，在鬥爭發動起來時，容易迷失於轟轟烈烈的形勢，而放棄了全面觀點，不能多聽反面的意見，反復考慮問題，我有時容易從表面現象出發，孤立地將一些“左”的表現認為是對黨忠誠的表現，這就容易引導鬥爭走了某些彎路。這一切對我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我一定記住我對同志們的責任，堅決糾正錯誤，努力團結。但是，在檢查錯誤的同時，我們必須指出，任何個人的，局部的缺點和錯誤，絕不能影響我們的肅反運動和黨內批判丁、陳的鬥爭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而且我們必須駁斥那些“無反亂肅”說肅反積極分子是“踏着別人鮮血前進的”種種反動的言論，我們必須揭穿象丁玲那樣抓住具體工作中某些缺點，便把自己說成是黨內的“貧雇農”，要想借此推翻自己反黨錯誤，並向黨進攻的陰謀活動，我們必須同這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作堅決的鬥爭。

(二)現在我要進一步把是黨委屈了丁玲，還是丁玲向黨進攻的問題講清楚。據我所知，黨對丁玲的爭取、團結，是仁至義盡了的。黨對於她是時時刻刻都寄予期望，給予重任的。就是從1955年起在對她進行思想批判並審查歷史的情況下，黨對待丁玲的創作、工作、地位以及應取得的一切待遇，絕不是減少了，就是連

丁玲自己捫心自問，也應承認是相當多了，而且太多了。丁玲昨天發言有兩點基本精神，應予以揭破：第一、我有錯誤，是因為我受了委屈而來；第二、我本來好了，但是由於受了委屈，所以後來又犯了更嚴重的錯誤。就是黨對不起她，好像黨使她犯了錯誤。我認為在這裏包含着一個原則問題，到底是誰損害了黨，還是黨損害了你，這一點必須在這次鬥爭中弄得清清楚楚。前年的黨組擴大會，是一場政治鬥爭，也是一場思想鬥爭，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作為一個黨員，一個階級戰士，不應對這有怨言，也不能成為有委屈的理由。就說歷史問題吧，黨在那樣情況下，還是保護丁玲的，就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到黨組擴大會議上來談。儘管在處理丁玲的歷史問題時，丁玲的態度非常不好。實際上黨絕不像她所說的那樣不負責任，而是由中央所特別指定的一個專門小組，由張際春同志負責，來進行的。這還不是黨的嚴肅負責的態度嗎？在這過程中，丁玲的態度不好，黨批評了她，這只能說明是黨對一個黨員原則的幫助和溫暖，而任何人都沒絲毫理由把這當作委屈的。

另外，我們談談是不是黨限制了丁玲的自由？因為在丁玲昨天的發言裏，把她自己形容的好像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似的，事情真是這樣嗎？她很自由，甚至自由到可以到很多人家裏去講反對黨的話，去煽風點火，難道這還不自由嗎？但問題是在於丁、陳他們總要背着黨作一些見不得人的事，因此丁玲約陳企霞到她們家裏去，都要選擇時機，避開她家的公務員；因此陳明給陳企霞打電話要裝作女孩聲音，因此他們訂攻守同盟要夜間約在街頭上秘密進行，這就說明丁玲不是不自由的，而她要的是反黨的自由，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對於丁玲在這會議上繼續玩弄她是“貧雇農”，是“從墳墓裏出來的人”這種兩面派的陰謀，我們必須給以揭穿，給予回擊。

事實上只要能夠達到團結，只要丁、陳能夠積極的靠近黨，檢查自己的錯誤，交待自己的問題，黨時時刻刻對她們都是採取歡迎

的態度的，為了達到團結，作協黨組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檢查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為了達到團結，也曾經考慮過只要丁玲、陳企霞認識自己錯誤，就把“反黨集團”的帽子摘掉。這一切說明黨長期以來，一直是等待着丁玲的最後的覺悟。黨是如此，關鍵的問題是丁玲在這段時期內對黨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態度。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直到今天為止，她對黨仍然採取不忠誠，不老實的態度，並且變本加厲地向黨進攻，在損害黨。我不想多講，只想講不久以前，她對自己的歷史結論所採取的保留意見就足夠了。甚至現在當黨指出馮達早已是特務了，她還堅決不允許在結論上，寫馮達是個特務，而只允許寫叛徒。我們要問：為什麼這樣？你對馮達的感情是什麼？你對黨的感情又是什麼？她在結論中還有這樣的保留的意見，她說：“不知道顧順璋、汪盛棟、徐恩曾直接參予對我的欺騙與勸誘，”我認為她明目張膽地把這一條寫在她的保留意見書中，上交給中央組織部這實在是欺黨太甚了，當然，中央組織部後來已將這一結論退回重議。我現在用她自己從前寫過的書面材料來駁斥她這一保留意見；她被捕後五月間，汪盛棟親自勸說，還指出她是共產黨員，難道這不是直接勸誘嗎？七月徐恩曾出面勸說，難道這不是直接勸誘嗎？十月顧順章出面，顧送禮，徐送錢，以後她到了顧家，又打牌，又照像，後來就背叛了黨，還給顧順章抄過一次什麼文件，這不是顧順章直接參予勸誘又是什麼？一個黨員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就應該老老實實地低下頭認罪，隱瞞了七年之久，43年又沒有做出結論，現在還採取這樣狡賴的態度，這不是丁玲在損害黨，在向黨進攻是什麼？

我想在這兒，再來檢查一下丁玲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和行動，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今年五月到六月初這段時間裏，丁玲除了與陳企霞、李又然等勾結起來，佈置反對黨，分裂文藝界的大陰謀外，還到各處點火，根據葛文同志的揭發和徐剛同志的交待已充分證明這一點。我在這兒特別要指出5月28日丁玲在支部大會上

的發言，六月十三日在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是公開的，露骨的對黨進攻。首先丁玲唯恐右派對黨進攻不猛，當時在章羅聯盟掌握下的“文匯報”已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要陣地，而丁玲還嫌“文匯報”所發表有關文藝界整風的消息是“捧場”，誣織作協請黨外作家提意見是作協請了兩次客。浦熙修到她家去，她也向浦表示“文匯報”所發消息是說好話的，這是為什麼？為什麼那麼希望右派更猛進攻呢？丁玲對黨的仇恨，對右派的歡迎之心，在這裏不已經很清楚了嗎？實質上丁、陳反黨集團裏的人，在這場鬥爭的大風浪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認為匈牙利事件對他們是有利的，認為“時機到了”，於是他們大肆活動，從暗中煽風點火，到處公開地誣織黨，策動一些翻案，陳企霞不就這樣鼓勵柳溪說：“右派就右派”嗎？不是鼓動右派分子孫毓椿拒絕參加反右派的會議嗎？陳企霞不是通過柳溪去聯絡“交匯報”，爭取公開丁、陳事件向黨進攻嗎？艾青不是為了同樣目的在自己家裏招待“文匯報”記者，把黨內的底公開出來嗎？丁玲在爭取“文匯報”這一點上也許做得比較巧妙，而不過更陰險罷了，當浦熙修又訪問她時，她不是說“文匯報”的消息是說好話嗎？陳明不是公開對浦說：“你們來發動貧雇農來了！”這句話，不是把他們將右派分子當作土改時的工作隊一樣竭誠歡迎的心情都透露出來了嗎？這一切都說明反黨集團與黨外右派分子是立場一致，聲息相通的。

如果，丁玲對這一切還在狡辯，現在我們用她自己的發言來回答她的狡辯吧！在五月二十八日支部會上，她公開說自己是貧雇農，把自己說得十分可憐煽動人挑撥人，貧雇農是受地主壓迫的，地主又是誰呢？就是黨的領導。她還公然煽動地說：“我要警惕一些，有些人很會搞人的。”她說：“運動不能只有上級領導，沒群眾監督”。在整風期間，中宣部要黨員給中宣部領導提意見，她說：“這是中宣部要摸我們的底”。我不知道一個黨員，有什麼底怕黨摸呢？這樣說恐怕丁玲是真正有見不得人的底

吧？她還在支部會上說：“黨內有牆，黨外有溝，平均人人有份嗎？我看應整領導，還沒整呢，就表示最喜歡和風細雨”。“周揚對文藝界統治了二十年。”請聽，這和右派分子惡毒的誣毀有何不同？而陳企霞在同一支部會上，一唱一和，攻擊作協黨的領導是“做假事情”，是“變把戲”，說：“不要在我們面前玩這種花樣”。說：“做假事情轟轟烈烈，做真事情冷冷清清”，他們繼各處煽風之後，在這次支部會上就公開點火，煽動大家反對黨了。在這之後，果然，就出現了第一至第三次黨組擴大會議上的對黨的囂張的進攻，李又然在這些會上公開宣稱他們是審判者，公開煽動前年揭露他們的黨員向他們起義，而以丁玲在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達到了他們反黨的高潮，她惡毒地質問：中宣部長辦公會議的性質，追查中宣部長辦公會議的記錄，她說：“是口頭批准的，請拿出會議記錄來，是書面批准的，請拿出材料來。”還質問中宣部是不是代表中央？事實上，這就是丁玲對黨對她的長期的寬大、忍耐、爭取、教育的回答，這回答，就是瘋狂、露骨的反黨。可是，陰謀還不止於此，根據已揭發的材料，確確鑿鑿地說明：他們更大的反黨陰謀是準備在十月文代會上退出作協，公開分裂，陳企霞說他要公開發表文章“和文藝界告別”，丁玲也對葛文說，登報聲明退出作協，這就是整個的分裂革命的文藝隊伍，整垮黨對這一戰鬥隊伍的領導，我們應公允地，嚴厲地指出，這是丁玲在南京背叛革命之後，所準備的一次更大的分裂、更大的背叛。當然，烏雲遮不住社會主義的太陽，這一切反黨陰謀，在黨領導所進行的鬥爭之後，卻被揭穿，被粉碎了。從這一系列的事實，我們來看一看，是黨委屈了丁、陳，還是丁、陳損害了黨，這問題不是已經回答得明明白白了嗎？丁玲那種裝作“委屈”“可憐”的假面具應該拿下來了。⁴⁴

劉白羽講話中提到的周延，在華北聯大時是陳企霞的學生，

44 《劉白羽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4—27。

也與陳保持了超越一般朋友的關係。反右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周延，迫於當時的壓力，向出版社的領導交代了匿名信的寫作情況：陳企霞向她講述的，她找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老編輯抄寫的。⁴⁵這使陳企霞預感到，1955年的匿名信事件也一樣被擅長“搞材料”的人搞出來了。

因為有這樣的預感，所以陳企霞在會上有了“再不抵賴”的態度了。

六、陳企霞“轉向”

8月1日下午，第九次會議召開。由上午郭小川出面約請的曹禺第一個發言。隨後柳溪發言，交代與陳企霞的交往及陳所謂的罪行。“接着發言的有唐達成、艾青和魏巍代表十七個人”。

周延的交代和這次會議上柳溪的揭發，使陳企霞的精神瀕於崩潰了。這次會議後，他神態憂鬱，精神萎靡，一改過去不願在家人面前談論工作上事情的常態，把事情向妻子鄭重說了。陳恭懷在《我的父親陳企霞》中描述說：

（陳企霞）很傷心地對母親說：“我現在很可能過不了關，黨組擴大會議文藝界各方面的人都來了，有二百多人，會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緊，壓力很大。丁玲過去在南京被捕變節的事，組織上從未說過，我一點也不知情，平常也沒有聽她談起過，現在眾口一詞，斷定她那段經歷有問題，根本不聽她的分辯。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實際上是我們對周揚同志有意見，背後談論過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些意見沒有經過組織，有些自由主義，我是有些責任的。現在他們攻擊我的最主要問題是匿名信，矛頭都指向我。匿名信實際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對她說過一些情況，她認為我是冤枉的，就寫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寫的，所以作協儘管對我所有的學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對過筆跡，

45 1999年2月25日採訪張僖記錄。

也沒有查出來。反映事實是可以的，但不應該用匿名信的方式。我雖然沒有讓她寫，可她這樣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責任的。我現在只有把這件事說清楚，才能減輕我的罪責。我考慮再三，覺得應該把這些情況向組織講清楚。但我現在也很為難，過去我頂得那麼厲害，會議拖得那麼長久也沒有結果，就是因為我堅決不承認。如果我現在去說明真相，怎麼說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講，他們會不會相信呢？”

母親勸父親不要顧慮太多，說，你既然要向組織靠近，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顧慮，還是自己主動去講好。其他有什麼都可以講，不應該迴避，要相信黨，相信組織。那天晚上，他們一直談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多鐘。

父親談過之後，心理負擔減輕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這時母親倒緊張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黨教育，相信組織，總想讓父親採取主動，擔心他顧慮重重，醒來後會改變主意。考慮再三，她決定自己先去找作協領導談談。天剛濛濛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輕手輕腳出了大門，前往東總布胡同46號劉白羽同志住處。當時劉是作協黨組負責人。母親說有急事要找劉，請他接見。

劉白羽同志起身後問母親什麼事情，母親把昨晚父親說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並說父親現在已經認識到自己有錯誤，願意向組織靠近。

劉不大相信，說企霞這樣的脾氣不可能有這種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說的，在我們面前，他一向個性很強，輕易不肯認輸，可能他不一定願意談。

母親保證說，請組織放心，即使他到時不肯講，我也願意在組織面前證明這些話的可靠性。她請劉白羽同志把這一情況向周揚同志轉告。劉顯得很高興，說，我先向周揚同志匯報，你回去後在企霞面前先別透露，等我匯報完再去找他。

當天下午，周揚同志派了輛車，接父親和劉白羽同志到他那裏

去。劉很熱心地和父親握了手，說，你昨晚的情況，鄭重已和我談了。我已向周揚同志作了匯報，他要你去談談。父親什麼話也沒說，就上了汽車。

父親從周揚同志那裏回來，神態自如多了，對母親說，我一到那裏，周揚同志和我握了手說，企霞同志，你這樣很好，把問題談開了，我們相信你會改正的，黨是要你的。

這之後，父親一直在家等候。作協組織出面，為母親請了一個月假，說父親身體不好，需要照顧。

為父親的這次行動，周揚同志的談話和劉白羽同志的態度，母親感到很放心。她認為父親這樣靠近組織，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是正確的，而且作協組織和周揚同志一再保證“黨是要你的，是歡迎你回到黨內來的”，她以為事情一定會順利解決。

作協組織要求父親在大會上能把問題全說出來，從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問題。⁴⁶

陳恭懷的記敘雖然在細節上與張僖的回憶有小的出入，但大致使我們了解到陳企霞“轉向”的原因。另外，陳恭懷所敘述的這一情節，在郭小川日記中也有簡略的記載：

8月2日

……九時多到大樓，聽白羽說，陳企霞昨晚已交代，跟他的老婆談了一夜。鄭重五時就去找他，約定今天上午十時來談話。

十時，陳來，情緒緊張，首先就交出鑰匙兩把，而且說：這是罪證！然後又滔滔不絕地交代了他與丁玲、馮雪峰的關係。

講到一時，不斷使我毛骨悚然。

到定一同志處匯報，在他那裏吃飯。

從陳恭懷和郭小川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陳企霞的“轉向”是多麼地引起重視：周揚見陳企霞；郭小川要向陸定一匯報。在這些領導看來，陳企霞的“轉向”，不僅可以推動對丁玲批判的深入，而且表明他們的批判已經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難怪要如此重視了。

46 陳恭懷：《我的父親陳企霞》（南寧：接力出版社，1994），頁205—207。

在得知陳企霞徹底坦白的情況後，這一天，丁玲和陳明也表示願意交代。下午四點多，郭小川接到陳明的電話，“說如不交代，就無法生活下去”。五點多，邵荃麟、劉白羽、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一同與丁玲和陳明談話。

晚上，這些人一同到周揚處匯報。周揚告訴他們，“據說，定一同志請示小平同志，他主張後天就登報”。

8月3日下午兩點半，第十次會議召開。按照預先的安排，陳企霞在會上作了交代。

首先，陳企霞交代了匿名信的寫作情況：

三封匿名信有二封是我寫的，有一封是我說，由周延記下的。前年作協黨組擴大會討論的那一封，是我寫的，周延找她的同學抄的。以後我便到梅山去了。走前，我們談好，接到我的信後，她始可發出匿名信。但周延看到時機來到（按：周延這裏說的“時機來到”指1955年4月胡風反革命集團向黨進攻這件事——原注）沒等我的來信，她自己就把匿名信發出去了。我想，筆跡對不出，發信時我又不在北京，除非我坦白，否則誰也查不出……同志們眾口一詞說我是寫的，我就死不承認，甚至不惜犧牲。現在想來，為這一封信，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時間，而衛生以前卻把責任推給作協，還反問：你們計算一下，浪費多少時間、人力！

接着，陳企霞談到“同丁玲的關係及最近的反黨活動”：

通過陳明，丁玲同志和我直到開這次會議前還在訂攻守同盟。肅反以後我們見面確實很少，一共三四次。但我們兩人心照不宣，一句話，一個姿態都可以懂得意味着什麼。我們在一起活動太久了……我隔離出來後，她病了，我帶了老婆孩子去看她，陳明拒絕。我的小孩在他家台階上坐着，我很狼狽地回來了。當時，我有兩種心情，一是不滿丁玲，傷了自尊心，一是覺得丁玲還是聰明的，不見面大家方便。今天春天，丁玲又通過艾青向我說，她不能來看我，並表示歉意。

今天春天，陳明帶了一個小女孩到我家裏。那時我已成了“英雄”。因為我在作協肅反總結會上批評作協“無反亂肅”“違法亂紀”，把一切壞事都推在別人身上。丁玲以為又可以和我勾結了。我是死心塌地願意同她勾結的，因為沒她我不行。那次見面，陳明叫我晚上七點半去他家，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晚，他說公務員夏更起每週一、三、五晚七時半出去學習。他怕夏知道匯報。說我可以在這個日期的時間去他家。我七點半去了，我和陳明把參加會的人都作了估計，誰是同情我們的。我問丁玲怎樣，陳說，丁玲說我瘋狗似的亂咬人，其實有人是同情我們的，不要得罪。又問我同蒞子關係現在如何，要我動員蒞子發言。

以後，作協重新討論我們的問題。一次散會後，陳明偷偷約我去他家。丁玲接見了我。我們無所不談。那次我談到王實味問題。我舉出王實味為例，說翻案很難，假如有人問王實味下落，要公佈他的罪狀，怎麼得了。丁玲說：並不是沒有人提，現在右派分子中就有人提。

那天還談到退出作家協會的事。我說我要翻案，如果翻不成，十月開會時我要退出文藝界並寫“告別文藝界”一文。丁玲講她也退出作協。我政治上墮落到根本不認識這是政治問題。

黨組擴大會第四次會後，就在給柳溪寄小冊子的那天，陳明給我打電話，他用很奇怪的聲音叫我：“企霞叔叔，晚八點在東單八路車站等你，請你吃飯。”很久，我才想起來是陳明。他問我屋裏有沒有人，我說沒有。問他是不是陳明，他說是。當天晚上我去了。陳明蹲在樹底下，四面張望，像個小特務，我說：“你為什麼怕成這樣了？”他說：“我怕有人跟着。”他問我採取什麼態度！我說“全面駁斥”，並問丁玲態度怎樣，陳說丁玲是“逆來順受”。陳明說那天晚上我去他們家的事夏更起知道了，此事只好講，但日子向後移一天，就說路上碰到，我非去不可，去了也只談談作品。為什麼移一天呢？因那天丁玲到荃麟處去了，可以說路上碰到的。我說你為什麼這樣怕公務員？我心想，胡風不

也是這樣的嗎。他和丁玲覺得黨派人監視他們。

那次陳明來我家，鄭重知道，陳明要我囑咐她不要講。

楊朔在黨組會上發言說丁、陳不是反黨集團，不是獨立王國，我聽了很高興。我叫鄭重給陳明打電話，問丁玲態度，我表示仍然“全面駁斥”。陳明說，“說過的事情還是不變”（按：指他們訂的攻守同盟——原注）。所以前兩次會上我撒賴。

我從丁玲那裏聽到過很多消息，一定陸續講，希望大家幫助我，相信我。希望丁玲來揭露我。

我同丁玲長期工作中，感到丁玲一貫反對周揚，我也是反對的。但我們表現不一樣。丁總是說，周揚還是應該做領導工作的，我攻擊周揚太厲害時，她還批評我。她說周揚的手是冰冷的。我在上海左聯時，第一次見周揚時，我們握過手。昨天和周揚談話，臨走時也握了手。我昨天知道周揚的手是熱的。以前是我冷，不是他冷。康濯曾經說他重新找到了黨，丁玲、李又然和我都反對他這句話，認為這是喪失立場。現在我知道，康濯是對的，誰如果有我那種想法就是錯的。

丁玲最後篡奪思想和報復思想。她不是想當宣傳部副部長，全面的宣傳工作丁也自知不行。這裏的問題是爭名譽、地位和聲望。丁玲很愛羽毛，希望美麗的羽毛都是自己的。丁玲有報復心。丁強調自己不願做行政工作，其實不是。她在“人民文學”作主編時，我曾獻策，不要她當人民文學主編，專當中宣部文藝處長。這樣，手裏抓兩個刊物（按：指“人民文學”和《文藝報》——原注），可以批評。當時人民文學的同志對丁玲有意見，她要調康濯到人民文學。我說恐怕不行，堡壘要從內部攻破的，勸她在“人民文學”內部找幾個人圍在她周圍。她雖沒接受，但贊成我的看法。後調了蕭殷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到梅山時，去無錫看丁玲，我說，我處分期滿了，請她幫幫忙，替我說話。她說我不去。我覺得如果我有錯，她可以教育我，我受冤枉，她該為我說話，這種“我不去”的態度，用自由

主義來解釋是不行的。

我到杭州，丁叫我去看陳學昭，還叫買一點好糖帶去。我和陳學昭在延安吵過架，不願去，她勸我去，這是為什麼。

我到梅山是丁玲的意見。丁玲說陳登科是好人，茵子也在梅山，和我熟。她說他們可以幫我忙。

自延安和丁玲共事迄今十六年。可以說，她每次談話沒有不反對周揚同志的。

文藝報檢查時，丁玲、馮雪峰，和我曾在丁處吃飯。丁、馮說：“陣地都放棄吧”，我說“總要保持一個陣地，文藝報不能放棄”。胡風問題被揭露，我們三個人都有這種心情，怕將自己被捲進去。

丁玲同志的歷史問題我不知道。她和我接觸多年，只有南京一事從不和我談。我也聽說一些，但糊裏糊塗。我從前以為她被捕時有社會地位，因而被國民黨優待。我還想像她這樣大人物，政治上也許可以馬虎一些。⁴⁷

陳企霞的交代的確起到了震撼作用，以至於給參加會議的人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徐剛回憶說：

他(陳企霞)拿出和同居人租的房子的鑰匙，在手指上晃蕩着，承認了柳溪揭發的事實。接着他說他和丁玲熟了，一個眼色一個手勢便知道什麼意思，他說他和丁玲在近期聯繫過，在電話中用變調的聲音……⁴⁸

參加這次會議的李之璉回憶說：

會議進行中有一些人憤怒指責，一些人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氣氛緊張，聲勢兇猛。在此情況下，把丁玲推到前台作交代。丁玲站在講台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作答。她低着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

47 《陳企霞的檢討》，載《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的檢討》，1957年9月。

48 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頁。

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⁴⁹

陳企霞的交代，已經承認了1955年的批判是正確的了，在張際春領導下在復查甄別工作中主持工作的李之璉，也必須有所表示，承認自己的甄別工作是搞錯了。因此，在丁玲、陳明被迫交代後，李之璉作了發言。他說：

在這個鬥爭的過程中，我們有一些黨員同志出於一時沒有識破他們的陰謀，或者識破而沒有料到有這樣的嚴重，曾經在一個時候被他們的假像所迷惑，低估了他們的錯誤的嚴重性質，特別是機關黨委有幾個同志(包括我自己)在過去一個時候沒有看到他們錯誤的一貫性和沒有看穿他們的別有用心的目的。曾經考慮過把他們叫作反黨小集團是否合適，是否重了一些。但根據現在揭發的事實看來，這種看法是落後於事實的發展的，是對他們的錯誤估計不足，這是右傾的表現，這應作為一個教訓。現在已看的很清楚，他們的錯誤決不是一般的錯誤思想，決不是所謂自由主義的錯誤，而是一個蓄意良久的反黨的政治陰謀，是個小集團，有組織的活動。

也有另外一些同志，在這次會議中和在這次會議以前，曾被他們所蒙蔽，沒有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向他們鬥爭，卻幫助了他們向黨進行攻擊。現在這些同志應該看清楚了他們的面目和企圖，應該很快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堅決投入這個鬥爭。

陳企霞今天已經開始向黨低頭認錯，這是進步，但是，還僅僅是開始，他是否真心悔過，還要看他今後的表現。這個鬥爭現在對我們還不算勝利，只是勝利的開始深入。關於丁玲我們還看不出她的誠意和決心，她今天的發言還很不老實，她只是敘述了些瑣事避開了問題的實質，她必須徹底地完全地拋棄個人的野心，毫無保留地交代自己的陰謀，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能做到這個

49 李之璉：《不該發生的故事——回憶一九五五——1957年處理丁玲等問題的經過》，載《名人與冤案——中國文壇檔案實錄》(二)，群眾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需要說明的是，李之璉把這次會議誤記為7月25日的第四次會議。從下文的敘述可以看出，在那次會上，李之璉沒有講話。

地步就是他們自棄於黨，自棄於人民。

反對以丁玲為首的反黨小集團的鬥爭是維護黨的文藝方針路線的鬥爭，這個鬥爭的勝利就是黨的文藝方針路線的勝利，這兩者是不能並存的。現在這個勝利已開始深入，必須更進一步深入開展，徹底揭露這個集團的一切活動，批判這個小集團散佈的一切錯誤思想、這個集團不只是一兩個人，希望所有的人，凡是參與過他們的活動的人——直接或間接，一次或多次——都要起來揭發這個集團，並認真地交代自己，和這個集團劃清界限，把這個集團徹底粉碎，這樣我們的文藝隊伍才能純潔，才能團結，黨的文藝方針才能貫徹。

對於這次表態的發言，多年以後李之璉真誠地反思說：“在我的內心裏則認為這種講法，只是對丁玲等施加壓力，無助於解決是非。這在我是無法克服的矛盾。這個講話就成為我一次最大的違心之言。長期以來在我的心靈上是一種莫大的遺憾”；“我的講話應該認為是一個錯誤。因為在調查丁玲等‘反黨’事實的過程中，實際上否定了1955年作協黨組批判的結論。我這次講話表示了黨的‘一致’，就表明對作協黨組作法的支持。由於我的這種錯誤的遷就態度，就使主持批丁的人更無所顧忌了。從此以後，作協黨組繼續對丁玲等的批判和最後處理就不再徵求機關黨委的意見，而是由黨組直接向中宣部主要領導人請示”。另外，由於李在這個講話中承認了中宣部黨委的“右傾”，這也為日後清算他們的“右傾”的人提供了口實。

由於第十次會議被認為是“勝利的開始”，在接下來的會議中——8月4日第十一次會議、8月6日第十二次會議、8月7日第十三次會議、8月8日第十四次會議、8月9日第十五次會議、8月10日第十六次會議、8月13日第十七次會議，與會者都繼續揭發批判丁玲。

按照中央書記處的指示，這期間，在周揚主持下，從8月3日開始，郭小川一直為會議的報導而忙碌。會議報導稿經周揚修改後，

在8月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刊出：“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丁玲、陳企霞隨之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右派了。

為了配合批判會的進行，會外作協黨組抓緊了一系列工作。比方說，黎辛、劉白羽去找丁玲的兒子蔣祖林做工作，要他大義滅親，揭發丁玲的所謂反黨罪行；錢俊瑞、夏衍和郭小川做陳明的工作。陳明在電影局工作，所以由其單位的負責人和作協負責人一起與他談話。在8月10日與陳明的談話中，郭小川的目的是“只是想擠出一些材料來”，但關於丁玲的材料陳明沒有講出什麼來，就只好揭發“黨委會李之璉和崔毅的一些錯誤表現”，把去年幫助他們甄別的中宣部有關人員拋出來作擋箭牌——這也為後來李之璉遭清算提供了“炮彈”。而邵荃麟和劉白羽則與丁玲談話。

8月15日，在文藝界一次內部通報會上，邵荃麟、劉白羽、林默涵傳達幾位中央常委關於丁、陳問題的指示，為處理丁、陳定下基調。這些指示顯示當時嚴峻的尺度：“個人主義在文藝方面很厲害，略有成就就反黨，根本忘記他的成就是怎麼來的。知識分子有各種各樣的流氓性。不能有溫情主義，不要認為搞得過火了、面寬了等等。今天不痛，將來不知道要怎麼痛，將來就痛得不可收拾。頑抗的只好毀掉，淘汰一部分，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辦法。”

在這次關鍵的通報會上，劉白羽再三強調：“我們的鬥爭搞好，對全國是個推動。我們已經突破反黨集團，但離徹底勝利還差得遠。雪峰和丁玲之間的關係還沒打破。對艾青、李又然這些人要有各方面的材料，陳明在北影搞，馬烽、白朗交代丁玲的問題太少。不要放鬆丁玲……”

林默涵說：“丁、陳問題不僅是作協的事，而且是整個文藝界的事，各方面的鬥爭都與丁、陳問題有直接、間接關係……這個問題在文學史上十分重要，這是個重要的歷史事件。”⁵⁰

50 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114。

七、對馮雪峰의 批判

對馮雪峰的批判，是8月6日第十二次會議開始的。

7月25日黨組擴大會復會後開始後，在前幾次會議上，火力都集中在丁玲、陳企霞身上，雖然有人提出了馮雪峰文藝思想的問題，但並沒有借此來清算他在三十年代的問題。所以，在8月4日第十一次會議上，馮雪峰針對對他的一些揭發，主動作了檢討。但是，這個檢討，在一些人看來，是不能過關的。此後，在會議主持者的引導下，在揭批丁玲、陳企霞的同時，馮雪峰沒有機會再逃避了。

在8月6日的第十二次會議上，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作了發言，他在對丁陳批判了一通後，把矛頭引向了馮雪峰：

我還想對馮雪峰同志說一點意見。

馮雪峰同志是我一向尊敬的老同志。但是我覺得，他在和黨的關係上，在文藝思想上都是存在着錯誤的。上次他的發言，講的事實很少，但我同意他對自己思想的想法，就是：

(一)跟黨的關係長期不正常，主要根據也是由於他有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有很重的包袱，有一種委屈情緒，總覺得黨對不起他。因此就容易同一些對黨不滿的分子結合起來。對於新社會，他總是容易看到陰暗面。他常常說人家做官，這就不是一種自己是新社會的主人翁的思想。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其實正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強烈的地位觀念。這一方面，我想很多老同志更了解，我不想多說。

(二)他的文藝思想是同黨的文藝思想，具體說是同毛主席的文藝思想相違背的。馮雪峰同志有一些好的文藝見解，但是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重要的在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看法不對。1946年他用“畫室”的筆名在重慶《新華日報》副刊發表一篇文章，是正面反對毛主席關於政治性與藝術性的關係的說法的，而且用很輕蔑的口氣說：“提倡政治性的先生們，如果我

反問三次什麼是政治性，你能回答出來嗎？”（大意）他的論點是說政治性藝術性這種說法本身就不對，說藝術作品凡是有社會價值的就是藝術性高的，否則就是藝術性低的。政治性與藝術性是統一的，但同時也可以存在矛盾。怎麼能否認有些作品有較好的政治內容，而藝術性上比較幼稚一些呢？比如無產階級的文藝在初期就是如此，它歷史很短，在藝術上比較幼稚，比較不成熟，但它有比過去的作品更高的政治思想內容。又怎麼能否認，資產階級作家有些作品，藝術性並不壞，而政治思想內容是不好的呢？正是這樣，雪峰同志對於我們的新的文學作品採取了抹煞的態度，對於蘇聯文學也加以輕視，甚至於說在社會主義的精神上不如舊俄文學。蘇聯文學在藝術上許多還為未趕上舊俄作品的水準，但怎麼能否認它的革命性遠遠超過舊俄文學呢？

雪峰同志的文藝思想與胡風的思想是有共同點的。在重慶時的一個座談會上，茅盾同志批評了舒蕪的《論主觀》，雪峰同志卻極力為《論主觀》辯護。雪峰同志也和胡風一樣，抹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作用。在他所寫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認為胡風的所謂追求主觀力量、所謂“向精神突擊”或“自然力的追求”，是對於革命的接近和追求，不是什麼危險的傾向，“是非常好的”、“為我們文藝所希望的”。當時我們指出胡風的所謂“主觀力的追求”，是借“反教條主義”為名散佈唯心主義的毒素，雪峰同志卻認為沒有這個可能。怪不得反胡風時，雪峰同志作為文藝理論家，對於胡風的文藝思想，一篇批評文章也寫不出來。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有人說，在文藝思想上，過去胡風是雪峰派，後來雪峰倒成了胡風派，批評胡風的思想而不批評雪峰同志的文藝思想是不公平的。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雪峰同志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對於黨的團結廣大作家的方針有抵觸。二次文代會時，對老舍先生就表現得很不尊重，對郭老也是不夠尊重的。⁵¹

51 《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

林默涵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批判馮雪峰的問題。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的報導中就點了馮雪峰的名；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在當天撤銷了馮的整風組長的職務，開全社大會對他進行揭發，搞“配合作戰”。

在8月9日第十五次會議上，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任副社長的王任叔作了長篇發言，羅列馮雪峰在出版社種種所謂“右”的表現，並斷言說：在“丁陳反黨集團中”，“雪峰同志是演了主要角色的”。引人注目的是，王任叔在羅列了馮雪峰文藝思想上六條錯誤後下結論說：

而這一切，雪峰同志實際上又歸結到反對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毛主席的說法。所以綜合起來看，就是一條文藝路線的問題了，就是反對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問題了。

這一基調，不但基本上否定了馮雪峰的文藝思想，而且提高到“路線”的高度來認識了。在那個年代，一提到“路線”問題，基本上就等於在政治上判處了這個人“死刑”。

在同一天的會上，作協黨組成員嚴文井的發言中就提出：“馮的文藝思想和宗派主義也要檢查”。

同一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和總書記鄧小平召集周揚、林默涵、邵荃麟、劉白羽等文藝界人士開會，“談了反右派鬥爭問題”，“最後決定緊接着就展開對馮雪峰的鬥爭。現在是要掃清週邊，然後進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團”。⁵²

根據中央的部署，11日下午4點，周揚、林默涵、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等人與馮雪峰談話。談話時的情況，馮雪峰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有詳細追述：⁵³

據郭小川日記，是在11日下午：

(1957年9月)，第52—53頁。

52 參見郭曉惠等編：《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第198頁；《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55頁。

53 以下引述的馮雪峰回憶的有關內容，來自史索、萬家驥《在政治大批判漩渦中的馮雪峰》一文，《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2期。史索、萬家驥對於談話的日期不確定——“11日或12日下午”。郭小川也參加了這次談話。

我到文聯會議室時，周揚、林默涵、邵荃麟、劉白羽四人已等在那裏，當時我覺得空氣是很嚴肅的。周揚先說話，他說：“叫你來，就是要告訴你，也要把你拿出來批判，同批判丁玲、陳企霞一樣。你那天檢討，我當時認為還可以，但大家不滿意。批判丁玲、陳企霞，不批判你，群眾是通不過的。你要摸底，這就是底。”這開頭的幾句話，雖然不能說是原話，但意思我記得是這樣。接着，我記得他主要說了這兩點：一、他說這一次必須把我許多問題搞個徹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歷史；他說這是階級鬥爭，大是大非的鬥爭。二、他說，我的包袱太重了，總以為自己“正確”。就在說第二點中間，他很憤激地提到36年的事情，說他和夏衍等人在堅持地下鬥爭，而我卻和胡風勾結，給他們以打擊。他說，這段歷史也必須在這次批判中搞清楚。記得周揚當時還特別憤激地說，我36年在上海還曾經說他和夏衍是藍衣社、法西斯，要我當面回答他（這點我當時就回答了，說請調查）。

這次談話主要是周揚講，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風問題、丁陳問題；有的只是說：“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須對你鬥爭，這是為了黨的利益。”有的卻說：“不批判你，黨內黨外都有人有意見。”

關於這次談話，當時作協的黨組副書記郭小川在“文革”中也有所交代：

這次談話，歷時三小時，到下午7時才結束……我記得，周揚談了馮雪峰各個歷史時期的問題，也談了馮雪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問題，不過最使我震動的是左聯問題。因此，我在日記上記着：“四時，與雪峰談話，周揚談了許多過去的問題，雪峰從蘇區來，馬上懷疑周揚，相信胡風；雪峰在重慶住到姚蓬子家裏，許多事是敵友不分的；雪峰表示他怕給他加上小集團成員的帽子。”周揚的談話當然比我記的多得多……記得，周揚問馮雪峰：“你從陝北出發前是誰交待你的任務？”雪峰說：“洛甫同志。”（張聞天）周揚問：“他怎麼說的？”馮雪峰回答：“他說

上海沒有黨的組織，黨的組織都被破壞了。”這以後，周揚才談到他從日本回來到處找黨的組織，結果只找到了“特科”組織(即情報組)，這樣才搞起來一個攤攤，發展了黨員。周揚還說：“我們孤軍奮戰，我們這些人又比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們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黨中央的宣言提口號、搞工作。你一來，就一下子鑽到魯迅家裏，跟胡風、蕭軍這些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們，我們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們的黨的活動。周揚似乎還講到，馮雪峰來上海之前，他們同魯迅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馮雪峰來上海之後，就和胡風等人一起包圍了魯迅，欺騙了魯迅，魯迅是把馮雪峰看成是黨的代表，當然對周揚他們就更有惡感了。魯迅那時身體又不好，病很重，馮雪峰和胡風利用魯迅生病時拋出了幾篇文章，以魯迅的名義來反對周揚們的“左聯的黨組織”……說到這時，周揚哭了。然後，他告訴馮雪峰：“要經受一次批判。”馮雪峰表示，他怕搞成小集團成員。周揚又說了一段話，意思似乎是着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團成員。並叫馮雪峰準備在會上作檢查。⁵⁴

這次談話後，在8月13日第十六次會議上，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作了長篇發言，在批判了陳後，邵荃麟按照作協黨組的部署，點出了馮雪峰三十年的問題：

1927—37年中，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在領導左聯工作鬧得很不好，形成黨內分裂的情況。這可以由其他同志來講。

邵荃麟所說的“由其他同志來講”的話，就是根據11日的談話而來的。這個“其他同志”就是夏衍。

在8月14日第17次會議上，夏衍作了後來被稱為“爆炸性的發言”。他在發言中說：

1936年雪峰同志從瓦窯堡到上海，據我們所知，中央是要他來和周揚同志和我接上關係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們，先找了魯迅

54 郭曉惠編：《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第198—200頁。

先生，這一點，按當時情況完全是應該的，可是這之後，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關係的黨組織，而去找了胡風，不聽一聽周揚同志和其他黨員同志的意見，就授意胡風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引起了所謂兩個口號的論爭，這是什麼緣故？今天在座的有許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證明，當時由於抗日愛國運動的勃興，我們已經有了半公開活動的機會，我們已辦了許多週邊刊物，找我們是並不很困難的。事實上，我們知道雪峰到了上海，還是從救國會的非黨同志那裏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風、甚至可以找章乃器，為什麼不找我們。我們在上海的工作有錯誤，犯過左傾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忠實地奉行着黨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我們終於保全了整個文化界的黨的組織，我們還聯繫着包括救亡團體和職業界團體在內的廣泛的群眾組織，我們領導着上海所有的進步劇團，和數以百計的合唱隊、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編輯部和四家進步書店，出版着十種以上的進步刊物，——為什麼你要違反黨的指示而撇開我們呢？算我們是一支暫時失掉了聯繫的遊擊隊吧，中央要你來整理、領導這支遊擊隊，你可以審查我們，整頓我們，但你不能完全撇開我們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對我們、破壞我們的胡風及其黨羽。退一步說，你聽了胡風話，也該找我們來對證一下吧，你硬是撇開了我們，不是幫助我們，而是孤立我們，不，實際上決不止於孤立了我們，而是陷害了我們。章乃器等本來是同我們聯繫的，見了你之後，他向外公開說，我已經和“陝北來人”接上了關係，今後你們不要來找我，“陝北來人”說，上海沒有共產黨組織。我還聽人說，這位“陝北來人”曾告訴原來由我們領導的週邊人士說，周揚、沈端先等假如來找你，“輕則不理，重則扭送捕房”。還有，已經過世了的錢亦石同志曾告訴周揚同志，雪峰在外面說，夏衍是藍衣社，周揚是法西斯，這不是陷害，還是什麼？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漢夫同志、王學文同志、鄧潔同

志都可以證明。

第二、胡風親自說過，當時雪峰同志介紹和批准了胡風入黨，而且還把他引進了黨的工作委員會。當然，你這樣做是不讓我們知道的。胡風就是仗着你的全力支持，掛上了共產黨的招牌，才能恣肆地進行了分裂左翼文化運動的罪惡活動。當時圍繞在胡風周圍的是些什麼人呢？不僅有劉雪葦、彭柏山、蕭軍，而且還有孟十還、黎烈文等等。雪峰同志，這一段時期你和胡風是怎樣一種關係？這筆舊賬你向黨交代了沒有？

……

第六、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常常聽到“一條線”這句話，丁陳反黨集團這樣說，江豐反黨集團也是這樣說，他們都說中宣部、文化部黨組、作協黨組、美協黨組是一條線，這條線上的人用宗派主義來打擊丁、陳、馮、江等等，這句話使我想起另一條線來，解放以後我在上海，經常碰到一條抗拒執行黨的文化政策的線，這就是雪峰、胡風、劉雪葦、彭柏山……這一條線。現在，胡風、雪葦、柏山這些人的政治面貌是已經搞清楚了的，雪峰同志，這些人和你之間的這條線只是思想上的共鳴呢，還是有什麼組織活動？這個問題在我心裏已經壓了很久了，今天我鼓起勇氣，把這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來。

講到彭柏山，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樁公案。我們幾個人被誣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這裏講一講。

直到今年八月為止，我們一直認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魯迅先生的手筆，現在雪峰承認了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請在座的同志們重新讀一遍這篇文章。別的問題這裏不談，我只談其中有所謂“內奸”問題的一段。雪峰同志是一貫主張真實性和藝術的真實的，但是他起草的這一篇文章，不論描寫的細節和內容，都是不真實的。

真實的情況是這樣：

有一次，周揚、田漢、陽翰笙和我四個人——這就是那篇文章中

所說的“從汽車中跳出來的四條漢子”——為了左聯的工作去找魯迅先生。在內山書店老闆的客廳中見了面，起先談得很融洽，魯迅先生還給左聯籌了款，後來談到胡風問題，田漢同志因為胡風在國民黨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對他表示有一點懷疑，魯迅先生聽了很不高興，接着我把話又開了。當天沒有談到“一個青年被指為內奸”的事。這個青年是什麼人，就是彭柏山。事實是1934年底或在1935年初，彭柏山被捕，不久，彭柏山的愛人靜子叛變了，帶了包打聽捉人，再不久，彭柏山也變節了，黨組織知道了以後，就決定通知和彭柏山有關的同志，不要和彭柏山接觸，我奉命去通知和彭柏山最親密的周文——即何谷天同志，周揚同志不相信，說不應該懷疑好人。於是我告訴他，這是組織上的決定，你假如不聽，將來發生任何後果要你自己負責。同時我說，你假如再和彭柏山來往，黨不能不考慮和你暫時切斷關係。在當時，1934、35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嚴重，黨領導機關破壞得頻繁的年代，我直到今天還相信，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周文同志把誇大和歪曲的事實告訴了胡風，胡風再誇大歪曲了一下告訴魯迅先生。雪峰同志，這就是答徐懋庸信中所說的一個青年被誣陷為“內奸”的事實真相。二十年後，在前年反胡風鬥爭中黨審查彭柏山歷史的時候，從發現的檔案證明，柏山和靜子的叛變是事實，這件事，彭柏山已經承認而做了結論了。由此可以證明我們沒有誣陷“一個青年”，而雪峰同志卻誣陷了我們達二十年之久。

請同志們想一想，雪峰同志用魯迅先生的名義，寫下這一篇與事實不符的文章，聽胡風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們查對，缺席判決，使我們處於無法解釋的境地，而成為中國新文藝運動史中的一個定案，究竟是什麼居心？造成的是什麼後果？這究竟是誰的宗派。

在那一段時期，我們工作中犯過不少錯誤，在黨和魯迅先生的關係上，錯誤也不少，但是，我們對魯迅先生的尊敬，對他在革命

文化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和一心一意希望和魯迅先生搞好關係這一點，是此心耿耿，沒有一點虛假的。這裏，造成我們和魯迅先生隔閡的，除出我們的錯誤之外，也還有別的因素，其一是我們隊伍裏也還有一些不識大體，作風不正派的人，如徐懋庸(當時他不是黨員)等，以左的面貌，給魯迅先生寫了那封極其不好的信，使魯迅先生認為這是我們的意見，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今天已經證明是壞人的人，如胡風、蕭軍、黎烈文、孟十還……等，在魯迅先生周圍進行了長期的對黨的領導和黨員作家的挑撥、造謠和污蔑。正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雪峰同志奉黨的命令到上海來了，從常識來講，雪峰同志的任務應該是從大局着想，從革命事業的利益着想，來消除隔閡，來鞏固團結的吧，可是雪峰同志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努力去消除這種隔閡，反而用一切不應有的，可以說極其陰毒的手段，加深了這種隔閡，甚至有意的挑起了兩個口號的論爭，實際上是分裂了黨領導的整個文藝事業。今天，雪峰又參加了丁陳反黨集團的分裂作家協會的陰謀，事實上，他二十年前、在最困難的日子裏，已經有過一次更毒辣的分裂活動了。

也許還有許多問題，今天先提這六點。

上次雪峰同志的發言中，特別使我不滿意的是談到魯迅先生那一段。雪峰說，魯迅不同意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這也和事實不符。事實是：兩個口號論爭之前，我們已經間接地從一篇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了解了黨的方針，並且已經通過茅盾先生，對解散“左聯”，組織文藝家協會的方案，徵求過魯迅先生的意見。魯迅先生贊成我們這樣做，他只是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他要知道我們有沒有決心真真改正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我記得很清楚，印象也很深刻，他的話是這樣講的：“孫行者真肯丟掉那根手裏的金箍棒嗎？”二十年了，這句話一直留在我心裏，作為警惕自己的警句；第二是他對我們準備邀請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的個別的人有意見，具體地說，就是對施蛰存、杜衡、葉靈

風等等。從這兩點，能說魯迅不贊成統一戰線嗎？雪峰一定會記得，左聯成立的時候，我們中間有些人不贊成郁達夫參加，魯迅先生不是替郁達夫講過話嗎？雪峰是魯迅研究者，魯迅全集的主編人，對於魯迅的這種一貫的思想，難道會不了解嗎？那麼講這段話的用意何在呢？是不是如許廣平同志所說的“把許多事都推到魯迅頭上”呢？至於說，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中某些具體人事的思想抵觸，那是很難免的，一點也不值得奇怪。雙十二事件之後，我們在上海聽到由於中共的堅持，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的時候，我們黨員中間不是也有許多人“百思不解”、甚至痛哭流涕嗎？雪峰同志，你是從黨中央所在地出來的，魯迅則困處在敵人重圍中的上海，在大轉變中有一點思想抵觸，“同意了但沒有解決問題”，有什麼奇怪呢？我以為在那個時候，從延安來的雪峰同志還要“再搞一個東西表示我們沒有放棄階級立場”，倒是很值得奇怪的。

夏衍的發言之所以被稱為是“爆炸性”的，是因為一是所講述的內容，是大多數與會者聞所未聞的，因而使他們感到——用當時郭小川的語言講——馮雪峰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無疑[遺]了”；二是因為夏衍的發言“引起一場激動”，的確有“爆炸性”的效果。關於這一方面，有關當事人在後來有所追述。

馮雪峰在代交材料中回憶說：

說到8月14日會場的空氣，使我很震動……8月14日第十七次會議上夏衍發言對36年兩個口號問題的所謂“揭發”，不但在我當時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對於大部分到會人我覺得也很意外，加以樓適夷忽然號啕大哭，許廣平憤怒地站起來痛斥我，使整個會場非常緊張。我確實很震動。（許廣平在夏衍發言中間站起來痛斥我，說我欺騙了魯迅，是一個“大騙子”……後來她開始識破周揚等人的陰謀，她就從別的角度來批判我了。）

在夏衍的發言中間，周揚也站起來，憤怒地質問我，說魯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

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的一段話，底稿上留有我的筆跡，這不是對他們的“政治陷害”又是什麼？又說，左翼內部爭論公開發表，這也等於“公開向敵人告密”。這也使會場更緊張，我也更震動。

還有其他好幾個人接連站起來質問我種種問題。

邵荃麟當時也站起來說過這樣的話：二十年來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必須重新寫過了。

由於我遠離黨的原則，不能正確地、堅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去認識所發生的現象的實際，事前又沒有思想準備，當天我確實感到震動和意外。

於是當天晚上我就打電話要求同周揚見一次面。經過是這樣的：周揚讓我到文化部他當時的住處去見他。我要求見他，是想問一問清楚，我的問題究竟是出在過去，還是同丁、陳反黨集團的關係等問題。同時也想問一問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事實進行說明和解釋。我到他那裏後，他先說：“今天會場的激動情況，我也沒有預料到……夏衍的發言，事前沒有商量。他昨天電話上是告訴過我的，要提出(19)36年上海的問題以及你脫離組織回家鄉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實上，夏衍的發言顯然是他們事前經過策劃的。)我於是向他提出我的問題究竟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他說：“什麼問題都讓大家揭發嘛，批一批，對你也有好處。”我說，有些事實，我可不可以申辯。他說：“可以，你可以在會議上發言。”我記得當晚他對我只說了這幾句話……他說話時態度很平靜，同白天在會場上的態度不同。我感到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這一天白天的會議，我感到震動和很大壓力，心裏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欺騙了魯迅”，又“陷害了周揚”，這像兩塊石頭壓在心上。晚上我去聽了周揚談話，當時覺得茫然，回來後也還是很茫然，心裏只覺得沉重。但同時我也還這樣想：錯誤我應該

承認，事實也應該辯正，弄清楚……

會上的情況，在場的時任作協總支書記的黎辛後來回憶說：8月14日第十七次會議批判馮雪峰，這是最緊張的一次會議。會上，夏衍發言時，有人喊“馮雪峰站起來！”緊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來！”“站起來！”“快站起來！”喊聲震撼整個會場，馮雪峰低頭站立，泣而無淚；丁玲屹立哽咽，淚如泉湧。夏衍說到“雪峰同志用魯迅先生的名義，寫下了這篇與事實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麼居心？”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着馮雪峰，大聲責斥：“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這一棍劈頭蓋腦地打過來，打得馮雪峰暈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靜聽。會場的空氣緊張而寂靜，那極度的寂靜連一根針掉地的微響也能聽見。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彈一發接一發，周揚也插言，他站起來質問馮雪峰，是對他們進行“政治陷害”。接着，許多位作家也站起來插言、提問，表示氣忿。⁵⁵

在會場上“嚎啕大哭”的樓適夷，此前與馮雪峰的交往很深。至於為什麼會在聽了夏衍的發言後大哭，他在後來的回憶中說：

大家知道夏衍同志從卅年代以來，一向領導和實踐電影戲劇，為黨立功，受廣大群眾愛戴，是一名高手。當時他的發言，實在是極其動人的，我這一哭，增加了他的效果，確為事實。他當時說雪峰同志曾叫人可以把他的扭送捕房，又說中央交雪峰又一任務，是在離陝北途中找到一支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的遊擊隊，而雪峰不找，那支遊擊隊終於因失卻中央聯繫而被國民黨全部消滅！我的哭聲，就是在這時候爆發的。在場一百餘人，可能不會比我記得那樣清楚，但記得的人，一定會有，是可以肯定的。夏衍同志發言完畢，走下主席台，就坐在我的身邊，我對他說：“馮雪峰原來是這樣一大壞人，我可看錯了人。”夏衍同志說：“你讀過歷史沒有，歷史上有多少大奸呀！”啊，原來馮雪峰是一個大奸！

55 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1期。

這時候，邵荃麟同志指名要我上台發言，我的眼淚還未擦幹，奉命上台，泣不成聲，把雪峰同志罵了一頓，自覺語無倫次，三言兩語，就下場了。記得那次大會上，一邊哭一邊發言的，還有許廣平同志。⁵⁶

在夏衍發言中間，許廣平先是插話，黎辛回憶中的許罵馮雪峰為騙子之類的話，就是在插話中說的。在夏衍發言後，許廣平又作了發言，也就是馮雪峰所說的“別的角度”的“批判”之類的話。據當時的記錄，許廣平針對發言者所說魯迅“受騙”，《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是馮雪峰勾結胡風，假用魯迅名義所寫一事，在發言中說：

……找了一個死無對證，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實的情況，完全安到魯迅的頭上。

有一天魯迅寫了一封信給胡風，我就說：周起應和胡風不對，是他們的事，與你有什麼相干？魯迅跳起來說：“你知道什麼，他們是對我！”

關於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你（按指馮雪峰）說是你寫的，這篇文章，我已送到魯迅博物館，同志們可以找來看看……兩個口號的文章是你寫的，但是魯迅親筆改的，在原稿上還有魯迅親筆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這要是魯迅不革命、魯迅不同意——魯迅不同意怎麼發表了？！發表以後魯迅有沒有聲明說這篇文章是雪峰寫的，不是我寫的？……

許廣平的這些話，是針對馮雪峰而來的。在這次會議之前，馮雪峰曾說過魯迅答徐懋庸的文章是他起草的話，所以夏衍在發言中說，他們——他與周揚等人——在今年八月才知道這一事實，並

56 樓適夷：《為了忘卻，為了團結——讀夏衍同志〈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魯迅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樓適夷的將會談日子誤記為8月17日；另外，樓回憶中說，夏衍揭發馮雪峰沒有按中央指示尋找一支遊擊隊的事情，在夏衍的發言記錄中沒有，樓在下文中說是記錄中“不提”這件事。我曾就此事請教過幾位參加過這次會議的知情者，他們說，夏衍沒有提到這件事情，只是把在上海孤軍奮戰的他們說成是“一支暫時失掉了聯繫的遊擊隊”，樓大概當時聽錯了，當然也可能後來記錯了。

把這一條作為馮雪峰“欺騙魯迅”的重要罪證。許廣平作這樣的發言，雖然意在批駁馮雪峰，卻道出了另外一方面的事實：魯迅答徐懋庸的文章雖然是馮雪峰幫助起草的，卻是魯迅自己的文章。許廣平這樣說，客觀上也使不了解此文起草過程的周揚、夏衍等人十分尷尬，所以許廣平的發言沒有收入印發的會議記錄中。“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想起許廣平這個發言，把它作為周揚、夏衍等人打擊魯迅的罪行予以揭露，並有許廣平識破了周揚等人的“險惡用心”，“義正辭嚴”加以駁斥云云。其實，在當時的情況下，許廣平只不過是說明了事實的真相而已，她還沒有看出了周揚、夏衍等人的“險惡用心”這樣的覺悟。

8月14日的第十七次擴大會議將三十年代的問題提出後，16日和20日的會議上繼續對馮雪峰進行揭發。馮雪峰追述說：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會議上，何其芳、陳荒煤等人發言之後，會場上有人要求主席團叫我發言，交代一些問題，特別是夏衍那天提的問題，我一則沒有準備，談話次序很亂，二則只說到一些事實的經過，有的則加以否認(如說周揚、夏衍是藍衣社、法西斯和摧毀上海地下黨組織等)，有的則加以解釋(如關於兩個青年問題)，給自己進行辯解，中途被轟了下來。

8月20日第十九次會議上周立波、郭小川的發言，完全不合事實的問題更多，在會後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說，事實是可以查對核實的，重要的問題是“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同時叫我準備好作檢討，徹底交代。

8月16日的會議上，何其芳批判馮雪峰的重點放在馮雪峰的文藝理論及文藝思想上的。

在發言中，何其芳主要是將馮雪峰的文藝思想與胡風連在一起進行批判：

在許多文藝的基本問題和重要問題上，胡風和馮雪峰的論點是一致的。我們簡直分不清是誰影響了誰。這是左翼文藝運動以來一條隱藏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之下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修正主

義的文藝路線。他們是企圖從內部來奪取我們的革命文藝運動的堡壘的。許多研究新文學史的人，只知道左翼文藝運動曾有過教條主義的錯誤，不知道長時期以來還存在着這樣一條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路線。批判胡風的時候，我們已經接觸到這個問題。現在再來看看馮雪峰的文藝思想，這條魯迅就更清楚了。

為了證明這個斷語，何其芳連用三個“和胡風相同”的段落加以論證。

既然是對馮雪峰文藝思想進行批判，馮雪峰的作品就是這種批判所引用的依據——當然是斷章取義的。在引用馮的作品中，何其芳自然要着重談到被毛澤東特意點到的《火獄》，⁵⁷並認為這是馮雪峰“陰暗情緒”的一種表現：

蘇聯紅軍攻入柏林的時候，英美帝國主義通訊社發出了一些電訊。這些電訊別有用心地專門描寫和誇大戰爭中的破壞，說“每一幢房屋，每一個視窗，每一個頂樓都噴着火光”，“全城籠罩在烈焰中”，“從前的壯麗建築，現在已成為無數的斷磚殘瓦；兩旁樹木，好像火龍一般。柏林現在是死人城，屍體縱橫，滿布於街頭小巷中，或被封閉在地下鐵道網的黑暗隧道裏，或沉浮於溝渠中。全城大火，猛烈燃燒，繼續蔓延……夜間則除熊熊火光和一片冷月外，都極黑暗淒涼”。馮雪峰同志不能辨別這些電訊別有用心，反而大為欣賞，把它們抄引下來，寫了一篇《火獄》（《有進無退》和《論文集》第一卷）。他稱讚這些電訊“都是史詩似的文字”。他說“這樣的焚毀就值得我們狂歡”。他說“再也沒有這樣的焚毀，這樣的火海，更為人道了”。但是他又說“我們在狂歡之後，也許還要忍受不能忍受的索漠的茫然的痛苦”。他的結語是這樣的：“焚毀不能立即停止，大火還要燃燒着吧。”雪峰同志這種感情實在是異乎常人的。他狂歡的不是德國法西斯的最後崩潰和柏林人民的解放，而是英美帝國主義通訊

57 《與露菲談周揚》，徐慶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揚》（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頁208。

所描寫和誇大的全城大火、屍體縱橫和黑暗淒涼。有些同志在會上也揭發了馮雪峰同志極其陰暗的心理和他的瘋狂的對於破壞的渴望。

在同一天的會議上，陳荒煤則以“兩個口號”論爭當事人的身份，“以自己的親身體會來揭發他在上海如何以‘欽差大臣’的姿態出現，來打擊當時上海的地下黨，分裂黨、破壞黨的活動”。在作一通揭發後，陳荒煤“提出幾個問題，要雪峰答覆”：

1. 發起兩個口號的論戰，動機是什麼？現在看來，是蒙蔽魯迅先生，假魯迅先生之手打擊左聯，打擊地下黨。
2. 他說在這幾天的會上，他才知道宗派主義嚴重，他的宗派主義是因為先入為主，信任胡風，同時魯迅先生支持那個口號。這是把責任推到魯迅先生身上，把自己描寫得很天真，很無知。難道你那樣分裂黨、打擊黨，到現在才知道嗎？
3. 你對各地組織隨意打擊，否認別人的黨籍，你自己呢？一和黨的意見不合，便開小差，一跑了之。難道你不了解黨籍是一個黨員的政治生命，黨員冒着性命危險在堅持工作嗎？現在你對黨籍是毫不在意，為什麼你二十年來對叛徒、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毫無警惕，相處泰然，把他們當作知己，這樣親近，而對地下黨員卻戒備很嚴，仇恨很深，為什麼？

在20日的會議上，周立波也以當事人的身份，揭發了馮雪峰對上海“文委臨委”的五次打擊，並提出要求：

二十年來，許許多多不可理解的言行，雪峰同志必須一件一件，向大家作出真誠老實的交代。

在這次會議上，當時作協的黨組副書記郭小川被要求在會上發言。郭小川對這樣的要求是不情願的，他的理由是，“因為我既不了解馮雪峰的歷史，也不了解他的現在。我到文藝界還不到兩年。實在無言可發”。但是，他並沒有推託掉。他在交代材料中追述說：

經我仔細回憶。那時林默涵提出叫我發言的，因為他曾一再表示

欣賞我8月4日就丁玲問題的簡短發言，認為我“有分析能力”；他要我發言的意思是馮雪峰問題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黨組負責人中應當有人出來講講話。他一提，我就表示不願意講，還說了我的理由：如不了解馮雪峰、事務工作等等。這時，周揚、劉白羽也都說：“講講嘛！”於是，我提出講什麼問題。林默涵馬上出了一個主意，說可以看看胡風的“供詞”，講講馮雪峰和胡風的關係。他還說到，馮雪峰與胡風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林默涵說：“把大家的意見歸納一下嘛！”這一句話，我記得是比較清楚的。⁵⁸

於是，在周立波發言後，郭小川也勉為其難地對馮雪峰進行了揭發。

8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以“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為正副標題，以“丁、陳反黨集團的支持者和參加者”、“人民文學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來一貫反對黨的領導”、“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胡風一致”、“反動的社會思想”等為分標題，列舉了馮雪峰的“歷史”和“現行”“罪行”。關於“現行”問題，文章說：

據王任叔、徐達等揭發：在大鳴大放期間，馮雪峰看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大舉向黨進攻的時候，他興奮地說：“洪水將衝破大門。”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鬱的狀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各編輯部門到處放火，向黨發動進攻。

在整風座談會上，他號召對黨不滿和反黨分子：“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又說：“黨內對黨外應和風細雨，黨外對黨內暴風驟雨也不妨；上級對下級應和風細雨，下級對上級暴風驟雨也未嘗不可。”他還在全社的整風動員大會上污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肅反工作有“重大錯誤”，並說：“必要時也可暴風驟雨，大民主也不要緊。”他到該社第二編輯室，有人問他：“整風中罵

58 郭曉惠等編：《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頁203—204。

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他說：“也可以。”在共青團的座談會上，他說：“我向來是喜歡青年的，你們有什麼儘管說，沒有什麼可怕，大民主也不妨。你們不是造社會主義的反，不是造共產黨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們就是打我們一頓也不算什麼。比如兒子打老子，老子不對就該打。”

關於“歷史”，也就是三十年代的那場公案，文章雖然沒有具體地提“兩個口號”爭論，但卻對1936年馮雪峰到上海的工作全盤否定：

1936年，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他不信任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卻把正在反對黨的胡風一度拉入黨內。他在上海的宗派活動，對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事業起了分裂作用。

這個會議報導，從8月17日就由郭小川負責撰寫，到27日發表，對於是否明確提及“兩個口號”爭論問題是有一番考慮的。

本來，在郭小川起草的這份報導稿時，根據會議的揭發，寫到“兩個口號”的問題，但是，大約周揚在最後定稿時刪掉了。之所以刪掉，周揚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兩個口號問題，還是等中央講話，我們自己不要講。”⁵⁹

馮雪峰的“罪行”在8月27日見報後，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奉命書面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其“列為右派骨幹分子”。

八、對李又然、蕭三、羅烽、白朗夫婦、艾青的批判

在8月14日、16日、20日會議過後，對“馮雪峰問題已經搞的差不多了”，黨組擴大會議轉向了對李又然、蕭三、羅烽、白朗夫婦、艾青的揭發批判。

8月23日第二次會議上，著名詩人公木揭發李又然。

59 參見郭曉惠等編：《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頁205。

李又然一直在丁玲所主持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工作，1954年2月，中央文學研究所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丁玲已辭去所長職務，文學講習所人員由作協黨組來調配，任命吳伯簫為所長，蕭殷為副所長。蕭殷離開後，10月，周揚出面，調在東北的公木來擔任副所長。此後，公木又擔任所長。改由田間擔任，稍後由公木擔任。李又然即在公木領導下工作。由公木來對其進行揭發，順理成章。

公木在發言中，羅列了李又然一系列所謂的反黨罪行後總結說：

(一)李又然打着“羅曼·羅蘭”的幌子，披着“老共產黨員”的外衣，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忠厚、善良、熱情而不幸的人，被誤解、被打擊的人。其實，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他有着一個腐朽透頂的極端卑鄙污穢的靈魂，他是非常陰險毒辣對黨充滿仇恨的報復主義者，他是長期隱藏在黨內的瘋狂的反黨分子。他平常偽裝做瘋瘋癲癲；而遇到向黨進攻的時候，又惡狠而毒辣，非常“精明”、“能幹”。這一套手法和這種作法，如果不是向王獨清、王實味等人學來的，那麼是怎麼來的呢？

(二)在丁陳反黨集團中，李又然是老資格，是“開國元勳”、是重要成員和骨幹分子。在最近一年來，他乾脆拒絕黨給他做的結論、拒絕了黨分配的工作，日日夜夜，東奔西跑，咬牙切齒，專業反黨。——他不是專業化了的黨員作家，而是專業化了的反黨專家。

(三)李又然既然是堅決的老牌的反黨分子，自從入黨之日起，就沒有幹過什麼好事，只是過着糜爛的生活，瘋狂反黨。所以在延安整風審幹運動中，在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中，到北京肅反運動中，以及這一次反右派鬥爭中，他一貫是站在反黨立場。對黨進行鬥爭，他的經驗可以算是豐富極了。這一次他又是“鎮靜，鎮靜！”——“沒有什麼好驚慌的。”他不但自己拒不交代，還指導別人狡賴、抵抗。

但是，我們要向李又然提出嚴重警告：你們的反黨集團已經被擊破了。你們的陰謀詭計已經全部敗露了。你們與之相配合、相呼應的資產階級右派的倡狂進攻已經被擊潰了。你們所盼望的“匈牙利的十月”已經流產了，已經被粉碎了。這一回你必須低頭認罪，決不能蒙混過關。

反右派鬥爭提高了我們每個人的認識，你的狡猾抵賴的老經驗，再也用不上了，再也施展不開了。假檢討，不交代，再也騙不了人了。

上一周在講習所開會，李又然一開始就說：“反右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他企圖迷惑到會的同志。不對，你完全錯了，你這一套手法沒有用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人民大眾與資產階級右派（以及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合的對抗性矛盾，決不是什麼人民內部的矛盾。你想攢任何空子，都不成了，一切空子都堵死了。

李又然只有一條路是活路：低頭認罪，徹底交代！

社會主義這一關，還是向你敞開着的，過還是不過？決定於你自己，而且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再猶豫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次會上義憤填膺的公木，在1958年10月作為中國作協最後一名右派被發配。⁶⁰

在同一天的會議上，作協審幹辦公室副主任胡海珠對著名詩人蕭三做了揭發：

蕭三同志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文藝界最老的黨員和作協黨組成員之一，在整風運動中可以說和黨是完全抱着兩條心，而和丁、陳反黨集團倒是抱着一條心。他和這個反黨集團究竟了謀而合，還是不謀而合，我不能妄下斷語，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蕭三同志是作協外委會主任，外委會的工作在整風當中大家也有很多意見，可是外委會的整風會議據說他一次也沒

60 張菱：《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頁277。

有參加，而對丁、陳問題的積極性就那麼高，真是沒會必到，到必說話……在右派向黨進攻的時候，蕭三同志在旁邊叫好，煽風點火；……現在連陳企霞同志也向黨提出了蕭三同志的問題，陳在最近向黨交代的材料中說到：“丁玲和蕭三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丁玲在反對周揚這一點上，和蕭三完全一致，而且可以感覺到是相互呼應的。”“他們對近年來黨的各種運動都抱着或是躲避或是蒙混的態度，而背後也就話多。”我以為蕭三同志在整風中和反右派鬥爭中的表現，決不是偶然的。據陳企霞交代：“蕭三同志有一次在學習會上說，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發展形式，由於新的形勢要用另一種眼光來考慮了。他說納賽爾，尼赫魯，蘇加諾等的憲法上，開頭都規定社會主義，他們也許還有另一條到社會主義的路呢。”這另一種眼光，另一條路，究竟怎樣解釋？你的修正主義思想究竟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了，這是值得你嚴重注意的。

指出上述問題後，胡海珠認為：“在徹底解決丁、陳反黨集團的問題的同時，也徹底解決像蕭三這樣一個老的同志的問題。”⁶¹蕭三是國際著名的詩人與文藝活動家，是1922年加入中共的老黨員，與毛澤東在長沙時是同學。因此，儘管有胡海珠的揭發，但蕭三最後只是作了個檢討，而僥倖過關，沒有劃為右派。

在8月24日第二十一次會議上，28日第二十二次會議上，開始了對羅烽、白朗夫婦的揭發。

24日，作協反右領導小組成員黃其雲發言。根據丁玲的交代材料，從四個方面揭發羅、白夫婦與丁陳“勾結”的問題。這裏把第一、二個方面的內容摘錄如下：

(1)羅烽、白朗和丁玲相互交換情況，共同圖謀翻案。大家都知道丁、陳圖謀翻案，但卻可能有人不知道羅烽、白朗也圖謀翻案。因此我想先簡單的介紹一下，1955年9月在作協二分支擴大

61 《胡海珠同志的發言(在8月23日第20次會議上)》，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59—160。

會議上批判了羅烽、舒群、白朗三同志的反黨言行問題。當時召開那個批判會有兩個根據：一、鬥爭丁、陳的黨組擴大會議上，好多同志提到他們的反黨活動；二、東北轉來十幾件檢舉他們的材料，現在看起來，當時批判他們是有根據的，今天那些根據不但可以存在，而且還值得進一步的追查。當時組織上為了愛護他們，曾將他們的問題交給支部進行批判。在二分支的批判會上，同志們提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他們自己也承認了一部分錯誤，說了許多感謝黨挽救他們的話。那個會議一共開了七次，最後由於他們的檢討不深刻，黨組織除了責令他們深刻檢討以外，並沒有做出什麼結論。本來當時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同時又沒有做什麼結論，應該是無案可翻的，但他們卻也要鬧着翻案。並且在這個問題，和丁玲的反黨活動結合在一起，他們經常相互交換情況，互相策劃。丁玲把自己寫給黨委的信，以及對周揚同志的意見，都給羅烽、白朗看了。丁玲由支部轉給黨委的信，也事先給他們看過。白朗在總支寫組黨組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會議（這個會議，現在檢查起來，是過份遷就他們的，下面還要談）上的發言稿，是事先經丁玲看過的。丁玲看了以後還給她出主意，“攻擊的目標太不集中，針對着一些女同志很洩氣的。”白朗馬上說，“舒群的發言是針對劉白羽的。”同志們！我們想一想，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私房話？這難道還不明顯嗎？丁玲的言下之意是叫白朗集中攻擊黨組負責同志，白朗立即會議說，舒群是針對劉白羽同志的。交換意見交換到這種程度，這不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黨活動是什麼？我們應該肯定的說這是一種非法的反黨的小組織活動，這不但證明前年對他們的批判是絕對必要，而且也證明哪一次是不夠徹底的。

(2)我們必須進一步的指出，羅烽、白朗和丁玲的共謀，不僅僅是為了翻案，而更主要的是為了製造分裂，破壞黨的統一和團結，以達到篡奪領導權的目的。怎麼能說明他們不僅僅是為了翻案呢？我想把今年3月總支協助黨組解決羅、舒、白問題的情

況，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會一共開了兩次，為了團結和教育，會上周揚、劉白羽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評，嚴文井、阮章競、張僖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評。羅、舒、白三個人都在會上發了言，現在回憶起來，當時羅烽、白朗都向黨進行了猛烈的攻擊。白朗的發言特別尖酸刻薄，她罵黨組和總支批評他們是買空賣空，罵同志們批評她是造謠、污蔑、陷害。一次發言攻擊了十來位同志，還要求把她所說的那些尖酸刻薄的罵人話轉給那些被罵的同志。這就是經丁玲看過的發言稿，一個黨員公開地倡狂到這種程度，是我所沒有見過的。我覺得在她的心目中，不但看不起同志們，而且目無組織。因此在她的口頭上，不但可以污蔑同志們造謠、陷害，而且還可以謾罵黨組織是買空賣空……當時周揚同志說了她一句：“如果我是你，我就不這樣說。”這個批評本來是很溫和的，但白朗卻把嘴巴一翹說，“我就是這樣，我就是出氣”……以黨組織解決黨員個人問題來說，可謂仁至義盡，也可以說是遷就到了極點。如果他們只是為了翻案，就應該心滿意足了吧！可是事實上卻不是那樣的，事實上他們是用翻案來作藉口，以達到陰謀反黨的目的。因此，他們三個人雖然都在會上表示了同意那樣的處理，但會後卻又變了卦。原來是羅烽、白朗把會議的情況全都告訴了丁玲，丁玲馬上給他們出主意，叫他們繼續向黨進攻。果然會後一兩天，他們便分頭找黎辛同志提意見，表示對會議的不滿，抓住劉白羽同志在會上說了“羅烽同志的歷史不是反革命問題”這句話，就倡狂進攻，可是今天從羅烽的歷史結論來看，羅烽1934年在哈爾濱的監獄裏卻確實向敵人自首過……⁶²

黃其雲說到這裏時，會場有人附和呼喊“叛徒！”。在場的羅烽忍無可忍，跳起來拍着桌子大聲喊道：“我不同意！”。接着便毅然退出會場。這突兀而來的行動，全場驚愕。⁶³

62 《黃其雲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62—164。

63 玉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載胡平、曉山編：《名人與冤案——中國文

當然，羅烽的憤然退場，除了增加了他的“罪行”之外，並不能終止人們對他的批判。這一天，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崔毅也對羅烽的歷史問題作了揭發。

8月28日，中國作協審幹辦公室主任羅立韻作了發言。發言中，羅立韻認為，“羅烽……勾結丁玲共謀反黨這一件事”，“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一一列數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表現，不但繼續肯定羅烽的自首問題，而且以此證實羅烽“長期的欺騙黨，長期的對黨不忠”。⁶⁴

兩次批判會後，羅烽、白朗成為右派，雙雙被開除黨籍。令人欽佩的是，在對待自己的歷史問題上，羅烽始終不屈服。他不但拒絕在作協所作的“自首”的“歷史結論”上簽字，而且還留下了自己的抗議：“因為我在敵人面前沒有任何‘自首’行為，因此，我不能同意這個自首的結論。”“我懇求黨再進一步調查研究，慎重復查。並請允許我保留向上級黨組織申訴的機會和權利”。⁶⁵

1957年9月12日，羅烽在寫給作協黨總支和中宣部機關黨委的材料中說：“在真理面前犧牲，我是心甘情願的，讓我不清不白的倒下，實在痛苦，因為毀的不是渺小的個人，卻是真理。”⁶⁶依然不屈不撓，堅守自己的底線。

對艾青的揭發批判，持續的時間比較長，集中的批判在8月23日第二十二次會議(李季、阮章競的聯合發言；徐遲的發言)、8月31日第二十三次會議(臧克家發言)、9月3日第二十四次會議(袁水拍發言)上。

在7月25日復會後，對於丁玲、陳企霞的揭發批判中，就已經牽扯到艾青。在8月1日第九次會議上，艾青不得不作出檢討。但張光年和袁水拍聯名給主持會議的人遞條子，表示不同意艾青的檢

壇檔案實錄(二)》(北京：群眾出版社，1998)，頁483。

- 64 《羅立韻同志的發言》，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66—171。
- 65 玉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載胡平、曉山編：《名人與冤案——中國文壇檔案實錄(二)》(北京：群眾出版社，1998)，頁484。
- 66 金玉良：《羅烽、白朗蒙難記》，載《新文學史料》第4期(2006)。

討。艾青並不知道這一切，走下台來還問劉白羽：“我還要發言嗎？”劉白羽說：“不用了。”艾青以為自己可以蒙混過關了。他哪裏想到，後患正等着他呢。⁶⁷

首先，《人民日報》8月7日“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集團”的報導中，艾青名列其中，其主要罪名是“丁、陳和江豐反黨集團之間的聯絡員”，他曾在家裏召開記者招待會，聲稱文藝界有“兩個底”，一個是丁玲、陳企霞，另一個是江豐，鬥他們無非是黨內宗派主義在作祟。對艾青來說，在黨報上被公開“點名”令他措手不及，更感到政治鬥爭的殘酷和無情。

其次，黨組擴大會議在批判了馮雪峰、李又然、羅鋒、白朗夫婦後，艾青也被列入批判的日程。

在8月23日的第二十二次會議上，首先是李季和阮章競聯合發言，列舉了艾青的反黨言行：

(一)艾青是文學界的丁陳、美術界的江豐、戲劇界的吳祖光的重要發言人、聯絡人，是各個反黨集團之間的蘇秦，決不是個僅僅是受影響的糊塗蟲。這個結論是他自己的言行和“功績”證實的。證據確鑿，艾青是賴不過去的！

(二)艾青不是灰心，不是什麼都不想做，而是一個重要的反黨角色，積極熱情地進攻黨，積極到半夜招待記者。很顯然，這個集團認為當時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抓緊火候的行動。這能夠說他是思想安安靜靜地寫什麼？

(三)艾青的招待右派記者，是丁陳集團的一個有計劃的第一步的政治陰謀，和陳企霞同志指示柳溪同志的行動，完全一致，互相配合的。兩路出擊：一到報館，一招待記者。而且確實起了作用，如果人民不起來反抗，就會出現丁陳要進行分裂的第二步行動，使黨陷入困難。決不像艾青同志說的是被利用。⁶⁸

67 高瑛：《我和艾青的故事》（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頁46。

68 《李季、阮章競同志的發言（在8月23日第22次會議上），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72—179。

如果說李季和阮章競的聯合發言還側重於對艾青政治的批判的話，徐遲的發言則近乎於人身攻擊。徐遲與艾青有很深的交往，此前個人關係很好。正因為如此，他的揭發就更“細緻、生動”。他揭老底道：去年3月，在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上，周揚同志在報告中批評了艾青，艾青不服，乘中間休息，周揚同志對他講：“我是對你提出希望。”沒想他卻反唇相譏道：“我知道你的份量。”態度極其惡劣。徐遲在發言中痛斥艾青生活腐敗，甚至大講某些“細節”，令艾青無地自容。⁶⁹艾青欲起身解釋，立即有一些人大喊：“艾青，你老實點！”另有一位作家憤慨地站起來說，艾青這個人太狂妄，他多次散佈說，目前某些人寫不出作品，就弄理論，理論弄不成，就搞行政。結果是行政管理論，理論管創作，一個婆婆壓一個媳婦，創作還有什麼希望？艾青請示主持會議的劉白羽，問能否為自己說幾句，他冷淡地揮揮手，拒絕了。⁷⁰

徐遲的發言，用艾青的話說是“重磅炸彈”，把他給炸蒙了。艾青辛酸地對夫人高瑛說：“在這次運動裏，也讓我看到了一些偽君子、變色龍、喬裝打扮的假革命。”⁷¹

這一年的12月，艾青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撤消一直職務。

九、丁玲、馮雪峰檢討

“外圍”清除後，大會又將批判的目標轉向了丁玲。

9月3日，第二十四次會議上，丁玲作了一個長篇檢討。檢討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南京問題，分為(1)在南京的錯誤；(2)對錯誤的態度；(3)離開南京的經過。第二部分：在延安的錯誤，分為(1)支持

69 《徐遲同志的發言(在8月23日第22次會議上)》，載《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頁180—188。

70 程光燁：《艾青在1956年前後》，載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8—10。

71 高瑛：《我和艾青的故事》(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頁47。

反黨分子蕭軍及其他一些有反黨情緒的人；(2)篡改了黨報文藝欄的編輯方針；(3)我的嚴重的反黨的文章。第三部分，1949年到前年黨組擴大會議，分為(1)做工作時期(獨立王國，小集團，製造個人崇拜……)；(2)不做工作時期(不合作，分裂，反黨，一本書主義)。第四部分：最近一年來的反黨活動，分為(1)反黨小集團問題；(2)退出作協，分裂文藝界；(3)和右派關係。第五部分：我的初步認識。

茲將第五部分轉引如下：

1947年6月我到建平的時候，看見毛主席，毛主席在一個短時間裏，從散佈到吃晚飯，他把一句話向我重複了三遍。毛主席說，看一個人不是從幾年，而是從十幾年。毛主席每次說完，我都沒有答應，只在心裏想了一想。我想的很簡單，我想，過去幾十年不算，我還有以後幾十年，我要珍視以後幾十年。這句話後來我也不敢忘記。可是我卻沒有真正懂得毛主席的話的意思。我從一個個人主義來聽這句話，而且用個人主義的狂妄的抱負，實際是唯心主義來對待了這句話。現在十年過去了。在過去了十年後的今天，我重想起這句話，我想到這裏，就不能再想，我寫到這裏，我就不能再寫……。我現在體味到那時，毛主席是代表了黨對我這樣一個犯過很多錯誤的人給予了希望。那是黨對我的無比的慈愛，也是嚴格的要求。我既沒有好好的把過去的幾十年深刻的檢查一下，而且又在這十年中越跑越遠，越來越墮落，並且在幾次黨對我的挽救中都不知悔改，一直走到了毀滅。我是非往死路走不行，非弄到這步田地不止。這難道不是我忘恩負義，難道不是我辜負了黨嗎？我最近每一想到這幾十年，這幾十年的罪惡的歷史，幾十年裏黨希望我走的路，和我幾十年來自己所走的路，我就像有一座山壓在心上。可是我想，過去我錯了，我沒有勇氣正視我的歷史，從清算我的歷史中來洗清我的靈魂，我就不得不背着骯髒的包袱而繼續犯罪。我現在已經到了絕路上了。可是我是不能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欠了賬就得還錢。我對人民

犯了罪就要贖還。我是黨的不肖子孫，我背叛了黨，我就該向黨請罪，受黨的處分。為着要還賬，為着要贖罪，我就得有勇氣好好的清算自己，否則我就無法做人。無法贖罪。我現在簡單的總結我的幾十年，作為我的初步認識。

我的幾十年的道路，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走向叛黨，反黨，一條通向毀滅的道路。我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由於我的家庭出身沒落的大地主家庭，而又寄人籬下，所以帶着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意識，唯我獨尊，而有着濃厚的虛無主義的孤僻的感傷的情緒。我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不滿而參加到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來的。參加革命後，思想沒有絲毫改造，不久便被捕，在階級敵人特務的囚牢中，受到嚴重的考驗。但我沒有受得住考驗，我屈服了，投降了，寫了聲明自首書。從這裏我走向了叛黨。

我又重回到黨的懷抱，黨給我極大的溫暖和相信，給我同工農相結合的機會，委託我去做紅軍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又做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又上馬列主義學院學習馬列主義，和文協副主任，黨報文藝欄主編，我應該誠懇的做好工作，以贖前愆，但我卻在革命的困難時期，對黨不滿，反黨，發表了反革命分子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自己也寫了《三八節有感》和“在醫院中時”等文章，而《三八節有感》就被敵人特務機關利用，作為向黨進攻的有力的彈藥。

當革命勝利後，黨委我一重任，我卻滋長着驕傲，目空一切，把黨的事業當作個人的地盤，擴大個人影響，製造個人崇拜。而在這樣的時候，又被反革命胡風分子等，認為可以合作的物件。

前年受批評了黨教育我了，而我既不決心悔改，又不警惕，反而向黨進攻。在大鳴大放期間，右派分子向黨瘋狂進攻的時候，我也加緊了反黨的步調，小集團的反黨的活動和陰謀是非常惡毒和瘋狂的。而且我又為右派分子所看中，實際是裏應外合的都想在“丁陳問題”上翻案，大鬧一場，打倒文藝界的領導，以資產階

級的文藝方式來篡奪黨的文藝領導，從這一連串的叛黨，反黨的行為來看，我不是一個什麼黨員，黨員的名稱，只是一件騙人的外衣，在這件衣服底下，全是污穢的東西。而且可怕的是從歷史上，時常，幾乎一貫的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常常和敵人裏應外合的向黨進攻。並且屢戒不改。我懂得黨對我的這樣無恥的墮落的錯誤是痛心的。不到重病也是不願用重藥的。我現在也明白了像我這樣的一個頑固的個人主義者，一貫的反黨，反黨成為一種本性了的人，也是非置之死地而後才能復生。我如果不經過大痛苦也是不能回頭的，如果不大徹大悟，徹底的暴露自己，批判自己，從根拔除腐爛的思想根源，完全拋除個人主義，也是不可能從新做人的。我現在第一步是要死去，一塊肉一塊肉的割去，腕骨療毒，我要下狠心。要對自己毫無溫情。從死中求生。我是一個大罪人，我沒有臉，也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和黨給我寬大，我只請求黨給嚴格的處分，要求黨繼續拯救我，同志們繼續幫助我，使我能用行動，用工作來贖回我的罪惡。⁷²

丁玲都這樣作踐自己了，黨組擴大會議也該結束了。

9月4日第二十五次會議上，與會者針對丁玲的檢討，再一次對丁玲、陳企霞作了批判。這已是最後一次批判大會了。

其後，馮雪峰也作了檢討。對三十年代的問題，他說：

我對於周揚同志等，在1933年的時候，已經形成了宗派主義的成見。1933年底我離開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辭，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為。1936年7月至9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態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於懷疑周揚同

72 《丁玲的檢討》，載《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的檢討》，1957年9月。

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並且要停止當時的黨團對上海文藝界的領導工作，由我來通過群眾加以領導，但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為登峰造極的表現。

馮雪峰的這篇檢討還說：

我到上海之前，周揚同志等同魯迅先生之間的隔閡，是已經形成的；但我到上海之後，我不但沒有向魯迅先生解釋，進行團結工作，反而隔閡加深了，這也是我要負責的。

馮雪峰的這一檢討，當然是順着與會者所強加的“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而作的。

馮雪峰最後說：

我向黨表示，假若我還能夠留在黨內，我固然要堅決地按照黨的要求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即使我被清洗出黨，我也一樣要堅決地按照黨的要求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爭取重新入黨。⁷³

1958年2月，馮雪峰被“清洗出黨”，劃為右派。一直到他去世，也沒有獲得“重新入黨”的機會。

9月5日的黨組擴大會結束後，作協黨組決定，在9月16日、17日兩天召開文藝界大會(與前面的會議延續下來，即二十六次、二十七次黨組擴大會議)，總結傳達這25次會議的成果。

這兩次大會在首都劇場召開的。參加會議的人除了原來出席黨組擴大會的二百多人外，又邀請了中國作家協會各地分會、中共各省、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各地部分作家、藝術家及中國作協所屬刊物編輯部全體工作人員共1350多人參加。

16日的大會在上午八點四十五開始，首先由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代表黨組對丁、陳反黨集團的鬥爭作了總結，指出了鬥爭已經

73 《馮雪峰的檢討》，載《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的檢討》，1957年9月。

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今後還要深入更深入地進行鬥爭”。

其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講話。周揚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只講了一個半問題。第二天開會時，周揚接着講。在周揚長達五個小時的講話中，他從“兩種世界觀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要解決文藝家和工農相結合的問題”三個方面，“對文藝界對丁、陳反黨集團鬥爭的重大意義和他們的反黨思想，歷史根源以及我們今後的工作等各方面，作了闡述、分析和批判。他指出這次鬥爭還要繼續下去，鬥爭的成果還要進一步加強鞏固和擴大，繼續開展文藝的大辯論，從鬥爭中接受教訓”。

下午，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陸定一到會講話。他從“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問題”、“文藝工作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對待文藝工作者的兩個方針”、“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去”、“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個狠”等六個方面，肯定“這次文藝界反對右派分子和反黨分子的鬥爭進行得很好，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並“就社會主義革命的艱巨性和反右派鬥爭以來文藝界暴露出來的人神共憤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作了分析”。

此外，在兩天的會議上，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副主席巴金、老舍等在發言中，“一致擁護作協黨組對丁、陳反黨集團的鬥爭，認為這場鬥爭勝利，對文藝界的教育意義很大，對提高文藝家的覺悟和思想水準，加強文藝界的團結，都將起着劃時代的作用”。⁷⁴

十、對丁玲、陳企霞的組織處理

一場“大辯論”結束了，中國作協黨組又要向中央寫出報告。

9月21日下午，中國作協黨組會上，劉白羽提出，要郭小川來起草。26日上午，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嚴文井等作協五人核

74 參見《文藝報》第25期，1957年9月29日出版。

心小組成員開會，就報告內容談了一個提綱。郭小川27日動筆，30日寫好《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經過報告》初稿，下午列印出來，徵求意見。10月10日黨組會上，大家對報告基本滿意，又提了修改意見。

在作協黨組修改、上報《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經過報告》的過程中，中共中央也將如何處理右派分子提到了議事日程。

9月20日，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的全體會議開幕。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反右派鬥爭的方針政策和具體部署。9月23日，總書記鄧小平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明確提出：“對於黨內的右派分子應該開除他們的黨籍。”

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第一部分規定了哪些應劃為右派分子，第二部分規定了哪些應劃為極右分子，第三部分規定了哪些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可以作為將丁玲、陳企霞等劃為右派的依據是第一部分的第三條：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⁷⁵

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裏頭出了高崗，你們民主黨派一個高崗都沒有呀？我就不信。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麼一些人，你們民主黨派不是也出了嗎？”⁷⁶

談到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毛澤東說，反擊右派總要告一個段落嘛！比如，現在北京這個反右派的空氣，就比較不那麼濃厚

7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613。

76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88。

了，因為反得差不多了，不過還沒有完結，不要鬆勁。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擺他幾十年，聽他怎麼辦。談到處理右派的方針，毛澤東說，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丟到海裏頭去呢？我們一個也不丟。我們採取不捉人，又不剝奪選舉權的辦法，給他們一個轉彎的餘地，以利於分化他們。具體到人，毛澤東也作了一些考慮，他說，章伯鈞的部長恐怕當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還可以當，副校長就當不成了。還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暫時也不能當。對右派如何處理，如何安排，這個問題請諸位去議一下。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再一次談及對右派的政策。他說：“對右派的批判必須嚴肅、深刻、全面，處理要比較寬大。寬大無邊當然不好，但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裏來。”這就總結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名言。⁷⁷

1月29日，國務院第96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這個文件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給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執行。文件把“國家薪給人員”中的右派分子劃為6類處理辦法。具體規定如下：

(甲) 國家各機關單位中的右派分子：

第1類、情節嚴重、態度惡劣的，實行勞動教養，態度特別壞的，還要開除公職；

第2類、態度好或情節不十分嚴重的，撤職送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生活上酌予補助；

第3類、情況與前兩種相似，但本人學術、技術上有專長，工作需要的，或年老體弱不能勞動的，撤消原職，留用察看，並降低待遇；

第4類、情節較輕、態度較好，或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需要給予

77 朱正：《反右派運動始末》(下)(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頁673—674。

照顧的，撤消原職，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第5類、情節較輕、態度好，或在社會有較大影響，或學術、技術上有較高成就的，實行降職降級降薪，原兼職過多者，應撤消其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

第6類、情節輕微、態度好的，免予處分。⁷⁸

中央的方針，成為中國作協對右派進行組織處理時的政策依據。

對於丁玲的處理，作協黨組召開會議討論後，還需要聽取中央書記處的指示。10月14日，作協開了一次會。10月16日，在作協開會再討論“對丁、陳集團的處理問題”時，其間周揚到鄧小平那裏去了半個小時，“回來後由他主持討論到十二時，決定開除幾個人，把他們分配到下層去生活。最近就分別進行談話，處理他們的黨籍問題”。10月17日，作協完成了“關於處理丁、陳問題給中央的報告”。⁷⁹

10月26日下午，中國作協各支部大會一致同意開除丁玲的黨籍，建議讓她下去參加實際工作鍛煉，有的支部建議，將丁玲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改造，甚至有人提出直接送到農墾部的王震將軍處管理。支部大會後在上報的材料中寫道：“丁玲的言行滲透了剝削階級的意識，為了挽救她，就必須嚴肅處理”。11月4日，在周揚的主持下，作協開始討論擬定關於丁、陳問題以及對其處理的給中央的報告。11月26日，郭小川寫出了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分子的處理決定》上報中宣部，文中稱：“關於丁玲、馮雪峰的作協副主席職務，擬由作協向主席團建議，採用通訊方式徵求作協理事的同意，解除他們的副主席職務。丁玲等人的其他行政職務及刊物編委等應一律解除。人民代表和作協理事的名義，在下屆選舉時，另行處理。作協會員的會籍，可不變動。擬讓丁玲等人

78 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97》(上)(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頁794—795。

79 郭曉惠編：《郭小川全集》第9卷(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202—203。

深入基層生活，改造思想，繼續寫作。”⁸⁰

12月2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經過報告》上報中宣部並轉中央。《報告》中說：

這次會議是1955年八九月間黨組擴大會議對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的繼續。前年會議以後，丁玲、陳企霞實際上不但沒有接受黨對於他們的批判，痛改前非，反而從去年下半年起，暗中結合力量，繼續反黨活動。黨組為了和他們進行鬥爭，於今年六月間再度召開擴大會議，展開辯論。最初的三次黨組擴大會議是在六月初大鳴大放階段召開的，在這些會議上，丁玲、陳企霞、李又然等公開向黨進行了倡狂的進攻。從7月25日第四次會議起，開始了對丁、陳反黨集團的反擊。

《報告》中列舉了所進行的“繼續反黨活動”的主要表現：

- 一、勾結黨外右派，和文藝界其他反黨集團，利用整風初期大鳴大放機會，進行推翻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篡奪文藝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不僅勾結了《文匯報》的右派分子，企圖在報刊上為1954年檢查《文藝報》翻案，為丁、陳反黨集團翻案，而且與美術界的江豐反黨集團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文藝報》等處的右派分子們互通聲息，相互支持，企圖把這許多反黨的潮流，匯合成一支巨流，推翻黨的領導，由他們這一派人物取而代之。
- 二、分裂文藝界，破壞黨內團結和文藝界黨與非黨的聯盟。丁玲、陳企霞不僅進行反黨的小集團活動，而且還曾準備在他們進攻不遂的情況下，退出文藝界，與黨公開決裂。丁玲、陳企霞都準備在原擬於今年十月召開的文聯全國代表大會上，採用登報聲明退出作家協會的辦法來向黨要脅。馮雪峰身為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卻背着黨組和《文藝報》的幾個忠實於他的反黨分子密謀籌辦《同人刊物》，企圖搞垮《文藝報》，他們內定的“同人”中，就有丁玲、陳企霞、王若望、劉賓雁、陳湧等右派分子和反

80 參見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119。

黨分子。這次會議還從歷史上揭發了他們反黨思想和活動的發展過程，特別是丁玲、馮雪峰多年以來對黨不忠和破壞黨的利益的行為，使大家更加深刻認識到這個反黨集團的危害性。

《報告》談到對丁、陳反黨集團分子組織處理的初步意見：

一、丁玲、馮雪峰的歷史問題，尚未作出結論；根據會議上所揭露的材料，又發現了一些新的疑點，因此，我們認為，對他們的歷史問題應進一步加以審查。

二、關於丁玲、馮雪峰、陳企霞、李又然、艾青、陳明、羅烽、白朗的黨內處分問題，亦應予以及時處理。最近，作協各個支部在大會結束後，採取了大放大鳴的方法，普遍地在會議中提出對丁、陳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的組織處理的意見，絕大多數都主張開除上述八人的黨籍，只是白朗比其他七人罪惡較輕，如轉變得好，可以考慮是否給以留黨察看的處分(直到目前為止，白朗檢討的不好)，黨組已建議作家協會總支和文化部黨組織(馮雪峰、陳明在文化部過黨的生活)考慮這些意見，最近即召集總支大會或支部大會作出決議，然後報請上級黨委批准。

三、關於丁玲等八人的工作問題，我們也準備進行處理。我們初步意見是：撤消丁玲的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委員、全國文聯委員、人民代表；馮雪峰的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人民代表；艾青的全國文聯委員、作協和美協理事、《詩刊》和《收穫》編委；白朗的作協理事、人民代表；陳企霞、羅烽的作協理事；李又然的文學講習所教員；陳明的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保留馮雪峰的全國文聯委員、作協理事；丁玲的作協理事。然後根據各人不同情況，分別讓他們下去鍛煉改造繼續寫作或監督生產，或另行分配工作。⁸¹

12月6日下午，中國作協黨總支召開大會，一致通過開除了丁玲的黨籍。

81 轉引自：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244—245。

12月20日下午召開黨總支大會，一致通過開除陳企霞、李又然、艾青的黨籍。

在8月召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期間，在陳企霞決定“轉向”時，周揚和劉白羽都給以“黨還是要你的，歡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黨內來”的許諾，但這時已被忘在腦後了。陳企霞後來仍然被定為右派分子第2類，取消原來的行政十級的待遇，“送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只發給個人生活費每月26元。

12月16日下午，劉白羽代表作協黨組先後找艾青、丁玲談話。劉白羽一見艾青，說話就極為嚴厲：“你還這樣，使人對你失去信心，上次開除丁玲黨籍的會，你說你牙疼，沒來，非常可惜。”艾青說：“我就是活到60歲，也還有12年，我是算了吧。”劉白羽極為不滿地說：“黨對丁玲重做安排有20年的打算，黨對你也是這樣。要有點思想準備，做農民也要做好農民。”

相比之下，與丁玲談話，劉白羽就顯得比較緩和。丁玲在延安時就是劉的老上級，當年丁玲夫婦同劉白羽夫婦時常在延河邊散步、交談。從記錄稿上看，兩人說話前後不搭，像是漫不經心的一次閒談。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談話方式裏，丁玲的政治命運已經悲劇性地定下來了。談後結束前，劉白羽告訴丁玲：“要讀黨報社論，一個作家首先是一個戰士。”劉白羽還交待，在下去之前，時間好好支配一下，有些批判大會還要參加。丁玲心裏明白，這是以罪人之身陪鬥。⁸²

1958年1月9日，中共中央向全國批轉了《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經過的報告》，批語中認為，這個“報告中所述各點是正確的”。

對於丁玲的處分是基本上是按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當時，丁玲的丈夫陳明也在電影局被劃為右派，要到下邊勞動。而考慮到丁玲年齡較大，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明確告訴丁玲：“你可以不下去

82 參見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120—122。

勞動，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從事研究或寫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資”，“也可仍舊留在北京寫作，過一段時間再把陳明從東北調回來。”

丁玲的全國人大代表，毛澤東已經有話，肯定當不成了。1958年2月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經審查認為，有38人“已經喪失繼續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的合法根據，不應出席本次會議”，其中就有丁玲。

至此，從1955年開始的批判，雖然歷經反復，但最後還是回到起點。所不同是，不但丁、陳的罪名增加了，變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而且那些在這一反復過程中被稱之為替丁玲、陳企霞“翻案”的人，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淒慘的右派境遇。

十一、“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作協黨組在9月16日、17日召開的1350人參加的總結大會，參加人員規模這樣廣，事實上就是一種“消毒”。而在此期間，新聞媒體發表連篇累牘對丁玲、陳企霞的大批判文章，也使全國家喻戶曉。這樣的做法，在中央和中宣部以及作協黨組看來，還是不行，還需要從更高的高度對這場後人看來甚是荒唐的批判從理論上來做嚴肅的總結。

這個任務非周揚莫屬。

9月16日、17日周揚所做的五個小時的報告，在會後曾以《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為題印發徵求意見。

毛澤東很重視周揚這個講話。他在看了一遍後，專門找周揚談了一次，提出了修改意見。他告訴周揚，文章很好，但他還有些想法，因要去蘇聯，沒有時間細讀，是否等他回來再改改。在毛澤東出國這段時間內，周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文章又作了修改。毛回國後，周揚又將修改稿送上。毛澤東閱後批示說：

周揚同志閱後，即送胡喬木同志轉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順便談過：應印發給以小平為首的會議各同志，作一二次認真的討論(事前細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後發表。發表前可送我看一次。會議討論使要有周揚和其他幾位文藝領導同志參加。此事請告小平同志辦。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這是一件大事，不應等閒視之。我現在不看。待小平會議討論再加修改後，我再看。

毛澤東批示中的“以小平為首的會議各同志”之語，當是指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不但自己修改這篇文章，而且責成中央書記開會處討論修改，可見對這篇文章是高度重視的。

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討論意見，周揚再次作了修改。1958年2月，又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又親自作了大量修改，2月24日，退給林默涵，並指示“最好將此文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

2月27日，《人民日報》排出文章清樣，周揚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再次作了“一點修改”。2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和3月11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五期上，同時刊登了這篇文章。⁸³

在這篇經中央審定的文章中，周揚對丁玲作了全面的清算：

在1955年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上，我曾經說，一個共產黨員最重要的是對黨忠誠。丁玲對這句話頗有反感；她在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氣勢洶洶地質問我為什麼要提“忠誠”這些話。丁玲自己心裏當然明白。原來作賊心虛，她怕聽“忠誠”二字。丁玲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一個一貫對黨不忠的人。

許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讀一讀她三十年前的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幫助的。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可怕的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她說謊，欺騙，玩弄男性，以別人的痛苦為快樂，以自己的生命當玩具。這個人

83 參見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13—1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92—96。

物雖然以舊禮教的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實際上只是一個沒落階級的頹廢傾向的化身。當然，作家可以描繪各種的社會典型；問題在於作者對於自己所描寫的人物採取什麼態度。顯然，丁玲是帶着極大的同情描寫了這個應當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說這篇小說表現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麼她入黨很久以後，特別是在革命根據地生活了幾年以後，卻寫了像“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這樣的作品，就說明她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後來不但沒有改好，反而發展到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尖銳對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在“丁玲文集後記”中，卻說作者所描寫的這個“靈魂”，是如何如何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這就看出，他們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在1941年寫的“在醫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對工人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敵視。這篇小說是丁玲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世界觀的縮影。小說把一個有着嚴重的反黨情緒的年輕的女共產黨員陸萍描寫為一個新社會的英雄人物，僅僅是因為組織上分配工作的時候沒有滿足她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黨和革命的需要咒罵為套在脖子上的“鐵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抵觸的情況下，陸萍對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視的眼光，並且在醫院中展開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小說把革命根據地的勞動群眾寫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寫成一個殘酷無情、陰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幹部從上到下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鬥爭。丁玲寫道：“她尋仇似的四處找着縫隙來進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倒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一邊的。”丁玲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黨、反人民的“真理”，狂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真理”。從莎菲開始，在丁玲所描寫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經歷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賞莎菲式的女性。她對臭名昭著的右

派分子林希翎的讚賞決不是偶然的。她把這種類型的女性當作最可愛的堅強性格加以頌揚。可以說，多少年來，莎菲女士的靈魂始終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後來她穿上了共產主義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麼容易為人們所識別，而她作起壞事來危害也就更大了。

頑強的個人主義者，在革命鬥爭中，一遇到嚴重的考驗，就變成極脆弱的人了。丁玲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國民黨自首，從特務機關的階下囚一變而為他們的座上客，背叛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就是這種脆弱性的表現。後來丁玲到了延安，隱瞞了這段歷史，騙取了黨的信任。1942年，她發表《三八節有感》一類的文章，和王實味、蕭軍等人共同反黨，表現得十分頑強，這可以說是她叛黨行為的繼續和發展。黨對她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是當她表示願意改正錯誤的時候，黨仍然努力挽救她，鼓勵她到群眾中去改造自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就是在黨的這種幫助之下寫出來的。全國解放和一本“桑乾河上”給丁玲帶來了名譽和地位。她在解放後一兩年內多少作了一些工作。但她的個人主義也隨着更加發展了。她忘記了黨對她的批評和教育，變得驕橫不可一世。她利用黨和人民所交托的崗位，極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圖實現她的稱霸文壇的野心。她和陳企霞、馮雪峰把他們當時主編的《文藝報》變成了獨立王國。1954年黨和文藝界檢查《文藝報》工作中的錯誤，這就大大地觸怒了他們。他們的“王國”是誰也碰不得的。從此，他們懷恨在心。他們的反黨小集團的活動愈來愈露骨了。反革命的胡風也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合作的“實力派”。1955年作家協會黨組揭發了丁玲、陳企霞的反黨活動並對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當時，他們作了後來自稱是“言不由衷”的檢討。正如陳企霞所自白的，他們心中充滿了“瘋狂的報復主義”。到了右派進攻的時候，他們的反黨活動就達到了頂點。這就是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的三個時期，在每個重要歷史關頭的表現。

對於馮雪峰，周揚也同樣作了嚴厲的清算：

馮雪峰也曾經為革命做過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濃厚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思想，和黨的組織性、紀律性經常發生矛盾。馮雪峰在他的檢討中用了兩句話來概括他和黨的關係：“得意時個人在黨之上，失意時個人在黨之外。”他在1936年從當時革命根據地的陝北來到上海，以欽差大臣姿態出現，一方面把胡風引為同黨，另一方面對當時上海地下黨組織給以極惡劣的宗派打擊，造成了革命文藝事業的分裂。這就是馮雪峰在他的所謂“得意”時期幹的一件大事。1937年，他因為黨沒有滿足他個人的地位野心，就自動脫黨而去，作了革命的逃兵。抗日民族戰爭爆發，全國人心振奮，而他卻離群索居，鬱鬱寡歡。從此就開始了他的所謂“失意”生涯。

1943年馮雪峰從上饒集中營出來，並沒有變得堅強一些，而是心情更灰暗，更消沉。他在這一年寫出的那本題為“鄉風與市風”的雜文集，充滿了空虛、寂寞、悲觀、絕望的情緒。他看到的是人民群眾的愚昧和麻木，是“奴性的卑賤的苟安”。他對整個民族喪失了信心。當時日本侵略者佔領了我國大塊地方並在我國土地上推行奴化教育。馮雪峰恰在這時提倡民族的“他化力”，主張民族文化的“他民族化”，宣傳民族文化“也可以被強姦產生嬰兒”（見“他化力”）。在這本書裏，他還放肆地宣傳了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思想，宣傳了封建階級的“士為知己者死”和個人野心家的哲學。說什麼“死之專一”而且只限於“知己者”，就是“除了表現對於所依存勢力的忠誠之外，更是尊重着對於自己的獨立意志的忠誠了”。而他說，這“是我們歷史的一個勝利”。他還說什麼“英雄們的野心，也正是有志的士人所要擁抱的那些正氣之另一面的表現；同時，英雄們的野心一接觸到人生的功利，實在是使德行賦有了新的生命”（見“談士節兼論周作人”）。這是說的甚麼話呢？毋怪乎全國解放後，丁玲、馮雪峰、陳企霞等人大大發展了個人野心，向青年們大大宣傳“士為知己

者死”，原來早就有了他們反動的哲學根據的。

馮雪峰在1944年、1945年寫的“有進無退”這本論文集裏，宣傳個人主義的主觀戰鬥精神，歌頌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在許多地方，和胡風的口脛一模一樣。我們知道，胡風是提倡瘋狂性、癡癲性的。馮雪峰也說今天的時代和社會，“要求着瘋子以上的大瘋狂者，要求着強者以上的強者，要求着大瘋狂者的肉搏，要求着最強者的反抗”（見“發瘋”）。當1945年蘇聯紅軍攻克柏林的時候，由於美國陰謀家和納粹匪徒的縱火，柏林一些地方變成了一片火海，馮雪峰不但不斥責敵人的暴行，卻去讚美那“史詩般”的火獄，“史詩般”的恐怖。他把蘇軍解放希特勒德國的勝利說成是“真的恐怖的鞭子”；把解放了的柏林說成是“人類的恐怖之城”。這流露了他對於革命的恐懼和瘋狂的心理。這哪裏有一點點共產主義者的味道呢？馮雪峰在1944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友愛”的文章。這時他從敵人的集中營剛剛出來不久，但在這篇文章裏，他沒有表現一點對於階級敵人的仇恨，卻反而強調宣傳什麼“廣大的人類的友愛”，說這是人的唯一的“根本的要求”，這已經很使人難以理解了。更加奇怪的是，他特別強調對朋友的“友愛”和“忠誠”，他說即使對一個想要叛黨投敵的朋友，“假如不先對朋友或同志下勸告和阻止，卻只將他的企圖當作情報似的東西向社會或團體告發，這對於社會或團體也許可說是忠誠的，但對於朋友或同志卻是居心險惡，近於可怕”。顯然在他的頭腦裏，只有私人友情的利益，沒有黨和人民的利益。事實上，我們從馮雪峰前前後後的言行，只看到他對資產階級的忠誠，卻沒有看到他對無產階級的忠誠；只看到他對自己、對自己的好朋友胡風、丁玲等人的友愛和忠誠，卻沒有看到他對黨對人民的忠誠。我在這裏較多地引證了馮雪峰在1943—45年這個期間所寫的一些文章，為的是好讓大家看看在那烏雲罩滿全世界的年月，這位“共產主義者”的真實思想和情緒。

1949年全國解放，馮雪峰不但沒有感到興奮，反而感到沮喪，如

他自己所說，有一種像“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心情，這就並不奇怪了。他用陰暗的眼光看革命的勝利，看一切新的事物。陰暗正是馮雪峰這一類個人主義者的心理特徵。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馮雪峰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更加處處感到抵觸和厭惡。他的情緒越來越低沉，又越來越暴躁。而當右派進攻的時候，他的壓抑很久的反黨情緒就暴發出來。他和丁玲等人的反黨結合，也就完全暴露。

……

許多同志正確指出了馮雪峰的文藝思想和胡風的文藝思想在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胡風是一個混進革命文學隊伍中來的反革命分子。他巧妙地隱瞞了他的反動政治經歷，騙取了信任，搖身一變而為“左翼”作家，從革命文學內部來進行瓦解破壞的活動。而馮雪峰則始終支持胡風，並且在文藝思想上和胡風唱一個調子。早在1936年馮雪峰就反對向作家提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認為強調世界觀對創作的意義是“機械論的老調”。他和胡風一樣對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路線採取蔑視和嘲笑的態度。他們拒絕文藝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原則。他們口中的所謂“大眾化”，實際是用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去“化大眾”；他們從來不提作家應當如何努力與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卻反復宣傳作家應當用甚麼“主觀戰鬥力”，實際就是用狂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去“擁抱”現實，“改造”人民。他們一向輕視文藝的民族傳統和民族形式。馮雪峰把作家對“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的追求責罵為小市民性的“市儈主義”。當1945年我黨在重慶對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進行批判的時候，馮雪峰仍然站在胡風一邊。他公開地為胡風辯護，反對黨的文藝方針。全國解放後，黨和文藝界委託馮雪峰以主編《文藝報》的重任。這時他雖然在口頭上表示擁護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路線，但實際上還是反對的。他曾力圖使《文藝報》成為宣傳他們一夥人的文藝思想和擴大他們個人威信的地盤。他在1953年為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起草的

文學報告草稿，在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名義下，提出了他的一套修正主義的理論，對解放以來文藝工作的成績全盤加以抹殺。他的報告沒有被採用。正在那時，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任務。黨要求文藝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克服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指出對於文藝上的新生力量應當積極加以扶植；對自己的成就不要自滿，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我們的時代一定能夠產生偉大的作品。黨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馮雪峰等人卻不聽這些意見，還是繼續堅持他們的錯誤的看法。他們在《文藝報》這個獨立王國一意孤行，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投降，對新生力量加以壓制和輕視。黨和文藝界不得不出來糾正《文藝報》的錯誤，並且改組了《文藝報》的編輯部。這是全國解放以後，馮雪峰在文藝路線上和黨的第一次明顯的分歧。馮雪峰當時雖然公開做了一個檢討，但他和他那一夥人始終把《文藝報》的改組，看作黨對他們的打擊，而心懷不滿。他們總是企圖翻案，以便捲土重來。大鳴大放期間，《文藝報》編輯部的唐因、唐摯等右派分子一方面陰謀篡改《文藝報》的方向，另一方面密謀由馮雪峰掛帥創辦所謂同人刊物；他們聲言“要在文學上打天下”，要通過刊物“打開一個新局面”。可見右派分子利用刊物來闖天下的企圖，是始終不肯放棄的。丁玲、陳企霞、江豐還計劃在原定1957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公開製造文藝界大分裂的局面。反右派鬥爭才使他們的陰謀全部歸於破產。

這篇名為“大辯論”但事實上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人卻沒有任何“辯論”餘地的文章，在當時廣為印刷、發行，文藝界各個單位並組織學習，座談討論，領會其精神實質。

在這篇文章公開發表兩個月後，毛澤東在1958年5月8日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又提到了它：周揚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贊成，尤其是文章的第三部分，解決很多問題。

在毛澤東所稱道的第三部分裏，有他親筆加寫的這樣一段文字：

在我國，1957年才在全國範圍內舉行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給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解放文學藝術界及其後備軍的生產力，解除舊社會給他們帶上的腳鐐手銬，免除反動空氣的威脅，替無產階級文學藝術開闢了一條廣泛發展的道路。在這以前，這個歷史任務是沒有完成的。這個開闢道路的工作今後還要做，舊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開闢了，幾十路、幾百路縱隊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戰士可以在這條路上縱橫馳騁了。文學藝術也要建軍，也要練兵。一支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大軍正在建成，它跟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大軍的建成只能是同時的，其生產收穫也大體上只能是同時的。這個道理只有不懂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才會認為不正確。⁸⁴

在當時，雖然還不流行將毛澤東的話用黑體字排印出來——像在“文革”中那樣，但是許多人都是知道這段話是毛澤東的，至少是中宣部幹部都是知道的。

二十多年後，周揚本人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的報告中，回顧到這段歷史時，非常沉痛地說：

特別是1957年文藝界的反右派鬥爭，混淆兩類矛盾的情況更為嚴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應有的打擊，錯誤地批判了一些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文藝觀點和文藝作品，傷害了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華、有作為、勇於探索的文藝工作者，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後，文藝領域出現的生氣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

歷經“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後，晚年的周揚對以往自己所領導的政治運動有了真誠的反思，在此同時，他也完成了由政治家向文化人角色的轉換。在出版自己的文集時，雖然他曾堅持要將這篇文章收入，但是終因自己年老體衰無法為此寫出他所想寫的按語，

8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94—95。

加之一些歷經那場運動的人的反對而作罷。⁸⁵

十二、毛澤東發動“再批判”

在毛澤東修改周揚這篇文章的同時，或許他覺得但靠周揚的一篇文章還不足於消除丁玲、陳企霞等人的“流毒”，因而想到了作協黨組印發的一份材料：《《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這份材料是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後期印發的，後面附有1942年統一出版社編印的“統一叢書”：《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相》。編者按語中特別提到：“統一出版社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一個出版機構，這個小冊子得自胡風家中，扉頁上寫有‘陳守梅’（按即阿壠）字樣。”劉白羽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曾經提到過。毛澤東認為，應該重新發表和批判這些文章。

周揚立即找到《文藝報》主編張光年和副主編陳笑雨、侯金鏡，說主席要求發表對丁玲過去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要組織批判文章。

張光年等人當然不能怠慢。他們馬上組織人將這些文章匯集在一起，以“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及其他反黨文章的再批判”為題，準備發表。為了表示重視，張光年等人還起草了一個編者按。

1月，《文藝報》編輯部將這組批判文章呈送已到南寧的毛澤東。在請示報告裏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組文章將在《文藝報》第二期上發表，請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看了《文藝報》的編者按，給張光年、陳笑雨寫信說：“看了一點，沒有看完，你們就發表吧。按語較沉悶，政論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來說，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

85 參見徐慶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頁、211—212頁。

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們來件剛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又說：“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兇，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願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澤東對“編者按”還改寫和加寫了以下段落：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1957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很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了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顯然，毛澤東並沒有看重這個所謂“丁、陳反黨集團”成員的“現行問題”即反黨言論，而是強化了他們的“歷史問題”。⁸⁶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二期，刊出了《再批判》特輯，批判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第二天的《人民

86 參見黎之：《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頁；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41頁。

日報》，介紹了《再批判》特輯和編者按的主要內容。

此外，還需提及地，在媒體上對丁玲展開大批判的同時，中學課本中有關丁玲的作品也被盡數刪除。在丁玲影響比較大的地方，像被稱之為“獨立王國”發源地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則集體消毒；全國婦女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丁玲也被迫到會接受批判。在批判會結束後，中國作協黨組在所裏召開了肅清流毒的大會。大會由劉白羽主持，參加人員為在京的一、二期畢業的學員，丁玲也以戴罪之身陪同。

結 語

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召開二十二年後，1979年，中共開始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二十二年前在會議上被口誅筆伐的人，陸續獲得了“改正的結論”：恢復黨籍，恢復政治名譽和原工資級別。其後，在“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大原則下，二十二年前近乎於鬧劇的擴大會議被人們有意淡忘了。

五十年後的今天，翻看着因歲月雕刻已發黃的《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的檢討》，那些在我們這一輩人心中須仰視才能看得見的一個個文壇名家的名字映入眼簾，我無法和他們優美清新的文學作品聯繫在一起，更無法相信這樣一個事實：後來我輩所從小耳濡目染的“文革”語境，其源頭竟能和這些作家聯繫在一起。當然，我知道，那不是他們的錯！

五十年後的今天，不管是當年義憤填膺的聲討者，還是被聲討者，多已作古。歷史只有靠我輩來描述了，可是，他們會答應嗎！

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

謝泳

一、反右運動史料範圍概述

1957年發生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當代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它涉及中共上層對當時國內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同時也涉及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狀況的一般認識，特別是對中國民主黨派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歷史地位以及民主黨派上層人物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要求等相關問題。

反右派運動對中國當代歷史產生了極大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以及後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影響深遠，特別是右派離開原有生活環境外，他們的命運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反右運動使中國傳統社會中作為“士”階層特有的精神氣質受到極大傷害，此後中國發生的許多變化，都與此次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打擊有密切關係。

目前學術界對於此次運動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關於此次運動發生的原始檔案還沒有解密，特別是中共上層關於此次運動決策的原始檔案，在所有關於反右運動研究的文獻中還看不到。當下反右派運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1.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始末。
2. 關於反右派運動中重要歷史人物的經歷和評價。
3. 右派個人的回憶。
4. 中共相關歷史人物回憶中透露出的有關反右運動的歷史信息。
5.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變化。
6. 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的作用。

7. 反右運動的歷史影響及其右派子女的命運等。

中國的反右運動是一個歷史事件，但同時也是一個現實事件，因為關於此次運動的影響及相關事實認定還在進行中，特別是在此次運動中受到傷害的歷史當事人，今天還在用自己的行動豐富這一歷史事件的相關信息。本文所指的反右派運動史料，包括一切以此歷史事件相關的信息，主要是較為集中的與此運動相關的文獻，特別是原始及較為稀見的文獻，取原料第一，次料第二的原則，在原料中包括文字以外的文物性史料。

本文對於成形的一般文獻，敘述較略，比如當時出版的《新華月報》《人民手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以及各地方性日報中關於反右運動的記載，因為這些歷史文獻較為常見和研究者容易使用。另外各種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史性著作中有關反右運動的論述，因為多數為一般性敘述，較少獨立見解和新材料來源，本文也較少涉及，本文注意較多的反右運動史料，以中國大陸各類非正式出版物為主，港台及西文反右運動史料，因為受收集條件限制，暫不涉及。

二、反右運動始末及相關史料

中國有檔案法，但對原始檔案的屆時解密，在事實上很少發生，特別是對與現實政治和相關歷史人物有關的歷史檔案，基本是在封鎖狀態下，這種現象直接影響了歷史研究的深度。目前對於中國反右運動的發生及完整運動始末的研究著作有多部，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及著者對反右派運動的事實判斷雖不盡相同，但使用歷史文獻的方法及文獻來源大體一致。這些文獻的特徵一是已公開的中共文件及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文稿，二是處在反右運動決策中心的歷史人物的回憶錄，三是當時公開出版的報刊，四少量知識分子的日記。

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目前關於反右運動研究著作中還不可能使用

原始檔案，所以關於反右運動的起源及後來的變化發展，較少存在分歧，下面這些史料基本構成了當前關於反右運動的基本文獻綫索：

文件：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北京。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北京。

回憶：

《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當代叢書之一)，中國人民二二七鳴放反共革命聯合會出版，當代出版社，1957年，香港。

《鳴放——革命實錄史》(當代叢書之二)，中國人民二二七鳴放反共革命聯合會出版，當代出版社1958年，香港。

《鳴放回憶》，展望雜誌編輯，香港自聯出版社，1966年，香港。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下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1986年，北京。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冊)，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

葉篤義《我和民主同盟》等五篇文章，見《文史資料選輯》增刊第2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北京。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2年，香港。

蕭克、李銳、龔育之等著《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北京。

陳清泉、宋廣潤《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

研究：

- 納拉納拉揚·達斯、欣文、唐明譯《中國的反右運動》，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年，西安。
- 戴晴《儲安平·王實味·梁漱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長沙。
-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鄭州。
- 彥奇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史人物傳》(1—4)，華夏出版社，1991年，北京。
- 薛建華《毛澤東和他的右派朋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成都。
- 葉永烈《沉重的1957》，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南昌。
- 盧之超主編《毛澤東與民主人士》，華文出版社，1993年，北京。
- 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朝華出版社，1993年，北京。
-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九十年代雜誌社，1995年，香港。
-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太原。
- 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明鏡出版社，1996年，香港。
-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寧。
-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上下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烏魯木齊。
- 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三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北京。
- 胡平《禪機：1957》，廣東旅游出版社，1998年，廣州。
-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香港。
-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鄭州。
-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

民國九十年，台北。

汪國訓《反右派鬥爭的回顧與反思》，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2005年，香港。

宋霖《論1957年“反右派鬥爭”應予徹底否定——由毛澤東與魯迅談起》，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4年，合肥。

謝詠《儲安平與〈觀察〉》，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北京。

在上面提到的相關研究著作中，就史料來源及獨特性而言，1958年香港出版的《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一書引人注意。

本書沒有單獨署名，是一本史論結合的著作，由於多數涉及的原始文獻沒有注明史料來源，一般較少為研究者注意。¹但從書中所敘述的多數史料分析，本書在敘述已知的事實方面，沒有編造，特別是書中多次提到其中的材料來源於當時在北京任職的朋友，據此判斷，本書作為一本較早敘述中國反右運動的著作還是有價值的。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本書第三章《鳴放變成反右派，毛澤東被鬥出走和回京》一節中，作者引述了幾個沒有透露姓名的朋友的說法，認為毛澤東基於他自己對當時國際關係，特別是對蘇聯關係的了解和判斷，曾有過一個建立“新國際組織的秘密計劃”。

在個計劃中，以毛澤東為首，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陳毅及中共四老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外加李維漢和陸定一，共十人，組成一個“新國際中央小組”。書中認為：“這十個人都是共產黨中央重要而有力的人物，都是有名的國家主義共產黨的反舊國際主義者。因此，完全避去舊國際主義派的劉少奇等人，這是毛澤東決定實行‘新國際’政治方向的堅決抉擇”²毛澤東這個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取代蘇聯，使中國成為共產國際的中心。

1 丁抒《陽謀》中引述了《鳴放革命史錄史》，但沒有提到《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見丁著第170頁，九十年代雜誌社，1995年，香港。冉雲飛編輯《右派資料知見錄》（編年初稿）中注明了他曾收有這兩冊香港早期出版的反右史料。見冉雲飛博客：<http://blog.tianya.cn>

2 《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第26頁。

反右前的“鳴放”就是毛澤東這個計劃的一個步驟。但當這個計劃在進行中時，受到了蘇聯的壓力。書中說：“蘇聯領袖赫魯曉夫等人，就乾脆的運用國際主義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國際主義派分子劉少奇等為代理人，制止毛澤東這一行徑的發展，故於六月間發出一個明確的國際指示：“中國人民內部，究竟有何種矛盾，必須採取鳴放與整風。在目前的世界資本主義帝幫，對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環攻之下，我們的國際主義者的處境是特別危險的，一切問題也特別嚴重的，一切也要客觀的審慎，合一步伐，無論人民有何種內部的矛盾，此時的當前，皆不需要一個政治性的鳴放和整風。公開宣揚鳴放政策和整風運動，是給資本主義帝幫一個便利的襲擊我們。同時，也是無形中違害了國際主義，影響了國際團結。毛澤東同志的這種主張，犯了右側思想，機會主義的錯誤，務必糾正這種右傾思想的發展，撲滅這種機會主義的存在。”³

在這種情況下，以國際主義自命而起家的劉少奇，立即召集了黨內的國際主義派分子，包括已冷落的李立三、陳紹禹等人一塊起來了，建立一個‘護黨戰綫’，接受了蘇聯的上列指示，提出要與毛澤東為首的右傾思想，機會主義分子作嚴重的鬥爭，實行蘇聯代理人的任務。當時劉少奇是人大委員長，彭真是書記處書記，人大常委會的秘書長，劉彭二人作了主動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決定。彭真說：“鳴放是民主性的好政策，但是與黨的政治系列相反的，就被右派機會主義分子作了反黨的工具，黨應該要了解這個實際情況，應該要下最大決心，採取反右派的嚴格鎮壓。否則這個鳴放政策，就要危及黨的團結與生存。”

劉少奇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見，並提出兩項建議：“1. 將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時的秘密講話的有關各點，須加修正，予以公開發表，以免右派分子所利用和藉口，2. 召開人大大會，公決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懲處，結束鳴放，以免影響國際與國內的糾紛。”

3 《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第48頁。

書中還提到了毛澤東對劉彭意見的一些不同看法。同時還在“毛澤東出走時的托孤左右鬥爭”一節中，引述了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累年的辛勞，身感疲倦，需要易地修養，黨事不管，國事請你與伯特等四老共同研究，鄭重處理。”⁴

這本較早在香港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內幕的書，其中提到的細節可能多數是出於推測，有些時間、人物活動的空間也與真實歷史不相符，比如書中說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前就離京出走，顯然不準確，另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修改情況，《建國以後來毛澤東文稿》和薄一波的著作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可以印證本書的說法不準確。⁵但本書對劉少奇、彭真作為的一些分析，還有參考作用，特別是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對右派的批評確實非常激烈，而多數情況下毛澤東並不在場。⁶

在中共高層檔案尚不解密的情況下，結合後來中國歷史的發展，特別是文革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彭真的衝突判斷，本書對反右派運動起源的一些分析，在部分邏輯推斷上，確有相當的合理性。

在關於反右運動的起源問題上，因為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檔案，所以對於從“鳴放”突然轉向“反右”的變化，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的“陽謀”，起因是“鳴放”中知識分子的過激言論。但這個看法缺少內在的邏輯，因為對一個政治決策者來說，在決定“鳴放”以前，不可能對這一決策的後果沒有預期。引入蘇聯的干預及毛澤東和劉少奇、彭真的衝突，至少在邏輯上較為合理，因為從“鳴放”到“反右”的時間判斷，確實可以說是突然轉向。另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講稿和發表稿的極大差

4 《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第52頁。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35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北京。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下冊第567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北京。

6 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匯刊》的相關代表發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北京。

異，雖然從文獻上看是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但有些觀點前後截然相反，卻很令人深思。

一般支持毛澤東“陽謀”說的研究者的主要根據是1957年5月10日毛澤東起草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但這是一篇在二十年後才公開的文章。當時文章的題目是《走向反面》，毛澤東改為此題時特別注明“此文可登黨刊，但不公開發表”。此文原來的署名是“本報評論員”，毛澤東修改後為：“中央政治研究室”。6月12日印發黨內時，毛澤東才將署名改為“毛澤東”。除了特別說明“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外，毛澤東還加寫了以下文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直到1977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5卷時才公開了此文。

聯想到1957年5月1日，當時陳叔通、黃炎培給劉少奇、周恩來的信中提到過毛澤東自己建議下屆人大不再提他為主席人選時，信中特別提到：“昨毛主席於會上最後提到下屆選舉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並囑我們透露消息。”

毛澤東在陳、黃信上有幾處批示，其中一處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毛澤東還在信上特別說明：“請看末頁我寫的一段話及文中四處注解，都要印上。”這四處注解透露了毛澤東的一些心聲，其中一處說：“我仍存在，維繫人心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⁷

幾乎同一時間，在陸定一報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學校整風的情況簡報》上，針對當時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的文章《我的憂慮和呼籲》特別批示：“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這個北大學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當時中共高層的分裂。⁸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57、459頁。

8 同上，第493頁。

綜合當時的一些歷史細節和文革後毛澤東與劉、彭的衝突，應該說，由“鳴放”到“整風”的突然變化，確實與中共高層的分歧有關。朱正即根據批判錢偉長時有人說過：“錢說，鳴放搞不好，因為劉少奇到彭真這一條綫是不主張鳴放的。”朱正推測“毛澤東決定放棄新方針而轉為反右，實際上是向劉、彭真‘靠攏’”，這個判斷現在看來是有事實依據的。朱正由此認為“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¹⁰，這個判斷大體也能成立。

三、“右派言論集”的史料價值

反右運動主要發生在國家機關和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團體中(如大學、各文化團體)，因為反右運動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可以自由研究的學術領域，所以相關歷史檔案的開放程度較低，高層歷史檔案由於涉及政治鬥爭，普通研究者基本沒有接觸機會。一般文化團體中，關於右派的檔案，也很難查閱，因為這些普通人物的檔案較多涉及個人隱私和具體個人恩怨，所以對研究者來說，直接接觸原始檔案的機會很少。所以近年來，完全依靠原始檔案進行的學術研究，還很少見到，而且越是有價值的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原始檔案，接觸的可能性就越低。在這種原始檔案基本封閉狀態下，要想深入研究反右運動，一個較為便利的史料來源是盡可能收集當時運動中出現的各種文字材料，比較常見的就是各種“右派言論集”。

反右運動發生的時候，中國社會的基本工業水平還不高，所以此類“右派言論集”，通常包括手寫、油印、鉛印三種類型。作為反右運動的基本史料，在原始檔案不容易接觸的情況下，此類文獻形式大體可以判定為是反右運動史料中的“原料”。

在反右運動中，出現了“大鳴、大放、大字報”這種形式，在這些形式中，原始“大字報”保留下來的可能不是很大，只有通過

9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第618頁，允晨文化，2001年，台北。

10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第120頁，田園書屋，2007年，香港。

筆記或者印刷方式才得以保留。因為從“鳴放”到“反右”的時間很短，而且當時是中共號召並提倡的表達方式，所以就文獻形式而言，反右運動的文獻相對其他中國政治運動中的文獻算是較為豐富的。大約有這樣幾種類型：

1. 從組織形式上說，當時各級機關都建立了整風領導小組，基本是一個工作機關，它屬下的各機關團體的“鳴放”和“反右”情況，通常都會以文件形式上報相應機構，而作為領導機關，這樣的機構通過創辦“整風簡訊、整風快報、學習材料”等內部形式的報刊來指導工作。這種類型的文獻，從理論上說，在相關機構中應當有完整的保留，但從目前關於反右運動研究者所接觸的史料判斷，這種文獻的使用還有較大難度。

2. 從“鳴放”到“反右”期間，國家機關和各文化團體的機關報刊，通常較為集中出過各類形式的“專號、專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各專業性較強的團體中，也印刷過相當數量的此類文獻，比如一些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中的當時出版物，也保留了許多史料。

3. 學生雜誌和校刊的出現，也是反右時較為重要的一個文獻來源。特別是當時全國較為有名的高等院校中，許多系一級單位都辦有臨時性的報紙和雜誌。比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紅樓》特刊，哲學系的《思想戰綫》《浪淘沙》《論壇》，歷史系的《整風快報》等。

4. 國家意識形態機關主辦的內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傳通訊》和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這些期刊因為穩定連續出版，從保存史料的角度觀察，史料價值較高，特別是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因為依靠各地記者及相關機構以情報方式向中央匯報情況，所以保留了相當豐富的內部材料，特別是當時不能在全國大報及省級報紙公開的材料。《內部參考》中經常有讀者給《人民日報》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為情況動態向高層匯報。

5. 反右運動後期，從中央到地方印刷過大量各種形式的“右派言論集”，供批判使用，在此類文獻中，除了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

《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一類較為成形的文獻外，大量零散的各類“右派言論集”時有出現，但目前還沒有一部此類文獻的完整目錄及索引，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也沒有完整收集此類文獻。

以上提到的各類文獻中，內部印刷品較為稀見，特別是如《宣傳動態》《內部參考》一類當時就有發行限制的內部材料，對研究者來說更為寶貴。

1949年後，中國是一個通過意識形態來管理的國家，所以在各級機關中，多數都習慣通過文件和內部設定發行級別的報刊來進行信息傳達和管理，這種基本行政管理方式，直接導致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出現大量供內部參考或者批判使用的文獻，這些文獻基本保存了當時政治運動的大體運作模式，作為歷史研究的文獻形式它們所具有的價值是很高的，但研究者在使用此類史料時，應當對此類史料有一些基本判斷和辨別能力。

從目前對反右運動的研究來分析，大體可以認為，越往上的右派言論，越具備理論性和完整性，省級機關以下的右派，特別是不在專業領域以下的右派言論，主要是一些表達個人意見的簡單看法，是對自己生活環境中不合理現實及對領導的批評意見。而且中國反右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在已積累大量矛盾的工作環境下，社會成員之間的正常矛盾，借反右運動的“政治正確性”得到合理清洗，在相當的範圍內，所謂“右派”，多數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個藉口，在最終的清洗過程中，以往的矛盾是關鍵因素，所謂不同政見，一般只是事後羅織的一些藉口。

中國省級以上的各級機關中，特別是高校和文化團體中，因為時代的突然變革，加之歷史的原因，通常有較為明顯的派系，較為嚴重的已形成宗派，這個特點在中國各民主黨派文化團體的反右運動中表現特別突出，無論左右，凡居於強勢者通常自然代表正確一方，借合法的政治運動清理正常工作環境下積累的衝突和矛盾，成為反右運動的真實狀態，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許多研究者發現“右

派”其實多是“左派”，比如文藝界著名的右派丁玲、陳湧、江豐等等。

大量“右派言論集”的形成，主要是當時處於強勢一面的力量編輯完成的，它所收集的所謂“右派言論”的真實性都會有一些問題，斷章取義、張冠李戴，道聽途說，無限上綱是基本特點。另外“右派言論集”的編纂方式除了“右派言論”外，通常還會有一些批判文章和“右派”過去的歷史。因為“右派言論集”的編纂不會徵求“右派”的同意，所以作為史料使用時，對於書中涉及的事實，需要細加辨別和與真實的歷史事實相印證。

“右派言論集”作為文獻的最高價值，在於它所提供的歷史線索和部分矛盾的真實來源，雖然很多時候那些揭發和批判中提到的事實與真實的事實有相當距離，但這些文章中所涉及的事件及對人物個性甚至人格，特別是個人私生活方面的內容，對於了解歷史真實和判斷歷史關係還是有幫助。另外此類文獻中，對於所涉人物的基本經歷特別是當時作為反面材料涉及的歷史問題，多數對完整了解歷史事實，具有啓發作用。

就出版形式而言，1957年前後出版的此類文獻分為內部印刷和公開出版兩種，公開出版的多數是知名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通常較為容易見到，一般圖書館也多有收藏。比較少見和一般圖書館難以完整收藏的是大量無名右派的“言論集”，就史料稀缺性判斷，越是無名右派的材料，越有收藏和保存價值，因為就中國右派的總人數而言，知名右派畢竟是少數。在國家無意統計右派真實數目的情況下，這些“右派言論集”是將來統計右派人數的一個重要史料來源。撰寫過批判和揭發右派文章的那些作者，後來的人生也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通過對此類歷史文獻的收集和研究，對於深刻認識那些知識分子的行為也有幫助。

下面是我收集的部分“右派言論集”書單，除個別來源於書目外，絕大多數系據實物編寫：

內部出版部分右派言論集：

《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發言稿選編》，中央黨校編印，1958年，北京。

《整風學習討論問題參考資料》(1—75期)，中共中央黨校校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學員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校部辦公室編印，1958年，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普通新聞班整風和反右派運動的支部總結匯編》，中共中央黨校校部辦公室編印，1958年，北京。

《中國科學院北京區青年反右派鬥爭大會材料選編》，中國科學院團委會編印，1957年。

《校內外右派言論匯集》，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印，1957年，北京。

《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中國科學院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印，1958年，北京。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批判光明日報參考資料》，光明日報社印，1957年，北京。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右派分子儲安平言行》，光明日報社印，1957年，北京。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觀察〉儲安平言論選》，光明日報社印，1957年，北京。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批判文匯報報參考資料》三冊，光明日報社印，1957年，北京。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右派分子徐鑄成的言論作品選》，光明日報社印，1957年，北京。

《堅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綫》，山西省文聯、太原市文聯，1958年太原。

- 《戰鬥的聲音》，中共安徽師範學院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合肥。
- 《明辨集》，中共武漢水利學院委員會宣傳部編，1957年，武漢。
- 《章乃器反共三十年》，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整風辦公室編，1957年，北京。
- 《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的決定匯編》，共青團中央組織部編，1959年，北京。
- 《整風學習資料》，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印，1957年，北京。
- 《想一想 對不對》(一、二集)，電力工業部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擺出來，大家看》，電力部團委會辦公室輯，1957年，北京。
- 《右派言論選輯》中共河南農學院委員會編，1957年，鄭州。
- 《中國資產階級右派經濟言論批判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1958年，北京。
- 《反右派鬥爭學習材料》，共青團長春市委宣傳部編印，1957年，長春。
- 《整風學習參考資料》，電力工業部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南開大學右派反動言論選輯》，南開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教研組編，1957年，天津。
- 《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1—4輯)，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我院教職員中的右派言論匯編》，中共東北財經學院委員會編，1957年，大連。
- 《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中共旅大市委宣傳部，1957年，大連。
- 曾希聖《巨大的勝利，深刻的教訓》，山西省司法廳翻印，1958年，太原。
- 《蘭州大學右派言論匯集》1—2冊，中共蘭州大學委員會編，1958年，蘭州。

- 《右派分子言論匯編》第一輯，同濟大學馬列主義資料室編印，1957年，上海。
- 中共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委員會宣傳部編《“鳴放”言論選輯》第一輯，上海第一師範學院，1957年，上海。
- 《教與學——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義理論專號》，1958年第5期，中共中央第五中級黨校，北京。
- 《右派分子章乃器的醜惡面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宣傳教育處編，1957年，北京。
- 《粉碎陳銘樞反共集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各民主黨派的嚴重任務》，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反右派鬥爭的偉大意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揭露和批判章羅聯盟的軍師——費孝通》，中央民族學院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右派文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辦公室，1958年，北京。
- 《“鳴”、“放”選集》(1—4)，中共山西省委整風辦公室編，1957年，太原。
- 《鳴放放言論》(1—3)，“學習生活”編輯室編，1957年，哈爾濱。
- 《批判吳祖光右派集團——劇協、影聯聯合批判吳祖光右派集團辯論會上的部分發言》，首都藝術界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北京。
- 《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的檢討》，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北京。
- 北大工會歷史系部門委員會編《整風快報》，北京大學，1957年，北京。
- 中共山西省委直屬總黨委會編印《整風快報》，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1957年，太原。
- 《交通部機關反右派鬥爭辯論大會發言選輯》，交通部機關整風辦公

室選編，1957年，北京。

《內部參考》，新華通訊社參考消息組編，1957年，北京。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整風辦公室編《民進整風簡報》1—17期，1957年，北京。

中國民主促進會天津市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天津民進整風簡訊》，1957年，天津。

民進天津市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整風快報》，1958年，天津。

《捍衛高等教育和科學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錢偉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一、二集)，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委員會編，1957年，北京。

《校內外右派言論匯集》，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系教研室編印，1957年，北京大學，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部分青年教師等編《批判右派分子李景漢文集》，1959年，中國人民大學，北京。

《右派言行材料——民族主義分子反動言行選輯》，內蒙古黨委辦公廳選編，1958年，呼和浩特。

《駁斥董時光等右派分子謬論》，1957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爭鳴》雜誌，中國民主同盟主辦，內部出版，1957年，北京。

《劉賓雁言論摘編》，中宣部編輯，1987年，北京。

《方勵之言論摘編》，中宣部編輯，1987年，北京。

《王若望言論摘編》，中宣部編輯，1987年，北京。

公開出版的部分批判右派言論集：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匯刊》，人民出版社，1957年，北京。

《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綫而鬥爭》(上下冊)，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上海。

- 《右派言論選集》，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漢。
- 《向右派開火》，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 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北京。
- 《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不容抹殺》，群眾出版社，1958年，北京。
-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群眾出版社，1957年，北京。
- 《聲討惡毒攻擊肅反的右派分子》，群眾出版社，1957年，北京。
- 魏可、常宏著《右派現形記》，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上海。
- 《反右派通訊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漢。
- 《雷海宗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天津。
- 翦伯贊等著《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
- 楊華生等《右派百醜圖》，遼寧人民出版社，1957年，瀋陽。
- 《超階級的靈魂》(諷刺詩)，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上海。
- 《反右派雜文選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漢。
- 柳成群《駁斥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謬論》，1957年，財政經濟出版社，1957年，北京。
- 學習導報社編《反右派鬥爭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長沙。
- 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籌委會哲學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所、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編《批判馬哲民的反動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武漢。
- 《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論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 《批判右派分子譚天榮等論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 《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
- 《戰鬥的聲音——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文藝作品選輯》，北京出

版社，1957年，北京。

《批判王中反動的新聞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上海。

《戰鼓集》，北京出版，1957年，北京。

《批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長沙。

《在反右派鬥爭中吸取教訓——記黨的捍衛者和青年的敗類》，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青年作者的鑒戒——劉紹棠批判集》，東海文藝出版社，1957年，杭州。

文藝報編輯部編《再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北京。

《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資料叢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57年，蘭州。

四川省圖書館編《反右派鬥爭資料索引》，四川省圖書館，1957年，成都。

《右派分子的嘴臉》，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長沙。

中共雲南省委黨校教務處編《堅決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雲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昆明。

《堅決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廣州。

《短劍集——反右派鬥爭雜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長沙。

《分清教育界中的大是大非：中小教師反右派鬥爭學習參考資料》，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杭州。

丁忱、祝公健《批駁工商界右派分子的謬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上海。

李達《費孝通的買辦社會學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上海。

《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1—3冊，科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關於右派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資料》，1957年，武漢。

褚葆一《資產階級適中人口論批判——駁右派分子葉元龍“論最適當

的人口數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上海。

田峰、江陵編寫《批判右派分子沈志遠吳承禧在經濟科學方面的反動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上海。

《反擊右派鬥爭通俗講話》，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漢。

石人編寫《章羅聯盟罪行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漢。

《我們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濟南。

山東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山東文藝界反右派鬥爭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濟南。

《詩刊》(反右派鬥爭特輯)，1957年7月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文藝報》1957年1—38期，中國作家協會，北京。

《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北京大學浪淘沙社、北京大學校刊編，1957年，北京。

四、反右運動的影像史料

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時，因為技術手段的局限，這方面的影像史料較為稀見。主要有幾個方面：

1. 當時新聞記者拍攝的黑白新聞照片，在一般報紙上偶有所見，但主要存在於當時中國有限的幾本畫報中，如《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及地方出版的畫報中。

2. 美術作品(主要是漫畫)，出現在當時的一些文藝性報刊，如《中國青年》《新觀察》《文藝月報》《詩刊》《美術》以及北京大學的學生雜誌《紅樓》、《浪淘沙》《論壇》《思想戰綫》等雜誌上。

3. 1958年後，為了總結反右運動的成績，有些城市舉辦過有相當規模的“匯報展覽”，展覽後印製過一些畫冊，這些畫冊通常由照片、漫畫、實物、統計表格等幾種類型組成。

4. 新聞電影記錄片。

5. 戲劇等文藝形式的圖像記錄。

部分反右運動影像史料目錄

《自我改造匯報評比展覽會匯編 1957—1958》(畫冊)，廈門市民革、民盟、農工、民建、工商界、宗教界、歸國華僑聯合舉辦，1958年，廈門。

《上海市工商界整風運動展覽會匯編 1957—1958》(畫冊)，上海市工商界整風工作委員會，1958年，上海。

《天津市反右派鬥爭展覽會》，1958年，天津。

中國美術家協會廣州分會《反擊右派漫畫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廣州。

《向右派鬥爭》，紀錄片。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出品。

攝影：李振羽、葉松勁、錢厚祥、靳敬一、牟森、舒世俊、梁明雙、趙凱

解說詞：沙丹

編輯：鄧葆震。

(原廣告介紹詞：這部紀錄片如實的記錄了全國各地的群眾向右派分子堅決回擊的情況。在工人、學生們和右派分子進行說理鬥爭的辯論會上，在各民主黨派的整風會議上，右派分子們在憤怒的人民群眾用真理和鐵的事實的質問下原形畢露。)

話劇《百醜圖》，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演出，孫維世導演。上海滑稽劇團移植演出。

《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胡傑攝影、解說，2003年製作。

許善斌《證照中國 1949—1966》(本書收有“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民盟北京市委會反右派批判大會”的入場券)，華文出版社，2007年，北京。

五、近二十年完成的右派回憶錄

1979年後，中國對1957年的反右運動進行了重新評價，右派得到了改正，他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社會生活中。一般流行的說法是當時中國共劃了55萬右派分子。這個統計來源於李維漢的回憶錄，這只是個大概的說法，具體的右派人數，只有將來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才能完全落實清楚，希望將來能有一本較為全面的“中國右派名錄”，這是建立“右派博物館”的基本內容。¹¹

右派改正後，恰逢中國社會進行改革開放的時代，所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數右派重回工作崗位，加上對歷史認識的局限，所以寫作回憶錄的人很少，當時有條件從事這一工作的主要是一些作家，比如丁玲、劉賓雁、王蒙等，再加上一些學者及民主黨派的重要成員，如葉篤義、千家駒、費孝通等。

本人收集的右派回憶錄，一般不包括近二十年來被多次研究和有多種著作行世的知名右派，以及出版有全集的右派作家和學者，而主要偏重於長期在社會低層生活的小右派的回憶錄。

在本文作者的回憶錄概念中，包括一般出版的日記、自編年譜和紀念文集、較完整的個人簡歷等。但本文所列出的右派回憶錄，主要以完整的長篇回憶錄為主，包括右派本人去世後由家屬編纂的紀念文集。除特別重要者外，一般不列單篇的個人回憶或者相關研究文獻。也就是說，右派回憶錄，以作者本人的回憶為主(包括家屬編纂的紀念文集)，研究者寫作的右派傳記只少量收入。

這些右派回憶錄分為公開和自費印刷兩類，自費印刷也包括雖有出版單位，但是以買書號方式完成的出版物(包括使用香港書號的出版品)，中國近年來對於反右派運動的研究多有限制，這些出版物一般很難正常出版，所以許多作者選擇自費印刷的方式讓回憶錄問世。因為是自費印刷，這些低層右派的回憶錄反而更加真實反

1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第840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鄭州。

映了歷史，對於後人了解反右運動的對中國知識分子造成的傷害有很大幫助。而公開出版的右派回憶錄因為出版審查的原因，對於真實的歷史多有迴避，而且在對歷史的認識的判斷方面也缺乏深度，比如王蒙的回憶錄歷史價值就不高。一般而言，凡自費印刷的右派回憶錄，歷史價值高於公開出版的右派回憶錄。

右派回憶錄書目：

- 《風雨九十年——潘大逵回憶錄》，成都出版社，1992年，成都。
- 《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北京。
- 藍翎《龍捲風》，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上海。
- 邵燕祥《沉船》，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上海。
- 邵燕祥《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7》，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香港。
- 魯丹《70個日日夜夜——大學生眼睛裏的1957之春》，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北京。
- 趙熙德《往事並不蒼老——一個50年代大學生的日記》，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北京。
- 陳銘樞《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
- 《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北京。
- 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北京。
-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北京。
-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北京。
- 《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9年，北京。
- 許覺民編《追尋林昭》，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武漢。
- 高兆忠《猙獰歲月愁 1957—1979》，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校史資料室編寫，1999年，太原。

- 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北京。
- 馬嘶《負笈燕園 1953—1957：風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北京。
- 李莊《難得清醒》，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北京。
- 《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北京。
- 《小書生大時代——朱正口述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北京。
- 劉心武〈樹與林同在〉，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濟南。
- 柳溪《往事如烟》，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武漢。
- 朱伯康《往事雜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上海。
- 吳容甫《劫海惡波》，自費印刷，2000年，長沙。
- 王覺非《逝者如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北京。
- 何濟翔《滬上法治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北京。
- 徐光耀《昨夜西風雕碧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北京。
- 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蘭州。
- 章文岳《大學生與盲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北京。
- 趙旭《風雪夾邊溝》，作家出版社，2002年，北京。
- 劉秀臣《真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北京。
- 劉皓宇《人·鬼·人》，自費印刷，2002年，長沙。
- 王玉林著《品味人生——反右蒙難五十年》，2006年，自費印刷，北京。
- 吳永良《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紀實》，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北京。
- 陳瑞晴《只有雲雀知道你》，自費印刷，2006年北京。
- 張偉《隻言片語——中國作協前秘書長的回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北京。
- 《舒蕪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北京。
- 李蘊輝《追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蘭州。
- 朱正主編《1957新湖南報人》，自費印刷，2002年，長沙。

- 殷毅《回首殘陽已含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北京。
- 李仕興《自掌嘴——我當右派的心路》，自費印刷，2003年，鄭州。
- 《彭文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自費印刷，2004年，上海。
- 茹家升《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遠方出版社，2004年，呼和浩特。
- 李泥《歷史傷口——二十年尋訪右派實錄》，自費印刷，2004年，北京。
- 陳炳南《赤子吟》，中國文學藝術出版社，2004年，北京。
- 高爾泰《尋找家園》，花城出版社，2004年，廣州。
- 陳為人《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4年，達拉斯。
- 邵燕祥《找靈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桂林。
- 倪良山《沉思集》，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
- 胡伯威《青春·北大》，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桂林。
- 邢同義《恍若隔世——回睽夾邊溝》，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蘭州。
- 王火《長相依》，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北京。
- 《自誣與自述——聶紺弩運動檔案匯編》，武漢出版社，2005年，武漢。
- 鐵流《風波萬里——鐵流詩選》，自費印刷，2005年，北京。
- 朱峰《在陽謀的祭壇上——天山深處一個小右派的苦難生涯》，稿本，自費印刷，北京航天大學，1998年，北京。
- 萬耀球《滾爬血腥路——憶我賤民，平民人生》，稿本，自費印刷，北京大學，2001年，北京。
- 許覺民主編《林昭不再被遺忘》，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武漢。
- 《楊兆龍法學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北京。
- 曹聚仁《北行小語》，三聯書店，2002年，北京。
- 袁冬林《浦熙修——此生蒼茫無限》，大象出版社，2002年，鄭州。
-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北京。
-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香港。
- 趙誠《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蒼桑》，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4年，武漢。

趙誠編《追尋黃萬里》，書海出版社，2004年，太原。

章詒和《伶人往事》，明報出版社，2006年，香港。

高新 何頻《朱鎔基傳——從反黨右派到鄧小平繼承人》，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台北。

馮亦代著、李輝整理《悔餘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鄭州。

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勞改基金會出版社，2005年，紐約。

巫寧坤《一滴淚》，允晨文化出版社，2005年，台北。

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出土記，見二閑堂主頁，<http://www.edubridge.com/>

《林希翎自選集》，順景書局，1985年，香港。

洪禹平《我與林希翎之間》，《江南》雜誌2006年第6期，杭州。

《與林希翎對談錄》，涂光群，未刊稿。

姚仁傑《我與北大同行》，未刊手稿本，北京大學，2004年，北京。

《烏“晝”啼——1957年“鳴放”期間雜文小品文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北京。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北京。

薛攀皋 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 1957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1998年，北京。

薛攀皋 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 1957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1998年，北京。

黃河清、北明等編輯《劉賓雁紀念集》，明鏡出版社，2006年，香港。

六、長篇小說中的右派史料

作文藝作品的表現內容，“右派文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經歷過兩個階段。先是在反右運動開始後，“右派”完全以反面形象出現，當時無論是詩歌、話劇、戲曲還是美術作品，右派都是丑角。在1976年以前的文學作品中，除了反右運動前後出現較多應景的

“右派文學”外(主要是一些學生作品，如北京大學張鐘以魯遲名義發表的《阿0外傳》，常宏《林希翎右史演義》、魏可《右派現形記》，吳天惠《夢幻曲》)。¹² 作為文學作品的題材，右派形象在文學作品中並不多見。

“右派”作為文學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是伴隨“右派”在政治上獲得改正後出現的現象。余易木的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較早表達了“右派”的真實生活，到了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電影《巴山夜雨》(葉楠)《苦戀》(白樺)出現後，“右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已發生了完全改變，接着張賢亮的《靈與肉》《綠化樹》等一系列作品，在表現“右派”真實生活處境方面又向前跨進一步。

整個八十年代，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右派”生活的基本都是“右派”作家，他們在思考反右運動和“右派”人生經歷中，思想還沒有完全解放，對於導致“右派”命運的真實歷史還缺乏拷問歷史的勇氣，所以這個階段的“右派文學”所達到的水平並不高，這可能與當時“右派作家”重新回到體制內並獲得主流認可有關，特別是丁玲、王蒙、張賢亮、從維熙、唐達成、李國文等“右派作家”，基本構成了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主體。在這一代“右派作家”中，劉賓雁和邵燕祥的選擇比較獨特，他們保持了獨立思考的勇氣，特別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他們主動自覺和體制保持了分離姿態。

進入二十世紀後，作為文學題材的“右派”主題，一度獲得作家的重視，但這次承擔“右派”題材回歸文學的作家，主要不是原來的“右派”，雖然王蒙在九十年代初期創作了《失態的季節》，但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幾部以“反右運動”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中，王蒙這部作品並不特別引人注意。在深刻表現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分

12 見《戰鬥的聲音——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文藝文藝作品選輯》第80、102頁，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學生的反右派文藝作品，原發刊物以學生雜誌為主，張鐘、吳天惠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有發表在《紅樓》和《浪淘沙》等雜誌上。

子的傷害程度，並同時表達對現實政治深刻絕望方面，楊顯惠關於“夾邊溝”的系列作品，龍鳳偉、方方的長篇小說，都比王蒙的小說更引人關注，因為這些雖然沒有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作家，在對“反右運動”的認識和思考方面超越了現實政治的制約。

長篇小說中的右派生活，並不能作為一種真實的史料來看待，但因為虛構文學的來源有史料基礎，同時作家在敘述反右運動的生活時，也涉及對反右運動史料的選擇和評價，所以也構成了反右運動史料的一個方面，特別是對後人了解這一段歷史，反映右派生活的文學作品，有可能也成為另外一種史料，也就是史學研究中常提到的間接材料，或者不經意的材料。

以右派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書目

王蒙《失態的季節》，199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方方《烏泥湖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北京。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天津。
尤鳳偉《中國1957》，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瀋陽。
趙旭《大饑餓》，作家出版社，2004年，北京。

七、方志中的右派史料

在近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新修方志是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個基本內容，至少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多數都完成了這一工作。本文的方志概念中包括了高等院校、文化團體、科研單位編纂的各種類型的機構史。

方志是中國保存歷史的一個傳統，真實、完整和系統是它的基本要求，但因為當代中國還不可完全擺脫意識形態對專業和學術的制約，所以新修方志的總體水平並不高，特別是對反右運動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通常會採取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的方法，不可能完

全承擔保存史料的歷史責任。但作為方志，總還在相關方面有一些綫索，特別是右派的履歷及右派的人數統計等方面，畢竟還是一個史料來源，在這方面，一些高等院校的校史及科研、文化單位的機構史相對嚴肅一些，在名人履歷中把右派經歷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記錄。丁抒《陽謀》一書中，較為重視使用方志中的反右運動史料，特別是對於基層社會反右運動的真實情況，通過對方志中相關文獻的梳理，經常會有新史料的發現，在反右檔案不能公開使用的情況下，這個獲取史料的方法應當重視。

中國政府對反右運動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一方面對這個運動基本做了否定評價，但另一方面卻不願意正視歷史事實。這種態度導致許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人，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採取有意迴避態度，比如朱鎔基、費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長，在正式履歷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經歷。這種現象說明，在中國社會現實中，雖然右派獲得了改正，但右派正統的社會地位並不高。我認為這與兩個事實有關，一是反右運動的具體當事人鄧小平本人，對這一歷史事件並沒有深刻的懺悔，雖然在主觀上承認了這一運動的完全錯誤，但在事實上並沒有徹底改變對原來右派的認識和評價。二是1976年後，中國政治生活雖然發生了變化，它的重要領導人也多次變更，具體政策時有改變，但基本意識形態並沒有轉換，這一事實決定了他們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在中共幾任總書記中，真正對反右運動有深刻認識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具體到中國社會現實中，基本情況是，早年負責反右運動的領導人，並沒有因為主流意識形態部分改變了對反右運動的評價而成為這一歷史的責任承擔者，他們依然佔居中國社會的主要領導地位。這種“我打你右派，我給你改正”的事實，直接影響了整個社會對反右運動的基本判斷，除了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獲得了正面評價外，越往社會下層，右派的真實社會形象，並沒有發生完全的改變。

從全國範圍內觀察，右派改正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並沒有顯著

變化，除了朱鎔基、費孝通、王蒙、鍾佩璋等少數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右派基本還是一個邊緣群體。由反右運動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實，大體還發生作用。

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人才流動的主要機制，它的發生與時代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建立時，它的主要領導層，以造反起家的人為多，凡造反成功以後，必然論功行賞。在這個機制中有相當一批人是以造反為自己主要才能的，但在一個沒有反可造的時代裏，這些人的才能就發揮不出來，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時代裏，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所以觀察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總是沒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而沒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於高位，比如1957年，當時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被打成右派的人，基本都是大學生。名單如下：¹³

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人員簡況

姓名	當時年齡	成份	當時職務
陳 模	35	學生	中青報副總編
鍾佩璋	33	學生	中青報副總編
陳緒宗	39	學生	中青報總編
李 庚	41	學生	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
彭子岡	44	學生	旅行家雜誌主編
劉賓雁	32	學生	中青報工商部主任
吳一鏗	39	學生	中青報文藝部主任
譚西山	38	學生	上海團市委副書記
董學隆	32	學生	雲南團市委副書記
賀惠芹	29	學生	四川團市委副書記
郭永澤	32	學生	哈爾濱團市委書記
項 南	39	學生	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 正	34	學生	江蘇團市委副書記
仇作華	34	學生	廣東團市委副書記

13 《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的決定匯編》，共青團中央組織部編，1959年，北京。

方志中關於右派的史料情況較為複雜，容當以後再細論。

八、右派的上書文獻

上書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表達政見的一種方式。在傳統社會，上書的主要對象是皇帝。上書的直接動機來源於法律、新聞的缺位。上書形式有兩種，一是單獨的個人行為，二是聯名上書。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依靠上書解決問題的事實非常多。就是在毛澤東時代，依靠上書解決問題的現象也很常見，比如李慶霖關於知識青年生活處境的上書，張天民關於電影《創業》的上書，都是明顯的例子。在現代傳媒出現(以電子傳媒為標誌)前，上書是真正的上書，而到了現代傳媒出現後，上書其實只是一種表達方式，它的核心意義並不是一定要讓上書的真實對象看到自己的意見，雖然這個願望始終存在。傳統上書的預期建立在偶然性上，所以上書的方式除了正常渠道外，主要依靠私人關係，因為私人渠道在一個非常態的社會中反而會保證信息的對稱，所以一般能發生作用的上書行為，通常都有私人背景。

本文提到的右派上書，專指近年來為了呼籲對反右運動歷史的重新認識和研究，一些具有右派身份(包括右派子女)的人，以上書形式表達政見的行動。這種行動的主要對象其實是新聞媒體和大眾。

採取上書的方式，只說明對高層解決問題有一種期待，並不完全相信高層對會此作出明確回應，事實上高層在看待右派上書問題方面，信息是不對稱的，他們沒有把上書者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看待，所以右派上書，目前它的意義還只在表達政見的層面上。右派上書起源於1987年2月由許良英、劉賓雁和方勵之發起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其他以個人名義向本單位上級領導尋求個人問題解決的表達方式，並不在本文所謂右派上書的意思中。

右派上書統計

《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1987年，北京。

《重慶“改正右派”呼籲書》，2003年，重慶。

史若平：《反右受害者及家屬子女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2005年，濟南。

蔣文揚：《重慶116名右派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2005年，重慶。

彭志一：《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和申訴信——要求國家對右派分子正式道歉並給予經濟補償》，反右運動受害者及家屬子女2007年，

任眾：《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2007年，北京。

《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屬敬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2007年，杭州。

周國興：《新疆右派上書中央》，2007年，烏魯木齊。

任眾等《必須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的錯誤政治運動——致國家主席胡錦濤》，2007年，北京。

九、簡短結語

反右運動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深遠，但關於反右運動的史料來源又非常有限，在研究者獲得原始檔案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首先意識到收集反右運動史料的意義是學術研究的關鍵，近年來中國學者已在這方面作了很多準備，比如冉雲飛編輯的《右派資料知見錄》，已有了較為開闊的思路和基本收藏，隨着網上“反右博物館”的建立和影響，可以期待反右運動研究的學術性將會得到提高。¹⁴

14 反右博物館(<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fanyou/0000.html>)

一個時代學術研究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材料的發現和新方法的運用。反右運動，作為學術研究對象具備相當的豐富性，在相關檔案不開放的歷史現狀下，依靠社會各界力量，有計劃有系統完成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並編纂成形的研究文獻是迫切的學術基礎工作。

目前反右運動研究的史學地位還不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右運動研究中，原始文獻的使用率較低，多數研究依賴零散的第二手文獻，所以史料先行，應當成為反右運動學術研究未來前途的必備條件。成熟的學術研究，應當建立在較為完備的史料基礎上，不然很難提升反右運動研究的學術水平並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所以建立反右運動史料學，應當成為當下重要的學術工作。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之學術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1957年的反右運動研究，隨着史料的不斷發現，有可能成為今後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新潮流。

2007年4月23日於太原南華門山西作家協會宿舍

五十年 無祭而祭

倖存者倖存下來幹什麼？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樂業，恐怕就應當是存留記憶和守護記憶。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在這本書裏，所描述的中國大陸文壇反右的情況，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膽俱寒。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喪失人性，每次運動都是這樣，豈止一個反右。後果是整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道德淪喪；後果是從圍觀活剝狗皮到山西黑窩奴工現象層出不窮，驚心動魄，且延續下去。面對某種強大的存在力量，個人情感與需求無論多麼重要，多麼真實，似乎都無須獲得尊重。於是，連人的生命也都變得像草一般，輕飄飄。

面對共同記憶，面對過去創傷性記憶是需要全民族來共同承擔的。反右運動的歷史不是五十五萬右派和他們的親屬子女的私產和包袱，也不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私產和包袱。我們既要從政治體制上追究歷史的罪責，同時還要從人性的深層拷問民族、群體及個人的責任。

章詒和，章伯鈞女兒，著有《最後的貴族》《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順長江，水流殘月》等書

ISBN 978-988-99455-4-1



9 789889 945541

港幣\$100 台幣\$400